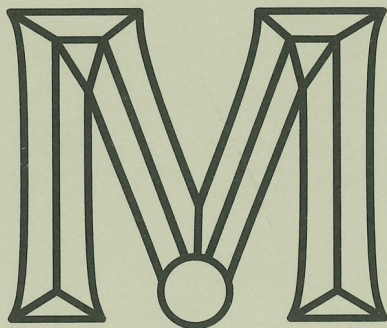


[MIRROR] 074

KIMBERLY KAY HOANG



SPIDERWEB CAPITALISM:

HOW GLOBAL ELITES EXPLOIT FRONTIER MARKETS

蛛网资本主义： 全球精英如何从新兴市场攫取利益

作者_ [美] 金伯莉·凯·黄

译者_ 汪丽



[MIRROR]

理想国译丛

imaginist

074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想
国

imaginist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满足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美] 金伯莉·凯·黄 著 汪丽 译

蛛网资本主义：
全球精英如何从新兴市场攫取利益

KIMBERLY KAY HOANG

SPIDERWEB CAPITALISM:

HOW GLOBAL ELITES EXPLOIT FRONTIER MARKETS

SPIDERWEB CAPITALISM: How Global Elites Exploit Frontier Markets

by Kimberly Kay Hoang

Copyright © 2022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5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3-2024-01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蛛网资本主义：全球精英如何从新兴市场攫取利益 /

（美）金伯莉·凯·黄著；汪丽译. — 昆明：云南人民

出版社，2025. 10. （2026. 1重印）— ISBN 978-7-222-23168-9

I. F740.2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5CP7702号

责任编辑：柴 锐

特约编辑：刘 铭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责任校对：金学丽

责任印制：代隆参

蛛网资本主义：全球精英如何从新兴市场攫取利益

[美] 金伯莉·凯·黄著 汪丽译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58千

版 次 2025年10月第1版 2026年1月第2次印刷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23168-9

定 价 98.00元

目 录

序 言 越南，胡志明市 001

导 论 蛛网资本主义 007

第一章 社交蜘蛛的缠结之网 035

第二章 吐丝织网：促成新的投资交易 077

第三章 不同类型的腐败和贿赂 125

第四章 全球精英的税务策略 173

第五章 隐形蛛网中的有罪不罚 203

第六章 道德困境和合理辩护机制 231

第七章 退出市场：盛宴与饥荒 257

结 论 解开混乱缠结的蛛网 289

附 录 研究精英群体的性别悖论 303

致 谢 329

注 释 337

参考文献 349

索 引 363

越南，胡志明市

那是某天下午 5 点，太阳正要落山。经过了一下午的炙烤，天气开始逐渐变得凉爽。就在人潮正不断从各自的办公室涌出时，我终于在市中心商业区的交通高峰期设法搭上了一辆出租车。

我正在路上，准备去见艾伦·唐（Alan Tang）¹，他是越南一家超大规模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管理着超过 20 亿美元的资产。在越南快速增长的外币投资市场中，艾伦属于一小群极其富有之人，而这个群体的人数正在不断攀升。

在当时，我认为艾伦可能就是我可以为这本书采访到的最重要的人了。他是经济市场运作的关键人物，对于解答许多相关问题都至关重要，比如全球精英是如何在像越南和缅甸这样的前沿市场（frontier markets）^{*}中管理投资风险的？为了能够采访他，我花了好

* “前沿市场”，也译作“边境市场”，在本书中主要指越南、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前沿市场”与“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概念类似，但也有不同。新兴市场一般是指相对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虽然新兴市场的人均经济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差距，但新兴市场的经济结构相对稳定，并逐步成熟，例如中国和印度。“前沿市场”相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发展程度要更低，尤其是在金融行业，部分国家甚至还没有证券市场，这些市场对应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相对不稳定，政局可能时常发生变动，市场的系统风险性更高。为了避免与外贸的“边境”概念混淆，本书一律采用“前沿市场”的译法。（若无特殊说明，本书所有脚注皆为译注。）

几个月时间。在此之前，我已经采访过他的几名员工以及他公司内部的法律顾问。在我们约定这次会面之前，他搁置过一次我的采访邀约，还有两次是要求我重新安排会面时间，所以今天我一定不能迟到。我还有 30 分钟时间，但我得穿过十个街区，要是没有交通堵塞的话，这本来不成问题。

在拥堵的路上，我坐在出租车里一直焦急地盯着手表看。我望向车窗外，不禁感到一阵不安，只见这座城市被汽车大军占领，它们在原来主要为数千辆摩托车修建的老路上制造着新一轮的交通拥堵。到了 5 点 10 分时，我开始恐慌起来，于是便催促出租车司机，问他能不能快点。司机在车流中加速疾驶，有一次，他甚至跟在几辆车的后面直接开到了人行道上，以便超过拥堵的车流。

已经是下午 5 点 25 分了，出租车距离酒店还有两个街区。我盘算了一下，发现要是我现在下车跑过去的话，可能还会更快也更安全。于是，我从包里抓出来一些现金付给了司机，然后便下了车，开始一路狂奔——穿着我的工作服和高跟鞋。

当我到达酒店时，我的手表显示的时间为下午 5 点 32 分。“糟了！”我心想。还是迟到了！我一边听着从酒吧那里传来的现场演奏的钢琴声，一边紧张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在这座城市最豪华的一家酒店的休息室里，气氛明显要安静得多，人们的步履也不像外面的人那般疯狂和匆忙了。我快速扫视了一遍，发现艾伦正舒适地坐在一张扶手椅上，身穿一套灰色细条纹西装，材质肯定比我穿的工作服要厚。显然，他并没有被外面的车流、闷热潮湿、污垢或噪声影响到，因为他置身于这个空调开放的凉爽空间内，还有服务生在一旁伺候。与我的火急火燎截然不同，他紧盯着手机屏幕，正在快速地打字，看上去是一副镇定自若、悠然自得的神情。

我整理好衣服，紧张地走到他桌边。“嗨，艾伦，我是金伯莉。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他抬起头来，对我说：“我正在这里忙着进行另一场会议，先请坐。”艾伦叫来了女服务员，她问我是点咖啡、茶还是酒。我告诉她，我只想点艾伦点过的。于是，女服务员拿出一瓶冰镇的法国夏布利酒（Chablis），然后给我倒上了一大杯。

艾伦专注地在他的手机上继续忙活，我便拿出我提前准备好的备忘录，上面列着我能在互联网上找到的所有关于他的背景信息。我知道艾伦曾管理一家公司超过15年，并让它从市值500万美元的一家小型单一管理基金公司发展成为一家大企业，并成功地在伦敦、加拿大和中国香港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他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积极参与者，还拥有两个荣誉博士学位。他也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生活和工作过，近期在中国香港定居。

艾伦的名字在当地的金融圈里如雷贯耳，我遇到的几乎每个人都会告诉我一个关于艾伦如何赚钱的故事，不过故事的版本各不相同。在越南，人们对艾伦的态度融合了嫉妒、羡慕和神秘感，这甚至还助长了不少谣言，比如，也有人说艾伦的投资策略涉及盗窃、洗钱和腐败之类的。不少人猜测，他的资金来源是中国香港一个著名的黑帮团伙——香港三合会（Triad in Hong Kong）。但是，如果艾伦在越南的名声真的如此糟糕，那他怎么还能继续从国外一些最具声望的投资者那里筹集到这么多的钱呢？而且，那些投资者都声称，他们会对其合作伙伴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

我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红酒，艾伦便忙完了。他立即问我道：“是金伯莉，对吧？你在越南这边很有名。你写过那本关于性产业的^{xiii}书”。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你在夜店酒吧做女招待的事情。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从那时起就认识你了。你真是个勇敢的姑娘。”我紧张地呷了一口酒，才意识到艾伦也同样调查过我。接着，他继续跟我说，

* 即下文提及的金伯莉的第一本专著《欲望交易》（*Dealing With Desire*）。

他略读过《欲望交易》那本书的导论部分。他告诉我，他十分钦佩我为了写作而亲自下夜店去一探究竟，深挖细节内幕。我都还没来得及把聊天的话题转移到我的新书项目以及我为什么要采访他这上面来，他就直接切入正题，说：“我明白，其实你知道我们是怎么在越南做生意的。那就请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忙？”

我回答说，我这次回东南亚是为了给一个新书项目做调研，这本书有关前沿市场中的外国投资。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的主要兴趣点在于像他这样的人如何巧妙地应对高风险的前沿市场。我们谈话的前30分钟颇为无聊。艾伦向我讲述的是他精心准备的公关故事，关于他如何凭借一个小基金公司管理者的卑微出身，摇身变成在这个市场中扎根下来的大人物。作为东南亚地区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越南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也曾就此采访过其他一些人。而他告诉我的老一套，我从那些人嘴里至少听过100遍了。艾伦所说的无非是，他也是乘着越南经济快速增长的东风才拥有如今的经济优势地位。

出于礼貌，我附和着点了点头，等他说完便问他：“据我所知，在越南以及在我正在研究的另一个市场缅甸，贿赂和腐败都是常态……那么，您是如何从外国投资者那里筹集到资金的呢？毕竟，投资者都必须严格遵守有关贿赂和腐败的法律条例。”

艾伦停了下来，将酒杯放在了桌子上，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问：“所以，你是想了解我的商业机密？”

“不，并非如此。”我向他解释了一番。我并不是对某个人的商业成功故事感兴趣的记者。我是一名学者，我来这儿是要采访数百人，以便了解不同人在巧妙地应对这些市场时的一些更为广泛的模式、流程和实践。

他居高临下地回答道：“在商界，有这么一句话。那些做不成事的才教人做事。我告诉我所有员工的第一件事便是，收起你们那

些花里胡哨的常春藤名校的学历证书，在入行前，请把它们都丢在门口。”他继续告诉我，商学院的教授总是浪费如此多的时间，来教学生如何去建立模型来预测或计算市场风险或业绩。但那些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因为在越南市场，有着太多不可预测的变数。

我继续向他追问一些重要的事情，接着，他告诉我两件事，而它们将会改变我的整个研究方向。首先，他说：“要想在亚洲的任何地方赚钱，你就需要掌握‘在灰色地带游走’（playing in the gray）的艺术。”这可是一门艺术，他解释说，那些能够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人知道如何巧妙地在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之间游走。他们抢先于市场和法律，即抢先于官方正式的监管程序，这主要是指在没有合规许可证、注册登记或税收凭据的情况下就开始建设或投资运营。但是，此举会得到政府官员心照不宣的保护，因为这些官员会以接受礼物或贿赂的形式参与分红。这就是能使这些地方成为前沿市场或新兴市场的原因。

xiv

其次，他告诉我：“每位首席执行官的背后，都有一位董事长。”这些董事长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之人，他们富到从未出现在任何报纸，或者像《福布斯》（*Forbes*）这类杂志的公共排名名单上。这些超高净值人士 / 超级大富豪（UHNWIs）* “便拥有我所说的‘能使鬼推磨’的钱财……对他们来说，这些国家的前沿市场只不过是轮盘赌桌上的一个小方格而已”。他进一步解释说，本地的首席执行官“只是交易时抛头露面之人……当然啦，我们也赚到了很多钱，但我们也承担着所有风险，而且容易成为‘落马之人’（fall guys）”。董事长实际上“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并且，他们也

* 超高净值人士 / 超级大富豪一词是“ultra-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的首字母缩写。由于“超高净值人士”为本书中的高频词汇，译文根据前后文的语境和句式的连贯性将其主要翻译为三种——“超高净值人士 / 超级大富豪 / 主导型大蜘蛛”，“HNWIs”一词也会根据具体语境翻译为“高净值人士 / 富豪 / 从属型蜘蛛”这三种。

不用向任何人负责”，因为他们隐匿在遍布全球的资本网络中一层又一层公司的背后。²

这次采访在我心中播下了一些想法的种子，这些想法不仅会改变我的研究问题，还会改变我对这个问题的一整套研究方法。随着此项研究的深入，我慢慢揭开了一张由人脉和各种机构构成的、协调着世界各地资本投资的庞大蛛网——这些人和机构都掌握了在灰色地带游走的游戏策略，因而才能如此紧密勾连。

2016 年，一个匿名消息来源泄露了 1150 万份财务档案，它们通常被称为“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这些本来因“律师—委托人保密特权”而远离公众视野的文件，却将 50 多个国家的 140 多名超级大富豪——这份名单还包括某些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与设立在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巴拿马和英属维尔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等 21 个避税天堂中的离岸公司联系起来。¹ 2015 年，对“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下文将简称“一马公司”（1MDB）]* 调查的报告揭露，有 45 亿美元的马来西亚公共养老基金被该国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和马来西亚金融家刘特佐（Taek Jho Low）窃取进私人腰包。这种事件并非发生在某个“遥远”东南亚小国某处的一个孤立事件。在一次对“一马公司”的调查中，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最大金融机构之一的高盛集团（Goldman

* 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是马来西亚财政部全资拥有的一个战略性的开发公司，在 2013—2015 年被曝出负债 421 亿令吉，引发了贪污腐败丑闻和诸多争议。

Sachs)就曾承认,它们为了获取有利可图的商业交易,曾合谋向马来西亚和阿布扎比(Abu Dhabi)的官员行贿超过10亿美元。²这起欺诈不仅涉及来自美国的同谋者,而且也对美国的政治产生了影响,因为刘特佐将资金转移到了同伙的账户中,同伙中就包括海地裔美国说唱歌手普拉斯·米歇尔(Pras Michél),后者又将这笔资金汇给了两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即“黑人投票团”(Black Men Vote)和“特朗普必胜团”(Trump Victory),以游说支持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³

2 此类离岸丑闻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在合法和非法市场之间深层交织的联络网,也向我们揭示了全球金融结构所产生的这个金融“黑洞”到底发展到了何种可怕的地步。在这个“黑洞”中,只有极少数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精英可以通过一些离岸空壳公司来转移和管理他们的资金。这些都是没有实际业务运营的空壳公司,其设立的唯一目的就是持有资金、管理其他实体经济组织的金融交易、合法避税,以及掩盖境内资产的真正所有者。⁴在各种各样的丑闻事件爆发之后,很多记者和学者都曾试图绘制出这些复杂网络的示意图,但众所周知,这类玩家极难追踪。在这本书中,我揭露了这些隐形人脉网背后的运行机制。这些人通过由律师、会计师、公司秘书和中间人(fixers)构成的隐秘而错综复杂的蛛网互相勾连,进而也就能跨多个主权国家来促进一些非法交易活动。通过仔细研究越南和缅甸等新兴市场,我揭示了世界各地的金融精英是如何利用离岸实体将他们自己与来自欠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精英及其经纪人联系起来,并隐藏在全球资本主义网络之中的。

本书以一个主要的问题为研究中心:全球精英如何利用和开拓高风险的前沿市场?正如我接下来将展示的那样,答案便是:在灰色地带游走。为了理论化“在灰色地带游走”的策略,本书的目标共有三个:(1)揭示这一人脉网络的结构,我将其称为“蛛网资本

主义”；（2）调查研究那些在全球各地赚钱并利用离岸工具转移资金的人士；（3）揭示全球精英如何利用合法和非法行为之间的灰色地带来建立重要的社交和政治关系，而正是这种关系让他们能够开拓新兴市场。

揭开谜底

为了讲好这个故事，我将先从两个国家——越南和缅甸——开始，这两个国家吸引了很多寻求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者。这群投资者借鉴了西方制定的旧有策略，并在监管结构较弱的前沿市场利用它们来抢先于当地的政治和法律体系。

2016年4月，在富布赖特全球学者计划（Fulbright Global Scholars program）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资助下，我收拾好行囊前往东南亚地区，计划将越南的胡志明市和缅甸的仰光市作为接下来18个月我的研究基地和大本营。然而，现实转变之快，我连想都没想到，我的计划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追踪数据进行调查时，我发现了一个更大的谜题，它将胡志明市和仰光市，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联系在了一起，接着还会延伸得更远，将它们与一个更广泛的离岸外包系统联系起来。³

在为我的第一本书《欲望交易》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我曾往返越南多年，因而也在那里发展了好几位联系人，他们对推动我第二本书的研究也至关重要。我将缅甸也包括进了此次的项目研究，因为有好几个以前的联系人已经搬去仰光，并在那里开设了办事处，希望能将业务扩展到一个更新的前沿市场，他们的搬迁进一步促成了我在研究与缅甸市场的接触。在缅甸，我被介绍给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刘轩（Xuan Liu），该公司在越南、缅甸、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设有办事处。刘轩让我担任他的私人助理，并慷慨地教了我很多关于越南和缅甸的外国投资环境方面的知识。我在刘轩的办公室工作过的那段时间对我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那份工作教会了我如何掌握一种新的专业金融语言。后来，这也有助于我确定相关技术性问题，以便向投资者进行提问。

我早年曾经在某家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份经历也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人类学教授侯凯伦（Karen Ho）所说的“前台”（front office）和“后台”（back office）办公室中的相关政治策略。⁵跟着刘轩四处走动和工作，我得以目睹他在“前台”开展的工作，其中大部分都涉及与公司外部的潜在投资者和政府官员打交道的联系工作。刘轩会把他开源引流来的一些交易交给后台办公室中的员工来打理，员工们主要执行交易中具体的技术性工作。刘轩还将我介绍给他的团队，说我是对东南亚的外国投资感兴趣的研究员，目前也是一名会帮助他处理任何所需事务的助理。我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NDA），协议规定，我所写的任何关于公司的内容，都将由公司内部的相关方先行审读考察。在这之后，刘轩便将我介绍给了他的管理团队。这就意味着，我现在可以进入真正的“后台”办公室了。

虽然我在后台办公室完成一些低级任务时也对金融体系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我在办公室以外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中习得的东西要更多。这些会面大多定在办公室员工的午休时间，地点在附近的酒吧，我们在交流采访中共度了这些欢乐时光。我非常感谢律师“宣”（Tuyen），他担任公司内部的法律顾问。宣出生于越南，但在加拿大生活过很多年，并且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在我们第一次午餐会面时，宣问我是否知道什么是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或控股公司。我不知道。正如我后来所发现的那样，这正是解开我的许多问题——比如这家公司如何帮

助全球精英开拓前沿市场——的关键所在。他解释说，特殊目的公司是在海外离岸市场上设立的空壳公司，对于宣经营的业务来说，“离岸”市场便是指中国香港或新加坡。这家空壳公司是一家控股公司，其主要作用就是持有在越南或缅甸境内的子公司。这一切对我来说完全是新的，所以我便请他用外行也能听懂的方式向我作一番解释。于是，他给了我下面这个例子。

超级大富豪在世界各地都有投资。对进入腐败程度高的风险市场，他们通常抱有谨慎态度，因为这可能会产生刑事和声誉方面的双重不良影响。因此，他们便会对在中国香港或新加坡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或控股公司进行投资。接着，中国香港或新加坡的那家空壳公司再进行投资，它在合同文件的字面意义上持有在越南或缅甸经营实际业务的当地公司的股份，但是，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超级大富豪在越南或缅甸进行了投资。如果在岸投资出了问题，离岸的特殊目的公司还有一道法律上的防火墙，这样就可以保护他们其余的所有资产不受在岸投资的影响。例如，如果越南政府向他们发出一份补缴税款通知单，该国是不能对他们在韩国、泰国或罗马尼亚的其他投资设置留置权的。每项投资都有自己的空壳公司，这样就能将所有投资安全分离。这些做法在技术上是合法的，但它们处于灰色地带，并且也是故意保持不透明的。离岸公司都是在投资受益人居住地或业务运营地以外的司法管辖区域内登记注册的，这就让那些受益人难以被定位和追踪。

我就这样在越南和缅甸生活和研究了六个月，在这以后，搜集到的数据又将我带到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这些地方，我与常驻那里的一众律师、银行家、公司秘书、会计师和基金经理取得了联系，但他们只专门从事在越南和缅甸的在岸投资业务。我的项目研究设计一下子从原来的两个国家变成了现在的四个地区，这种方向上的转变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是，等我一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便向我敞开了大门。此次搬迁导致我又采访了更多人，我在这些采访中了解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母公司其实也是设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巴拿马、开曼群岛、萨摩亚（Samoa）和塞舌尔（Seychelles）等地、范围更广的空壳公司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次接触到蛛网资本主义时，我感到无比震撼。当这个故事在我面前徐徐展开时，我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追踪它，而且正如我将会了解到的那样，很少有人能够追踪到这些庞大复杂的资本蛛网。

5 设立这些特殊目的公司的金融专业人士在其各自领域都特别专业，以至于他们对自己帮助设立或控制的实体公司究竟如何与海外的母公司产生联系反而知之甚少。事实上，正如一位律师向我解释时说的⁵那样，他们“不知道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或巴拿马的上面一层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上司在越南或缅甸是如何行贿的，这些反而在他们周围建立起了一道法律防火墙，因此，也就没有人会被牵涉进整个交易过程”。通过对这些叙述的进一步探索，我开始意识到，在越南和缅甸的投资也并非仅仅是在这些国家内部进行。所有权和投资工具并不会从 A 国直接转移到 B 国。与此相反，它们都嵌入了一个全球性的子公司网络之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完全了解 A 国与 C 国至 F 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的资本所有权体系。结果就是，我的整个民族志研究课题的范围变得更大了。

我开始思忖：参与构建这些金融蛛网各个部分的不同专业人士都有哪些？在大型投资组合中，从事一小部分工作的金融专业人士在构建这些蛛网结构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像越南和缅甸这样的小市场又是如何与更广泛的全球资本主义生态系统相互勾连的？我身上作为教授的部分蠢蠢欲动，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学者们没能够捕捉到这个故事的全貌。回答好以上这些小问题将对理解在灰色地带游走的艺术至关重要。因为，事实证明，有一群超级大富豪隐藏在

层层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专业人士的背后，也只有他们才会确切知道资金是如何流动的。董事长（艾伦和刘轩都会这样称呼他们）雇佣了高级管理人员、资产经理、私人财富经理、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公司秘书、中间人和代理人（nominees）。所有这些专业人士共同创造了市场，他们通过离岸基金建立起了鲜有人知的资本蛛网，使他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资金，而无需遵守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规章。

蛛网资本主义以及在灰色地带游走

蛛网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以其错综复杂的子公司网络为特征。这些子公司跨越多个主权国家相互勾连，几乎不会被外人知晓。离岸金融中心使金融精英和政治精英——在欠发达经济体中，他们往往是同一批人——牢牢获取了积累私人财富的独家和“准合法”（quasi-legal）的机会。这个蛛网是如此错综复杂，涉及如此多的层级和参与者，以至于难以追踪。蛛网上的每一根蛛丝都是由金融、法律、行政管理和公共关系方面的专业人士组成的网络节点连接起来的，但他们都对彼此遁形隐身，故意掩盖他们自己与蛛网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主导的大蜘蛛就是控制整个蛛网的超级大富豪，但是，这些主导大蜘蛛会使用“代理人”或“中间人”来给他们的交易——可能会被视为“肮脏”或腐败的交易——打掩护。这些代理人都是些较小的蜘蛛，它们在巨大的全球蛛网和新兴市场上的较小蛛网之间穿针引线，连接蛛丝。这些较小的蜘蛛是高净值人士，他们在代表超级大富豪建立这些资本蛛网时也会获得高额报酬。迄今为止，外国资本在信任和合作水平低的市场中的迅速崛起令人费解，我认为，蛛网资本主义解释了这一原因，即它们是利用离岸投资工具的复杂结构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仅仅绘制出一张蛛网图还是不够的。于是，我继续深入研究，想要探究这张蛛网从一开始是如何构建起来的。我认为，这些构建策略便包括小心翼翼地“在灰色地带游走”，涉及利用合法/非法、发达/不发达、清廉/腐败、民主国家/掠夺性国家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些二分法之间的灰色地带，也是加深我们对一个投资悖论的理解的关键：国际金融机构和全球治理机构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经济真言（economic mantra），即经济发展只会发生在具有强大法治的经济体中，因为对于国际资本而言，这让投资更加安全可靠——然而，本书中所揭示的事实正相反，其中的案例表明，经济增长在法治薄弱的经济体中也能维持。

通过绘制出蛛网结构图，并且揭示出创建了这一蛛网的人员及其流程，本书意在阐明，全球资本越来越不受单一民族国家的束缚和限制，因为富人和他们的财务顾问会使用离岸工具结构来经营投资、获取营业执照，然后再“洗白”他们在全世界证券交易所的投资中获得的那些来路不明的“灰色资产”。本书旨在提供一个窗口，能让人们去了解由金融专业人士创造出来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他们跨境转移资产，通过离岸工具来摆脱受制于地缘政治的法律的约束（这些离岸工具“使得经济精英能够自行选择将用于管理他们自己的金融交易的法律空间”⁶），与政治精英建立起人脉关系，并通过在法律、金融和政治的灰色地带中游走来赚取大量钱财⁷。

在解开资本主义蛛网时所遇到的障碍

这次研究蛛网资本主义的组织架构及其人员构成的民族志之旅让我满腹狐疑，为什么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资本市场是以这种方式相互勾连的呢？虽然前沿市场无疑是资本蜘蛛扩展蛛网的新

领域，但是这些运作策略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就一直在被使用了。⁸ 三个重要障碍限制了我们对这些蛛网的进一步研究，也遏制了我们 7 对其进行理论化分析的能力：（1）那些对离岸金融感兴趣的人，只会研究这个大难题中的一小部分，因而一叶障目；（2）我们过度依赖经济学家的分析，而他们主要使用定量分析和间接的网络工具，这就限制了我們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因为真实的人往往会以混乱、非理性和不可预测的方式来创造市场；（3）强大的机构过于强大，对研究带来威慑和阻碍——另外，此类研究所需的时间和资源成本也都很高昂，因为资本蛛网中的这些个体极其难以接触。⁹

且让我先从学者之间存在的问题展开我的论述。正如金融专业人士是专业化的从业人员一样，学者也是如此。法律学者主要关注律师在编写法律法规和改变法律的地理适用性方面的作用。¹⁰ 经济学家通常假设发达市场是理性的，并且会在一套明确的规则、法规和法律体系下运作，“因为精英们需要能够确保持久、稳定特权的某种组织架构”。¹¹ 相比之下，欠发达市场的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各种破坏性策略（*tactics of sabotage*）也被“用来确保巩固某些特殊优待或偏好”。¹² 虽然经济学家也会研究离岸外包的金融世界，但他们更多关注的还是税收以及转移利润的方法。¹³ 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没办法做到在“民族—国家”的视域之外，或者在划分第一世界 / 第三世界、南 / 北半球的视角之外，开发出一种看待金融市场的新方法。¹⁴

缺乏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一叶障目，过度关注了这个更大难题中的一小块，而且也南辕北辙，完全跑错了方向。几乎没有学者会在第一世界 / 第三世界或全球城市研究的视域之外，将律师、银行家、财富经理、会计师、中间人和公司秘书这些角色联系起来，而他们其实都在更大的投资网络中扮演较小的角色。政治学家提出的那种跨国比较研究则进一步削弱了我们

研究这些国家的能力，因为它们实际上都是通过离岸网络工具而相互勾连在一起的。

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快速增长以及政府在规范国际金融活动方面的作用不断减弱，社会学家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便将其研究视角从关注民族—国家转向了关注全球各大城市。¹⁵ 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和巴黎成为关键地缘城市，作为组织全球经济的指挥中心而闻名。¹⁶ 萨森认为，这些城市对于推动全球市场的扩张至关重要，因为城市是协调高度专业化的金融市场的重要节点和指挥所。¹⁷ 与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有所不同，这些城市互相协作，共同构成了一个最终能够促使各个发达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系统。萨森的研究框架最强大的地方便在于，在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大背景下，她关注的是其他地缘空间单元及其发展的规模。¹⁸

8 我们要么倾向于在单个国家内研究金融和资本，要么就是在研究跨国金融和资本流动，因为从历史上来看，这都是很重要的。以前各国从其他国家榨取财富，主要是通过政治统治和殖民主义来实现的。但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化使各大公司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运营，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而离岸审计系统的创建则使全球各行各业的精英得以聘请金融专业人士来帮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相关的法律结构。因此，以前那些基于国家的、用来理解经济流动的研究模型，现在充其量也只是片面的。我在本书中采用的研究方法使原本错综复杂的金融精英之网变得清晰可见。这些精英隐身于层层蛛网背后，藏匿在被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称为“空头企业家主义”（paper entrepreneurialism）¹⁹ 的迷宫之中。这种安排便使得置身纽约或伦敦的金融代理人能够去积极开拓合法的离岸金融空间和业务，这种离岸金融空间既不受国家监管机构的监管，也在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与解释范围以外，因而不为人知。²⁰

揭开资本蛛网的第二道障碍，与我们过度依赖经济学家的分

析结果有关。其实，有些经济学家自己也深知并曾正确地指出，在世界金融中心所在的全球性大都市中，“国际金融统计数据一直存在系统性不一致，因为统计报告中的经济负债总是要比金融资产更多”。²¹ 在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所著《各国的隐藏财富》（*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他认为，全球8%的金融财富都被其所有者转移到了海外，这使各个国家损失了大约2000亿美元的税收。²² 尼古拉斯·沙克森（Nicholas Shaxson）认为，一半以上的银行资产、三分之一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85%的国际银行业务都被转移到了海外的离岸市场。²³ 罗内·帕兰（Ronen Palan）和其他研究者也同样道出了离岸投资基金的隐身性，他们阐明了离岸司法管辖区是如何做到（主要是通过为了规避法律而创建的特定法律空间）让超级大富豪、富豪和跨国公司实现“在其他地方”现身，或者“在理想情况下完全不现身”的。²⁴ 经济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巴尔·扬（Cristobal Young）从天体物理学的概念中汲取了理论灵感，他将富裕精英转移到海外的大量资产隐喻为“黑洞”，认为此举“（造成）了国际财务收支状况统计中的异常”。²⁵ “黑洞会以特定的方式扭曲光和引力，因而，就像天文学家可以对其进行探测那样，避税天堂的存在也正在以其特定的方式歪曲国际财务的统计，而这势必会留下一些关于它们的存在及其规模的蛛丝马迹。”²⁶ 但是，光知道那里存在一个黑洞，以及金钱正在被其吞噬，仍然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找到方法来了解造成这些巨大统计差距的相关背景和结构状况，这得要观察真实的人是如何巧妙地利用这些市场的。

最后，关于经济如何运作的传统智慧也未能解释这种转变，这是因为，很少有学者有充裕的时间、相关的训练和充足的资源来探索如当前这般规模庞大的全球经济。正如我在书后的方法论附录中所详述的那样，这类研究成本高昂，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且要辗转世界各地进行调研，还要想方设法招募到那些愿意坦诚相谈其金融实践的研究参与者。

本书利用了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法律和经济学中的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理解蛛网资本主义以及在灰色地带游走的游戏策略。因而，在这个繁杂缭乱的万花筒中，本书的焦点可能也会因为读者的个人学科视角而有所不同。

然而，我认为，第一世界 / 第三世界、成熟 / 不成熟的市场，或者清廉 / 腐败市场之间的二元对立式划分，导致我们无法看清前沿市场中的腐败或灰色交易是如何与民主社会中的成熟市场紧密勾连在一起的。²⁷ 将所有这些市场关联起来的黏合剂，就是全球精英所使用的特殊目的公司和控股公司，它们超越了所有主权国家。离岸金融中心既服务于一些主权国家，也迎合全球富人的需求，这些富人依靠其他国家来帮助他们保护自己积累起来的资本，而与此同时，这也削弱了某些国家的经济实力。

对于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来说，本书的目标即通过展示真实的人是如何织就这个蛛网的，进而去为全球资本描摹出一副面孔来。这个目标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全球资本流动所做的大多数描述迥然不同。经济学家通常将资本视为高度抽象的东西，只能通过一组计算器和算法来挪动，但他们却很少关注市场中的人是如何相互关联在一起的。²⁸ 理论上，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学家理应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解释，但他们又过分关注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表现——这通常还是指一个孤立的公司或在公司中的行为表现——而不是着重于他们如何做市（market making）。与此类似，文化社会学家的一项重要工作聚焦在富人如何看待他们自身的财富，但其实，富豪对富裕的焦虑只有在他们赚得盆满钵满之后才会浮现出来。²⁹ 最后，人类学家主要关注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些后果，特别是当外国投资进入一个国家之后会发生些什么，以及这

反过来又会如何影响到本土国家和当地人民等。³⁰

本书并不聚焦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或后果，但我会从 20 世纪杰出的社会学家 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那里汲取灵感。米尔斯所关注的是全球精英如何赚取钱财，以及他们从自身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中——他们不得不在灰色地带游走——创造出意义的一些方法。³¹

就实践层面而言，法律和经济学的视角审视了合法 / 非法、私人 / 公共、腐败 / 清廉等二分法之间的冲突和摩擦，这一视角认为 10 这些二分法的两部分之间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很多时候，合法与非法、正当与不正当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相反，非法和不正当行为甚至还促进了合法和正当的做市行为。正如汉娜·阿佩尔（Hannah Appel）所主张的那样，离岸结构既是容纳前沿市场资本累积来源的容器，也充当着一种运作工具，使这些非法性质的资本变得合法化，而这一过程是在一个外界无法捕捉和量化而且纠缠在一起的网络回路中实现的。³²

我认为，在联系紧密的小型人脉网络中，人们会同时通过“破坏”和“协作”的策略来做市，而在这些网络中，合法与非法、道德与不道德以及正当与不正当的两面其实是彼此紧密勾连的，就像非法的行为也会促进合法的做市行为一样。³³ 通过分析腐败如何实际上促进了前沿市场中的经济交易，以及这些赚取到的资本如何改头换面，在离岸金融结构中被洗白并在全球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过程中逐渐公开化。我揭示了两个看似对立的经济体是如何通过复杂的空壳公司链交织在一起，并最终构成了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体系的。

首先，我会从研究前沿市场入手，阐明大多数资本积累是如何通过一系列通常被认为是肮脏和腐败的交易开始的。在这里，自当地基层起，企业家会努力通过扩大规模和加快发展速度来吸引外国投资者，并通过错综复杂的贿赂网向当地政府官员行贿来逃税，以

便最大限度地积累利润。随着各个小公司发展成熟，它们会通过一套专业化的过程进入全球证券交易所。与此同时，曾经以贿款形式支付的资金通常会通过离岸金融中心的空壳公司网络中的合法架构来洗白。这些资金通常不会被闲置，而是会通过一组指定的代理人投资到世界各地的成熟市场中去。

全球民族志研究

本书将民族志研究方法与网络化方法结合起来，既绘制出通过网络互联的各个机构，也描述了经由该网络所勾连起来的具体内容。民族志研究方法是一种可以用来放大和缩小的工具，本书使用这一方法跨多个国家进行研究，并将看似相互矛盾、实际上却利益互补的市场行为者联系起来。通过开展这种全球民族志研究，《蛛网资本主义》绘制出了这些系统协同合作的方式，并将与离岸金融中心、影子银行、法律法规和合同，以及在前沿和新兴市场上的外国投资有关的各种视角汇集到一处。³⁴《蛛网资本主义》的研究跨越了一定的空间广度，并揭示出这些市场如何依赖与国家的特定关系（特别是在正当和不正当之间游走时），本地的其他个体如何围绕毒品、性和不忠行为的道德困境进行协商，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贿赂获得最有利可图的交易。

为本书的研究项目而收集的数据也映射出了一个遍布世界各地的全球金融精英网络。在2016—2017年的18个月中，我旅行的航程超过了35万英里*。为了追踪全球资本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我一会儿飞到设立离岸账户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和巴拿马等地，一会儿又飞到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或控股公司的中国香港和

* 一英里约为1.6千米。

新加坡，经过这些地区的资本，最终会被投资在越南和缅甸的在岸市场。除了将仰光市、胡志明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作为我的研究大本营，我还曾多次跟随当地公司的代表飞往全球各地。他们旅行时会带着销售单去募集私人投资资金，也会带着寻求投资交易和部署资金的“资金运作者”（money movers）。通过这种方式，本项目便为调查那些并不总是“在地上”的田野调查点提供了一个模式。我几乎总是从“高空”观看，无论“高空”是指在飞机上，还是指某家酒店或办公楼的顶层。真正位于地面上时，我也经常只是随行团队中的一员，在安保人员的护送下，乘坐带有有色窗户的汽车，沿着精心策划的线路参观那些投资地点。像那些外国投资者一样，我们身处车上，无法看到也无法深入了解汽车外面、我们周围的社区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总共采访了 300 多人，包括超级大富豪和帮他们管理资产的人，比如私人财富经理、基金经理、主席董事长、当地企业家、高级战略主管（C-suite executives）、律师、银行家和公司秘书等。当我与超级大富豪及其雇佣的金融专业人士在国际化城市和本地化投资区之间旅行时，我才开始明白，对于我研究中的超级大富豪投资者来说，这个世界并不是按照各个国家的国界线来划分的，而是按他们的投资来划分的。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只被分成了适合投资的富裕地区和不适合投资的贫穷地区。³⁵ 然而，那些在全球范围内研究精英的研究者，通常不会凭经验来区分出富人中的不同社会阶层。³⁶ 但是，我认为，区分出超级大富豪和有高薪回报的金融专业人士（即高净值人士）的上下层级至关重要。后者只是帮超级大富豪管理资产的人，而这两个层级在富人中的占比也是很不同的，前者占前 0.1%，后者占前 1%—10%。³⁷

本书明确区分了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dominant spiders，即超级大富豪）和它们的下属同伙蜘蛛，前者只占富人总人口的前 0.1%，

12 在本书的界定中，大蜘蛛的下属同伙是富人阶层中前 1%—10% 的人。富人阶层中占前 1%—4% 的人在本书中被称为从属型蜘蛛 (subordinate spiders)，他们是富豪，主要包括资产经理、基金经理、律师和银行家。还有一组从属型蜘蛛，他们属于专业从业者和管理阶层，占富人总人口中的前 5%—10%。这个群体包括会计师、公司秘书和其他一些在建立这些资本蛛网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主导型大蜘蛛和从属型蜘蛛之间的关键区别，与他们和资本的所有权关系，以及他们作为个人在资本蛛网中的位置和角色有关。主导型大蜘蛛在这个蛛网中占据着更中心的位置，能产生更大的辐射性影响，只要他们想看，他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资本蛛网的更多部分。然而，他们雇用的从属型蜘蛛在这个网络中处于非中心、较边缘的位置，从属型蜘蛛只能看到这个资本蛛网的一部分，而且永远也不会看到它的全貌，但他们会为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提供专业服务，承担和减轻风险。

在当今世界，经济不平等日益扩大，可赢家却总是能通吃。2021 年，《福布斯》杂志将“超高净值人士（超级大富豪）”界定为至少拥有 3000 万美元流动资产（“银行账户或经纪业务账户中的资产”）的富人，并将“高净值人士（富豪）”界定为拥有流动资产在 100 万美元到 3000 万美元之间的富人。³⁸

对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现象的痴迷与关注也吸引了大众的想象力。《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国家新闻网（CNN）都提供了互动功能供人们输入各自的收入，以便找到他们自己所对应的财富排名和占比百分位数。2018 年 10 月，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最富有的、占前 0.01% 的超级大富豪，每年的收入为 2 756 865 美元，这就使得最富有的、占前 1% 的富豪的平均年收入大约为 71.9 万美元，而最富有的 5% 的富豪平均年收入也达到了 30 万美元（见表 1）。再

往下一个层次，作为专业从业者和管理阶层的那一部分人是占比前 10% 的富人，他们每年年收入约为 11.8 万美元。由于多种原因，这些差异在精英群体中其实是十分显著的。

占前 0.1% 的富人“不仅仅来自纽约、旧金山和伦敦这些显而易见的中心大都会，也来自孟买、莫斯科和上海等新兴大都市”。³⁹众所周知的是，《福布斯》杂志还惹人非议地创建了世界亿万富翁名单，它指出，在 21 世纪，大多数的亿万富翁不再来自西半球的国家。

在俄罗斯、东亚和东南亚以及中东地区，拥有巨大财富的富人正不断涌现。⁴⁰与此同时，《福布斯》杂志在此所列出的财富数字可能还是极为保守的。尽管《福布斯》尽力想要报道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他们还是经常会遗漏大量真正富有的精英，尤其是那些政治上有争议的国家中的精英，因为他们不希望见到自己的财富就这样被公之于众。生活在政治局势不太稳定的国家中，人们经常担心政府随时可能会针对他们，征用或没收他们的资产。但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资本的所有者已不再集中在第一世界国家。此外，曝光度高的政治公众人物（PEP）——担任政治要职的个人、他们的直系亲属，以及他们的亲密合作伙伴——通常会隐匿在高薪聘请的私人财富经理和资产管理者的背后，而后者则代表前者来进行投资交易操作。

15

我所研究的投资交易规模，在 20 万美元到 4.5 亿美元不等，主要涉及房地产行业、制造业、采矿业、高科技行业、服务业和贸易等。这些投资跨越如此多不同经济领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投资交易更多的是与人脉关系网有关，而非与某个行业的专业知识有关。政治上的人脉关系对各种交易经纪活动都很重要，一旦交易达成，公司就将聘请相应的战略高管来执行日常的实际业务运营（例如，管理员工和运营当地业务等）。

表 1 世界前 10% 的富人收入一览表，资料来源劳伦斯·米舍尔 (Lawrence Mishel) 和穆拉特·卡萨 (Mulat Kassa) 的研究，“自 1979 年以来，收入占世界前 1% 的人，其薪水上涨幅度为 157.8%”，“工作经济学博客” (Working Economics Blog)，经济政策研究所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2019 年 12 月 18 日

工资组	年平均工资 (以 2017 年美元价值计)										百分比变化			
	1979	2007	2009	2016	2017	1979—2007	1979—2017	2007—2009	2009—2017	2016—2017	大衰退时期			
	长期													
占底部的 90%	29 608 美元	34 542 美元	34 332 美元	35 838 美元	36 182 美元	16.7%	22.2%	-0.6%	5.4%	1.0%	4.7%			
90%—99%	96 843 美元	140 739 美元	140 373 美元	151 575 美元	152 476 美元	45.3%	57.4%	-0.3%	8.6%	0.6%	8.3%			
90%—95%	82 122 美元	110 096 美元	111 127 美元	117 817 美元	118 400 美元	34.1%	44.2%	0.9%	6.5%	0.5%	7.5%			
95%—99%	115 245 美元	179 043 美元	176 932 美元	193 773 美元	195 070 美元	55.4%	69.3%	-1.2%	10.3%	0.7%	9.0%			
占头部的 5%	148 063 美元	286 352 美元	262 307 美元	293 608 美元	299 810 美元	93.4%	102.5%	-8.4%	14.3%	2.1%	4.7%			
占头部的 1%	279 336 美元	715 586 美元	603 810 美元	692 948 美元	718 766 美元	156.2%	157.3%	-15.6%	19.0%	3.7%	0.4%			
90%—99.9%	241 260 美元	475 466 美元	434 834 美元	486 396 美元	492 311 美元	97.1%	104.1%	-8.5%	13.2%	1.2%	3.5%			
99.9%—100 %	622 018 美元	2 876 667 美元	2 124 597 美元	2 551 917 美元	2 756 865 美元	362.5%	343.2%	-26.1%	29.8%	8.0%	-4.2%			
富人年平均工资	38 161 美元	50 910 美元	49 571 美元	52 825 美元	53 474 美元	33.4%	40.1%	-2.6%	7.9%	1.2%	5.0%			

重要的是，本书借鉴了一些综合案例，因为我有意不从头到尾追踪某笔交易，以便保护我的研究对象的隐私并确保他们的匿名性。在越南和缅甸采访完以后，我会请那些关键的信息提供者给我介绍帮他们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设立机构的金融专业人士。当我通过一系列介绍人的推荐最后抵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之后，我又采访了这些人，问了一些与他们在越南和缅甸所从事的项目投资方面的经历有关的问题，而他们的这些项目经历与我正在当地进行实地研究的案例并不相关。在每次的采访中，作为案例研究中例行常规的一部分，我都会告诉我的每位受访者，我对他们本身（的交易）并不感兴趣；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识别和描画出他们和其他几位受访者所共享的更广泛的某些交易模式和实践。

这种方法通过将一系列境内的经济关系与境外的法律结构和外国投资者联系起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分析全球经济结构和经济地理的范式。这就像有六块不同的拼图，它们都有着各自独特的图案，但组成这六块拼图的碎片本身是相同的。因此，从每个拼图中取出几块碎片，我们可以重组出整个画面，同时又能模糊掉个体玩家之间的差异。

在 C. 赖特·米尔斯那部关于权力精英的开创性著作中^{*}，他描述了这样一群精英阶层，他们是一个社交封闭型的小群体中的成员，这个小群体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其中的成员都共享着社团主义的社会身份和彼此荣辱与共的联结感。⁴¹ 他们互相认识，会捍卫彼此。这是一个“自我维护的阶层”（Klasse für sich）——一个在上层阶级内部、具有自我意识、关心并守护自身的圈子。他们会将其他人排除在这个圈子之外，而且，正如米尔斯所解释的那样，只要你想要，你其实也可以在必要时“找到”他们。不出意外的话，大概率你都

16

^{*} 此处即指米尔斯的著作《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1956年）。

能在某个乡村顶级俱乐部中找到他们，又或者，他们总是被列为当地交响乐团音乐会的资助方。

《蛛网资本主义》讲述的是有关一种新型社会群体的故事，这种群体主要是由金融行业的参与者所组成，他们的行动不仅对公众，而且也对彼此保密。他们有高薪聘请的“代理人”或“中间人”来为他们掩盖踪迹。他们这个群体似乎没有什么社会凝聚力。虽然他们可能也会举行夜饮狂欢派对和其他一些秘密的聚会，以便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或者至少是互相挟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掏出一部相机来拍照留证。换句话说，这里似乎没有一个作为社会团结基础的“规范守则”。⁴²

关于我在灰色地带游走的几点说明

想要揭露这些“黑洞”，首先就得实地调查当地的人脉关系、资本网络和做市情况。在我担任刘轩的私人助理三个月之后，我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模棱两可的境地，或者按照我后来进行理论化后的术语来说，我正在灰色地带游走。我能够有机会参加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政府官员、顾问和外国投资商之间的私人会议和交流，这一下将我抛入了我正想研究的那个世界。然而，这也意味着，我正在秘密参与一些在越南早已司空见惯的交易。而作为一名美国公民，这可能会使我成为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所禁止的那类犯罪活动的从犯。在咨询了芝加哥大学的律师团队以后，我了解到，凡是被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规定为可能涉嫌违法的交易活动，我既不能亲眼见证，也不能实际参与。

然而，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往往并非总是那么泾渭分明，而这也并不光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事实上，许多的活动都游

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在越南，贿赂有时是含蓄而非明目张胆的。例如，某家公司可能会聘请一名顾问来帮助它与政府方面打交道。因为上述目的而被聘请来的员工，可能恰恰与政府方面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该员工很可能是某位官员的家属或朋友，那么，对于获取政府信息和有效驾驭复杂的监管环境而言，该员工就至为重要。可如此一来，付给那位顾问的薪水算贿赂吗？在越南，答案显然是“不算”，因为此人拥有访问政府办公室重要信息的渠道，而公司正急需此人。然而，在美国的社会语境下，答案就将会是“算”。在对中国香港的摩根大通银行（JP Morgan Chase）提起刑事指控的案例中，正如美国当局所表明的那样，该银行内部将此种关联戏称为“官员子女计划”（Sons and Daughters Program）。最后，摩根大通银行同意向美国当局支付 2.64 亿美元的罚款，“用以解除对该银行的指控，即认为该银行实施了贿赂官员的计划，（通过雇佣）政府高层领导的亲友来换取政府对其银行业务的投资”。⁴³

17

由于在该领域中存在着诸如此类的伦理困境，以及随后在学界又有一些与研究非法活动有关的争议，最终我离开了刘轩的公司。伴随而来的，是一些严重的方法论上的掣肘和限制。例如，我永远都无法目睹第一手的交易互动现场，此外，如果一家得到外商投资的公司存在两三代账簿——这在越南和缅甸都是惯常做法——我也不能亲自查验它们。⁴⁴

在向芝加哥大学和东南亚的几位律师寻求法律建议之后，我被告知，我无须报告被采访者在交易之外与我进行的访谈中私下对我所说的话。尽管如此，我最终还是决定不写任何关于刘轩或那家公司中任何人的信息，因为那太具有挑战性了，我很难做到保护他们的匿名性，并且遵守我在签署“保密协议”时给出的允诺。然而，在那家公司度过的时光让我了解到了一些相关情况，我可以使这些信息为我所用，比如，它们能帮我确定在我所招募来的采访者

当中谁才是关键人物。我不想完全放弃这个项目，所以我决定还是展开采访，但会对我的民族志研究有所限定，我会与我的研究对象一起四处出差旅行，因为他们正在世界各地筹集资金并寻找交易机会，以便将这些筹集到的资金部署在越南和缅甸市场。但在这些旅途中，我并没有全程参加任何会议。与此相反，我花了很长时间和他们一起乘飞机出差旅行，在早餐时间和下班后的小饮时间，我不停地跟进这些研究参与者，他们会给我讲述当天所发生的事情。顺便一提，我也不敢确定，继续留在那家公司是否会对我有方法论上的帮助和意义，因为我是无法从“后台”接近那些交易经纪流程的，那里的活动开展得比较缓慢、平凡琐碎，其专业技术性也很强，无法告诉我太多我真正感兴趣并想要研究的那些人和他们的关系性工作。

在我离开那家公司时，因为要确定一些市场上新的关键性参与者，我还面临着几方面的挑战。越南和缅甸都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这意味着有一批新的人与新的政权有了联系，他们可以轻松获得一些“特惠交易”（sweetheart deals）^{*}。例如，在越南，刚上任了一位新总理，随他一道升上来的还有一群新的下属，他们主导着越南的多个经济部门。随着市场上新的参与者攀登到监管严格的经济部门的顶端职位，旧的政府参与者将会因腐败罪而锒铛入狱，而在这新旧交替中的每一个人都试图弄清楚如何保护自身，以及如何去与具有政治权力的市场新玩家结盟并维持关系。正如我的一位受访者所说：“他们所有人都想要弄清楚该怎么去巴结讨好新的掌权之人。”

¹⁸ 与此同时，缅甸刚刚选举出了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作为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领导人和首位现

^{*} “特惠交易”指一种在商业交易中为某人或某团体提供优惠条件的协议，通常涉及亲密关系或内部人士，也可指私下达成的交易。

任国务资政（相当于总理），该国的外国投资者正因此事而兴奋不已。他们跃跃欲试，想要在这个新的市场大展拳脚。他们希望在经商时，旧有的裙带关系能够让位于一个民主和透明的商业环境。

在芝加哥大学三位本科生研究助理的热心帮助下，我们对报纸、杂志和领英（LinkedIn）等社群网站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以便寻找出潜在研究对象的一些联系信息。我也使用了“滚雪球抽样法”（snowball sampling）——寻求研究参与者的协助，让他们帮我确定其他的潜在受访者，并做一些重要的联络和介绍工作——让我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资产管理公司的人，给我推荐了其他一些联络人。在越南，我花了三个月时间采访了别人介绍给我的所有人，其中包括基金经理、家族企业办公室中的私人财富经理、公司内部的决策者、律师、会计师、银行家，以及在交易达成过程中各个不同方面的所有人士。在这些采访中，于不经意间，“离岸外包”这个词一遍又一遍出现。在前 100 次的采访中，有近 80% 的受访者使用的都是律师宣曾使用的术语，也就是人们用“特殊目的公司和控股公司”来描绘他们通过复杂的子公司链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建立离岸投资结构。这些初步的研究为我确定合适的研究问题奠定了基础，并最终也为贯穿本书的研究课题搭建了理论框架。

东亚和东南亚的崛起

东南亚转向很快便表明，“第一世界 / 第三世界”和“全球北方 / 全球南方”等旧有的范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构建全球经济框架了。在过去的 20 年里，我们目睹了全球资金流动的巨大变化，东亚和东南亚同时崛起的另一面，则是美国和西欧在全球经济主导地位日益衰落，这些变化也引发了一些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⁴⁵例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之间，纽约、伦敦和东京通过

管理不成比例的金融行业份额和大量的金融交易，巩固了它们作为执牛耳的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些城市也曾在很大程度上主导过全球经济。⁴⁶

19 然而，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这些城市的命运发生了一次逆转，而新加坡、中国上海、中国香港和首尔开始成为新一批的全球金融中心。⁴⁷正如王爱华（Aihwa Ong）、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和其他人等所揭示的那样，自此，亚洲经济如火箭升空般飞速发展，资本也在急剧增加。⁴⁸2000 年以来，“二战”后经济的长期增长，加上全球资产阶级的崛起，已经改变了区域内部的投资动态。虽然东南亚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过去主要是来自美国和西欧，但现在越来越多地来自东亚地区。⁴⁹

2012 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东亚地区占全球资本市场份额的 32%，领先于美国的 30% 和欧洲的 25%。⁵⁰截至 2011 年，亚洲百万富翁的数量超过了美国或欧洲。⁵¹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崛起，以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却经历了一直持续至今的经济滑坡。例如，在 2014 年 10 月，欧洲银行曾宣布，有 24 家欧洲银行都未能通过金融抗压测试。⁵²

特别是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一直保持着创纪录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在一些新兴和前沿市场上取代了西方国家曾经占据的霸权地位。新兴市场有望成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市场。⁵³新兴市场位于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并且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增长率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还多。⁵⁴结果就是，全球资本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意味着整个世界现在被一分为二，一边是富人，另一边是广大到无以数计的穷人，他们遍布在全球包括发达市场、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又或者，正如埃斯特瓦（Esteve）、普拉卡什（Prakash）和莫汉蒂（Mohanty）所审慎地宣称的那般，这是“三分之一世界与另外三分之二个

世界的对抗”，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超越了国界，共存于很多国家。⁵⁵

本书概述

《蛛网资本主义》一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通过追踪“社交蜘蛛”之网来绘制一幅全球资本流动的新图景。第二部分则聚焦于蛛网中的人员和机构，揭示金融精英（即资本的所有者）是如何通过雇佣一群金融专业人士来代替他们从事灰色交易的工作并联合抵御风险的。这部分的主要论点是，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是经济精英（包括本地和外国的投资者）与政治精英之间紧密联系的一个结果，这种紧密联系也导致了各种腐败和各种税收结构的存在，它们又使得全球精英能够巧妙地利用这些市场而免受惩罚。²⁰最后，本书第三部分聚焦于在这些新前沿市场中开展实地工作的个人，他们必须执行所有这些交易所涉及的具体工作，本章也会论述他们在灰色地带游走时所面临的一些道德上的困境。这些章节之间紧密关联，如此编排是为了能让读者了解，真实的人会如何面对这一系列的道德困境，而当这些人在努力克服这些困境时，他们又是如何为其行为辩护的。此外，在灰色地带游走的这些人，要么最后会获得巨额的利润，要么会惨遭巨大的损失。这本书也会揭示，遭遇巨变的他们又如何经历和体验这些足以彻底改变他们生活的后果。

具体而言，在“社交蜘蛛的缠结之网”（第1章）中，我提出了“蛛网资本主义”的概念，用来比喻那些精通灰色手段的离岸空壳公司所组成的复杂网络。在使用“社交蜘蛛”来做类比之后，我提供了一幅新图景来解释这个蛛网是如何构建的，并将蛛网上的主导型大蜘蛛和从属型蜘蛛之间做了具体区分。我使用了越南和缅甸的案例

来描述资本在被从离岸基金转移到在岸的新兴和前沿市场进行投资之前的各种流动过程。这与社交网络或金融专业生态系统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资本主义蛛网拥有独特的全球结构，超越了主权国家之间的界线。

“吐丝织网：促成新的投资交易”（第2章）则聚焦于个人和机构，本章主要聚焦相互协作以便达成交易的人们，试图为全球资本描摹出一副面孔来。有这样两群人，其中一群人拥有资本并希望能用它来赚取利润，而另一群人则代表资本的所有者去寻找交易，并将前者的资本投入投资运营中去。这些交易找到的是那些正在寻找退出机会以兑现其创业努力的本地企业。本章会将这些节点都联系起来，展示他们是如何结盟并走到一起的。我将会阐明，在数据贫乏和缺少事实依据的市场中，经济精英是如何利用人脉关系和社交联络网来筹集市场资金的。

“不同类型的腐败和贿赂”（第3章）回答了以下问题：“全球精英如何开拓和利用前沿市场？”答案是主要通过采取多种遮掩策略。本章提供了一幅他们通过不同策略在灰色地带游走的连贯图景，这些策略滋生了各种腐败现象。对此，我提出了一个论点，即在这些地方，合法和非法活动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在那些重要的政治官员和经济精英（包括本地和外国的投资者）紧密的关系网络中，后者想要通过这种关系获得进入该地区市场的内部机会。通过剖析非法活动和合法活动之间重叠交叉的地带，我揭示了投资者会模糊化他们贿赂政治精英的一些做法，进而论证我的论点，即非法活动也影响了合法投资。

21 “全球精英的税务策略”（第4章）旨在说明，全球精英是如何通过不同的税收结构而在灰色地带游走的。这里的重点还在于展示了存在于同一市场中的一种连续空间：早期的投资者倾向于采取逃税行为。然后，他们就渐渐发展成了倾向于采取避税行为，主要是

通过合法的转让定价的做法，将利润分配并转移到海外，而那里的税收负担则要低得多。

在“隐形蛛网中的有罪不罚”（第5章）中，我在世界上前0.1%（即超级大富豪，资本的所有者）和占比前1%—10%（即富豪，资本的保管者）的富人之间作了区分，以便说明超级大富豪是如何通过将风险转嫁给高薪的金融专业人士而几乎做到了免于受罚的。因为这些金融专业人士为资本的所有者构建起了保护性的法律屏障，所以，这些人也就承担了涉及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游走的所有犯罪风险。

“道德困境和合理辩护机制”（第6章）则进一步探讨了蛛网上的这些群体和个人，本章主要探究了个人投资者在资本蛛网中寻找他们各自的独特位置时所面临的一些道德困境。在正当和不正当活动相辅相成的“准合法的世界”中，为了使资本流动更加人性化，本章利用了与道德市场方面有关的社会学文献，来研究个人是如何构建道德感或商业伦理感的。我在本章阐明的正是这群人如何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一套道德辩护机制，在巧妙地利用这些市场时，这些人必须能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调整他们自己内心的道德指南针。

“退出市场：盛宴与饥荒”（第7章）则揭示了在退出市场时，资本蛛网上的个人在生活中会发生些什么。本章首先分析了当个体成功退出市场后会发生些什么，接着，我又仔细研究了三个与个人损失大量金钱有关的具体案例——这三个投资案例的惨败，分别是由于政府下台、外国合作伙伴的盗窃行为，以及当地合作伙伴的恶意收购。

从《蛛网资本主义》中得出的结论概述了资本蛛网的策略所造成的影响，本书还探讨并权衡了与全球不平等、税收以及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结盟相关的一些议题。它始终围绕“如何解开混乱如麻、盘根错节的蛛网”这个问题，并邀请公众一起来讨论该如何创建一个更好的系统，以便能够不让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结成联盟，不让

他们来监管自身的那些“准非法”（quasi-illicit）行为。

我希望，这本受到 C. 赖特·米尔斯启发的书，能够解开这个错综复杂的蛛网，正是这个蛛网使得那些“精英蜘蛛”几乎可以免于受罚，逍遥法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的经济不平等。通过关注人们如何在小型亲密的社交网络中用破坏和协作等策略手段来做市，《蛛网资本主义》也阐明了 21 世纪早期全球经济中的一些做市策略。

社交蜘蛛的缠结之网

若仔细观察一张一美元钞票，你就会发现，在它正面的右上角似乎有一只小蜘蛛。

这只“蜘蛛”周围是一张密结之网，蛛网密密匝匝裹在钞票正反面的每个角上。蜘蛛和网象征着当下全球资本主义的状况。藏匿

在复杂蛛网背后的蜘蛛吐出蛛丝，并将它们编织到全球资本市场的各个角落。

蛛网庞大而又层层密布，这就使得蜘蛛难以追踪，而且它们编织的网也难以解开。像藏匿起来的蜘蛛一样，世上的超级大富豪也难以接近，因为他们以令人极其难以追踪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编织起了资本之网。本章将会厘清蛛网资本主义的概念，以阐明这些“蜘



蛛”都有谁以及他们如何运作。本章旨在揭示这些蜘蛛如何与金融专业人士的社交网络相互合作，进而能够跨多个主权国家编织起层层蛛网。

在我所搭建的描绘蛛网资本主义的理论架构中，不止有一只蜘蛛，而是有一群蜘蛛，它们协同合作，并且各自分工编织起蛛网中的不同部分。在此，我从“社交蜘蛛”（*Anelosimus eximius*）* 那里汲取了一点儿灵感，这是一种以群居合作而闻名的蜘蛛，它们会共同编织起世界上最大的蜘蛛网。¹ 这些蛛网中的蜘蛛也分为支配型和从属型，但每只蜘蛛都有其特定的职责。例如，有些蜘蛛主要负责编织和修复蛛网，有些则负责制服和捕获猎物，还有些蜘蛛要保持蛛网的清洁。² 群居蜘蛛共同协作，以编织、维护和供给它们的蛛网社群，它们一起合作捕猎，也一道享受美味盛宴。³

24 基于这一类比，我在记者尼古拉斯·沙克森所做的努力之上将蛛网资本主义概念进一步理论化，并且强调它不受主权国家的限制，也并非集中在全球性的大都市中，而是属于全球互联之网的组成部分。此外，蛛网资本主义也限制着我们想要完成国际财务会计与统计的诸多努力。⁴ 就本书主旨而言，我从社会学家 C. 赖特·米尔斯的思想中汲取了一些灵感，试图利用蛛网资本主义的概念来强调政治和经济领域之间的紧密关联。米尔斯告诉我们，金融代理人利用他们的人脉及其与各国官员打交道的机会来把控基本法律法规的制定，并从中赚钱谋利。将金融精英和国家行为者（state actors）[†] 捆绑在互惠互利关系中的秘诀，便在于境外 / 离岸系统（offshore system）。因而，蛛网资本主义根本不会消失，因为拆除掉这个系

* 社交蜘蛛，是阿内蛛属蜘蛛，一种喜群居的蜘蛛，分布在巴拿马至阿根廷一带的亚马逊雨林，又称“亚马孙蜘蛛”。

† 国家行为者，或译“政府行为者”，指的是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人，受到宪法等基本法律法规的限制。

统本身就好比是让监管者去监管他们自身。

仅仅确定资本蛛网的存在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解密它是如何形成的。超级大富豪必然会招募各类人员来帮助他们编织起一个遍布全球的资本之网，在本章中，我就将对所有这些人员进行一番介绍，并会简要概述使这些蛛网得以形成和得到维护的社交关系。资本的金融蛛网是由各种各样的社交蜘蛛来织就的，他们共同协作以维护蛛网的运行，并一道从中分享经济利润。

蛛网中的支配型大蜘蛛是超级大富豪，他们多运筹帷幄于幕后。从属型蜘蛛是富豪，他们是拿着高额报酬的金融专业人士，但他们从资本中获益的份额相对较小。从属型蜘蛛会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这就要求他们对其他人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但他们永远也无法全面把握蛛网的整个庞大结构。这个全球蛛网由各类机构组成，其中包括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公司服务提供商等，它们共同吐出丝线，将大大小小的蜘蛛互相联结起来。于是，跨多个机构工作的律师、银行业者、会计师、中间人和其他人员就一起编织了遍布全球各角落的复杂而庞大的蛛网。理论上讲，蛛网资本主义的“猎物”包括公众和所有深陷资本蛛网之中的人。但这部分群体并非本书实证性研究的焦点，故不会涉及。

要想厘清这个故事，我们首先得绘制出境外系统的结构，并且要能够找出将它们与境内投资和金融活动勾连起来的蛛丝。统观整个蛛网，我们就会发现，像越南和缅甸这样存在风险的前沿市场，其实也与一些所谓公正透明的发达国家的市场紧密相连，它们共同处于一个全球资本的生态系统之中，是谓蛛网资本主义。

结识弗里茨——恒色资本之网中的一只从属型蜘蛛

25

弗里茨（Fritz）是一名40岁的美国公民，在过去十年中，他

一直在香港一家财富管理公司恒色资本（EverColor）⁵工作。弗里茨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飞机上度过的，他经年往返于西雅图、中国香港及越南与缅甸各地，因为他妻子住在西雅图，恒色资本的办公室在香港，而他需要负责监管的公司投资业务又在越南和缅甸。弗里茨本科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又在加利福尼亚一所较小规模的私立大学读了法律硕士。拿到法律硕士学位之前，弗里茨就已经在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的私人财富管理集团中工作了，这使他能够在华尔街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中担任并购律师。

2010年，弗里茨来到香港，开始担任基金投资总监。在香港，他先是为一家能源公司管理超过1亿美元的基金投资组合，接着又在香港最为成功的对冲基金公司之一工作。在这之后，弗里茨加入了新成立的恒色资本基金公司，并最终被提拔为首席运营官、法律总顾问和投资主管。目前，他在恒色资本管理着超过2.5亿美元的资产，还担任总部位于越南和缅甸的另外四家投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弗里茨每年的底薪为30万美元，除此之外，每年还有数额不等的额外奖金，通常都是以百万计算。毫无疑问，弗里茨是全球精英富豪中的一分子。

但是，根据弗里茨自己的说法，他只算全球前4%的富豪中的一员。也就是说，弗里茨不是蛛网资本中的支配型大蜘蛛。与他的老板罗斯（Ross）相比，他还只是小巫见大巫。

而罗斯，这只顶级大蜘蛛，才是超级大富豪。作为恒色资本的创始人，罗斯为弗里茨管理的基金投资了2亿美元。此外，他从共计六名从属型蜘蛛——像弗里茨这样的富豪——那里又筹得了5000万美元，这便使基金总额达到了2.5亿美元。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2.5亿美元都是通过对冲基金所赚取的利润，这些基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市场中进行了大笔的押注投资。

我只见过罗斯一次，而且我们谈了不到30分钟。这倒不是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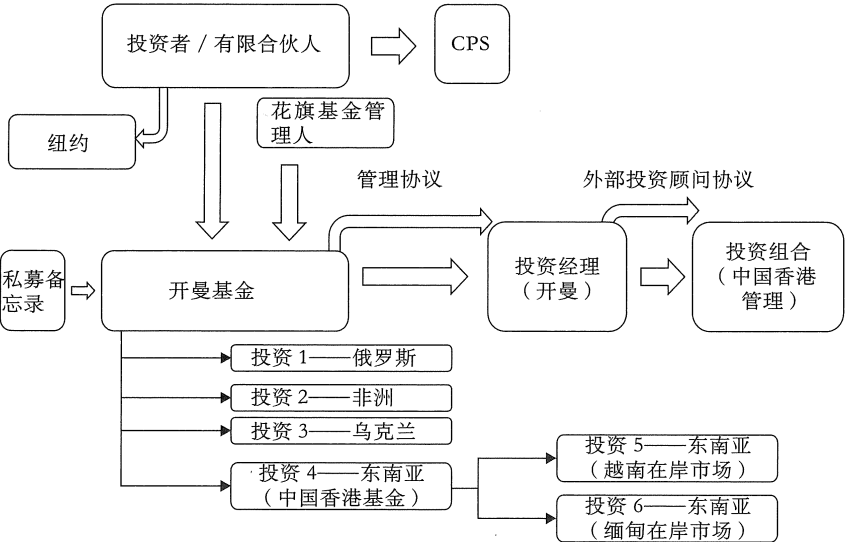
为罗斯特别忙，而是因为他像真正的蜘蛛一样擅于藏匿其自身。众所周知，蜘蛛会使用多达七种不同类型的蛛丝来诱捕猎物，并保护它们自身免受其他掠食者的侵扰。同样，罗斯也会将他自己藏匿在一群从属型蜘蛛的背后，这群蜘蛛给那些想要直接接触他的人设置了重重障碍。罗斯从不亲自露面去进行任何交易，他藏在层层密布的社交蛛网后运筹帷幄，让那些步兵棋子来管理他的钱财、为他效力，保护他免于被人窥探隐私。作为恒色资本的支配型大蜘蛛，罗斯雇用了一众业务熟练的金融工程师来帮助他设计遍布全球各处的资本蛛网。

26

在我对弗里茨进行的采访中，我请他为我绘制出恒色资本在全球的投资网络图。然而，除了罗斯以外，没有人能完整看到这个蛛网。这个蛛网中的其他蜘蛛只能看到它们自己帮助织就的蛛网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这就是弗里茨在我采访他的一家酒吧内的餐巾纸上所画出来的蛛网的样子（参见图表 1.1）。

这个图就是弗里茨向我解释的方式。他们的主要基金在开曼群岛进行了注册登记。该基金中有一半通过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公司投资于成熟且可预测的市场，例如用于投资指数基金，而另外 1 亿美元则会通过一家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子公司的基金来分配给他所谓的风险市场，诸如俄罗斯、非洲和乌克兰以及东南亚等。中国香港的基金在越南和缅甸进行了两次在岸私募股权配售——在这个案例中，主要是投资于房地产和零售公司——这样一来，他们就为当地公司提供了运营资金，以便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和扩张，旨在未来能够以更高的价值将其抛售。该基金的投资者（又名“有限合伙人”）不必亲自前往越南或缅甸，因为他们会依靠弗里茨来代表他们管理这些在岸投资。

开曼群岛存在着这么一份“私募备忘录”（Private Placement Memorandum），弗里茨称其为投资“圣经”，它是由一家大型全球



图表 1.1 恒色资本在开曼、中国香港和越南的投资，来源：金伯莉·凯·黄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起草的。该投资“圣经”规定了开曼群岛的基金将用于投资什么业务，并且还概述了投资经理的角色职责。投资经理在开曼群岛拥有离岸基金，例行任务就是要在俄罗斯、非洲、乌克兰和东南亚地区进行投资。有两项管理协议将开曼群岛的基金与中国香港的基金投资组合联系了起来，它们专门瞄准东南亚地区。弗里茨管理着位于中国香港的基金，该基金也必须遵守在开曼群岛设立的那份“私募备忘录”。

更重要的是，花旗基金（CITI-Fund）的管理人接受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指示，并在开曼群岛、纽约和中国香港的银行之间转移资金。开曼群岛的公司秘书协助设立开曼基金，而中国香港的公司秘书则设立东南亚基金，并在越南和缅甸同时设立子基金。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多个离岸司法管辖区建立好一切。

对于东南亚地区，恒色资本采取的策略是早早进入这些市场，

他们希望能拿下 100 万美元的投资，并将其扩增到 500 万乃至 1000 万美元，因为他们可以进入这些市场的内部渠道，获得一些并不会对外公开的交易。然而，随着对前沿市场进行投资，该公司的负责人对风险有了很高的容忍度，并做好了失去一切投资资金的准备。他们的投资策略类似于玩赌博轮盘：恒色资本将其筹码摊开、散布在桌子上，只需要其中两三个筹码盈利便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因而足以弥补其他筹码所带来的损失。

27

全球精英：超级大蜘蛛及其下属同伙

在全球范围内，富人阶层的人数都在不断增长，而弗里茨和罗斯还只是其中的两人而已。虽然大多数论述都倾向于将世界上前 10% 的精英归为一个大类，但梳理出超级大富豪和富豪之间的差异尤为重要。

我们深知，如今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经济极为不平等的世界中。按照大多数人的说法，弗里茨将会成为全球经济精英中的一员。然而，他知道自己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他与真正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很接近了，但目前还不是其中的一员，而那些主导型大蜘蛛才是在全球富人阶层中财富占到前 0.1% 甚至是前 0.01% 的超级大富豪。作为资本的所有者，他们在资本回报率超过其增长率的经济体中占据并保持着经济主导地位。⁶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超级大富豪都是隐形的，他们被像弗里茨这样的人所织就的网络层层包裹并遮掩着，另外，他们也需要依靠弗里茨这类人来代他们投资和管理他们的钱财。有时候，这些资本所有者会被称为某公司或某基金的“董事长或女董事长”（chairman/chairwoman）。在我的田野调查现场，金融专业人士，尤其是银行中的金融专业人士，会将他们称为 VIP 客户，或者称其为拥有大量资金、可在全球投资的政治公

28

众人物。投资公司一般被称为普通合伙人，而投入资金的投资者则被叫作有限合伙人。恒色资本基金公司由一组普通合伙人组成，他们与另一组有限合伙人形成了投资关系，这些有限合伙人一般由养老基金、机构账户和富有的个人构成。我采访中的有限合伙人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如英国、法国、丹麦、德国、瑞士和爱尔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每个有限合伙人都至少拥有 500 万美元用于全球投资。迄今为止的研究过程表明，有限合伙人是最难以接近的，他们都是世界公民，拥有一两个国家的国籍和公民身份，但经常会在世界各地出差旅行。

从属型蜘蛛：富豪

如果弗里茨不是主导型大蜘蛛中的一员，那么他是谁呢？最后我发现，弗里茨是众多高净值从属型蜘蛛中的一员，他们为像罗斯这样的主导型大蜘蛛构建蛛网的不同组成部分。富豪获得成功的一个迹象便是，他们业已成为管理全球投资的“飞行阶层”（flying class）中的一员。

为了弄清楚一些问题，比如这些人都有谁以及他们是如何构建这个蛛网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的，我从内尔·弗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和道格·麦克亚当斯（Doug McAdams）那里汲取了一些灵感。他们认为，在任何行业领域内，权力的分布都是不均衡的，并且经常被人们视作理所当然，这就从根本上形塑了最终的结果，即权力不同的人最后会得到不同的东西。⁷ 按照这个推演逻辑，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也势必存在着多个重叠的网络。在这些蛛网中，与其他那些更强大的主导型大蜘蛛相比，建立起这些蛛网的金融专业人士是从属型蜘蛛，他们“对该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即存在着怎样的利害关系，有着一种模模糊糊的大致理解”。然而，这些从

属型蜘蛛愿意从事各类目光短浅的工作，是因为他们在完成这些工作时，也会获得丰厚的报酬。⁸

虽然主导型大蜘蛛和从属型蜘蛛之间存在着上下级关系，但重要的是，较小的从属型蜘蛛并不是简单地接受主导型大蜘蛛的命令。与此相反，他们的目标是吸引主导型大蜘蛛对他们的公司进行少数股权投资，这样一来，在前沿市场的在岸市场上，他们就能在主导型大蜘蛛和他们自己所建造的那些小型蛛网之间建立起关联，从而将前沿市场上的较小蛛网连接到更大的遍布世界各地的资本大蛛网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从属型蜘蛛自身进行资本积累的一种努力。这些超级大富豪的从属型蜘蛛会秘密地使用他们自己的激励结构进行运作，实际上，他们在寻求资本注入时可能会将多个主导型大蜘蛛引入到他们自己构建起来的蛛网之中。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不同的资本蛛网就通过离岸和在岸这两端的市场连接了起来，这也突出了位于前沿市场中的小型从属蜘蛛的代理作用，他们在构建这些资本蛛网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9

总之，主导型大蜘蛛和从属型蜘蛛联手在与他们的猎物相关的更广泛领域中占据着更加强大的地位，因为他们有能力去利用尚不存在交易规则的地缘空间。⁹ 那些由专业人士组成的网络中的从属型蜘蛛，通常在各自专业领域里是如此专业和专注，以至于他们在更为复杂的线路中只会扮演一个相对较小的角色，往往看不到他们所嵌入的更大网络的全貌。所有这些金融专业人士都在全球资本转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会通过开曼群岛等多个离岸金融中心进行运作，并将这些资金用于在岸投资。在蛛网资本主义中，财富地位位于富人阶层前 0.1% 的主导型大蜘蛛能够以隐形和有罪却免于受罚的方式游刃有余地玩着资本游戏，而财富地位占富人阶层前 1%—4% 的从属型蜘蛛则充当着这些大蜘蛛的金融代理人，他们在获得丰厚回报的同时，同样也承担着在灰色地带游走的所有刑事和

民事风险。但是，从属型蜘蛛也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深嵌在各种不同的机构之中。下一节内容就将概述这类从属型蜘蛛群体，他们是我在努力追踪这些更广泛的资本蛛网时辨别出来的一些人。

私人财富经理

私人财富经理的主要职责是为富有的客户群体提供专业金融服务，这些客户主要是一些家族企业和个人。财富经理就是与超级大富豪 / 富豪建立起关系并为“家族办公室”工作的人。“家族办公室”是指一种私人控股公司，主要负责某个富裕家庭的投资管理和财富管理等日常的资产管理工作。私人财富经理会帮助超级大富豪 / 富豪来决定如何将他们的资本投资于各种金融工具，例如，从股票到二级另类投资市场，再到投资组合基金公司等，主要方式是通过基金经理进行海外间接投资或是直接投资于成长型公司。他们与一个由律师和会计师组成的广泛的社交网络合作，这能帮助富有客户设立基金会、信托和公司来服务于多种目的，其中就包括避税、规避监管、控制家族资产、计划企业领导人继任、投资和捐助慈善事业等。¹⁰ 在我的研究中，这些私人财富经理都是富有客户的“核心联络人”（point people），也是许多交易达成时出面的代理人。他们是使主导型大蜘蛛成功在市场上隐身遁形、难以追踪的关键人物。我采访到的私人财富经理的收入，通常在 15 万—30 万美元，外加奖金津贴，以及在成功的投资中赚取到的一些“附带分成”（或者叫作“附带利益”，这是另一种基于工作绩效的薪酬）。

30

基金经理

基金经理为董事长工作，他们负责具体实施基金的投资策略和管理交易活动中的组合资产。参与我研究采访的基金经理会获得他们基金平均管理资产（AUM）的1%—2%不等的薪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基金经理所报告的年收入在20万—30万美元，而在越南和缅甸等欠发达经济体中的基金经理报告的年收入在10万—15万美元。在越南和缅甸境内开展业务的基金经理，通常会通过策略性持有不同经济领域中的上市公司和有望上市的公司来寻求长期的资本增值。在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中，基金经理可能会有一个为期七年的退出市场策略，但是，在越南和缅甸，基金经理通常会根据不同的投资项目持有投资七至十年。

会计师和审计师

越南和缅甸的会计和审计公司主要分为“本地”审计公司和“全球性”审计公司两种。本地的审计公司收取的费用要低得多，并且它们倾向于为中小型公司提供服务，而像安永（Ernst & Young）、普华永道（PwC）和毕马威（KPMG）等全球知名的审计公司，则旨在为那些家族企业的“职业化运作”（professionalization）过程铺平道路。一般来说，这些公司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会计、审计和咨询服务。此外，这些公司还会就公司税、国际税、公司秘书服务、并购税和全球转让定价服务等方面提供业务咨询服务。在我所采访的那些会计师中，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会计师更专注于税务规划和转让定价类的业务安排，这些安排最终会将公司负债保持在越南和缅甸境内，而将盈利资产放在离岸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市场。越南和缅甸本地的审计公司在越南和缅甸境内的税务合规方面会

提供更多的帮助，并且还会为公司提供相应的审计服务。由于越南和缅甸市场的交易量不是很大，所以，本土的审计公司还会为潜在的投资者提供一些其他方面的服务，例如市场准入和业务起步规划、公司监管合规以及争议解决等方面的服务。

律师

所有这些不同国家的律师都会从事多种工作，这些工作对个人能力都有着不同的要求，涉及从基金结构到交易执行等各方面。他们帮助设立基金、构建投资结构，并为超级大富豪及其投资经理提供与不断变化的法规有关的最新信息。他们的工作经常会与审计公司的工作有所重叠，因为他们要整合税务和公司建议，并协助处理可能出现的国际税务方面〔美国方面的要求、投资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等规则〕的问题，以及掌握监管法和证券法等。全球律师事务所通常会拥有跨司法管辖区的合作伙伴。例如，越南的某家大公司可能会在中国香港、伦敦、悉尼、芝加哥、卢森堡和新加坡等地有合作律师事务所。在越南和缅甸，全球知名的律师事务所也会聘请一些越南和缅甸当地的律师，因为他们是能接触到当地政府官员的关键性人物。这些律师事务所也在为政府提供建议和制定贸易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诚然，本地律师事务所的确不具备全球律师事务所的声誉或专业能力，然而，在如何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一系列模棱两可的法律以及与高级政府官员打交道并发展和维持重要关系的工作方面，本地律师事务所却能够提供关键洞见。在法律制度薄弱的情况下，这项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法条通常可以进行多种阐释，本地有关部门也难以对海外公司执行法律制裁。

银行从业者

银行从业者会帮助客户开设离岸和在岸的银行账户。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大部分工作都可以通过电子汇款的方式来完成。我采访的大多数银行从业者都认为，他们自己是准监管者（quasi-regulators）。虽然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创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LLC）、国际商务公司（IBC）或资产保护信托（APT），但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开设银行账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针对银行的一系列监管打击之后，银行从业者现在都必须要对所有客户展开调查。也就是说，他们需要验证客户的个人信息（通过护照、驾照等）、住所或实际住址，以及来自其他银行账户的财务报表，以便核实客户所有存款的资金来源。进入银行大厅办事的客户类型各有不同，因此，银行从业者也会据此与其客户建立起多种不同类型的银行业务关系。一般来说，若不是银行VIP客户或“政治要人”客户，银行从业者就必须遵守最严格的监管准则，才能为他们的日常交易开设简单账户。而那些拥有更多财富之人，与银行从业者私下的联系与合作会更加密切，这些银行从业者也会就如何转移资金和规避资本限制向这些客户提供业务建议。

32

公司秘书

公司秘书帮助投资者成立新公司、转让现有公司或者收购一些“老公司”。公司秘书集中在离岸金融中心，主要通过公司注册服务协助客户设立空壳公司，指导客户选择合作银行、为企业提供注册办公地址、准备和提交年度申报表，以及参与公司股票的发行和转让等。在某些情况下，公司秘书会为股东和董事会议起草会议记录，协助公司进行注销流程，并协助客户处理其他一些有关公司合规方

面的法律问题。这群人属于专业和管理阶层中的一部分，但在精英阶层中，他们也是属于最底层、财富占比在前 8%—10% 的人。他们的办公室通常最不奢华，也最不起眼。

代理人

代理董事 (nominee directors) 是指在离岸设立的空壳公司合同上的挂名所有者 (paper owners)。简单来说，就是有钱人会在他们内部的小圈子里找一个人来给自己实际拥有的公司挂名。挂名所有者合法地拥有该公司，但实际上并不知道公司具体在经营什么，也不会从公司的投资中获得任何利润。他们只会因出借自己的名字来挂职而获得一些经济补偿。此举有助于真正的投资者隐匿身份，并为他们设置了一层保护屏障，以免向税务机关、公众，以及有时候甚至是他们的配偶透露其隐藏的资产。想要建立一个代理人结构，有三份文件至关重要。公司真正的、秘密的所有者会选出一名代理董事，并将以下这三份文件发送给他们。第一份文件是《代理董事声明》，在其中，代理人需要承诺他们只会做公司实际所有者告诉他们去做的事情。第二份文件是《代理董事的辞职信》，只不过这封辞职信上暂时没有注明日期，这是为了让代理董事在发生任何麻烦事件时能够避免承担责任。第三份文件则是《通用授权书》，通过这份文件，代理人就秘密地将公司的所有控制权交还给它的真正所有者。¹¹ 在我的研究中，投资者提名的代理人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很多你都想不到的人，从投资者的女佣、司机，到他们在其他国家的情人，以及远房的亲戚和朋友等，不一而足。

中间人

中间人主要负责代表投资者处理与贿赂相关的事宜。他们会为此而获得一笔咨询费，主要工作包括打点政府官员、加快官方的办事效率、获取某些工程项目的内部消息、加快办理营业许可和经营执照等手续的流程。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贿赂法官以确保在某场诉讼中胜诉。比起缅甸，在越南，这些人更多被称作“关系户”，他们与关键的政府官员保持着牢固而密切的联系，可以在投资出现问题时帮助出面解决。

* * *

在这组从属型蜘蛛中，每一只蜘蛛都会执行非常特定的专业任务，以帮助构建蛛网的不同组成部分。但是，仅仅识别出参与织就蛛网的人员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要概述使这些资本蛛网能够大规模扩展到新前沿市场领域的具体背景。本书中的故事就将着眼于审视全球精英在东南亚地区抓住机会、赚钱捞金的一些策略。

市场东移

瑞士是世界避税天堂的开山老祖。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之一，瑞士为全球精英提供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保密司法管辖区和避税天堂。¹²虽然大多数人只将瑞士与精英用来保护其资金的离岸银行账户联系在一起，但其实，瑞士的金融行业已经发展到了会提供更为复杂的离岸金融结构。其中就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国际商务公司、资产保护信托以及私营的家族基金。

对于范围在 1000—5000 美元的资金，离岸有限责任公司允许精英在美国境外持有个人退休金账户（IRA）*、持有个人投资、持有房地产、管理诸如外国信托等用于资产保护的高端金融机构，并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客户隐私。对于那些在海外有活跃业务的公司来说，国际商务公司允许美国公司的某个海外分支或是由居住在美国的美国居民拥有的公司与在海外运营的非美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更为复杂的离岸金融结构的兴起表明，“国际金融的纯中介作用（intermediation），近年来正在大幅度增加”。¹³

然而，世界各地的精英与离岸金融中心的法律关系非常不同，这主要取决于他们各自所在国家管理离岸财产的法律规定。多年以来，许多国家一直试图渗透瑞士银行的保密制度，但直到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这些尝试大多都以失败而告终。随后，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在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美国开始调查帮助美国富人逃税的知名瑞士银行家。美国也开始制定一整套的法律和法规，以防止本国资金外流。

2010 年颁布的美国《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就是这样一项美国联邦法律，它要求所有外国（即非美国）的金融机构在其交易记录中搜索具有“美国人”——例如，在美国出生——身份标识的客户，并向美国财政部门报告这些人持有的资产和身份信息。该法还要求美国公民自行向美国国税局报告他们所持有的、不在美国境内的金融资产。2008 年以后的银行法规现在也要求银行方面“知悉您的客户”，银行必须采用一种用于识别和验证其客户身份的流程。外国的银行现在需要通过这一流程来限制欺诈、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等。重要的是，银行还将这

* 个人退休金账户属于美国社保体系的一个支柱，它是一种储蓄账户，旨在帮助退休后的稳健投资储蓄。个人退休金账户也算一种理财工具，能够提供各种税收优惠，包括免缴税款和延迟交税。

一要求传达给了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的人。这些调查最终迫使瑞士在银行保密工作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让步。

这些管辖美国海外投资者的法律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投资者是在一个全球化世界中运作，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要与不受这些法律约束的其他国家的精英展开竞争。美国政府出台的新法规，再加上其他新兴市场上新金融精英的崛起，就使得在东亚、东南亚、俄罗斯、拉丁美洲、中东等地区诞生的新富豪在以下三个重要方面有了额外的优势。

第一，离岸基金和银行不太可能会与拥有美国住户地址或持有美国护照的任何人开展业务。如果这么做的话，银行就得为帮助美国人逃税而支付巨额的赔偿金。2016年，美国方面对“涉嫌帮助美国客户逃税而将收入隐藏在海外的一些瑞士银行展开了严厉的打击，美国对80家银行处以超过13亿美元的罚款，其中涉及3.4万多个账户，账户持有金额共计高达480亿美元”。¹⁴ 汇丰银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在2012年也因为反洗钱控制不力而面临美国方面高达19亿美元的类似罚款。¹⁵ 2015年，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采取行动，出售了其美国客户的私人银行业务，并且重新调整了业务目标，专注于为居住在亚洲但不是美国公民的国际富人提供银行服务。¹⁶ 然而，这也不意味着美国公民便从此不再能开设离岸账户了。与此相反，2010年颁布的美国《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还导致了一个新的独立资产管理人产业的兴起，他们通过指定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由美国公民控制的信托机构来担任离岸托管银行的中介。为了将钱财转移到海外，投资者在财富管理人的帮助下设立了空壳公司和信托基金，这些财富管理人“不仅帮助投资者避税，而且还帮他们‘遮掩并分散了经济实力’……这就使得识别财富的真正所有者变得更加困难（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¹⁷

第二，在美国颁布的这个新的法律监管制度下，任何持有美国护照的人都必须申报他们在海外的所有银行账户和资产，这便使西方国家的人更加难以保持他们的匿名状态。结果，为了应对美国和欧盟的逃税调查和更加严格的申报要求，那些来自中东和亚洲地区的富人便将钱财从美国和欧洲转移到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又催生了一些新的财富管理中心城市。跟在瑞士后面的，是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一些小型司法管辖区，它们能够促进跨境金融资本的流动。¹⁸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些新的离岸金融中心实际上并没有与瑞士展开竞争。与此相反，“大量设在新加坡或开曼群岛的银行，只不过是各大瑞士银行机构的一些分支而已，它们之所以在那里开设分支机构，主要是为了吸引新的客户……银行账户通过一种简单的签名游戏便能从苏黎世流转到中国香港，（这取决于）对银行保密协议的攻击力度以及瑞士与其他国家签署的不同条款”。¹⁹ 瑞士的一些银行在新加坡设有办事处，以便为中国和东南亚的富有客户提供一些审慎的金融服务。通过这种方式，瑞士作为一个国家便不再从流入瑞士银行的资本中受益，但瑞士的这些银行机构确实可以受益，所以现在变得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关注由人而非由国家组成的资本网络，因为超级大富豪和富豪又为他们自身找到了继续赚钱的方法，将其交易转移到了新的国家中。

第三，在前沿市场和新兴市场中，对离岸金融中心的深入研究揭示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在离岸金融中心开展业务时所使用的隐私条款，与美国公民曾经在海外所使用的隐私条款相同。³⁶ 许多精英富豪同时在一些欠发达经济体崛起则为离岸金融中心提供了新的市场。在追踪资本流入“新兴市场”时，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访问瑞士的一家私人银行时，我注意到，他们的办公室里配备有中文、日文、韩文，甚至还有越南语写的宣传小册子。

瑞士的一位银行家伊恩（Ian）这样向我解释说：

在过去，我们主要是与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客户合作，因为所有钱都在那里。但今天，银行的主要业务是为全球精英提供服务。在出台了新的银行法规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选择不为美国人提供银行服务，因为我们还有足够多的来自中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甚至像越南这样的东南亚小国的银行交易业务。我们在为越南和缅甸的亿万富翁提供银行服务。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加上金融业从西方市场转移，共同推动了离岸银行开发出新的方式来吸引更加多元化的全球精英。这对政治公众人物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向政府官员行贿的一种方式便是让中间人通过在离岸金融中心设立的代理人账户向他们打款。银行家和公司秘书能够负担得起拒绝服务持美国护照客户的后果，因为来自中国、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的精英阶层已经带来了足够多的新业务。

世界上多个不同地区的超级大富豪和富豪的崛起，导致了资本蛛网向新市场领域进行扩张。蛛网资本主义不仅仅指在瑞士、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离岸金融中心之间的关系网，蛛网资本主义中的这些金融结构也是在像越南和缅甸等具有经济和政治风险的市场开展业务的重要工具。

新前沿市场

近些年来，中美两国一直在角逐在东南亚地区的立足点。2015年，中国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作为回应，同时也为了制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

响力，几个西方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随后联合起来，设立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公开透明的。正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网站页面上所言，“亚洲游戏规则的制作权正在被争夺……如果我们不通过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写下那些规则的话，
37 我们的竞争对手势必就会制定不利于我们的游戏规则……以此来削弱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地位”。²⁰ 2012 年，奥巴马总统成为首位访问缅甸的在任美国总统，他强调，“他希望将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多地转向太平洋地区”。²¹ 四年以后，奥巴马总统解除了美国对缅甸实施的经济制裁，允许美国公司和银行去探索亚洲最后尚未被开发的市场。²²

在 2017 年 1 月就任后不久，美国总统特朗普便终止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因为它是奥巴马任期内的遗留物。此举让其他国家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重新商谈贸易协定。但是，特朗普这个人是如此难以预测，以至于第二年，也即 2018 年 4 月，他在企业高管的大量游说之后又提议要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²³

尽管特朗普总统的立场总是摇摆不定，而且美国与菲律宾和泰国都有更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在特朗普政府任内，第一位访问白宫的东南亚地区领导人却来自越南。这是因为越南聘请了波德斯塔竞选游说集团（Podesta Group）——其中就包括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总统竞选团队的前任竞选总监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为越南总理访问白宫进行了大量游说。这是维持贸易关系以及制衡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长期努力中的一部分。此后不久，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都曾短暂访问过越南，这同样也是为了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无论是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越南都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

重要市场，因为它在地缘政治上靠近中国，在经济上也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市场之一，而在 2018 年，稳固占据这一位置的还是新加坡。²⁴ 这些政治因素都契合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兴趣。

与此同时，全球精英也在寻找方法，想将他们的投资扩展到新前沿市场中。他们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寻找基金经理，因为后者能够将其资本网络扩展到四个金砖国家（BRIC，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以寻求投资机会。由高盛集团的投资银行家、英国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提出并确定的“新钻十一国”（N-11）是由 11 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它们分别是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韩国和越南。“新钻十一国”极有可能成为 21 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组织。²⁵ 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已大大超过了更为发达的经济体。越南的经济也在以每年 6%—7% 的速度增长，而在缅甸，昂山素季在民主选举中当选之后，前往该地区的投资者也一直保有一种全新的兴奋感。在 2016 年缅甸举行的欧洲货币会议上，投资者一再将缅甸称为在经济上实现“蛙跳式”跨越发展的国家。

38

与此同时，当地新闻以及一些地区性新闻媒体则继续将越南和缅甸描述为腐败程度高、法律基础设施薄弱、经济上不可预测，以及官僚决策相互矛盾和消极不作为的国家。²⁶ 一些备受瞩目的腐败案件成为反面榜样，为其他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例如，在 2017 年，一名越南的银行家在牵涉到另外 51 名银行从业者和商人的欺诈案中被判处了死刑。²⁷ 这一银行界丑闻导致了海洋银行（Ocean Bank）的市场估值从 2013 年的 5 亿美元迅速贬值到了 2016 年的 350 万美元。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贸易制裁之后，尽管外国企业准备在缅甸投资，²⁸ 但该国仍遭受着军事、政府和商业裙带关

系方面的一系列公开丑闻事件的侵袭。2021年，缅甸国内情势的变化令投资者暂时遏制了对缅甸的投资兴趣，因为每个人都还在观望，想看看在与裙带资本主义长期勾连的新军阀政权的统治下，缅甸的市场究竟会走向何方。

作为两个重要的前沿市场，越南和缅甸存在着很多共同点，但是，越南在外国投资方面大约要领先缅甸20年，而且，两国的历史、地缘政治关系和地方政治都截然不同。这就使得这两个市场都成为独一无二的投资之地，需要人们前去仔细考察。

越南境内市场的情况

由于越南有着与法国殖民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等复杂历史的勾连，越南政府对高度管制的经济部门采取了保护主义立场。在越南境内，国有银行是基于与国家保持长期关系的境内资本配置的主要来源，当地商业网络通过与共产党的个人关系得以占据市场上的最佳位置。²⁹ 研究越南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几位学者表明，其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极具争议。因为“国家—社会关系”会涉及企业的操作实践，在这些具体的实践中，公职人员和私人投资者既为社会提供服务，同时也会中饱私囊。³⁰

³⁹ 法律学者阮图（Tu Nguyen）这样断言：“在行政权力去集权化和分散的政治环境中，非常规贷款利息（non-conventional interests）的增长和新的群众动员模式使权力等级更加复杂，并模糊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界限。”³¹ 越南的分权政府导致了大量与国家—市场社会相关的内部变化，这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政治学研究者马尔斯基（Malesky）、麦卡洛克（McCulloch）和奈（Nhat）所解释的那样：

大多数企业与政府的互动（都）分散到省级，包括企业登记、环境和安全审查、劳工监督、地方政府采购和土地分配……因此，许多研究都表明，在分析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时，更加相关的是省级政府，而非中央政府。³²

马尔斯基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根据投资项目所在的省份，以及本地和国外的投资者与当地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多个国家—市场关系可能会同时存在于同一个民族—国家之中。在越南，投资者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各种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越南没有建立强大的法律制度，而且法律条款在省级层面上的解释也不相同。

金勋（Hun Kim）对胡志明市房地产市场上跨亚洲国家的资本循环进行了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这座城市是如何通过不同的外国资本循环而得到了改造。³³ 东亚金融中心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区域内部之间的投资关系，将东南亚地区经济欠发达国家转变成了可获丰厚利润的新前沿市场，从而也增加了亚洲国家之间的资本流通。现在，欠发达国家的政治精英必须设法吸引当地的企业家、西方（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和日本的投资者，以及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投资者。³⁴ 与此同时，近来的全球经济转型也为寻求新兴市场投资的西方和东亚 / 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者创造了新的竞争格局。³⁵

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表明，各个国家尝试用不同的治理技术和监管制度来推动城市的发展。³⁶ 重要的一点是，城市规划学者金勋认为，两种相互矛盾的治理模式——不透明和透明——可以在同一个地域空间内同时存在。³⁷

我延续了金勋的研究路径，主要通过从市场参与者的角度看待这种关系。我认为，法律透明与不透明的不同程度，再加上一个去集权化的政府，共同导致了多样化的国家—市场关系的存在，使裙带资本主义 / 掠夺性资本主义、相互要挟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鱼死网破的相互毁灭威胁迫在眉睫，因为双方一道参与了腐败 / 不道德的活动），以及发展中 / 官僚国家—市场关系共存于同一个市场之中——具体会是哪种情况则取决于投资者与政府官员的接近程度。³⁸ 西方投资者与东亚 / 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者共存于同一个市场之中，前者想要提高投资时的市场透明度并签署正式的法律合同，他们也必须遵守诸如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和《反有组织犯罪及腐化组织法》（Racketeer Influence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等国际反腐败法律，后者更乐于遵守本地的交易经纪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贿赂司空见惯。

缅甸境内市场的背景

与越南一样，缅甸也有着非常复杂的被殖民历史。³⁹ 1962 年，奈温（Ne Win）领导的军事政变使缅甸的议会民主制告一段落，“缅甸社会主义之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让缅甸转向其自身内部，导致了长达 40 年的经济停滞。1962—1990 年，该国在军阀独裁和争取民主的内部斗争中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在军事独裁政府的剥夺下，该国政府将包括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公司进行了国有化改造，并在 1964 年实施了第一次非货币化（demonetization）改革。⁴⁰ 这便导致大量资本从缅甸飞快逃到了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邻近国家和地区。

军政府上台以后，缅甸又发生了第二次（1985 年）和第三次（1987 年）非货币化改革，引发了暴力和动乱，最后还导致了遭到军队镇压的游行示威和罢工。⁴¹ 军政府经济管理不善，这直接导致了经济停滞，以及好几次的经济危机。⁴² 到了 1987 年，由于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激增以及人民要求民主化的政治抗议，这个政府濒临垮台的边缘。⁴³ 此后，很快出现的是一种裙带资本主义，这是新

的商业精英与军队和军政府之间的一种共生关系。⁴⁴ 军政府给一个由商业大亨及与军方高层保有密切联系的退役将军组成的小团体寡头提供政治上的便利，以此来换取他们对其商业上的赞助。

20 世纪 90 年代，在缅甸的选举中，全国民主联盟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但当时自称为国家法律和秩序恢复委员会（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的军政府则对选举的结果不予承认。相反，国家法律和秩序恢复委员会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一整套允许成立私人银行的新法律。⁴⁵ 在缅甸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过渡期间，还发生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⁴⁶

在缅甸的市场经济中，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业巨贾垄断了市场。这些大亨雇佣军政府将领的子女——让他们在自己的公司中担任高级职位——“以便换取一些令人垂涎的合同，以及经营以下有利可图的行业的准入许可证：贸易、物流、房地产、农产品加工业、旅游行业、石油和零售业”。⁴⁷ 其中的许多裙带关系都被美国列入了制裁名单，某些美国个人或组织被禁止在缅甸进行新的投资。

2003 年，在缅甸的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之后，乔治·布什（George Bush）总统根据《缅甸自由与民主法案》（Burmese Freedom and Democracy Act）以及“第 13310 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3310）对缅甸实施了制裁，禁止美国从缅甸进口产品以及向缅甸出口金融服务，同时还冻结了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S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即更名后的国家法律和秩序恢复委员会）以及三家缅甸从事对外贸易的金融机构的资产。⁴⁸ 2007 年和 2008 年，布什总统还进一步将制裁扩大到了一组被指名的缅甸实体组织上，它们被认为侵犯了人权并且存在公开腐败行为。⁴⁹

在缅甸重新融入全球经济之前，它还要与西方世界隔绝近半个世纪。2015 年 11 月，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中大获

全胜，这才结束了缅甸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军政府统治。但是，缅甸对世界其他地区开放的后果是十分复杂的。裙带关系并没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许多拥有丰富资源和人脉的家族开始重新定位他们自身，他们“让其儿女也参与进来，通过商业上的联姻来巩固家族中的第二代精英……重塑他们自己的形象……（以及）重组整个企业集团”。⁵⁰ 投资者进入这个市场以后，还面临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最赚钱的企业和行业都与裙带关系有着长期联系。这也就意味着，来自中国、泰国、印度、韩国和越南这些区域的参与者现在已经成为缅甸市场中的排头兵，而受到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掣肘的西方投资者则一直在旁观望，等待着能早日迎来转变。

连接在岸投资和离岸工具的蛛网

越南和缅甸均作为重要的例子，展示了国家权力与经济利益如何以易于滋生腐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在这些深陷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的国家，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这个十分棘手的局面呢？那些来自美国、加拿大和西欧的投资者必须遵守反腐败法，而东亚和东南亚的投资者则不受这套意在提高市场透明度和反腐败 / 反裙带关系的监管法律的约束。前者又如何与后者中的新贵竞争呢？我认为，答案就在将资本蛛网编织在一起的离岸投资工具网之中，它们将越南和缅甸等市场，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中介机构相互连接，而这些中介机构只不过是其他离岸主权国家注册的公司的子公司而已。纽约、胡志明市和仰光市之间的联系存在于由法律合同构成的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将这些地方与英属维尔京群岛、巴拿马、塞舌尔、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离岸中心联系在了一起。通过长期为全球精英提供具有匿名性、隐私性和保密性的离岸金融中心，这个系统实现了对风险市场的资本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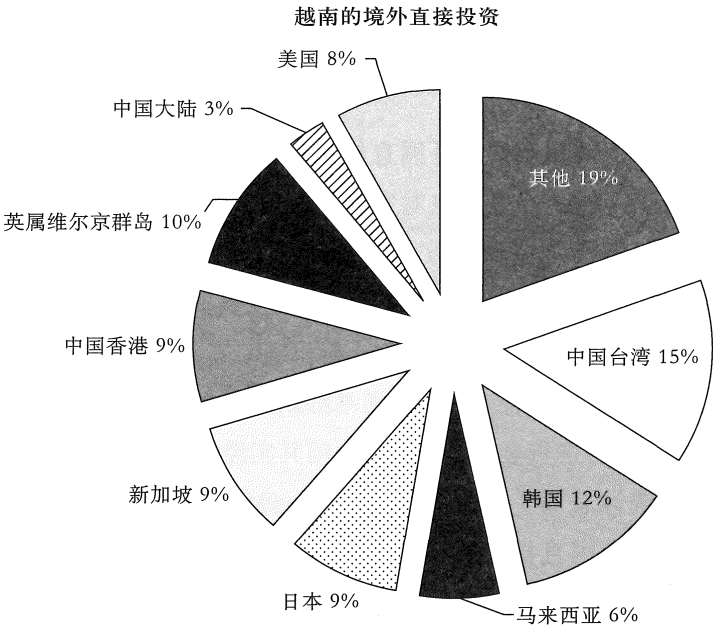
就让我们以越南和缅甸的外国直接投资为例。不光是我个人对这两个国家很感兴趣，弗里茨也对它们有兴趣，在这里，经济学家衡量外国直接投资资金流动的方式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缺陷。大多数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故事，计算的都是外国直接投资从资本来源国流向资本汇入国的流通资金规模。而在越南和缅甸等欠发达经济体中，试图获取资本来源国的政府统计人员通常都默认资本是从 A 国直接流向了 B 国，而不会考虑资金在境内上岸之前其实经过了许多个国家。

越南国家统计局（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of Vietnam）提供了进入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的相关数据（详见图表 1.2）。美国仅占 8%，而中国大陆仅占 3%。粗略看一下数据似乎会发现，进入越南的大部分境外资本来自中国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缅甸方面的数据统计中（详见图表 1.3）。在缅甸，美国都没有出现在任何数据统计之中，而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却占缅甸境外资本流入总额的近 75%。虽然这些图表数字显示，西方在东南亚的前沿和新兴市场上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它们却具有误导性，因为它们实际上隐藏了进入这些市场的资本的原始来源及最终受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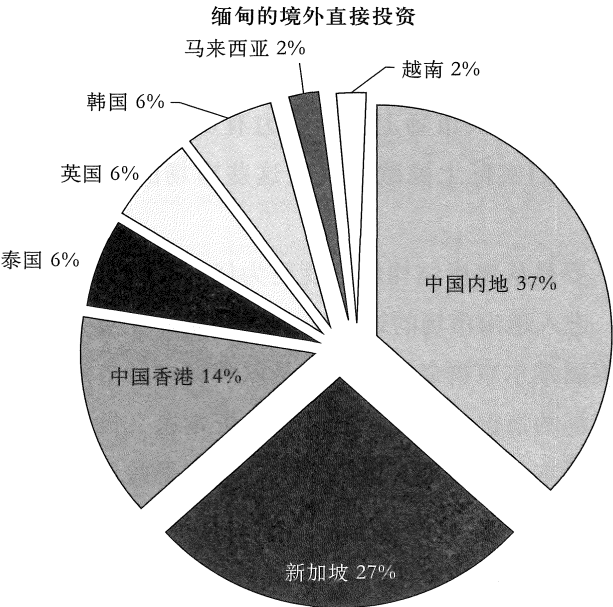
44

然而，要是从离岸结构的角度更为仔细地研究这些数据，我们便会发现，进入越南市场的近 30% 的境外资本主要来自新加坡、中国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这些都是以其离岸经济闻名的国家和地区。缅甸市场的情况也类似，在网状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外国直接资本的流动根本无法追踪，因为资本的最终受益者是另一家离岸公司。因此，图表中的数据并不准确：它没有提供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离岸司法管辖区的资金来源。

我在其他地方发表过这些图表，主要是用来说明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之间——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⁵¹ 然而，



图表 1.2 按来源国划分的越南的境外直接投资，2016 年统计。插图为作者绘制，数据来源：越南国家统计总局



图表 1.3 按来源国划分的缅甸的境外直接投资，2016 年统计。插图为作者绘制，数据来源：缅甸规划和财政部（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Finance of Myanmar）

正是民族志研究和访谈数据中的研究发现，才迫使我对此统计报告中的缺陷重新加以审视。事实证明，来自美国的投资有时会通过新加坡的离岸工具进行操作，而来自中国的投资则会通过香港的离岸公司进行遮掩。想要进入前沿和新兴市场的外国投资者利用了西方人曾经使用过的相同的离岸计划，在离岸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设立控股公司和特殊目的公司来开展业务。他们依靠金融专业人士——私人财富经理、基金经理、律师和 / 或公司秘书——来帮助他们建立离岸投资工具。正如布鲁克·哈林顿 (Brooke Harrington) 所写的那样，特殊目的公司“就像离岸金融的保险箱：它们是持有资产的一些金融机构，其唯一目的便是使资产免受风险……（从而给客户提供）保护，让其资产免受破产、债权人和诉讼人的追究与损害”。⁵²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可口可乐和微软等跨国公司会与一个经营玉石贸易的公司存在合作伙伴关系，又或者为什么它们会与深陷腐败和侵犯人权等指控的公司存在关联了。⁵³

我采访的大多数研究对象，要么为这些人管理资金，要么努力从精英富豪那里获得资金，这些精英富豪控制着在其他地方设立的离岸基金。通过建立一份假的书面档案追踪记录，高薪聘请的金融专业人士能够使资金看起来像是从开曼群岛、百慕大等地的离岸实体流向了新加坡或中国香港等地的特殊目的公司或控股公司，而在这之后，这些资金又会在一个复杂的资本网络中被投入越南或缅甸境内进行投资。吉米 (Jimmy) 是一名常驻香港的投资人，他在越南投资了一家医疗保健公司，他这样向我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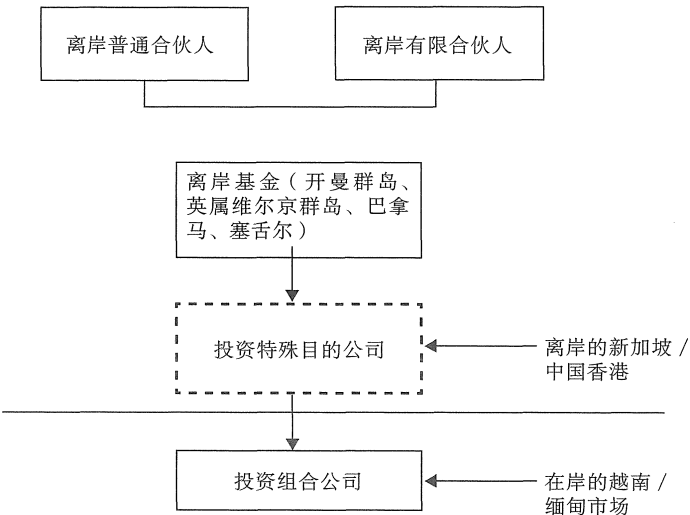
在东南亚，资本从 A 国流向 B 国的想法并不符合现实情形。没有这方面的官方统计数据，因为这种统计需要我们打开所有秘书办公室里的账簿，而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保护雇主的隐私，所以他们也不会那样做。我是韩国人，在美国接受教育，现在

住在香港。我的公司设立在萨摩亚，而我的投资则在越南。我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复杂的金融结构，也不仅仅只是为了隐匿金钱。这些都是合法的。你应该知道吧，普利兹克（Pritzker）家族是以建立这些金融结构闻名的家族，他们也是你所在大学最慷慨的捐助者之一。

吉米所描述的是一个简化的金融结构，但它与我绝大多数研究对象拥有的金融结构非常相似。通过空壳公司而假造的书面记录显示了一种所有权结构，使得资金在到达境内上岸之前会流经多个金融机构。吉米提到 J. B. 普利兹克（J. B. Pritzker），他是一位美国风险投资家、企业家、普利兹克集团的联合创始人，也是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吉米专门提及普利兹克也是为了让他自己在这海外的这些活动显得合法。他意在阐明，在美国这样一个拥有某些最严格法律的国家之中，如果一个管理着超过 1200 万人口的州长都能以这些做法而闻名，那就说明，它们一定不仅是合法的（legal），而且还是合理正当的（legitimate）。⁵⁴

图表 1.4 用一个简化的网络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标明了资本流入越南和缅甸等风险市场的典型方式。

46 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将共同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巴拿马、塞舌尔、萨摩亚或列支敦士登设立离岸基金。这些都是合法的技术手段，能在不同的主权国家创建一条所有权的书面追踪记录。在这之后，他们会在新加坡或中国香港设立投资项目或特殊目的公司，并经由这些公司再将资金导入在越南或缅甸境内的投资组合基金公司。值得关注的是，每个投资项目的离岸结构都很不同。在我跟踪过的 67 个不同的投资项目中，没有两个项目使用的是相同的结构。事实上，在 2016 年“巴拿马文件”泄露事件爆发之后，我的许多受访者都将他们的投资工具转移到了不那么知名的一些离



图表 1.4 假造的资本流动，来源：金伯莉·凯·黄

岸金融中心，比如萨摩亚和塞舌尔，这些离岸金融中心对报告的要求也不那么严格。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在实践层面，这些网络从来不会像吉米在图表 1.4 中所展示的那样简单。非西方国家中涌现出超级大蜘蛛及其从属蜘蛛，这便让他们使用离岸金融中心的原因多种多样。

离岸金融中心的功能

本书是关于资本蛛网的学术研究，它采取了批判性方法，研究离岸工具如何对民主、包容性和透明度构成威胁。然而，我在专门研究政府不太稳定的前沿市场时发现，这些资本蛛网除了有保密和逃税的功能之外，还具有其他一些实用功能，包括：隐私问题、税务问题、作为应对当地薄弱的银行机构的手段、离岸仲裁、接触到更广泛的全球投资者、保护资产免受诉讼的威胁、更容易实现

离岸退出，以及能够通过指定的代理人私下收发款项。

隐私问题

离岸金融中心的主要业务是为西方人提供隐私保护和保密工作。现在，这些相同的结构则为来自非西方国家市场的一批新精英提供隐私和保密性，正如居住在中国香港的韩国公民凯文（Kevin）向我解释的那样：

47

在这个富人世界中，有大鱼也有小鱼。大鱼有更多的东西需要隐藏，也有更多的钱财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必须为更复杂的管理结构买单。那些你正在与之交流的、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设立基金的人，都是极其富有的人。他们必须要在他们的投资之间创建各种层级结构，以便抵御和降低风险。在英属维尔京群岛，人们甚至都不能询问账户的所有者是谁。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个代理人结构来设置的，所以，没错，如果你想要藏好你的钱，那里就是最好的地方。如果一个美国的律师大老远跑过来问：“是谁持有这个账户？”法律根本不允许他们说出来。那就是他们那边经营的主要业务。

凯文给我介绍了苏茜（Susie），她是一位常驻新加坡的公司秘书，自称属于“外包版”首席财务官。她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于管理离岸结构的设置，以及处理客户业务中的税务问题。她向我解释说：“我们为客户保护隐私……亚洲的很多客户都害怕他们的政府随时会针对他们，并抢夺他们的资产。这就像是逃离大屠杀的犹太人一样。在缅甸，（政府）不公平地没收他们的资产（成了一个问题）。”

和苏茜所发现的一样，另一位公司秘书谭（Tan）也指出：“你必须区分隐私（privacy）和保密（secrecy）的不同……在一个规定税务机关和相关方共享信息的监管框架内，隐私当然是需要保护的。但保密会涉及隐藏、勒索以及欺诈。这些可能都是重要问题，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其实担心自己会沦为受害者，变成想要抢夺他们钱财的犯罪分子或手头经济拮据的政府的目标。”正如谭在此所指出的，隐私和保密的区别在于，隐私是合法的或道德的，而保密是非法的或不道德的。虽然它们在作用上大致相当，但关键区别在于它们与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的关系，以及投资者是否觉得他们在前沿市场上的资产是安全无虞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群体希望通过抢先于监管薄弱国家的监管体系来利用其前沿市场，但他们又希望能确保他们在海外的投资安全以应对风险。

当我向公司秘书询问影响美国投资者的新法律时，常驻新加坡的邦尼（Bonnie）对我说：“哦，没有美国投资者……只有中国和亚洲的客户……因为我需要向美国政府报告所有客户的信息，如果我接受了美国客户的话。”邦尼在这里指的是，她不再接待持有美国护照的客户。然而，她承受得起这样做的后果，是因为她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精英那里获得足够多的业务。对于美国公民来说，保密可能不太会行得通。然而，根据苏茜和其他人的说法，离岸结构仍然为第三世界的精英提供隐私保护服务。

苏茜向我解释说，当她对她的美国客户做尽职调查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拒绝配合回应，这迫使她只好彻底关闭他们的账户。新的法规规定，公司秘书必须要确定不同离岸结构的最终受益人，她担心自己会面临经济处罚，还担心她的会计证将被吊销。然而，正如苏茜后来解释的那样，“在这种空壳游戏中，如果你有（来自较小国家的）高级政府官员客户，那就没事儿，因为他们不会自我监管”。她指的是，在这些国家中，政治和经济利益经常相互重叠，

这就使得想要在前沿市场上拆除这个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避免与监管美国客户的新监管机构打交道，她主要接待中国和东南亚的客户，提供一定程度上的隐私保护，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执行与美国相同的“知悉您的客户”的规章要求。

逃税和避税

虽然美国监管机构经常使用“逃税”的字眼来追究他们认为没有向其缴纳应缴税款之人，但是，对于这些相同做法，我采访的所有法律和金融专家都将其视为避税。他们向我解释说，逃税和避税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非法的，而后者是合法的。然而，两者之间的界限也可能相当模糊。比如，在越南和缅甸进行投资的一家私募股权基金的执行董事保罗（Paul）这样向我解释说：

我认为，整个“巴拿马文件”事件和奥巴马在白宫发表演讲讨论这件事（2016年4月5日的演讲，讨论的就是“巴拿马文件”泄露事件）就仿佛是在说，“欢迎来到现实世界”^{*}。世界上大部分的基金都存放在一栋建筑里[†]，那里的律师和其他所有人使用的都是同一个地址……在这里，没有人会违法。我们都在缴纳税款，但是新加坡和越南之间有一项双重税收协议，据其规定，你只需要为你在海外取得的所有资本收益缴纳5%的税款。

吉姆（Jim）的回应也给出了类似的论点：

^{*} 美剧《老友记》（*Friends*）第一季中莫妮卡的经典台词，后来也成为美国一部小说的名字。

[†] 此处是指位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华尔街上的证券交易所大楼。

根据我得到的提高税务效率的建议，我经常会通过新加坡或英属维尔京群岛来投资，而不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那样直接投资。很显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他们在税收事务上更有效率，而且新加坡的企业所得税较少，因而我可以把钱留在新加坡。的确，这叫外国直接投资，但根本没有办法知道钱真正是从哪里来的。这不就是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吗？

保罗和吉姆都向专业人士寻求专家建议，这些专业人士在离岸金融中心经营业务，以便帮助他们建立起合法的结构，好让他们能够跨多个司法管辖区避税。本书第4章会更深入地探讨不同类型的税收结构和税务策略。然而，这里需要注意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与没有资金或人脉关系或者不知道该如何高薪雇用一组法律专业人士来巧妙地利用这些法律结构为他们谋利的竞争对手相比，资本主义蛛网上的蜘蛛却能够获得可观的利润。对于美国投资者而言，这些服务可能意味着，仅因为节省税款就可以增加高达30%的利润。⁵⁵ 49

薄弱的地方银行机构

生活在越南和缅甸这样政治不稳定且金融机构薄弱的国家，本地企业家经常会将离岸银行视为一个可以安全存储金钱而又不必担心破产的地方。

阿尔（Al）解释说：

离岸只是意味着它不可见，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当你与比我更了解这方面的人交谈时，他们会进行一些估算。比如，当你与银行方面交流时，他们会估算，在越南、缅甸或老挝等国家，只有不到50%的钱被人们存在了这些国家的银行里。我

的家人经历了如此多次的银行危机，以至我们对自己国家的银行都没有什么信心。我们总能记得银行刚关门倒闭的那些日子，人们在银行大楼外排着长队，都想要把自己的钱给取出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储蓄的银行破产了，你该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会称新加坡是东南亚的“自助洗衣店”。我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将我们的钱存放在离岸的新加坡、开曼群岛和中国香港等地。而且，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在那里留下我们的名字，因为政府随时可能会针对我们进行打击。你不会想要像那样变成一个容易被打击的目标。我们使用代理人来持有我们的资金。我在开曼群岛也有这么一个代理人，他为我和这里的所有公司做这项管理工作。缅甸百分之九十的金钱都存在新加坡的银行里，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政府也知道这一点。政府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考虑如何建立更安稳稳定的银行，以便鼓励人们将金钱再带回这个国家。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

在越南和缅甸，几乎所有与我交谈过的人，都没有将他们的流动资产留在国内。事实上，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报告说，他们只在境内保留了足够的现金以支付公司运营的成本。利润、投资或储蓄等，
50 都是存储在离岸的银行账户中。然而，这样做也不仅仅是出于保密和逃税的需要。还有一个原因是，金融危机和裙带资本主义创造了这么一种环境，在其中，很少有人会相信银行或国家的监管机构会保护他们存放在银行里的资产。这种薄弱的金融基础设施便将富人推向了离岸银行业务。

离岸仲裁

对于金融精英来说，前沿市场有风险，正是因为那里没有“明

确的法治规则”或可靠的司法系统来保障投资的安全。离岸法律协议则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些保障，因为对跨国法律秩序的要求有助于给离岸市场带来一些可预测性，以规避在岸市场的不可预测性。⁵⁶ 有 156 个国家现在都是《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简称《纽约公约》(New York Convention)] 的成员，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是国际仲裁的一大典范。理论上来说，个人可以向国有企业或与国家关系密切的私营企业提起诉讼，以期赢得离岸的判决。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大多数管理国有企业投资的私人投资者都很关心如何在一个中立地区解决争议问题。尽管如此，国家法院仍然可以拒绝承认和 / 或执行在离岸市场赢得的判决。

接触到更广泛的潜在投资者

法律和金融机构薄弱的前沿市场提供了潜在的巨大收益，但也带来了相应的巨大风险，这让投资者犹豫不决。鼓励他们投资的一种方法就是建立离岸实体，投资者可以在其中购买母公司的股份（母公司则持有在岸子公司的股份），却不必对子公司本身进行直接投资。与此同时，当投资者想要出售他们在当地公司中的股份时，他们只需出售在离岸市场所持有的股份，这样一来，他们想要退出该基金时，就无须在越南或缅甸的在岸市场做任何事情。这便使投资者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投资离岸公司：资金流入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某个基金，该基金在越南进行投资，而投资者可以通过出售他们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股份来退出该投资，而无须直接在越南市场上退出该基金。

本（Ben）是一位运营主管，他在越南经营一家小公司，其投 51

资的资金来自世界各地，他这样向我解释说：

我是这项投资的运营人员，但我的老板其实是罗布（Rob）和特里（Terry）以及上面那些人……珠宝集团（Jewel）被一家位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东南亚在线金融服务公司（SAOFS）授权给了VP银行。这家公司已经将珠宝集团授权给了新加坡美好生活集团（Richlife Singapore），而新加坡美好生活集团又将其授权给了越南的VP银行。就如何在越南市场推出这项产品，受聘提供咨询的是越南当地生活集团（LocalLife Vietnam）。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当外国投资者想要进入越南市场时，他们会去购买东南亚在线金融服务公司的股份。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无须在越南做任何事情就可以接触到越南市场。

换言之，特殊目的公司使投资者能够通过投资拥有在岸子公司的空壳公司或母公司来实现在风险市场中的投资。这意味着，想要在前沿市场进行投资的投资者只能从空中进行俯瞰，这使他们很难看到、触摸到或实际感受到他们的投资在当地产生的实质性后果。他们不必处理日常运营事务或复杂的政府关系，因为只需支付少量的管理费，在岸的子公司就可以帮他们处理好这些具体细节。

保护资产免受法律诉讼追责的影响

在离岸账户中持有的投资就如同被保存在保险箱中一样，这就使得索赔人一来难以定位被索赔人的资产，二来也难以执行对投资者资产的判决。特别是对美国公民来说，虽然根据法律规定，其账户信息必须填报在纳税申报表上，但这些资产本身不属于需要被公共记录和公开的部分。外国判决债权人通常难以在另一个国家执行

其本国法院的判决。

在我采访越南一家大型制造公司的投资者萨姆（Sam）时，他向我解释道：

也许在过去，这些事情要简单得多。你会在这个国家开一家工厂，然后在另一个国家再开一家，这两家公司都是你的。但是，比如说，如果你在越南经营的公司业务出现了问题，那你在印度或塞浦路斯等地的所有资产，都可能会与越南这家公司的资产捆绑在一起。所以，你必须做的就是在你的各项投资之间建立起法律防火墙。当你为一项业务设立一个空壳公司时，它就只是这家公司自己的资产，就算这家公司最后由于什么原因而破产，你在其他地方的所有投资也是很安全的。 52

另一位投资者加文（Gavin）解释了这些复杂的结构，他说：

除非你持有大量的投资，否则，为这些复杂结构支付所有费用就没有意义。项目或投资越大，结构也就越复杂。就这么说吧，我在萨摩亚有一家特殊目的公司，在塞舌尔拥有另一家……塞舌尔公司的结构中有在中国香港的子公司，而中国香港的实体则在越南进行投资。如果有人想要起诉我，那他们现在就必须要在四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都赢得诉讼才能执行对我的判决。没有人会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因此，这其实是一种帮你避免有人在诉讼中捞你钱的方法。

加文和萨姆所说的都是资产保护信托，这是一种法律机制，可以保护他们的财富免受诉讼、债权人、现任或前任配偶，以及投资者本国政府的影响。我的采访对象还报告说，为了建立这些信托，

他们花费了 2500—50 000 美元不等的费用，有些帮忙建立信托的公司还要求从所有被转移的资产中抽取一定比例的提成。建立信托的法律结构越是复杂，其受益者就越多，成本也就越高昂。

离岸市场的退出要更加容易

特殊目的公司能让其所有者通过在离岸市场出售他们在特殊目的公司中持有的股份，来处置在岸市场中的资产。在腐败猖獗或官僚机构低效的新兴前沿市场中，离岸金融中心的主要价值是它们能够提供效率更高而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会让投资者感到他们的投资更加安全。当投资者想要退出投资，并在前沿市场中出售市场份额时，他们会在新加坡或中国香港出售他们在离岸资产中的股份，以避免一系列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和征税。这种股份出售可以在不转让或不改变投资者在越南或缅甸等境内所有权结构的情况下进行。因此，在较晚阶段进入某个项目的新来投资者，就不必去处理重新申请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方面的问题。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可以避免在越南纳税，而且，这种所有权的转让也从未在越南真实发生过，所以新的投资者不必再从头开始处理那些烦琐的手续流程，也不必去贿赂当地的公职人员以获得新的营业执照、准入许可证，或是重新谈判新的税收协定。

53 离岸结构能使“资本蜘蛛”抢先于在岸市场的法律和政治体制，利用离岸保护机构将资本蛛网扩展到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角落。本书中的故事就将聚焦于东南亚地区，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争夺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 * *

正如我们在本章中所论述的那样，社交蜘蛛相互协作，不仅使蛛网的存在成为可能，还将其织就得越来越庞大。蛛网资本主义打破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成熟市场和不成熟市场、透明和腐败的市场环境之间旧有的二元对立，进而揭示了这些市场实际上是在一个大型的全球生态系统中相互连接起来以供超级大富豪加以利用的。就像章首提到的一美元钞票上的那只小蜘蛛一样，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隐藏在世界各地的角落里，聘请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代理人来帮他们织就连接全球市场的庞大蛛网。

然而，只描画出这个资本蛛网或论述这些不同金融结构的功能还不够。本书的目的是要解释，蛛网资本主义中的蜘蛛社群是如何通过更深入在灰色地带游走的实践来构建这些蛛网结构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接下来的章节将逐一放大和审视这些内容，诸如交易中的艺术 / 策略、不同类型的腐败现象、各种各样的税收结构，以及将不同的人联结捆绑在蛛网资本主义中的市场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吐丝织网：促成新的投资交易

一位富豪蜘蛛的钱是如何流向世界各地偏远角落的？将离岸资本与前沿市场上的在岸交易联系起来，又需要什么样的人员和关系网络呢？

在我的研究期间，越南和缅甸激发了投资者高度乐观的情绪。但是，这些国家都存在很大的制度性空白，¹包括但不限于：薄弱的银行基础设施、模糊且经常腐败的政府官僚机构、不安全的知识产权、匮乏的当地人力资本，以及与公司管理尽职调查报告有关的一些问题等。²这一章内容有关富豪蜘蛛如何在新兴前沿领域吐丝织网、达成交易，具体讲就是投资者如何依靠金融专业人士的广泛网络来帮他们克服一些障碍并且扩大他们的资本蛛网。

我追踪了那些真正意义上在世界各地到处运转资金的人。我利用在这一过程中所发现的民族志研究相关的数据，想弄明白全球精英是如何在那些具有巨大制度性空白的高投机性、高风险市场上投资的。更具体一点来说，我感兴趣的是了解金融专业人士如何为前沿市场筹集资金，然后再寻找交易来部署这些资金。在越南和缅甸，我参加了很多投资者的会议，目睹了投资者是怎么面对严酷现实的，

而现实便是，最有投资潜力和希望的交易是那些牵涉到与当地政府保有紧密联系（以越南为例）或是与以裙带关系为依托、有军方背景的老牌公司保持紧密联系（以缅甸为例）的交易。因此，在当地市场的这种背景环境下，来自美国等地的投资者要是不能依靠他人帮助来完成在灰色地带游走所需要做的工作，从而分散投资风险，那么，他们就很难巧妙地利用这些前沿市场。

本章将会重点关注风险市场交易经纪流程的三个核心环节：筹集资金、寻找潜在交易以便部署资本以及最终达成交易。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那种将小型的本地资本蛛网编织成更大的全球资本蛛网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拥有离岸资金的人与管理在岸投资和打点政府关系的一群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relational capitalism）的具体形式。³

筹集资金：将资金从离岸基金转向在岸投资

蛛网资本主义如此错综复杂，其原因在于社交蛛网并没有明确的起点或终点。有很多只蜘蛛同时从世界各地的不同角落里吐着丝，编织着这些巨大的资本蛛网。对前沿市场的投资并非简单地指让感兴趣的投资者在这些市场中寻找交易机会。相反，一个庞大的从属型蜘蛛社交网络中的从属型蜘蛛编织着他们自己的资本蛛网，同时也希望从世界各地持有更多资金的大蜘蛛那里寻求资本注入，以便扩大他们自己的蛛网。

在越南和缅甸的一些基金经理会采用在岸和离岸双重策略，来鼓励富豪及超级大富豪通过进入风险市场来扩大他们的投资组合。离岸路演——投资经理为潜在客户提供的旅行，旨在向潜在投资者推销投资机会——为通常在越南和缅甸工作的投资经理提供了一个施展空间，让他们能够与那些管理着富豪 / 超级大富豪海外资产的人会面，以此来鼓励并拉动这些人对新兴的风险市场投资。

为了追踪资金的流动并了解这些交易的面貌，我与一些基金经理及其团队一起飞往世界各地进行路演：我去了美国的好几个城市（旧金山、纽约、西雅图、芝加哥、休斯敦、奥斯汀、纽波特海滩，甚至还有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和丹麦），中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中国内地、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香港），以便观摩他们如何向潜在的外国投资者推销投资机会。在这些路演过程中，我采访了74位大型和小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经纪人，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专门为越南和缅甸市场的投资筹集资金。

我还曾花时间和同一批基金经理一起接待来自越南和缅甸的潜在投资者，那些超级大富豪和管理他们资金的人都可以参加在岸投资者会议并体验他们精心策划的当地旅行。这对于激发投资者的乐观情绪至关重要，会让他们本能地感受到越南和缅甸市场的活力，继而觉得这些市场是值得押注投资的地方。

56

离岸路演

路演是帮助潜在投资者的一种重要方式，让他们无须绕半个地球旅行就能了解越南市场。基金经理会向潜在投资者推销作为一个市场的越南、自身作为一个基金团队在与政府建立联系方面的能力及其获取内幕交易的机会。

凡（Van）是“XVN资本”（XVN Capital）的一个普通合伙人，马克斯（Max）是其有限合伙人，该基金的任务就是在东南亚投资。作为吸引新投资者的年度路演的一部分，他们计划前往美国，在那里，他们将向位于纽波特海滩、休斯敦、纽约、西雅图和旧金山的潜在投资者展示他们在越南的一些具体的投资机会。他们计划

向有限合伙人推荐网络中的几个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进行相同的演讲展示，这些有限合伙人曾投资于他们早期管理的基金。我全程参加了许多这样的演讲展示，但我有意回避了一些私人会议。

为了将前沿市场中较小资本蛛网的一部分与控制了发达经济体中较大蛛网的人联系起来，这支位于越南的团队花了数周时间，整理出了一套“投资者演示文稿”：在美国路演时，该交易团队随身携带着一份准备好了的15—20分钟的幻灯片演示文稿。

我们一起从胡志明市飞往洛杉矶，并入住于同一家酒店，在加利福尼亚州纽波特海滩的前两晚，我们都住在该酒店里。他们计划与爱德华（Edward）——一家小型家族办公室的私人财富经理——会面，爱德华的客户对公开募股和国际市场最感兴趣。我们抵达后的第二天早上，爱德华的助手拿单（Nathan）便在酒店与凡和马克斯见了面，并共进早餐。那天早上，我观察了凡和马克斯所做的工作，他们想大致了解该家族办公室所感兴趣的投资种类，了解该公司的风险偏好以及它的一般投资策略。这种面对面的建联关系工作很重要，它能帮助马克斯和凡确定该向爱德华重点展示什么内容。

57 在酒店吃过早餐后，我陪同他们去了办公室——在一栋容纳多家企业的综合商务大楼里。搭乘电梯到十楼只需很短的时间，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办公空间，在这里可以看到海洋和乡村俱乐部的全景。办公室的陈设现代而简洁，白色纹理层次分明。几乎消隐在背景中的是两幅白色底的大型画作，轻描出了站在小木筏上、戴着稻草帽的妇女的身形轮廓。这些画像是如此精细微妙，以至于它们几乎消融在了这片空间中。然而，这些作品所代表的含义清晰：爱德华的团队对东南亚有着明显的兴趣，也许他们已经在那里达成了一些交易。

年轻的女助理珍妮（Jenny）跟我们打招呼，并带领我们参观办公室。后面的三间办公室毗邻一间会议室，从这里可以看到远处

的大海。这间办公室给人的感觉与马克斯和凡在胡志明市的高层办公室明显不同，因为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都只能看到外面摩托车和汽车大军飞驰而过的繁华都市景象。参观结束后，珍妮为我们端来咖啡，并在爱德华进入办公室之前帮凡和马克斯设置好了他们的幻灯片演示文稿。在演示开始时，房间里共有五个人：凡、马克斯、爱德华、拿单和我自己。

凡和马克斯以对走廊上画作的赞美开启了这次谈话，他们说，这幅画让他们想起了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他们还谈到了这幅画作是如此抽象，以至于很难将它和世上的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联系在一起。接着，爱德华向他们讲述了他的祖母在 20 多岁时环游世界的故事，而缅甸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借助谈话中搭建好的这座通往东南亚的桥梁，凡便开始进行幻灯片演示文稿的展示。他们的第一张幻灯片上放的是一张东南亚地图。有一条红色虚线勾勒出了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凡这样开始了他的演讲展示：“毫无疑问，您的祖母遥遥领先于她的时代，因为眼下是投资东南亚的最佳时机。这里共有 10 个国家，总人口规模为 6.26 亿，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 2.8 万亿美元。”* 展示这张幻灯片的目的是，仅仅从人口规模就能捕捉到东南亚巨大的市场潜力。

第二张幻灯片聚焦于越南，其中有一些关于首都河内及其在管理关键政府关系的重要地位上的事实性介绍，而胡志明市则是该国的主要经济中心。凡继续说道：“越南现在是一个热门市场。它以每年 6%—7% 的速度在增长，这里有超过 9500 万年轻且不断

* 原文如此。东南亚共 11 个国家，但若按东盟成员国（ASEAN）来算，因东帝汶未正式加入，所以有时会说东南亚 10 国。另外，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3 年东南亚的人口规模约 6.9 亿，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3.8 万亿美元，作者此处所写数字，可能是 2015 年的统计。——编注

增长的人口，其国内生产总值在短短十年内就从人均 200 美元增长到了人均 5000 美元，这表明中产阶级正在不断壮大。此外，人们正以每年 3%—4% 的速度从各个省份的乡间迁入城市。”这里的演示重点在于，要讲述在整体上与美国等发达市场相比，越南宏观经济增长的故事，而美国等发达市场的年经济增长率仅为 2%—3%。其隐含的卖点便是，对前沿市场的投资将会产生至少两倍的回报率。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转向下一张幻灯片，上面有几个已经在越南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的公司的标志。他继续演讲：“这种快速增长的关键原因与三星等大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有关，这些公司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创造了就业机会，也增加了其财富。这增加了人们对更好的医疗保健、教育机会、银行服务以及获得信贷、私人财产或更大住宅的需求，而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投资的领域。”凡提供了一个全局性概述，旨在向潜在投资者展示，由于一些大型公司已经进入了越南市场，该市场现在可能比新兴市场时代要更加安全。在播放这张幻灯片时，马克斯也插话说，这些投资的回报率一般在 15%—20%。

在幻灯片演示进行到一半时，爱德华打断了凡的展示并说道：“您的投资领域似乎涵盖了方方面面。您的意思是要告诉我，您在这么广泛且多样化的行业中全都进行了投资吗？您在投资的实际运营方面有什么战略性技巧？”

马克斯笑着说：“我很高兴您这么问。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就在于，新兴市场中的人们倾向于以美国所没有的方式来控制未知和意外状况。我们将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聚集在一起，通过筹集资金和为寻求扩张的公司提供启动资金或成长资金来管理这些未知情况。”这是马克斯在表达上所采取的一种隐晦方式，也就是说，他们有能力利用这种市场的不可预

测性，因为这基于他们与关键政府官员的人脉关系。

然而，爱德华脸上困惑的表情让凡以更为明确的方式插了话：“需要明确的是，这不仅仅是为了弥合资本和机遇之间的鸿沟，它也与如何应对这些国家复杂的官僚系统环境有关。我们也在当地投资了其他一些公司，通常而言，在公司管理方面，它们不在大多数外国人的舒适区内。”凡在这里隐含的意思是，通过让投资经理在境内开展交易，爱德华就不必担心他自己会置身这些交易的灰色地带，也不必亲自去应对一个没有明确投资规则的政府。相反，从属蜘蛛将会为爱德华完成这个资本蛛网中的这部分工作；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他的信任和他投注的资本。

59

他们停顿了一下，然后马克斯转到下一张幻灯片，大标题为“投资方法”。“我们的主要方法，是去发现通过一般市场的私募股权结构无法广泛获取的一些投资机会。”这里所暗示的是，他们在越南具有某种优势，因为他们拥有得天独厚的内幕渠道，并对越南那些不向公众开放的交易有着实地了解。这些交易机会只会对富豪/超级大富豪开放。

马克斯继续说：“我们会通过聘请非常优秀的专业研究人员来帮我们做好尽职调查。我们还设立了少数股权投资保护机制，这使我们能够参与董事会并与管理层一起决策。我们通常会持有投资三四年，之后要么通过首次公开募股将其公开上市，要么将投资出售给下一位贸易投资者，我们的目标是达到每年7%的最低内部收益率，这个目标也很容易实现，因为该国经济正在以每年这样的速度增长。近年来，我们的实际回报率一直都在10%—15%。”

爱德华突然插话道：“这就是新兴市场的魅力所在啊！……高风险，也有高回报。”

马克斯对此欣然赞同，并回应道：“若您想要安全稳当地下注，那您可以投资发达市场，他们的制度性漏洞较少，因此您可以控制

的范围也就更大，但是，您也知道的，那里的内部收益率仅为每年2%—3%。而在新兴市场，你光是依赖那些国家的宏观经济增长率就够了，这就已经达到每年6%—7%了。”

爱德华问道：“但是，你们如何管理风险呢？在这种市场情况下，请你们详细说说都有哪些投资风险？”

凡将幻灯片跳转到概述风险的那个页面，其标题为“投资前沿 / 新兴市场”。他指着幻灯片说道：“存在一些宏观风险，最大的宏观风险就是当地外汇的贬值。微观风险则与公司治理相关的风险有关，那里的公司治理目前尚未达到国际统一标准。”凡从演示文稿展示中走开，并对他们说，“在灰色市场中，有很多钱可以被攫取”，因为那里的法律条款可以进行多重解读和阐释，“这也是我们的附加价值所在”。然后，凡继续讲述道，他的团队已经在市场上打拼了多年，并且“花了很多时间建立人脉关系，特别是在跟政府打交道方面”，这使他们在越南能够获得国有企业的独家股权化机会。他还告诉他们，在灰色地带游走就意味着，你进行一项投资不是基于
60 计算出的风险，而是出自一种直觉本能，这种感觉来自信任你所雇用的人，相信这些人拥有打理复杂国家关系的专业知识。为了做到这一点，那些筹集资金的人必须将他们的交易团队作为投资机会中的一部分来推销。随后，凡继续推销他们投资团队的故事，以及他们在执行和管理投资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他们的投资表现如何卓越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他们在进行交易时都拥有哪些关键人物的故事，以及他们能带来哪些独特的经验上的组合。扩大这些资本蛛网的关键，是要引入其他蜘蛛来发挥他们各自独特的作用，以构建这个资本蛛网的其余部分。幻灯片演示的下一个部分，便是要识别出从属蜘蛛。

推销基金主要创始人的故事

下一张幻灯片上有四个人的照片，并附有他们的名字、头衔和两三句话的简介，描述了他们各自的投资经历。

马克斯·沃（Max Waugh）——首席执行官

马克斯是“XVN 资本”的一位联合创始人。他在越南生活了 20 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话。他曾任 VNN 的地区负责人，还与他人共同创立了 VNN 资产管理公司（VNN Asset Management）。这家公司专注于越南市场的上市股权，其资产管理规模的峰值超过了 5 亿美元，后于 2010 年退出了越南市场。

阮凡（Van Nguyen）——首席投资官

凡是一名越南公民，在亚洲金融和运营方面拥有超过 20 年的经验。他曾在多家公司任职，主要负责监督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上市股权投资。

迈克尔·伯恩斯（Michael Burns）——香港业务运营部主管

迈克尔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亚洲的汇丰银行中度过的。在成为“JIA 可转换债券交易部门”（JIA Convertible Bond Trading）的负责人之前，他领导着一个有关亚洲股票、金融衍生品和可转换债券业务线的运营部门。他被全球风险评估专业协会（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s）认证为金融风险管理经理。

阮森（Son Nguyen）——总经理

森是该公司负责东南亚地区投资组合的总经理。他的前雇主包括汇丰银行、汇丰银行资产管理公司（HSBC Asset Management,

中国香港）和瑞士信贷银行（瑞士）等。在回到越南之前，他是一家瑞士投资集团在越南设立的控股公司的投资总监之一。

如幻灯片所示，该团队在越南、中国香港和瑞士都拥有自己的资本网络节点，而且，他们拥有多年的离岸和在岸运营经验。马克斯表示：“若加在一起算的话，我们的团队人员拥有超过 50 年在越南的投资经验。我们的基金能给投资者提供机遇，让他们能通过我们搭建起来的和商界领袖及政府领导人的社交网，来了解越南私募股权市场的发展情况。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不是如何进入市场或寻找交易，我们的挑战是要筛选我们了解到的交易并确定那些值得投资的好公司。简而言之，我们所拥有的这种市场优势将使投资者搭上越南中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快车。”

这张特别的幻灯片和他们推销交易团队的策略让我印象深刻，他们所谈论的不是他们的成功率，而是他们在不同的时间点被委托管理的资金规模。似乎没有人关心这笔钱是否产生了收益回报，也没有人关心是否有任何数据表明他们在之前管理的基金上取得了成功。在达成一笔交易协议时，对人的盲信至关重要。这些市场中的投资者换手率很高，正如那天晚上晚些时候马克斯在我们喝饮品时向我解释的那样，人们对市场投资损失的记忆很短。他们只想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赌赢的人。

什么才能让所下赌注获胜呢？是的，答案与管理各种投资项目的关键政治关系有关。凡接着划到了下一张幻灯片，其中放了一些他们与主要政府官员的合影，包括越南财政部的官员，他们也还与越南现任总理和加拿大的总理合影留念过。这些照片旨在说明，他们在一个政治关系对管理投资至关重要的国家里所拥有的人脉关系资本。

凡解释说：“我们的团队多年来一直与政府官员密切合作，以应对国家所面临的一些经济挑战。我们的团队中也有当地人，他们

了解该如何驾驭复杂的监管环境。正如您所看到的，凡和森都拥有在海外和越南当地工作的丰富经验，他们对如何利用未能在公共市场上公开的交易机会也很有远见。”再一次，马克斯和凡所强调的是，他们在该市场中拥有一种特别访问权和内部知识，而它们并非对任何想投资的人统一开放。他们正在推销的卖点是，他们对当地专业知识和人脉关系的把握，以及他们有进入一个缺乏一套明确规则的市场的内部机会，因为正是在这种缺乏明确规则的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获得一些特惠交易。

62

对投资者的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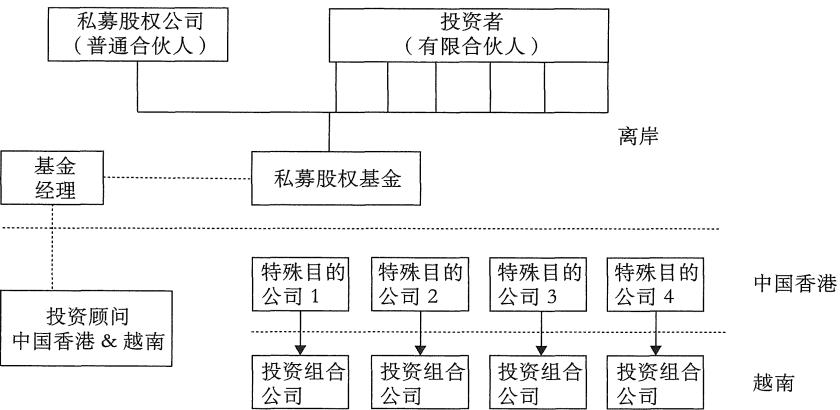
仅仅宣传越南宏观经济增长的故事还不够。作为离岸投资者和在岸投资交易之间的关键经纪人，他们还得非常努力地向潜在投资者保证他们具备保护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一些必备技能。比如，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多保护的将是爱德华，作为一名离岸基金的经理，他而不是他老板的名字将会出现在所有的投资文件中，而后者才是董事长或超级大蜘蛛，但他显然会缺席整个交易环节。

为了鼓励可能不太了解越南市场的投资者去那里进行大笔投资，马克斯和凡努力概述了他们将会如何保护投资者免受法律问责和经济损失。保护投资者的关键在于广泛使用离岸结构。

在另一张新幻灯片上，他们展示了一张将家族办公室的利益置于首位的控股结构图（参见下页的图表 2.1）。这就是他们眼中正在控制和管理的资本网络。

马克斯继续说道：“我们通过建立保护我们投资者的金融结构来管理许多与新兴市场相关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作为有限合伙人，我们的投资者会投资离岸设立的私募股权基金。我们有时会使用离这里不远的特拉华州，有时也会使用英属开曼群岛或英属维尔京群

63



图表 2.1 一般股权结构，来源：金伯莉·凯·黄

岛，具体用哪个地方取决于投资的类型。但特拉华州和现在的佛罗里达州同样好用。如您所知，最近有关离岸结构的新闻报道认为，这种行为完全是在逃税。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些结构对于保护越南等风险市场中的投资者而言也至关重要。”

当爱德华询问香港离岸结构的目的时，马克斯解释说，该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旨在专门保护像爱德华这样的投资者，因为这样一来，要是投资出现了任何问题，爱德华就可以直接起诉香港公司，从而可以避免与越南复杂的法院系统打交道。此外，马克斯还解释说，这种结构保护了投资，因为他们只在境内汇款以支付运营成本。马克斯补充道：

香港的结构也让我们能够利用在香港设立的双重税务协定，因为不在香港开展任何业务的离岸私募股权基金有资格豁免利得税。这也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多币种的公司账户，这在使用网上银行的当下非常简单便捷。

爱德华说：“我想让你们再详细解说一下图表底下的部分，这部分概述了中国香港的特殊目的公司与越南投资组合公司之间的关系。但这种结构实际上是如何建立的呢？”

马克斯解释说：

有时候，我们会决定持有一家公司的少数股权，并规定在该公司未达到增长目标的情况下可以接管该公司。如果您成了一名有限合伙人，我们当然会与您分享所有这些文件和详细信息，但现在，为了简化起见，就这么说吧：某些行业有外资所有权的上限规定，一般来说，它会是49%。这意味着当地股东会控制51%的股份。这就是我们会设置两层结构的原因，它能让我们做两件事情：要么我们为2%的离岸可转换债券设立可转换债务条款，这让我们能离岸持有多数股权；要么我们建立一个双方可以在境外签署股份转让表的结构，这样一来，越南的股东实际上只控制着一个空壳公司。

从本质上来讲，马克斯在这里传达的东西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却花了好长时间，听了好几次会议才搞明白。他们制定了一项策略，能让他们实际上拥有一家公司的多数股权，尽管从表面文件上看来，他们似乎只在该公司拥有少数股权。这是因为在境外设立的母公司采用了可转换债务结构——一种可以转换为股权的短期债务形式——这将会导致当地公司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一系列目标，因此他们将会失去多数股权。这是一种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因为这意味着，在明面的文件上他们离岸持有该公司的多数股权，而与此同时，他们又只会在岸持有同一家公司的少数股权。

64

向爱德华和拿单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应该在越南投资，以及如何

与拥有丰富经验的当地团队合作来进行这种投资之后，马克斯和凡又继续介绍了一些爱德华和拿单可能会考虑的投资机会。

投资机会

凡和马克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在越南进行投资交易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马克斯解释说：“对于欠发达经济体，需要记住的是，那里的家族经营这些公司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越南等地的家族企业财团通常会涵盖不同的经济部门。我们有一些公司正在寻求各类资本的注入。有一家公司是只专注于物流行业的家族企业——他们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在经营这项业务，并且也把家族企业扩张到了全国。另一家家族企业则在木材加工厂、房地产投资和医疗保健行业的进口产品方面都有业务。”他们后来跟我补充说，这张幻灯片的主要目的，是表明他们所瞄准的业务将会受到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和新消费阶层的大力追捧。这些行业包括农业、旅游业、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物流、能源和房地产。“我们也投资金融科技平台，这些平台正利用新技术来填补与本地银行业务相关的空白，以便在这个以现金为基础的经济体中，为数百万人提供银行交易业务。”

马克斯继续说道：“我们公司会通过我们自己的研究团队和当地员工来引源和促成交易，他们能通过会计师、律师事务所、交易经纪人和投资银行等渠道发掘潜在客户。”

爱德华问道：“你们一年中能有多少投资机会？达成一笔交易又需要多长时间呢？”

65 马克斯回答说：“我们一直都在筛选交易。有时，我们可能会先确定一家家族企业，并与他们一起工作数年，以使达到专业标准，然后我们再进行投资。我想，我可以说，我们每年可能会筛

选 250—300 个交易机会，并且在一年中会成功地执行或完成其中五项交易。尽职调查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我们会花费大量时间来做这件事，与某家公司合作六个月到两年，对管理层进行背景调查和运营情况评估，获得全面的投资评估或全景式了解，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

演讲到此便结束了，这让我感到惊讶，因为演讲中并没有包含有关马克斯和凡认为成熟的、适于投资的那些公司的任何信息，同样，爱德华似乎也没有问有哪些他能获得的具体投资机会。爱德华表示了感谢，并告诉他们，他和他的客户对越南市场的机会非常感兴趣。他还告诉两人，他的团队希望在做出任何确切的承诺之前先行访问越南，并要求参观一次马克斯和凡目前正在考虑的一些交易。我们（马克斯、凡和我自己）在参加完会议后，一起享用了一顿便餐。就餐时，马克斯和凡都给彼此提供了一些反馈意见，涉及他们会如何修改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其余路演中的演示文稿，届时，他们还将前往其他四个城市。

这里的重点在于，他们可以用很少的信息就能筹集到大量资金，因为在东南亚的投资具有极大的投机性。为这个市场筹集资金更多是与过去建立的人脉关系挂钩，而不是与曾经取得的成功相关。从空中观察到的景色与站在地面时所看到的景色有很大的不同。一旦投资资金通过各种特殊用途的工具进入越南的境内市场，投资者便可以从位于纽波特海滩的十楼高处尽览优美的景色，而无须担心交易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它再次表明，这关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甲认识乙，而乙又认识负责具体执行交易的丙。有时候，这些演讲展示也还是不够的。潜在的投资者要么会自己去越南或缅甸旅行，要么会派人去实地勘察。在进入新兴市场的这些旅程中，投资者能够接触和感受这个前沿市场的活力，在这之后，投资者通常也会做出一些决策，但它们很少是基于事实数据，而更多是出于某

种直觉或本能。换句话说，要想为境内市场筹集资金，基金经理就必须策划出一次体验经历，让投资者感受到该境内市场的投资潜力。

境内筹集资金：精心策划的越南和缅甸投资者之行

虽然管理资产的基金经理经常会在世界各地开展路演以筹集资金，但他们也会为家族办公室的财务顾问以及那些希望前往越南市场深入了解的投资者举办越南之旅。于是，一种新型的投资旅游便出现了，因为经纪人、基金经理和当地顾问会制定策略来精心策划一种旅行体验，以便说服投资者将他们的资本网络扩展到这个市场中来。

在越南和缅甸逗留期间，我采访了几位当地的基金经理，他们描述了向到访越南或缅甸的国外投资者筹集资金的过程，以此作为路演的一种有益补充。他们经常会招待来自东亚 / 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者，同时也还有来自世界其他不同地区的各种投资者，例如，有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的投资者，当然也还有欧洲和美国的投资者。这意味着，当地的基金经理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满足投资者的兴趣和需求。

所有投资者都会被邀请来参加投资者会议，这些会议旨在向外人介绍该市场。当地基金经理会采用两种不同的策略来筹集资金，于是，他们在与其打交道的不同类型的投资者面前便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于愿意承担更多风险的看涨型投资者（bullish investors），当地基金经理所采取的策略是，让他们感受到具有排他性和需要内部访问权的投资机会，这可以通过策划展示他们在境内人脉关系的那种旅行来做到，即安排一些能让离岸投资者与在岸关键政府官员和利益相关者联系起来的旅行体验。

境内投资者会议

在越南、缅甸、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之间穿梭时，我参加了四场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会议。有那么一次，我作为一名对外国投资感兴趣的芝加哥大学的学者被邀请参加了2016年在缅甸举办的一场私人会议。这次的会议主题叫作“投资缅甸”，由泰勒（Tyler）主持，他是一位40来岁的亚裔美国人。这次活动是场小型聚会，大约有70人参加，与会人员有着不同的职业身份，但都致力于鼓励对缅甸的外国投资。与会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包括：缅甸商务部的政府官员、美国和德国大使馆的代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代表、一些本地公司的全国负责人、各种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和总经理、银行家和律师。他们都在不同岗位上从事缅甸的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工作。与会人员皆由泰勒亲自挑选，会议仅受邀者才可参加。

67

泰勒在演讲中将此次会议展示比作一次机遇，可以让潜在投资者聆听缅甸最有前途的一些企业家的声音，并与他们交流互动。与此同时，他们还能与政府官员、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企业领导人一起来探讨缅甸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障碍和机遇。我是会议上唯一的学者，主要目的是向小组成员学习，并与在场的人建立联系。我坐在会议室房间后面的一张桌子旁，这样我就可以把笔记本电脑掏出来做记录了。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名叫杰克（Jake）的男性，他的年龄看起来在30—40岁，他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蓝色西装，搭配着条纹袜子和棕色鞋子，袖扣上还刻着他的姓名缩写。正当我卖力地在电脑上敲着字，试图记录下小组成员所说的一切信息时，杰克给我递过来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你是一名记者吗？”我写好回复并将便条递了回去：“我是一名教授。”

会议休息时，杰克走近我，并说：“你知道吧，这些会议上最

重要的信息，来自人们在休息时的闲聊，而非在台上所说的话。”后来我才明白，这些小组交流只是做样子的，旨在让人们共处同一个房间。但是，真正的生意发生在休息时段，这时候，人们会相互攀谈建立联系。我便抓住这个机会，问杰克我们是否可以在会后聊一些关于小组讨论的话题。

我们交换了名片——我的一张大学老师的名片换来了他的三张名片。他的第一张名片上显示，他为当地的一家企业服务，是该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从事的是卫生设备行业——主要是将豪华马桶、坐浴盆、水槽和水管进口到缅甸。他的第二张名片上写的是一家新加坡公司的办公室，他还在那里担任一个基金的合伙人，正在为投资东南亚筹集资金。第三张名片显示，他是一家专门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公司的投资策略师。当他把所有这些名片都递给我之后，我开玩笑地问他：“天哪，且就说说你不做哪行生意吧！”

他大笑着说道：“这在东南亚其实很典型。大多数人都会参与许多个不同领域的项目。”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杰克邀请我和正雄（Masao）一起去酒吧喝酒。正雄是一名来自日本的投资者，也是专题讨论会议中的小组成员，他就如何在缅甸寻找优秀的当地合作伙伴作了主题发言。我们在酒店吧台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来闲聊，也是在那里，我才得知，杰克是出生在新加坡的缅甸人。他在新加坡长大，大部分时间都在新加坡度过，直到最近，随着缅甸的对外开放，他才回到这里准备抓住一些商机。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政治动荡和反政府骚乱期间，⁶⁸ 杰克的父亲被谋杀了。在他父亲去世以后，杰克的母亲便举家搬到了新加坡，但杰克父亲生前一直说要回国，所以，杰克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实现父亲的遗愿。

回到缅甸以后，杰克与正雄合资成立了一家企业，经营他们的卫生设备生意。正雄负责从日本采购卫生设备，而杰克则负责在缅

甸处理与海关、销售和分销有关的所有事宜。与杰克一样，正雄也投资了多个经济领域，其中包括二手车进口交易、农业以及在新工业区建立工厂来加工出口食品等。

在我们之前的谈话中，我曾问杰克，他所说的这些会议上的“私下讨论”（side conversations）是什么意思。杰克继续该话题并告诉我，在像缅甸这样的国家，商业交易是模糊的，能否获取信息才是关键。会议上，专题小组成员谈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宏观且故意含糊不清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正在说话的这个房间里汇聚了各层级的利益相关者。杰克说：

在东南亚的许多地方，法律十分不透明，所以，政府官员可以滥用它们。缅甸这个国家素来以其在军阀控制下的裙带资本主义和腐败的历史而闻名。长期以来，这个国家的经济都是被一小撮与强大的军事将领有着良好关系的巨贾大亨所掌控……但是，在新任领导人昂山素季的领导下，每个人都在观望，想看那个小集团是否还能保持主导地位，或者看看有没有新的参与者能够进入该国市场。裙带主义中的亲信也很聪明，他们正在将自己重新包装为外国企业的潜在本地合作伙伴。因此，目前进入缅甸的大部分投资都来自亚洲的其他新兴市场。因为那些投资者知道怎么和腐败以及**道德上有问题**（他着重强调了这点）的合作伙伴打交道。

这段话所传达的想法，与凡和马克斯为筹集投资越南的资金而在美国的路演中试图向潜在投资者所传达的类似想法相呼应。当我开始把这些节点都连接起来时，我的研究课题中的一部分便开始变得清晰。这些市场上最大的黑匣子在于，仅凭借国家经济增长的活力，人们就有可能获得几乎翻倍的投资回报，但是，为了释放出这

种增长潜力，外国投资者就必须找到一个当地的合作伙伴。境内投资的诀窍就是，要弄清楚如何与赚取的利润丰厚但道德上有问题的当地公司合作或与之打交道，这些当地公司通常由与军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裙带亲信所控制。

69 在那次谈话中，正雄也强调了找一个好的当地合作伙伴很重要，因为这可以帮助你驾驭复杂的在岸投资环境。他告诉我，他没见过几个外国投资者能在不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情况下做成生意，从他的角度来看，投资者需要找一个当地的合作伙伴，因为在缅甸，“投资有关人际关系”。这样一来，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就必须与在这个全球资本蛛网的其他部分工作的从属蜘蛛形成一种互利互惠的信任关系。

杰克还尖锐地指出，在 2016 年向民主的过渡中，缅甸并没有自动迎来政治和经济安排上的彻底转变，反而是让裙带资本家积累了巨额的利润。他们不仅仍然活跃在该国市场上，而且经营的还是最赚钱的生意。此外，由于他们正在经历一种重新包装和专业化运作的过程，所以新的投资者也将不得不作决定，看看自己的投资风险偏好中是否包括与没有良好记录的个人组建合资企业。因此，这种交易的艺术就包括要弄清楚投资者愿意参与灰色交易的程度，以及他们可以与谁合作来管理该国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这样一来，投资者就可以在自身与交易之间打造层层壁垒，以减轻这种投资可能会涉及的物质损失和声誉风险。

看涨型投资者：对一个新兴前沿市场的投机想象

为了展示对越南蓬勃发展的市场的信心，一些本地基金经理会非常努力地为参观该国的投资者策划一种类似第一世界的体验。埃瑞克（Eric）是一名外国公民，他在越南经营一家本地的资产管理

公司，在我与他的一次谈话中，他的回答也与我从其他本地基金经理和投资者那里听到多次的一些话相一致。他告诉我：“西贡（指胡志明市的一个区）与纽约或中国香港也没有什么不同。你可以在这里获得与那些城市中相同的便利设施。”

为了策划这种接近第一世界的体验，当地的基金经理会为他们客人预订五星级酒店，其中就包括柏悦酒店、洲际酒店、喜来登酒店和卡拉维勒酒店等。在这些参观过程中，他们也总是会为客人准备一些有关越南历史的趣闻，可能会从他们下榻的酒店开始讲起。所有这些都是为越南塑造整体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卡拉维勒酒店自 1959 年起就闻名遐迩，它通常还被称为“东方之珠”（Pearl of the Orient），对许多人来说，它代表了胡志明市经济欣欣向荣的早期历史。柏悦酒店的入口处有一座纪念碑，以纪念那些在 1964 年平安夜受伤或遇难的人——那年，一辆越共的汽车炸弹在酒店的大堂附近爆炸，当时这里是一处美军驻地。这座城市也自豪于有一家名为西贡万韵（Reverie Saigon）的新酒店，这是一座 39 层的建筑，拥有 89 套豪华公寓套房及办公室，甚至还有一个供贵宾使用的直升机停机坪。晚上，客人在西贡最昂贵的餐厅和酒吧用餐，这让他们能够尽情享受越南当地的美食和由名厨掌勺的国际美食，享受到可与任何米其林餐厅相媲美的豪华而又幽雅的环境。当地基金经理和外国投资者经常会花时间在供应着高端威士忌和鸡尾酒的空中会客厅里了解彼此，他们在这里还可以欣赏到这座城市壮美的景色。在欣赏城市全景的那种高度，人们很容易会忘记欠发达经济体中存在的微观污垢。

70

文森特（Vincent）是一位海外越南人，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回到越南来开展业务，之后又在进入 21 世纪的头几年里在越南设立了他的资产管理基金。在与文森特的一次采访时，他这样向我解释：

在接待我们的投资者时，有一点非常重要，即我们要向他们展示越南不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越南发展得如此之快，你可以在西贡拥有你在纽约或洛杉矶可以拥有的一切。等他们看到这个国家已经发展到了这等地步，他们就会**感到**（他如此强调）对这个市场充满信心。

文森特接着描述了他为维护的一支公司车队——有一辆梅赛德斯、一辆路虎和一辆宝马——主要用来护送他的客人在城市里观光。他们的办公室位于市中心的一栋高层建筑的顶层，在那里，人们可以360度全方位地欣赏这座城市的景观。除了挂在走廊上的现代越南艺术品外，会议室的外观和给人的感觉都与国外其他高档的国际办公室别无二致。在其中的一次旅行中，我看到有一位财富经理拍摄了数百张照片来记录这次旅行，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这种第一世界体验的重要性。通过将酒店和办公室内的奢华景象与以摩托车为主的城市街道和不断修建的道路的景象并置，文森特还向我指出，不难看出，越南这个前沿市场正在快速成长为一个新兴市场。这种市场活力让他想起了21世纪初期的曼谷或雅加达。作为一个新前沿市场，越南市场具有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

71 作为旅行参观的一部分，投资者也会在豪华的办公楼里开会。在这些会议上，交易团队会分发小册子和一到两页有关他们当前投资情况和近期利润的摘要。投资者也能获得一个提问的机会。之后，办公室会派人带他们参观潜在的投资项目。克里斯蒂娜（Christine）是一位在约瑟夫（Joseph）的房地产部门办公室工作的女性，在我采访她时，她告诉我，虽然是约瑟夫在寻找交易并筹集资金，但她的职责是去弄清楚如何将投资者与特定的项目相匹配，然后再去管理投资的具体执行。她这样向我描述其中的一次环城旅行：

投资者最喜欢问我们的一个问题是：“越南盾的购买力怎么样？”这个问题在办公室里很难解释清楚。我们必须亲自带他们游览城市，向他们展示遍布整个城市的所有新建筑和豪华公寓。在开车带他们四处兜风时，我们可以这么问他们：“我们办公大楼周围正常的办公餐是6美元，这和六七年前的澳大利亚一样。这里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每年5000美元，但却足以支持在西贡这样的生活方式，你怎么看待这点？”这可不是我们能用统计的方式来回答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谈论数字，但你必须亲眼看到并真切感受到越南未来的发展。它仍然是一个以现金为交易基础的经济，没有任何数字或数据能够解释，为什么年收入5000—20000美元的人，能够以全款现金支付一套10万—30万美元的公寓，因为这里的人压根不去贷款。只有在投资者来到这里并亲眼看看后，他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这些旅行旨在为投资者创造乐观的投资情绪，这些投资者希望能对该国在快速发展的市场中的崛起投资押注。但是，人们无法精确计算这个赌注。这里的投资纯粹是基于投资者对市场潜力的感觉。这很重要，因为你缺乏关于越南市场的信息或确凿数据。通过向潜在投资者展示这个有趣的难题——一个只有极低薪水的普通公民却能够维持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便开始唤起投资者进入这个不透明市场所必备的本能直觉。虽然像科威国际不动产（Coldwell Banker）这样的全球公司也能通过房地产交易数据来帮忙填补一些市场空白，但他们的数据也存在很多的漏洞，因为没有关于交易价格的公共记录。此外，这里与中国或印度等更为成熟发达的新兴市场也类似，人们通常所报告的内容并未囊括为了避税而被转移走的现金。这样一来，这里仍然还是一个买卖双方必须在几

乎所有层面上互相讨价还价的市场。

与此同时，在这些投资者推测投资的回报潜力时，克里斯蒂娜
72 还会努力策划一种使投资者充满信心的体验。她说：“在我刚开始为办公室工作时，我们从事的项目要小得多，在一个基金中，我们可能会将五到八处资产捆绑在一起。在这个资产捆绑包中，有些资产运营得非常好，我们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另一些则在与政府打交道或等待道路建设发展时遇到了很多麻烦。如今，大多数投资者都想要进入一个特定的项目。当你试图将任何超过 1500 万美元的资产放在一起时，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建立信任，并让他们对这个市场感到有信心。”

宣传越南经济宏观增长故事的关键，是要让投资者相信，这个市场同时具有较低的进入门槛和较高的回报率；与那些发达经济体相比，越南的投资者可以用更少的资金进入市场，并能赚取更多的钱财。罗宾（Robin）是一家大型国际银行的银行家，该银行为那些希望进入越南市场的新客户提供交易咨询服务，他这样向我解释道：

我总是会告诉投资者，看看成熟市场吧：进入成熟市场的障碍是资本。你甚至需要 1 亿美元以上才有资格成为这些市场上的玩家，而且，每个人也都知道，投资回报率最多只有 5% 或 6%。但在越南这里，你只需要 1500 万—5000 万美元，就能看到两倍以上回报率。是的，数字真真切切，不骗人。作为银行家，我们非常了解这些数字。但这与统计无关，因为数据是无法解释现金经济中的这类增长的。我会带投资者去参观一些小型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当他们发现房子都还没竣工就已经全部售罄时，都惊掉了下巴。这里的人为他们的私家车支付双倍的费用，因为他们要支付高额税款，而且还都是用现金。当

我们将一些调查工作外包给新加坡的一家公司时，他们曾发回报称，有一家家族企业的资金，全都是以现金的形式储存，因为他们不信任银行。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不信任银行呢？因为这些人都经历过了很多很多次的银行挤兑。

当地基金经理的卖力表现旨在唤起投资者心中对越南经济的看涨体验。他们会开车载着投资者穿过西贡街头，参观一些潜在的投资项目，与基金经理、经纪人、顾问、会计和家族企业会面，努力宣传越南经济宏观增长的故事，并有意识地塑造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在发展中经济体体验第一世界的生活，创造出了一种“感觉”——这个词，在我与别人的谈话中反复出现——它是由对该市场的预期信心而激发的。

在我询问那些用第一世界旅游体验来接触投资者的基金经理，他们如何回应投资者提出的与市场上备受瞩目的盗窃、欺诈或投资损失等相关案例有关的问题时，一家小型基金的首席执行官约翰（John）这样对我说：

73

有句俗语是这么说的：投资者都只有三分钟记忆。如果你是在五至七年前赔的钱，那你现在再提出一笔交易，他们也不记得之前发生过什么。归根结底，货币市场是如此之大，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投资。在你作出决定的那个时间点之后的五至七年，董事会的成员可能都不在那儿了，而且，他们的风险偏好也很不同。

另一位基金经理托尼（Tony）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人们很快就会忘记市场上的投资损失。没有人会关注三四

年之前发生的事情，就更不用说五至七年前，甚至是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了。十年前是越南市场的拓荒时代。那时候市场上到处都是钱，盗窃案也很多，这就像是拓荒时代的牛仔和十分狂野的美国西部。但是现在，投资者变得更聪明了，公司运营更加专业化了，我们也会从新的投资者那里筹集一些市场资金。如今，韩国人是越南市场投资的主要参与者，因为他们愿意玩这种“越南市场游戏”，这种游戏可归结为两点：非正式和灰色交易。

在我们随后几次的访谈中，托尼一直提醒我要记得去关注所有在这些“灰色”空间中捕获到的资金。他说：

这就是工商管理课程无法教给你的东西：如何去利用市场上那些模糊、合法，但有时又是道德灰色地带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韩国人特别喜欢一起聚会喝酒，那其实是建立信任和联结体验的一个环节。

蛛网资本主义的这种交易艺术，涉及一种从本能、直觉和总体性感觉——认为这是获得可观回报的全新领域——中筹集资金的策略。这种策略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投资者无法以理性的方式来计算市场风险。为了推销这个市场，从属蜘蛛就必须说服占主导地位的蜘蛛去创造新的丝线来连接这些资本网络。于是，他们采取的方式便是去策划一种旨在关注目标国市场活力和基金经理所拥有的政治资本的旅行体验，这会让投资者激发出对这个新兴前沿市场的乐观情绪。一旦投资者表示出了投资兴趣，那下一步就是将他们与可利用的交易或市场上的卖家进行匹配。

寻找交易：寻找新的前沿市场

74

寻找交易指的是要找到一个关键地点，确定良好的当地合作伙伴，并建立一种让买卖双方在业务工作上对彼此都充满信心的关系。

在“投资缅甸”的那次会议上，我与杰克和正雄之间的短暂交谈让我收到了杰克的邀请，他让我陪同参加他为泰国投资者代表团策划的一次旅行。投资者有兴趣仔细看看尚未开发的海滨房地产的投资项目，因为那里长期以来都是军事控制区或者曾经是冲突高发地带。

杰克邀请我加入他们这个小组，但回避了我问的有关旅行细节的所有问题。他唯一愿意和我分享的信息是，小组成员都会住在市中心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会有一辆面包车专程来接他们去机场。如果我想一起去，就需要给他发一张我的护照照片，以便安排我的行程，并且，我要在规定的早上7点钟到达酒店，与他们会合。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鉴于杰克在细节上说得十分含糊不清，我反复考虑是否应该陪同参加这次旅行。虽然我在杰克身边时并没有感到不安全，但我担心和一群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商人一起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旅行是否安全，而且我还是这个小组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对我这样一个喜欢寻求直接答案的美国人来说，这次缺乏细节的旅行实在令人不安。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杰克和我互发了几条短信，他告诉我要收拾好个人的洗浴毛巾和卫生纸等用品，并做好准备，因为那里的卫生条件很恶劣。

到了约好的那天早上7点，我按照指示，紧张地提着一个小行李袋出现在了酒店里。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我从来没有问过杰克我们的住宿是如何安排的。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至少可以让我和一起旅行的那些男人分住在不同房间——啊，这真是菜鸟级的愚蠢错误！在酒店大堂等待的那15分钟，好像是很漫

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想到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并脑补了所有最糟糕的情况。

当杰克走进酒店大堂时，我紧张的神经才稍微缓解，他穿着休闲牛仔裤过来跟我打招呼。随后，他领我到就餐区，在那里向我介绍了经营一家家族企业的兄弟俩——加蒙·猜（Gamon Chai）和巴颂·猜（Prasong Chai），以及他们家族企业的战略投资总监哈里斯（Harris）。

75 杰克在介绍我们认识时说：“金伯莉，来见见泰国最年轻的两位新兴房地产大亨——猜氏兄弟。加蒙只有38岁，巴颂也才41岁。”杰克随后取笑加蒙，并问我道：“你知道加蒙在当地杂志上被称为泰国最惹人垂涎的钻石王老五吗？”我们听完都哈哈大笑。杰克随后介绍我认识哈里斯，他是前瑞士银行家，现在在泰国与猜氏兄弟一起合作，担任他们的首席投资总监。杰克也把我介绍给了这个小组，说我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教授，目前正在研究管理外国投资的人。在我获准跟随和观察他们后，我们一行五人便挤进了一辆开往机场的面包车。

在机场的售票区，我们还没来得及排队，就有一位空乘人员立即迎向我们，递给我们机票。这些都是纸质的登机牌，我们的名字和座位号都是手写的。在这时，我才得知我们是要去土瓦（Dawei）。我们绕过了安检线，直接被送到了登机口，一辆私家车正在那里等着护送我们登机。这架飞机是一架较旧的商用飞机。当其他乘客登机时，我们已经在前面落好座了。杰克和猜氏兄弟坐在一排，而我和哈里斯坐在他们对面的一排。

在飞机上，杰克告诉大家，我们将会去到一个城镇，寻找一些优质的房地产资源，该城镇已被预选为新的经济特区之一，也是一处与泰国有直接基础设施连接的重要地点。此次行程计划是要去参观该镇的发电厂、小港口和用来建造商业和住宅房地产的选址地点。

我们还将会与拥有和控制这片土地的当地团体会面。

在此次飞行途中，我试着和哈里斯通过闲聊来破冰，问他一些我认为很简单的问题：“那么，是什么让你来到泰国的呢？从瑞士转到东南亚市场的最大挑战有哪些？”哈里斯回答我说：

这么说吧，我认为，慢慢做大做强要比维持领先地位更加有趣……作为一名瑞士银行家的时候，我也很成功，但我感觉好像被锚定在那里了，一直盯着电脑屏幕看数字。在那里你是看不到推动市场的引擎的。亚洲市场现在很火热，这里有很多钱可以赚。猜氏兄弟还不到 40 岁，但他们在中国香港、新加坡、曼谷、胡志明市和仰光市都设有办事处。这些都是十分令人兴奋的城市。最大的挑战就是，必须要了解东南亚与西方的不同。在这里，你必须要与人打交道，因为这是一个由家族集团控制的市场。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前沿市场。

我对推荐给猜氏兄弟的投资做了各种各样的尽职调查，包括财务尽职调查、税务尽职调查、法律尽职调查、商业尽职调查以及对人（他特别强调了这点）的尽职调查。你必须要快速适应环境。你很快也会了解到，亚洲市场玩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游戏。当然，也有少数白马只赚干净的钱财，但大家都在驱逐他们，所以交易总是对他们有利，而于我们不利。因此，接下来我就必须要权衡处理脏钱的风险，而且很多时候，我也要冒着与道德上有问题的人交易的风险。

76

这次去缅甸边境的非凡之旅（rogue trip）让投资者觉得，他们可以去到一个没有其他人能进入的地方。这些都是原始未开发的偏远海滨地区的土地，投资者可以与当地合作伙伴一起在那里建造优质的房地产，以满足当地日益增多的精英阶层的住房需求，他们现

在有资金购买这些正在开发的住房项目。有大量的本地资金和潜力正在等着那些拥有外部资金和本地专业知识的人来将其释放，并使这一切都成为现实。猜氏兄弟在尽职调查模糊不清的亚洲市场上游刃有余。

飞机降落后，我们取了行李，有一整个车队的汽车前来迎接我们。总共有四辆不同的汽车：一辆看起来像公务车的黑色无标记汽车、两辆吉普车和一辆丰田 4Runner。我们所有人的行李都被装进了其中一辆汽车里。杰克和猜氏兄弟上了丰田 4Runner，哈里斯和我则被安排到其中的一辆吉普车上。我们的车开了大约 30 分钟，然后，我们在当地一家餐馆前停下来吃了午饭。这家餐馆似乎早就为我们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因为所有的菜肴都备好了，一一摆放在桌子上，并且用塑料罩盖着。我们快速吃完了这顿午餐，接着，我们又回到了车上，继续沿着一条贫瘠的土路开了两个小时，穿过一个有着简陋住宅的农村，才到达了我们的第一个参访地点。

我询问杰克，在两个小时的车程结束时，我们将会来到该国的哪个地区。他告诉我，那是一个尚未标记在谷歌地图上的地区，所以也没有真正的地址。这个地区以前是军事控制区，现在正在从公共土地转变为私人土地。杰克唯一愿意分享的信息是，该地区是连接缅甸和泰国的一条重要走廊。在我们的车队继续向前疾驰时，我突然发现，我们团队中没有一个人关心他们是怎么到达这个特定地点的，因为他们平常都习惯了被人护送到未被标记的、没有路网标识的地方。

这次旅行是投资策略中的一部分，目的是让投资者感觉到他们好像是第一批参访这个新兴前沿市场的人。泰国来的投资者团队有开发商和资金，所以，他们需要的就是适合下注的投资地点。像这类旅行中的其他一切事情一样，选择下注投资地点这件事，也是经由他们与这片土地、这个地方和护送他们的人的联结而培养出

来的一种感觉。特别是对于这次旅行来说，这种联结是以一种对泰国投资者来说自然而然的方式呈现的，因为这片土地紧挨着泰国，而且该地区也拥有吸引泰国和东南亚其他地区游客的潜力。必须要让投资者感觉到这个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于是，让他们下车来呼吸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在未被开发的土地上走动走动，就都是这项努力中的一个环节，旨在让他们与这个新地方产生一种情感上的联结。

77

在这次旅行参访中，猜氏兄弟不仅对建造豪华酒店和住宅感兴趣，也对投资关键基础设施很感兴趣。他们的首要任务包括建造一座水电站、修建一条公路，并聘请一支当地的团队来为他们提供一份关于当地社区生活的总结报告，以便他们可以为公司的新员工投资建立学校和生活社区。

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猜氏兄弟还将会再到该地进行三次参访，他们将组建当地团队来执行该项目。当地的合作伙伴表示，他们计划在没有得到当地建设和运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便通过破土动工来抢先投资，寄希望于他们在随后的建设过程中能获得这些许可证。由于他们在泰国签订了一份离岸合同，其中概述了他们的协议条款，所以投资者对他们当地合作伙伴的抢先战略计划感到很满意。奇怪的是，投资者对这些地点的参访总是通过类似的旅行项目来完成的。他们从来没有独自去过这些地点，也不想被在当地组织旅行的具体工作所烦扰。所以，投资者的视野仍然有限，他们是透过旅行车队的有色车窗来看待投资地点的，他们总是着眼于投资大局，而不会与当地人的生活真正联系起来。

这种搭乘飞机前往世界偏远地区的经历，只有拥有市场内部消息或访问权的人才能够体验到，这对寻找新领域的投资者——比如猜氏兄弟——来说很具有吸引力。正如哈里斯所说的那样，在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多年的国家中，寻找交易的过程感觉很“令人

振奋”，因为你可以亲身体验并感受到这个资本蛛网中的另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这种以非常本地化的方式与这个地区产生的联系，正是新前沿市场变成更广泛的资本蛛网一部分的运作方式。

达成交易

一旦投资者认可整体市场前景并表现出了对投资越南或缅甸市场的浓厚兴趣，基金经理（通常他们单独行动，但有时也与离岸投资者协同合作）就会努力促成交易。在此一过程中，买方（投资者 / 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和卖方（当地家族企业）之间的关系通常还需要一位中间人（基金经理 / 当地公司 / 从属蜘蛛）来进行大量的关系搭建工作，以便他们双方不仅能与彼此建立起信任关系，而且也能与对达成交易起关键作用的政治精英建立起信任关系。⁴

对于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来说，要想达成交易，欺诈、盗窃或不可预测的监管结构等风险就需要当地合作伙伴的帮助和信任才能解决。从本地卖方的角度来看，往往还会存在一些潜在的投资者，俗称“试探性买家”（tire kickers）*，他们会花大量时间从不同基金经理那里获取信息，却从未进行过投资，浪费了当地基金经理和顾问的大量时间和资源。

因此，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必须依靠当地的专业人士来帮助建立覆盖前沿市场的部分资本蛛网。在这种背景情况下，从属蜘蛛会通过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建立信任来完成所有在灰色地带游走所需的工作，这一般是通过男性社会性联结的仪式来完成的。投资者达

* 指那些喜欢浏览和询问商品但并无购买意愿的人，尤其是在购车时，因为原文字面意思是“爱踢轮胎的人”。

成交易的主要方式有两种：（1）通过与当地合作伙伴和政府官员的同性社会性联结经历（homoerotic bonding experiences）来建立信赖或牢靠的个人关系；（2）远离那些需要大量国家许可的交易，并拒绝“花钱玩灰色交易”（pay to play）。

关系资本主义和同性社会性联结

在路演、投资者会议和非正式聚会这些场合，通过关键的政府关系进入市场内部的话题都会被提到。虽然外国投资者知道与政治官员的关系是达成所有交易的关键，但我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来深入了解他们是如何建立起这些关系的。我发现，这需要通过同性社会性联结仪式来实现。这可能是最重要的领域，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会将灰色地带的风险平摊给资本蛛网中较小的那些从属蜘蛛。

在接受采访时，当地的一名开发商“仁”（Nhan）直言不讳地说道：“一切都有赖于关系，以及你在这个国家都认识谁……在这里，你必须付费才有入场玩的资格（ăn bánh trả tiền）……你必须行贿才能得到土地的开发权……而后，每次当上面有人来‘检查’时，你都要一次次缴纳‘税款’，以便保留对土地的开发权。”丹尼尔（Daniel）是一名越南裔外国人，他负责监管不同经济领域的投资，其中包括电力、建筑、房地产、资产转换和物流，所有这些领域都会涉及政府方面的高度参与。他的话也呼应了前文中仁的类似观点：“在这里，你要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你需要有（政府）方面的联系人……这里是他们的游乐场。”仁和丹尼尔都提到了能够实现大规模资本积累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仁和丹尼尔的投资者也都严重依赖负责当地事务的合作伙伴的能力，也就是与必要的公职人员建立密切关系的能力。

在采访中，我经常询问受访者他们是如何发展这些关系的。明（Minh）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一家地产集团董事长的得力助手，他笑着说道：“得用很多美女和威士忌！”明在此影射的是同性社会性联结仪式的实践，包括将女性作为工具，利用她们搭建权力精英之间的信任关系来帮助促成商业交易。⁵但这里并不是指所有男性，而是指交易关系中那些具有政治权力的男性和拥有经济资本的男性。在《权力精英》一书中，C. 赖特·米尔斯认为：“要想了解极其富有之人，我们首先就必须了解他们得以从中诞生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因为国家保障私有财产权。”⁶在伊芙·赛吉维克（Eve Sedgwick）所提出的男性同性社会性联结仪式中，女性是很关键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同性社会性联结仪式被称为“情欲三角”（erotic triangle）。⁷在两个男人之间，一位女性的存在充当着他们共同的欲望对象，并由此来调解这两个男性之间的紧张关系。⁸这个女人是黏合剂，她帮助男人通过这份亲密来达成父权制下的同性社会性联结关系。⁹

同性社会性联结的范围很广泛，从仅仅只是在模特或陪酒女的陪伴下饮酒跳舞，到在某人家中举行私密的性爱或狂欢派对等，不一而足。一方面，男性仰仗酒吧和俱乐部为他们提供款待国家官僚人员的娱乐空间，这主要包括深夜在各大酒吧纵饮买醉，其中就有华尔街“模特和美酒”的本地版本，只不过在这里，重要的不仅是双方之间分享内部信息，还包括从政府内部获取相关信息。我和一些男性一起度过了几个这样的深夜，并且观察到了许多亲密互动。在这些场合，女性招待花费大量时间来为一群男性破冰，帮助他们打破彼此之间的僵局，因为这些男性在此前的各种饮酒游戏、舞蹈表演和其他形式的娱乐中，几乎都不怎么跟彼此说话。

在前沿市场与我交谈过的这些男性中，大约有一半人都向我详细描述了这种运作方式，即他们依靠女性来帮助促成商业交易。夜

晚的酒吧聚会最终会导向某个私人住宅，在那里，他们会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参与狂欢派对，在这些派对上，与女性发生性关系并不会事先征得她们的明确同意。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人直言不讳地向我说明了在这些聚会中发生的事情，但是，当我穷追不舍地问其他人这类问题时，他们也会点头默认，又或是在迅速尝试继续讲述原本正在讲的内容时暗示存在这类事情。在其中的一次采访中，丹尼尔明确地谈到了男性之间的同性社会性联结经历，这尤其会发生在国家官僚、私营企业家和外国投资者之间，这种经历需要女性的身体参与其中。他是这样说明的：

80

在亚洲，基本上就是狗咬狗。这真是太糟糕了。昨晚，我们一开始是一起吃晚餐，然后，我们去了四个不同的酒吧和俱乐部，接着在凌晨3点左右，我们又去了一处私人住宅参加聚会。它最后演变成了性狂欢派对。我正在和某人说着话，就像这样（他对坐在他旁边的人打着色情手势）……然后，回过神来的时候，那场面就像，哦，天哪，（我们）正在乱搞三四个女孩，而我还得面不改色。

就在丹尼尔参加了这个非常私密的派对之后，我对他的采访好像就变成了周日早上的心理疗愈课。在描述完这些事件之后，他将他在亚洲的经历与美国的经历相比，并开始反思这种性接触的模式在两地是如何不同。当着我的面谈起性狂欢派对时，丹尼尔带着一种羞愧甚至是厌恶的心情说道：“那真是太肮脏。”他还将这里的性关系与人们在西方与女性的性关系进行了比较。他告诉我，在美国，至少还有一种有关强奸和性同意的语言，但在越南，没有任何词语可以用来描述未经同意的性行为。他说：“你知道，有时候那些女孩喝得酩酊大醉……而我们就那样和她们发生了性关系……第二天

早上，也没有人会真的来说些什么，但这就像，怎么说呢……这真的很肮脏。”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则有权选择不参与这种肮脏的交易，因为他们可以依靠当地的合作伙伴来代替他们在灰色地带游走，以便完成这些交易。

尽管丹尼尔肯定参加了前一晚的聚会，但他的描述还是显得很生硬，感觉就像是他自己还在琢磨那些大声对我说出来的经历。在这群受访的男性之中，有许多人也都描述了酗酒、吸毒和熬夜对他们的身体造成的影响，但这似乎是一种必要之恶，它代表了丹尼尔的搭档科伊（Coy）所说的那种“为了家庭所作的终极牺牲”。正如科伊所说：

我不了解你是怎么想的，但对我来说，我倒是有些欣赏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女孩们、男士们，还有政府官员……他们都是为了家人而牺牲。归根结底，当你走到路的尽头时，这似乎不值得。他们会生病（他们的肝脏会因为酗酒而坏掉），但他们都会说，我为我的家人们赚了100万美金……这是你为你的家人所作的终极牺牲。我是会这样的。我甘愿为了我的家人而进监狱，哪怕是去死也情愿。

这两个人都明确表示，在越南开展业务以及与国家官僚建立联系时，这些都只是惯常做法。如果投资者想要获得优质的房地产资源，或是想要完成项目并获得正确的批准，那就需要利用这种娱乐方式来加快极其缓慢的官僚手续流程。这些关系不仅对筹集资金很重要，对执行交易和最终盈利也很重要。

那些直言不讳地谈论这些在一群男性之间共享的私密经历的人也都很清楚，他们参与这些活动是为了服务于一个更大的终极目标：通过形成一种互相挟持的一损俱损关系，来保障交易没有风

险。虽然信任是这类联结经历中的一个维度，但没有人会完全信任他们周围的人，因此他们要努力获得保险措施。例如，随着我更加深入地采访丹尼尔，他开始更加明确地谈论这种男性社交之间的情欲三角关系。在描述投资者向政府官僚支付贿赂的利润分成计划时，他说：

我们必须从字面意义上（陪同彼此）上床，我们都是一条“床”上的蚂蚱。如果有一个落马了，我们其他人也都会跟着遭殃。

他们（国家官僚人员）会说：“我还以为我们是好兄弟呢！”而这些家伙想去喝酒、聚会、玩女孩，你能想到的娱乐活动，应有尽有，但归根结底，这关乎信任……即使身处最高层也难免存在某种程度的猜忌，这是一种常态。你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解读出言外之意，喝酒之类的，那都是表面做做样子的一套，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读得懂人心。

我请丹尼尔思考一下女性在他们跟政府官员打交道时所扮演的角色，他说：“这很简单……就是让彼此互相挟持。”然后，他告诉我一个最近在媒体上被大肆报道的事情。虽然我无法确认他说的那个故事版本是否属实，但他的解释足以说明，他认为那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据说，他有一群朋友正在房地产行业崭露头角。他们得到了黄金地段的开发权，而作为交换，他们便与一些政府官员制订了一项利润分成计划。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集团不断壮大，投资者与国家官员之间在利润分成比例上产生了分歧。政府官员想要拿更多，而投资集团则认为，这样一来，他们都还不够支付投资的成本。

为了拿到更多的钱，政府官员使用了一系列勒索投资集团的手

82 段，在这些尝试都无果之后，便有人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其中一位投资高管在狂欢派对上的照片，以此来公开羞辱他和他的家人。由于在该国，政府管控着媒体，所以丹尼尔将没有人审查这些照片的事实解释为这是受到政府方面默许的一种抹黑。¹⁰ 这些照片激起了媒体的狂热报道，公众还就性和商业的关系展开了一场辩论。对丹尼尔来说，这一系列事件像是一个警告，如果他不花很多精力来管理他自己的人际关系，那么他在那些聚会上的照片可能早晚也会被人公开。我问丹尼尔，政府官员是否也会担心他们自己的照片有被公开的风险，他告诉我说，这些照片确保了双方的共同毁灭，所以，只有当双方之中有一方认为没有其他中间道路可走时才会将其作为最后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关系资本主义就依赖于男性的同性社会性联结仪式。在缺乏明确的法治或对国家执行合同的信心时，个人关系对于达成协议就至关重要。这些个人关系会涉及高度私密的、依赖女性性劳动的接触。然而，在这张资本蛛网中，从属蜘蛛承担了有关这些同性社会性联结仪式的大部分责任，而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则避免了这些实践所带来的道德问题，也不用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或相互劫持的威胁。但也并非所有投资者都对这种投资方式感到舒适。拒绝按照这些规范来达成交易的人就是看跌型投资者（bearish investors），他们是以一套完全不同的策略来驾驭市场的。

看跌型投资者：远离国家支持的交易

虽然我的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特惠交易”全都流向了那些愿意“花钱玩灰色交易”的人，但也还有一小部分人拒绝按照当地的交易经纪方式来进行这场投资游戏。与之相反，他们会努力避开与政府关联密切的经济部门，并试图寻找到一些不涉及酗酒、性滥

交或狂欢派对的替代方法。这群人不会使用互相挟持的一损俱损策略，而是采用了协调策略来达成一些更为干净的境内交易。

这些投资通常集中在服务行业，包括零售、贸易、制造、运输、信息、艺术和娱乐业。为了吸引更为谨慎的投资者群体，这些行业的基金经理采取了不同的文化匹配策略。¹¹

他们会以谨慎的语气谈及市场上那些广为人知的欺诈和盗窃案例，以此来激起新投资者内心的恐惧，并引导他们远离那些耍手段的阴险竞争对手。与那些在前沿市场中通过策划第一世界体验旅行来吸引看涨型投资者的基金经理相反，这些经理致力于为其潜在投资者提供一份独特的越南体验。这个群体用来建立信任的方式，并不涉及同性社会性联结仪式，而是会诉诸完全不同的道德准则，他们会带投资者去参观学校和孤儿院，与此同时，还会谈论他们在该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这便开启了有关慈善事业、公益和影响力投资的各种讨论。总的来说，这些策略会吸引到一类截然不同的投资者，他们希望能与那些在参与灰色市场时还设定了道德底线的当地经理合作，从而进入这个市场。

83

采用更谨慎方法的基金经理努力去吸引那些警惕财务损失或盗窃案件的投资者。EMIA 资本（EMIA Capital）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Richard）这样描述他们达成交易的过程：

这便是要将合适的投资机会与合适的投资者或有限合伙人相互匹配。现在的投资者也聪明多了，他们正在寻找诚实的合作伙伴。很多早年间来越南投资的人——比如在 2006 年——都没能盘活投资，因为盗窃和欺诈，他们不得不关闭整个投资项目。我们也别自欺欺人了，你在美国也是需要人际关系的，但是，人际关系不仅在越南特别重要，而且在整个亚洲都是如此……我们会尽量避免那些过于依赖政府的交易……一般而言，任何

涉及政府方面的事情，都会围绕着他们的利益来展开……一般来说，我的原则就是，**你不应该花钱玩灰色交易**（他用了强调语气）。如果进行交易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花钱去行贿，那么，你就不应该做这笔交易。我想，做生意时像获得一些小的许可这样的事情是需要花一些成本的，但是，你永远也不应该花钱玩灰色交易。这些年来，我在这个市场中的成功，**大部分都得归结于我的声誉，以及我在这个市场游戏中所持的立场**（他也用了强调语气）。我个人的很多钱也都投在这里了。如果十年前你问我，我是否会在越南投资，我会大笑起来，但是，你看，我现在人就在这儿了。但在越南，2006年前后那个拓荒的牛仔时代已经结束了。如果他们的投资赔了钱，我也会跟着赔钱。我在这里投资是为了继续让资本增值。要是我要手段从我的有限合伙人那里骗取钱财，那我可能会筹集到第一轮的资金，但我肯定不会再得到第二轮或第三轮的融资了。我来这里是为了参与长期而非短期的投资。

与其他基金经理不同——他们的卖点是向投资者宣传他们与政府的密切关联，让他们可以拥有投资特权并获得最有利可图的一些项目——理查德特意避开了很多这样的行业，并且，他不愿意花钱玩灰色交易，而是严格按照政策来运作投资。

84 当潜在投资者抵达越南时，EMIA 资本的基金团队经常会建议投资者入住一些当地独特的精品酒店。这些精品酒店是全新的服务式公寓，配备了设备齐全的厨房、洗衣机和烘干机，以及健身和保健中心，包括个性化的瑜伽、冥想和水疗等服务。入住这些酒店每晚的价格为 70—100 美元，费用只是品牌豪华酒店房价的一小部分。理查德及其公司都没有一队豪华轿车来为他们自己或投资者充当交通工具。与此相反，理查德告诉我，他更喜欢搭乘出租车到处跑。

他这样解释说：

我们有一些亿万富翁投资者——他们都自己开车兜风，我和他们有过一些有趣的对话。当然啦，在亚洲，好像每个人都有司机、女仆、保姆和所有的必要配备似的。那时，我正在和我们的一个有限合伙人做交易，成天背着背包穿着西装跑来跑去。因为要会见一些政府官员，我就打了一辆出租车过去了。有一位政府官员便问我：“如果你真是老板的话，那你为什么还要像现在这样背着背包、搭乘出租车跑来跑去呢？”我回答说：“因为这样更有效率。”没有人在乎你的时髦手表、你的领带，或者你可以愚蠢地喝下去多少酒。重要的是，要有最好的产品……

在我与理查德的投资伙伴交流时，他们告诉我，理查德的做法让他在越南享有节俭的好名声，这在两个方面都对他有利：一方面，他试图说服的投资者会认为，他对委托给他打理的资金会很谨慎；另一方面，当地的被投资公司也相信，他会成为一名称职的董事会成员和财务顾问。

此外，理查德没有带投资者去体验和享受这座城市中的奢华大餐，而是会带他们去当地的一些精品餐厅，那里会供应地道的越南美食。他向投资者保证，他们不是去吃街上的小吃排档，而且这些餐厅也非常干净，这就为游客提供了一份独特的越南体验。在一处露天餐厅里，投资者还可以看到当地大厨在开放式厨房里准备着大部分的餐食。马德琳（Madeline）是一位在香港生活了20年的英国公民，她一直在香港的私募股权行业工作，也是理查德的一个有限合伙人，她这样告诉我：

85

在这些市场中，你必须要学会披沙拣金，就像是在一堆粗粝的原石中找出一颗钻石那样。但是，在这个国家，与理查德打交道的每一次经历都给人一种独特的越南式感觉，就好像你已经对你所投资的环境和整个交易过程全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很不同于你在发达经济体中投资的感受，在那里，你仅仅只是了解了（一个项目的）一小部分。他是真正做交易的人，因为他自己的很多钱也投资在这里……而且，他也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他对他的女儿们都很宠爱，他的妻子也可亲可爱。他这类人是值得信赖、可以与之共事的人。

马德琳所感受到的不仅是与越南的关联，还有与理查德的关联。他帮助创建了一家公司，随后又将其转手出售，他也因此赚了很多钱。理查德并不是那类泡在夜生活世界中的人，他的良好名声也并非得自这个方面，正相反，他会与他所寻求的潜在投资者谈很多关于他妻子和女儿的话题。

EMIA 资本采用的方法也很独特，因为他们寻求的投资目标都是女性持有或经营的企业，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被其他投资者忽视的尚未开发的巨大市场。理查德说：

我这个人吸烟，酒吧也不适合我。我并不反对喝点啤酒或威士忌什么的，但我可能更喜欢喝葡萄酒，而且我想，与我们合作的很多人都是女性。这里是一个非常母权制的社会，这里经营得最好的一些企业都是由女性所有和经营的。当潜在投资者来这里采访时，我总是告诉他们：“亚洲有一些非常合理、明智的资本可赚。主导亚洲公共部门领域的仍然是家庭。我们公司 75% 的员工都是女性，而在我们投资的公司中，约有 35%—40% 的公司是由女性经营的。我认为，越南的女性都非

常值得信赖,事实也是如此。她们在很多方面都比男人更加可靠。我还认为,如果你疏远了一半性别的人口,那么,从统计学上讲,这其实是有些愚蠢的。”我与女性相处得很好,倒不是因为她们的性别,而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每当我带投资者去参观女性经营的公司时,他们总是会对公司运作良好和一切井井有条印象深刻。归根结底,如果你想在市场上注入资金,并想缩小与新兴市场的差距,那么,这就是你会选择的投资之道。这类投资节俭而谨慎,但会产生缓慢、稳定和诚实的收益回报。当你和男性做生意打交道时,你还必须要陪同他们酗酒、赌博、上演情妇大戏,而个人和业务支出会在他们的记账本上混杂不清。

在一个长期由男性主导的行业中,以女性企业主为目标的投资做法似乎非常新颖。在跨境交易中,这种性别关系很重要,因为女性企业主能让外国投资者“感觉”到她们更值得信赖。起初,在理查德用“有条理”“谨慎”“节俭”和“诚实”等词来描述他投资的那些由女性领导的公司时,我还产生了疑问——事实上,投资者是不是可能会认为,女性企业主相较于男性企业主更加容易控制呢?但事实证明,远非如此。相反,与这些女性见过面的潜在投资者认为,她们都非常聪颖,也精明能干。我听到史蒂夫(Steve),康涅狄格州的一位潜在投资者,这样对理查德投资团队的一名成员凯西(Cathy)说:

86

今天,齐(Chi)女士让我印象深刻。她扭转了会谈局面,还追问我们关于投资条款以及什么是我们的“附加价值”的棘手问题。这让我非常敬重她,因为你可以看到她对这项业务有多么投入。她不是那种接受完注资然后就撒腿跑路的人,她会

推动这笔生意的进展，因为这是她作为女企业家的骄傲。她似乎是个爱打直球的人——不会夸夸其谈，不玩猫腻游戏，也没有时间来听胡说八道，包括我们说的那些。

齐女士是一家大型零售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曾将多个品牌引进越南，它们对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人群深具吸引力。她还在越南拥有多个特许经营权的独家许可。史蒂夫对齐女士的印象是多层次的。在投资者（买方）与投资机会（卖方）商洽合作的过程中，史蒂夫了解到，仅仅持有资金还是不够的。齐女士还希望他们能够概述一下，如果他们获得了她公司里的董事会席位，他们将会贡献哪些策略来帮助公司发展壮大，并要求他们提出具体的增长建议和清晰的发展愿景，这么一来，她就翻转了谈判桌上买卖双方的形势。史蒂夫还告诉我，在与齐女士的会面中，她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她对有些私募股权投资者抱谨慎态度，因为他们带着不切实际的投资目标来到谈判桌前，那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公司的控制权将会超过目前作为董事长的她本人。

我让史蒂夫把我介绍给齐女士认识，这样我就可以单独采访她了。当她坐下来接受我的采访时，她带着温暖的微笑跟我打招呼。她的和善和亲切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此时我已经习惯了以往打交道的那些男性，我总是不得不努力应对他们的自负。我向齐女士介绍了我的写作计划，并请她简要分享她是如何进入时尚行业的。当我问她如何看待史蒂夫和理查德这样的潜在合作伙伴时，她是这么对我说的：

我非常喜欢理查德。我有一群朋友，我们都是女性企业家，所以我们就像一个团体，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个团体很像一个俱乐部，我们每月都会举行一次早午餐聚会，主要和彼此分

享一些商业技巧或者互相寻求建议。有些人是小企业的董事长，有些则是大企业的董事长，但我们都分属不同的行业，所以我们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理查德和我们这个团体中的一位女性合作过，（她）回来跟我们说，他和女性合作共事得很好。他是那种真正来做生意和努力工作的人。当你要求逐条商议核对交易条款时，他会很乐意花时间来这样做，一点也不会摆架子。

87

我问齐女士，在一个男性以性狂欢派对做后门来进行交易的世界里，她是如何开展业务的。她快速反击回来：“要是你生意做得好，别人就会过来找你，并且想要给你投资。”

重要的是，齐女士的直率让她在理查德和史蒂夫那里赢得了尊重，在经历了一年来来回回的商议之后，双方才最终达成了商业伙伴关系，因为从一开始，正如齐女士明确表示过的那样，她并不想寻找那种完全不了解实际业务运作的投资者，那样只会致使最后公司被其控制。实际上，正是这一点赢得了史蒂夫更多的尊重，正如他对我说的：“最好的交易其实并不需要你的钱。所以，世界上最好的那些公司也总是能够筹集到资金。”

* * *

交易的艺术包括对资本蛛网的扩张最为关键的三个过程：筹集资金、寻找交易，以及达成有吸引力的交易。每一个阶段都会涉及不同的人，他们最终的职责就是将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的钱与前沿市场上的交易联系在一起。超级大富豪会将在灰色地带游走产生的道德风险、声誉风险和犯罪风险，转移给一群由他们高薪聘请的金融专业人士，这些专业人士协同工作以整合这些资本蛛网。那些环游世界进行路演的从属型蜘蛛，会将越南和缅甸包装成具有巨大潜

力的市场来兜售，并强调他们的交易团队能够接触到关键的政府人脉，并且有能力执行具体交易。筹集资金的工作会涉及一种马不停蹄的旅行，在世界各地的路演中推销交易。此外，资产管理公司也会组建团队，来负责举办投资者会议并精心策划境内旅游，以便激发投资者对市场的投资热情。

88 然而，仅仅引起人们对市场的普遍兴趣还是不够的。交易的艺术还涉及仔细协调和配对的过程，以寻找那些不向公众开放的、最为有利可图的交易。业内人士会称它们为“特惠交易”，这些交易通常指的是获得由国有企业或此前的裙带亲信所把持的关键投资项目。因此，进入这个市场的决定，通常不是基于对风险或潜在回报的理性计算。与此相反，大多数决策都是围绕着投资者对市场潜力的直觉感受而做出的，并且还要看他们是否有与当地合作者建立重要关系的能力，后者会帮助投资者寻找最佳的投资机会。从属型蜘蛛在构建他们自己那部分资本蛛网时拥有很大的能动性，因为他们会让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感觉自己正在触及一个全新的、可以“点石成金”的前沿市场，从而吸引 / 引诱超级大富豪在世界的偏远角落投资。

虽然让合适的买方和卖方相互交谈的配对工作很重要，但实际上，交易的艺术中最重要的方面可能还是达成交易。这项工作是最为棘手的，因为这需要协调该市场中政治领域的利益相关者，而他们也想要分上一杯羹。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一个极端便是，本地的资产经理和基金经理承担着最大的风险，他们通过同性社会性联结经历来参与灰色地带的交易，以便建立牢靠关系和一损俱损的相互扶持关系，这些联结经历势必会涉及酗酒、性滥交和狂欢派对等。当交易出差错时，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会赔钱，而那些在当地市场实际操作的人不仅会损失钱财，还会丧失他们的声誉，并且还可能在此过程中面临刑事处罚。那些不想做灰色交易，而更倾向于在灰色

市场上进行偏白交易（white of gray）的人，便采取了一种拒绝花钱玩灰色交易的策略，但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他们无法得到特惠交易的内部机会，而且他们还不得不去创造一些尚不存在的新市场。

本章重点强调的是，要将全球资本主义视为一个蛛网状的市场，而不是通过发达和不发达经济体市场这种二元划分来看待。经济模型表明，超级大富豪不会将他们的资金投资于制度性空白较大的地方，但事实却是，这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市场，资金也的确确是涌入了越南和缅甸等地。这是因为，蛛网资本主义不是资本在银行之间的简单流动，而是依赖于关系网，这些关系网经由从属型蜘蛛精心策划的旅行和推销来促成，这会让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产生一种直觉感受，即他们需要将其资本蛛网扩展到尚未被开发的地区。一旦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出于直觉而注入了资本，最后交易本身的促成还需要进一步形成互相协作又相互挟持的一损俱损关系，从而在缺乏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创造出了一种另类的“灰色”保障。这种模式让资本可以在监管制度不透明或薄弱的地区投资，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会快速流入具有巨大制度性空白的前沿市场。

为了达成一笔交易，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人员会在交易周期的不同部分分工协作。通过聚焦于这群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挟持破坏、协调合作及关系资本主义都是人们所采用的不同策略，具体采用哪种方式主要还取决于想通过内部人士进入新市场赚钱的离岸投资者和他们的职业经理人、在岸基金经理以及需要资金的当地企业之间的文化契合度。但是，筹集资金以及为这些资金找到合适的交易来注资，还只是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的开始而已。一旦这些交易达成，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不同类型的腐败和贿赂

在投资者决定押注前沿市场后，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和他们的合作伙伴又该如何巧妙应对“腐败行为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或多或少还被制度化为‘不成文’的游戏规则”的市场环境呢？¹外国投资者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避免腐败，又在什么时候会屈服于这类压力并花钱玩灰色交易的游戏呢？富豪和超级大富豪如何采用不同的策略来掩盖有损名誉的关系，每种方法的优缺点又是什么呢？

专门从事灰色市场的投资者明白，他们正悄悄地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然而，目前关于腐败的大部分研究工作主要关注的还是公职人员滥用职权来谋取私利的动机，却没有考虑私人行为者如何进行不同类型的贿赂。²关于腐败的研究很少着眼于某次腐败贿赂行为中的“双方”。³事实上，虽然有许多理论可以解释和分析不同类型的腐败，但它们用来描述该行为实施者的唯一词汇，却还是“行贿者”或法律意义上的“同谋”。现有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没有考虑交易另一方中不同类型的人，以及他们用来巧妙应对腐败市场的各种策略。

本章将重点关注私人行为者——在这种情况下既包括公司也包

括个人——是如何行贿的，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掩盖利用非法或不正当的联系以简化低效的官僚机构手续流程的行径，或用来打开原本对他们关闭的交易大门。在有些情况下，企业家和外国投资者会直接行贿，而在其他一些时候，他们会依靠通常被称为“中间人”的第三方中介来为他们处理行贿事宜。最后，我
91 还将说明，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则的市场上，投资者很容易受到欺诈和盗窃的影响——许多人还认为，这种风险是在这些市场上开展业务时必须付出的一部分成本。贿赂的社会网络包括加速交易手续的润滑打点者（greasers）、送礼者、经纪人、中间人和交易诈骗犯。

考虑到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之间存在交叉领域，投资者“在灰色地带游走”时的做法其实是一个无法截然区分、连续不断的整体，他们会在以下四种行为中选择：（1）反腐败者，这类人会明确表示要远离腐败，只进行非常严格、廉洁的交易，因此他们也能够接受自己将比竞争对手利润增长缓慢这一事实；（2）润滑打点者，指那些在获取执照和许可证时，同意支付一些小额“疏通费”的投资者；（3）行贿者，他们会通过多种掩人耳目的策略——送礼、利益捆绑和佣金等——来行贿，以便促成更大的投资成果；（4）窃贼，他们会与公职人员沆瀣一气来偷盗、处理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issues，即代理人 and 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洗钱和侵吞公款等。

绝大多数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坚持认为自己是反腐败者，或者感到为了加速交易手续而给点疏通费也没什么。然而，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他们其实采用了多种方法来分散和降低投资风险，包括让高薪聘请的其他专业人士——通常被称为代理人或者是代表委托人行事的中间人——来代表他们行贿。依赖从属蜘蛛来行贿的一个后果便是为公然盗窃和委托代理问题留下了可钻空子的

空间。在所有这些复杂关系中，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非法经济活动在促进合法投资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也更加能够说明，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之间的界限其实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

反腐败者：远离腐败

在我的每一次采访中，腐败都是每位投资者、基金经理、会计师或律师最为关切的一个话题。在普遍腐败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与政府关系的问题，是人们在茶歇、用餐期间，甚至是在第一次见面的会议上就会花费数小时来谈论的问题。前沿市场与发达市场的本质不同在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都在想方设法利用这些腐败行为。因此，他们带着不同的目标和策略进入这些市场，以应对当地复杂的现实情况。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彻底远离腐败是一个在实践中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尽管如此，在我所有的受访者中，也有不到 10% 的人谈到了他们是如何努力远离腐败行为的。但到目前为止，这个受道德约束的极少数群体最常谈到的便是他们为拒绝花钱玩灰色游戏而付出的巨大代价。

92

那些拒绝遵循当地常见腐败行为的投资者向我描述，他们经常不得不开发一些对其他人吸引力较小的项目，这些项目的竞争要少得多，同时还必须注入更多的资金，这就导致投资回报率也很低。事实上，那些在远离腐败这个策略上取得了成功的人，是那些在该国已经投资了 15—20 年的长期投资者，而这与大多数私募股权公司所采用的典型的七年退出策略相去甚远。对于其他投资者来说，远离腐败行为就意味着，要在没有修好路、没有水或电力基础设施的偏僻之地开发土地。其他一些投资者也说，项目的批准过程需要花费更长一段时间。为了克服这些常见的障碍，投资者就需要更多的项目启动资金，这样一来，他们的投资才能盘得足够大，他们才

可以利用这种投资规模来直接接触到当地的政府官员。

在我的受访者中，有 30 个人谈到了要远离腐败行为，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是在缅甸投资，只有 8 人是在越南投资。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6 年昂山素季赢得缅甸的民主选举之后，有一些投资者就直接跳过越南去了缅甸，这是因为缅甸的新领导人强烈反对裙带资本主义，而他们希望能够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工作。山姆（Sam）是一位在缅甸出生的投资顾问，他在伦敦生活了很多年，接着在 2000 年初回到了缅甸开始创业。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说：

我非常关心外国直接投资，因为我的日常工作就是与外国投资者合作，思考有关市场评估、市场准入的事情，看看他们能在缅甸与谁一起合作。我们也与很多缅甸企业开展合作，帮助它们思考增长战略。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战略联盟、缅甸合资等方式将投资双方联系在一起。在裙带亲信把持下的市场上生活了多年以后，当地企业和外国投资者都希望政府能够重新开始清理腐败行为。从当地企业的角度来看，并非所有的外国直接投资都会受到欢迎。坦率地说，外国直接投资对市场有好处，但挑战在于，受欢迎的那些投资必须是具有长远眼光的、可信赖的投资。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希望看到政府能够制定更为清晰的投资法，用数字化办公的方式来审批成千上万份申请单，对新领域的项目投资能有明确的税收减免政策，并明确土地使用权。对于企业而言，我们正朝着更加强大的公司治理方向迈进，通过专业化的运作过程来使管理层能够拥有经营公司业务的自主权，并满足公司在贷款、股权投资者和合资企业方面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这使当地企业能够向更多的金融利益相关者开放。因此，为

了做到以上这些，每个人都需要参与到推动提高法治透明度和公司治理的进程中来。

山姆在访谈中强调，国家官员、外国投资者和当地企业家多管齐下的努力十分重要，他们得共同致力于一个力避腐败的经济发展愿景。在新的民主政府领导下，国家官员除了维护他们个人的利益之外，还有一个减少腐败行为的动机：将他们自己标榜为与以前的裙带亲信不同的官员，由此去吸引新一轮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潜在投资。

山姆的这种观点也在另一个场合得到了类似的回应，那是在2016年，我被邀请去参加缅甸一个新工业特区成立的剪彩仪式。这个新开发的项目地点，距离缅甸主要经济中心仰光市约四个小时的车程。在这次活动中，国家计划和财政部部长吴觉温（U Kyaw Win）在对众人的演讲中表示，此次奠基仪式定会助力推动该国的发展。除了阐述一番他希望选定的开发商能够力避腐败之外，他还展望了工业园区未来的发展愿景，他说该园区将会包括住房、一所学校、一座医院和一座健身运动中心，以便为工人提供各类积极的休闲娱乐空间。除了物流、建筑、呼叫中心等后台运营服务及远程人力资源服务以外，该工业园区获批的其他经营业务还包括酒店和购物中心。禁止经营的业务主要包括军火或武器的生产和加工、毒品的生产，以及所有其他对环境有害产品的生产。正如我在这次活动中遇到的美国人基思（Keith）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近乎点石成金的项目。这些就是你想避免腐败时可以做的事情，也就是去做一些政府需要而且也想做的事情。”

这位部长在讲话中还提及缅甸的过去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便为现在和未来做好准备。他说：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创造我们民族的命运、改写我们这一代历史的时代……第一步就是要确保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我们希望通过缅甸投资委员会 (Myanmar Investment Commission) 为外国投资制定新的法律, 以便使其达到国际标准, 也使投资环境更加清晰和透明, 好让外商知道如何在缅甸获得营业执照并经营业务。

这里的透明度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对于投资者而言, 这意味着, 如果政府要求投资者除了建造工厂以外, 还要为当地社区进行更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话, 那么启动成本将会高昂得多。与其他工业区相比, 更高的进入成本就意味着, 投资者将不得不帮助分担那些通常由国家来提供的社会服务的成本。除了金钱支出还有额外的时间成本, 投资者到达这个工业区之前必须先飞到仰光市, 然后还要再开车四个小时。但作为回报, 投资者可以直接联系驻扎在施工现场的政府办公室, 该办公室会快速办理与投资批准、公司注册、企业纳税人识别号、外国人签证、消防安全证书、建设许可证相关的业务, 及时安排与工厂设备系统、建筑工程作业和防火系统相关的专项检查。

与我在越南尝试接触的很多政府官员不同, 吴觉温让我感到意外的地方在于, 他对参加此次活动的每一个人都很亲切。他摆好姿势与众人合照, 并把他的名片递给了好几个人, 还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对商业登记和许可程序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直接来找他。

缅甸这个 50 多年来一直信奉孤立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府, 怎么会突然间在经济增长、民主转型和全球金融一体化方面取得进步呢? 活动结束后, 我便就这个问题询问了我的几位受访者。我私下采访了几位政府官员办公室的助理, 这些非公开的采访谈话为我了解这一情况提供了更为细致入微的分析视角。他们告诉我,

他们亲身经历过那些由亲信控制经济、军民之间发生政治冲突的岁月。这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相反，已经深嵌在市场中的那些最有利可图的企业本身也将不得不经历专业化和重组的过程，以便满足全球发展标准。公职人员将不得不采取坚定的立场来清理该国的腐败问题，拒绝收受贿款，并迫使所有企业轮候。这意味着一开始就要接受增长放缓的后果，这么做不仅是为了赢得当地人民的信任，也是要赢得外国投资者的信任。

这些更加慎重的评论清楚地表明，高利润的裙带企业不会在一夜之间完全消失。这里的经济发展，势必要在裙带企业的转型与国家鼓励外国投资者进入的、没有裙带关系的新经济领域的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在像缅甸这样腐败盛行的环境中，这些反腐败的努力也让政府官员变得很脆弱，他们随时都可能会被突然提出的腐败指控赶下台。例如，在2021年缅甸发生军事政变之后，全国民主联盟的几名高级政府官员就曾因腐败罪名而遭到监禁。⁴

95

这种转变需要达成一种平衡，要在保护和促进本地公司增长的同时，也能够鼓励外国投资。例如，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跟我说：“你不能只利用当地的资源来经营矿山或水电站。我们需要外国投资和专业知识，以确保投资能够顺利进行。”她将采矿、玉石、木材和银行业等列为需要国家保护的行业领域，以便它们能够在被拥有更大资本池的海外投资者完全收购之前先行在当地发展起来。她继续说道：

我们在这种灰色交易中度过了50多年，我们告诉政府圈子里的人，没有人是彻底腐败或完全清白的。我们需要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共同努力，因为即使是在那些年里赚了钱的人，也想要有更清晰的税法、更公平和明确的法律，这样一来，他们也能感到自己的资产是受到保护的。

她在此提及的这些，也是我常从在裙带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巨额利润的公司中的一些人那里听到的，他们都希望能有一套更清晰的法律来保护他们所获得的资产。为了摆脱灰色地带并实现更加规范化的运作，政府官员会扶持那些希望能争取更高透明度的企业，他们也将此举视为鼓励从前的裙带资本家在新民主政权下改变经营方式并蓬勃发展的一种方式。重要的是，这里揭示的其实是一个围绕发展而非道德的故事，因为那些深陷在这个市场里的人，都希望能在一个非裙带关系的制度下经营和发展。但是，他们又必须在这种愿景和在一个裙带关系存在了如此久的制度中管理外国直接投资之间达成平衡。

96 有少数商界领袖因为力避腐败而享有广泛声誉。他们经常会在投资者会议上担任小组成员，主持每月的晚宴，管理通过各种外国商会搭建并在当地设立的商业网络。在每个月的某个周日，当地商界领袖昂伦（Aung Lwin）都会在他家举办一次晚宴，在这里，当地企业家和外国投资者可以聚在一起进行一些非正式交流，以便帮助彼此解决在缅甸经商时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我的一位受访者也邀请我去参加，他将我作为研究缅甸外国投资环境的一位美国富布赖特学者介绍给了大家。就在我向举办晚宴的东道主昂伦和他的三个朋友寒暄介绍还没多久之后，关于腐败的话题就立刻冒了出来。

昂伦这么对我说：

我们这里的许多人都在思考缅甸的长期发展愿景以及稳定和透明的重要性。我们想要纳税并支持一个强大的税基，因为这也意味着，我们将会拥有更好的医疗服务。我们纳税，我们的员工也纳税，我们对逃税采取零容忍态度。作为负责任的企业主，我们希望能够去鼓励更多的人纳税，拥有更广泛的税基。现如今，我们的企业都发展壮大，我们可以评估风险和纳税。

但这是与政府官员之间的一场持续对话，他们得为我们提供清晰、透明和可预测的征税制度。像印花税（文件税）这样的问题，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中小型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在这方面得到更多的帮助。

一起吃饭的时候，当地的商界领袖昂乃乌（Aung Naing Oo）插话进来，并跟我说：

大多数外国投资者来自中国和东南亚。昂山（素季）对美国 and 英国的访问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缅甸现在对外商业开放，政府支持私营部门进入市场。美国解除对缅甸的制裁是实现大规模商业运营的第一步，这也能够让本地企业在投资者中有所选择。政府正在逐渐摆脱不再那么流行的保护主义模式，以便促进私营部门的繁荣发展，并通过自由开放外国直接投资来带动当地中小企业的发展。正是这种对更高透明度的积极推动，将能够使缅甸超越您正在研究的越南等国家，因为这些国家都受到系统性管理不善的制约，这给诚实的企业主和聪明的投资者都带来了很多的困难。

昂乃乌的评论中所隐含的信息是，现任政府通过推动一向被西方民主国家视为理想的更高市场透明度，来促使美国和中国相互抗衡。然而，为了吸引西方国家的资本，地方政府必须与企业群合作，明确如何获得适当的投资证书和经营许可。此外，朝着这一理想努力的公司也会经历专业化运作过程，他们会聘请国际上认可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来处理合同和审计账簿，这些公司也希望能够因此而获得奖励。但是，对于晚宴上的每个人来说，管理这类投资就意味着，某只从属型蜘蛛需要将他自己的生活连根拔起，并能

计划长期生活在缅甸，做出可能会持续一生的投资承诺。

例如，我问这个小组里的人，他们如何能够在不参与腐败的情况下应对缓慢的官僚机构手续？一位来自旧金山的超级大富豪阿贾伊（Ajay）告诉我，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每个人都需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够上投资这条船。

“改变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他的当地合伙人昂奈乌也回应了阿贾伊的观点，并补充说道：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因为《外国投资法》（Foreign Investment Law，1988 年颁布）回到了这里。对外开放政策实际上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而不是伴随着最近的选举才开始。那时候的政策环境与现在非常不同。当时的政府中有三类团体：第一类是一群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的好部长，经过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统治，他们也想要改善环境（但他们不会收受贿款）。第二类人是那种两边倒的两面派。如果你向他们行贿，他们可能会收受贿款，但他们也不会坚持说你必须要这样做。第三类人是那些彻底腐败的人，除非你贿赂他们，否则你什么事也办不成。所以，在那时，你就必须选择你想和他们中的哪一类人打交道。对我来说，这种选择不是关乎道德的问题，这么做只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我在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如果你支付了大笔贿款，那么它早晚都会叫你付出代价。我见过太多人因此而锒铛入狱。但由于当时的执政政府，我们对第二类人特别具有吸引力。如果有一个需要透明度的重要项目，他们就会来找我们。这些项目一般都处于最没有吸引力的投资位置——说真的，我们不得不在沼泽地里建造一些项目，因为他们已经把特惠交易都给了他们的“朋友”（昂乃乌用他的手指稍微暗示了下，这里指的是那些行贿的人）。2000 年初还是任人唯亲、

裙带主义盛行的黑暗时代。那个时候，我们的压力都很大，到头来我们还是得决定要不要进行投资，不然就可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投资机会。但是，当你真的失去投资机会时，你还必须对整个手续过程保持冷静。只有当你特别渴望获得某个项目，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地得到它时，你才会不得不去处理跟腐败有关的问题。我个人的观察是，归根结底，将会决定项目可行性的是处理腐败的结果。我们希望现在的这个新政府能够有根除腐败的执政决心和意志力。为此，他们必须首先将腐败定为犯罪，只有根除腐败，他们才有能力去提供更高的薪水。但是，法治必须要发挥作用，我们也需要一些机制和机构来执行这些法律。没有经济增长，就不会有长久的和平。

98

昂乃乌停顿了一会儿，餐桌上所有人都看着他，然后他说：“我们只是相信，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开腐败。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要接受你的投资从一开始就会增长缓慢，并且也可能会赔钱，但如果你能挺过这些初始阶段，那它最终将会获得巨大的回报。”昂乃乌实现自己的投资抱负并使避免腐败的策略成为可能，是因为正像他所说的那样，他和他的投资团队并不“贪婪无度”，他们愿意接受一个缓慢得多的经济增长过程。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也很会选择，他们会选择和那些在根除腐败方面有着相似愿景的政府官员合作。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想要构建“远离腐败”的网络，政府和市场参与者就必须拥有相似的经济发展和愿景。尽管如此，昂乃乌的投资项目都是在远离市中心的郊区，也即在他所说的那些“沼泽地”中，因为黄金地段的特惠交易都流向了那些愿意在灰色地带游走和行贿之人。

在一个经济体中，要是国家政府没有能力给官员支付更高的工资，那它就很难控制自己的实体机构及其对腐败行为的参与。想要

避免腐败的投资者必须努力做到两点：要么做一些大到足以让中央政府参与进来的项目，要么就去做一些能够满足政府官员选举议程的项目。实际上，高昂的交易成本加上增长速度太慢的风险，意味着大多数投资者都无法完全避开腐败问题。在这种商业环境中，问题就不再会是有没有参与腐败，而是愿意参与何等程度的腐败。与其问人们是否参与了腐败，倒不如问人们愿意在灰色地带游走的限度在哪里。没有纯粹的黑白交易，灰色交易中也存在着深浅之别，在灰色地带游走便是一个从浅灰到深灰的连续整体，以下三个小节将会就此来做一番概述。⁵

润滑打点者：支付“加速手续打点费”

或为加快办理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疏通费

在我的研究中，有近90%的参与者都描述了在缅甸和越南的一种常见做法，即向政府官员支付“加速手续打点费”或者叫“小额疏通费”。有时，它也被称为“喝茶钱”或“午餐费”，这些花费从25—100美元不等，旨在加快办理诸如营业执照、许可证和商业登记等官僚手续的进程。人们广泛理解的疏通费，是支付给外国官员的款项，不管是根据一些国家的立法还是国际上的反贿赂公约，疏通费都不会被视作贿款。

在越南和缅甸，虽然行贿在官方层面是非法的，但我的许多研究参与者都告诉我，人们不可能绕过支付疏通费的做法，另外，这些国家也不会将支付小额疏通费定为刑事犯罪。事实上，在我与政府官员的私下谈话中，他们都强调工资很低，由此可见，这些国家能力有限，无法向其官员提供更高的工资，这意味着，官员会依靠这些疏通费来作为他们工资的补充。一位越南官员曾对我说：“我的官方工资是每个月200美元，这里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

5000 美元。我们靠这点钱（200 美元），哪里够生活呢？”

本地企业主会受制于成文法律和具体实践之间的灰色地带，与此不同的是，外国投资者跨境投资时，必须要学会就疏通费方面的问题，在当地法律和国际法律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例如，美国投资者必须得遵守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这是一项于 1977 年制定的美国联邦法律，它禁止美国公民和任何实体贿赂外国的政府官员，并根据 1934 年的《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列出了对会计透明度方面的要求。德国、英国和日本也有类似的反贿赂法，它们对海外投资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地方的投资者势必都会担心在其本国受到刑事起诉，因此，他们也就不太可能会冒着风险采取直接打款的行贿方式。

但在美国的联邦立法中，“疏通费”也是合法的。该词在 1977 年的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中被定义，并在 1988 年被进一步明确为：“一笔支付给外国官员、政党或政治官员的费用，以使他们完成‘例行的政府行为’，诸如处理文书、颁发许可证和某个官员的其他行动等，以便加快履行非自由裁量性质的职责，即他们已有义务要去履行的职责……（并且）无意影响官员行动的结果，只会影响其办事时效。”⁶ 禁止支付疏通费的国家，主要包括：阿根廷、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智利、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俄罗斯、斯洛文尼亚、瑞典、土耳其和英国。⁷ 任何具有上述这些国家公民身份的投资者，都必须要留心国际法，因为它们可能允许也可能会限制投资者的行为。

100

然而，在谈到疏通费时，我的研究参与者中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他们为了激励下级官僚更有效地工作而支付这种“小额费用”，会有被刑事定罪的危险。例如，杰伊（Jay）是一名投资顾问，他在

越南和新加坡两地之间奔波，主要职责就是帮助匹配家族办公室的投资者与越南和缅甸市场中的投资机会。在一次采访中，他对我说：

每当来自美国的投资者与我见面时，我总是会告诉他们，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法律存在这样一个漏洞，即给政府官员疏通费以使他们完成其分内工作并不违法。然而，让他们忽略某些东西则是违法的……但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灰色地带，有时候也很难应对。从运营层面上来说，本地团队将会处理好所有这一切，它们是经营成本的一部分，你也必须围绕某些常规参数来管理它们……所以，我们愿意支付疏通费，因为我们需要官僚机构以更快的速度来办理手续。大多数人都期望能在五六年内退出市场，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不能为了一个营业执照干等上一两年时间。

对杰伊来说，时间就是金钱，等待某个项目文书工作的推进最终并不值得，因为加快手续进程只需要花费很少一点钱。润滑打点费有助于项目的正式启动，这样一来，投资者也能够及时地获得收益。

安德鲁（Andrew）是一位持英国公民身份的投资者，但他过去20年来一直在香港生活和工作，他赞同杰伊的观点。在回答与疏通费相关的问题时，他这样对我说：

因此，归根结底，总会有正式和非正式的行政办公上的阻碍。嗯，但这与许可执照、土地使用权、环境问题和劳工问题有关。在亚洲的任何地方，你都会发现这一点。我们在C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投资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也没感到越南的投

资需要花点疏通费有什么不妥。我认为，在过去八年中，越南已经明白了从海外筹集资金的重要性。他们需要它……我很乐意付钱给这些国家的人，让他们去办事。（在这里）政府没有能力支付其政府雇员足够多的工资，当你去政府办公室时，一切的行政效率都很低下，办事缓慢……所以，只要你支付常规的疏通费，他们就可以帮你办成事……这是在每个国家都要经历的一套冗长、繁琐的程序，你会知道自己愿意支付多少，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底线是什么。一旦你克服了这点心理障碍，你就能很容易把这件事情办好。

101

和杰伊一样，安德鲁也认为支付疏通费不成问题。事实上，安德鲁还称之为在前沿或新兴市场上做生意的乐趣之一。因为他擅长将新产品推向新兴市场，所以，他每次出手推销时都能接触到全新的消费群体。我问他如何计算出疏通费该给多少时，他对我说：

其实也没有多复杂。他们只会告诉你，他们需要买咖啡的钱或喝茶钱，而你只需要给他们 25—50 美元就行了。然后保持微笑，等着他们去处理事情。有时他们会告诉你，你表格填写得不正确，但他们对你该如何正确填表格表述得含糊不清，这时候你就知道，你需要再多给点疏通费。这的确是一种潜规则，但是每一笔交易都不一样。我喜欢和其他投资者一起喝威士忌、抽雪茄，因为我们会就不同的交易疏通费而互相交流。在 C 国，有咨询公司来帮你支付这些费用，并会记录下每笔交易的成本，但越南目前还没有到那么复杂的程度，而缅甸仍然会手工完成所有这类事情。

除了少数投资者能够尽其所能地避免腐败和疏通费之外，我的绝大多数研究参与者在这点上采取的都是和杰伊及安德鲁相同的社交规范。对于那些从事小规模投资的人而言，他们没有直接接触政府主管部门的机会，而只有政府主管部门才可以向下级官员施压，要求他们及时处理好文书工作。所以，如果不给小额疏通费——它们能通过适当渠道有效地帮助推进文书工作——的话，他们是几乎不可能在这两个国家完成任何交易的。

因为安德鲁提到了他的威士忌和雪茄交流小组，我问他是否可以安排其中的一些人和我会面，讨论与如何在东南亚做生意以及投资者该如何驾驭官僚机构等相关的问题。三个月以后，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上面写着：“我们在抽雪茄了，快来加入吧。”我询问了时间和地点，他告诉我们已经在那里了，并给我发了地址。我立刻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迅速换了一身衣服，便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这个地址把我带到了一条古老的法国殖民时期的小巷，我爬了四层楼梯，最后进入到了一个黑暗的、没有标记名字的地下酒吧（speakeasy）里。我按照指示按了一下左侧的一个按钮。门随即打开了，我发现自己进到一个房间里，里面除了安德鲁，还有另外四个男人。他们懒洋洋地围坐在一张桌子边闲聊，桌子中间摆着一瓶“响 21 年”（Hibiki 21）——一种昂贵的日本威士忌。

102

安德鲁把我介绍给了桌旁的男人们。马尔科姆（Malcolm）是一名常驻新加坡的英国公民，正在投资越南的零售业。塞鲁斯（Cyrus）是一名居住在香港的 C 国公民，他曾在英国留学，目前投资了一家科技公司，该公司开发了一个为乡村企业提供银行服务的手机应用程序。周（Chau）是一名律师，他一直在为一家创立自 20 世纪 90 年代的越南当地公司工作。安德鲁、马尔科姆、塞鲁斯和周都是朋友，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经常在一起欢聚。他们会一起过节，并会经常就如何应对眼前的投资挑战而寻求彼此的建议。在

很多方面，周都充当了一种文化经纪人的角色，也就是一个向他们提供当地内幕消息的朋友，比如，在仍然保证交易光明正大、诚实公正的情况下，得花多少钱来润滑打点好一笔生意。

整个晚上，周都在描述他作为一名律师的工作，他不仅要帮助许多客户签订合同，还要为他们充当润滑打点之人：

你知道是什么让越南和缅甸这样的市场既分外有趣又令人沮丧吗？它们才是真正的市场……这意味着，没有哪两笔交易会完全一样。你可以去采访数百名商人，他们肯定会告诉你，他们与政府每一次打交道的经历都是不同的。很多人会来找我，让我为他们处理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公司在与政府打交道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即使对我们来说，每家企业也都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必须遵守不同的规则和法规，他们需要的也是不同类型的经营许可证。每隔几年，政府换届，官员也会发生一波更替。有时候，你好不容易花了数年时间与某些关键人物建立了关系，但他们几年之后就下台了，上来的会是一批新的官员。发生这种情况时，商界的每个人都会争先恐后、绞尽脑汁地去考虑，接下来他们需要巴结谁。

官员会在政府机构之间流动任职，再者，每个行业需要的也是不同类型的经营执照和许可证，这就意味着律师要代表他们的客户承担大量的打点工作，以便应对晦暗不明的未知领域。作为一个代表过多位投资者的律师，周可能对投资者该如何应对官僚机构有着最好的第一手经验。对于投资者来说，周的附加价值跟他了解法律或是知道如何恰当地写好文书关系不大，而是更多与他了解在投资流程的每一步要向每个官员支付多少好处有关。我问这些男性是否存在一份有关各种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非正式定价清单，马尔科姆

告诉我说：

103

在 C 国和俄罗斯，你可以与一些公司签约，他们会保存好每一笔开支的发票收据。那里的手续会比较标准化。但在越南这里，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所以很多时候，你还必须要相信，你的律师其实没有过多的要价和揩油水。你要支付合法经营的费用，他们为完成这些工作也要支付费用，至于怎么支付，那是他们自己需要去处理的事情。但归根结底，你仍然必须考虑自己在支付合法经营费用方面的底线在哪里、对此是否感到满意。以前，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律师实在太少了，以至于他们会收（一笔）高达 5 万美金的定金。但是，现在有了这么多互相竞争的律师事务所，你完全可以货比三家，然后再和他们一一协商谈判。

周随后也插话进来，对我补充道：

我们是一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一直在运营的本地律师事务所，因此，我们擅于和很多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国外大律所和我们本土律所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外国公司里，这些白人律师是为了装点公司的门面，但他们还必须聘请当地律师来为他们处理很多具体事项。对于本地公司而言，我们处理这些关系时显得更游刃有余，因此，我们有更多关于每笔交易成本的数据。有时候，人们会去大律所处理并购之类的事情，会来我们这里处理像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之类的小事情。

显而易见，我的下一个问题会是，疏通费的大致范围会是多少？

周回答说：“这完全得取决于交易的规模和风险的大小。从 25 美元

到几千美元不等，我都有过经历。”当我向他继续追问更具体的一些细节时，他告诉我疏通费无从计算，因为有些付款是每月付款，而另一些则是每年付一次。他还是坚持认为，除非每家律师事务所都同意公开这些数字并彼此分享，否则，不可能收集到有关此类数字的真实数据。但这种公开分享永远也不会发生，因为这样做有损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都想成为此类交易的润滑打点者。

作为我们闲聊桌上唯一的一位律师，周也提醒我，安德鲁、马尔科姆、塞鲁斯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他还告诉我，即使对于那些来自最严格的法律环境中的人——例如美国——来说，疏通费也是完全合法的。在晚上闲聊的大部分时间里，塞鲁斯都在静静地观察和倾听，他在这一夜的闲谈都快要结束时才对我说：

要是你在亚洲或世界上的其他什么地方做生意，你很快就会发现，所有人都在玩灰色交易；至于你问我们的这类小额疏通费，它更接近灰色交易中的浅灰色地带，而非深灰色地带。请记住，我们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付钱让人们去完成他们分内的工作而已。我们并没有贿赂他们，这两件事，性质完全不同。

104

所有这些男性都将疏通费（他们认为这是较轻程度的腐败形式）和直接贿赂（涉及较高程度的腐败形式）区分开来，这种区分方式也就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该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交易付款和对他们加快办理手续来说必需的那些关系打点工作？这也就是润滑打点者与行贿者的根本区别所在。那么，在行贿者中间，他们用来掩盖这些风险关系的不同策略又有哪些呢？

行贿者：通过送礼、利益捆绑和经纪业务费来掩人耳目

行贿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这主要取决于行贿者与想要贿赂的政府官员的亲近程度、限制或促成其行贿行为的法律结构，以及投资者进入市场开发的发展阶段等方面。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罗斯曼（Gabriel Rossman）概述出了个人可能会采用的三种掩人耳目的贿赂策略：送礼、利益捆绑和经纪业务费。⁸“这三种策略各有不同的内涵，它们都为（行贿者）提供了否认贿赂的合理方式。”⁹在此，我概述了从属型蜘蛛可能选择其中一种策略的条件。在分析过程中，我也会解释富豪／超级大富豪可能在何时会选择自己来承担风险，何时又会通过利用代表他们的第三方经纪人来开展这项行贿工作，以便降低个人风险。

送礼

在研究的早期我就了解到，行贿并不总是通过简单的现金支付来完成的。例如，在参观一个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时，我曾天真地问当地一位45岁的房地产开发商“奎”（Khue）：“您会给他们塞红包吗？您怎么知道该包多大数目的红包呢？”奎笑着跟我解释，他会通过送高度个性化的礼物来掩盖这类不光彩的关系：

你来自西方，所以你会认为，向政府官员行贿是不对的，但在越南，现实就是这个样子。想想看吧：他们每个月只能赚200—300美元。他们怎么能光靠这点钱来生活呢？他们也得吃饭啊！我们付钱给他们，让他们做分内的工作……（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直接打钱行贿，你必须要做得更加精明些。每个人也都很不一样，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需求。比如，有人可能

有孩子，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帮他支付孩子上学的学费。或者，105
我们也可以给他们的妻子买一块昂贵的手表或一只手提包，这些东西在香港很容易变现的。

当地企业家深深嵌入关键政治精英的封闭网络中，他们会通过高度个性化的送礼策略来掩盖这些不光彩的关系，送的礼物种类也会因每个人和每种关系的不同而不同。要是投资竞争者未能摸清如何巧妙地进行这类深层的个人交流，他最后可能会损失惨重。例如，在我对越南当地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仁”的采访中，他就阐述了他在争夺胡志明市黄金地段的竞争中所面临的困难，以及这些人际互动会如何促使投资者想出新的方式来巩固个人关系。仁解释说：

项目的最佳开发商并不总是那些赢得投标的人。赢家是那些知道如何玩好当地投资游戏的人。即使你付了钱，你也必须处理好政府的人事调动。每隔几年，政府就会换届，然后你必须得处理好与新官员的关系，他可能会为了支持自己的朋友而把你赶出市场。每个人都知道，那些顶级开发者都与政府高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这就意味着，顶级开发者必须给这些政府高层官员以及他们下面的每个官员一些好处。

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就需要与官员打交道、做好大量的关系工作，这不仅要评估什么形式的贿款合适，还要懂得怎样以精心策划的最佳方式行贿。未能支付适当的贿款可能就意味着，开发商将无法获得经营业务所需的执照或许可证，或者是已经在办理的营业许可证也可能会突然被暂停办理。

我询问开发商是如何管理这些关系的，仁向我解释说：“在我

们公司，（首席高管）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打理关系上，而后台办公室中的每个人都在思考该如何去具体执行。”仁还给我看了手机里他和他的合伙人在一次与当地官员签约时拍摄的照片。这张照片上有他们私人公司的六名男性，以及另外五名身着绿色干部服装的政府官员。在照片的正中间，三名公司高管正在和政府官员握手。仁指出，握手是他们已经稳固关系和结盟的一个标志。为了走到这一步，他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通过送奢侈品礼物来迎合政府官员的口味。

106 爱马仕手提包和劳力士手表是最常见的礼物，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是令人垂涎的、难以获得的奢侈品，也因为它们是高价值的储值手段，能够在二级市场上快速变现。一位知情人告诉我，他妻子赠送了一个价值 1 万美元的爱马仕手提包给他商业合作伙伴的妻子，以便获得他们最近完工的一栋公寓大楼的入住许可证。我想追问并了解更多细节，所以我便评论道：“对于一个重大（200 万美元）项目而言，那只能算是一笔微不足道的小钱了吧。”

奎回应说：“这就是为什么你得发展长期的关系。你以每次增加一点点的方式来赠送礼物，这就使送礼看起来不像是行贿。我们总是不得不考虑很多和礼物相关的事情。例如，她喜欢什么颜色呀，她喜欢什么款式啊。”[在这么说时，他给我看的是爱马仕铂金包和凯莉包（Kelly Bags）两款包包的照片]投资者会不遗余力地打造个人故事，讲述他们是如何想方设法才买到他们送给政府官员的那些礼物的。例如，一位投资者就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不得不每个月给他女儿一笔津贴，让她在爱马仕商店购买一些小件商品，以便能与爱马仕的某位销售人员建立好关系，这个过程持续了两年多。这是因为，在爱马仕商店，人们不是简单走进商店就能购买到某只包的。客户必须首先与销售人员建立关系，然后还要等到购买的机会，最后，他们才能直接从商店购买到梦寐以求的某只手提包。

还有一位投资人，曾派他的助手去法国连续排了五天的队，只为了购买到一只手提包，然后再亲自将它背回越南。由此可见，购买奢侈品本身就已经是一项复杂的交易过程了。

劳力士手表是最令人垂涎的手表之一，但并非所有的劳力士表都能拿来送礼。就像爱马仕手提包的情况一样，投资者寻求的是劳力士迪通拿（Rolex Daytona）这类令人垂涎的单品，而这种手表极难购得。光有钱也未必能买得到，人们通常要在多个国家等候数年时间才可能有购买一份的资格。劳力士迪通拿不锈钢手表的建议市场零售价为 13 000 美元起步，但由于市场需求旺盛，二级市场上的价格通常都是该数目的两倍之多。这里的手表价值不仅仅在于它难以获得，还在于人们可以围绕它来讲述一个故事，即他们为了购买它付出了多大的辛劳。

泽（Tze）是一位新加坡的投资者，他努力与政府官员建立并保持长期的联系，主要通过向当地的合作伙伴提供能购买精妙礼物的基金。正如泽所告诉我的，“这些‘礼物’包括参观其他‘项目地点’（豪华酒店）的免费欧洲游、演出门票、餐厅预订以及提供导游团队，让他们获得终极的海外度假体验”。这些假期通常会令人难忘，共同经历，充满了惊奇感和发现感。他们在送礼者和接受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情感联结，这有助于达成或促进一笔交易。

除了手提包、手表和度假游之外，艺术品也开始作为送礼佳品而受欢迎。我现在怀疑，帮助当地和区域性艺术家不断出现并兴盛的，可能是一种对投机艺术的新痴迷，这种艺术被用来巴结和赢得好感。一天下午，我受邀参观了著名越南裔美籍艺术家黎光定（Dinh Q. Lê）的工作室和家宅。黎先生的作品是抽象的，但都是他从越南战争中汲取了灵感，将北越和南越的标志性图像并置，并使用一种特别的篮子编织技艺所创作的。每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售价均为 1 万—2 万美元，大都是投机收藏家购买了这些艺术品，他

们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艺术品的价值还会进一步增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手提包、珠宝、度假游和艺术品都是通过送礼来行贿的例子，因为当地商界精英会努力通过给公然行贿戴上伪装的假面，来掩盖这种非法和不光彩的关系。在这里，贿赂无疑是必要的，但找到合适的礼物和合适的送礼时机也是交易经纪艺术的一部分。在我的很多采访中，研究参与者都提到了赠送这类礼物的重要性，因为它们能帮助建立个人联结感，而这是促成交易的关键。¹⁰

从国家官员的角度来看，他们也需要与送礼者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因而他们只能接受经过适当遮掩的礼物。然而，处理好这种微妙平衡的艺术，能为投资者提供一项长期的战略，以确保能为正在进行的开发项目获得必要信息和外界助力。重要的是，通过更频繁地向官员提供不引人注目的小礼物，他们就能够与关键官员保持长久的关系。对于那些与政府高层没有关联的人来说，这是获得土地或与投资机会相关的关键信息的唯一途径。

建立直接联系的努力就会涉及社会学家丹·莱纳-沃斯（Dan Lainer-Vos）所称的“模糊实践”（blurring practices），即参与者努力完成交易，与此同时也会模糊送礼、贿赂和市场交易之间的界限。¹¹ 送礼使当地企业主能够通过国家官员进入市场，而这些官员作为政府的雇员，每月收入还不到 300 美元。通过模糊这些做法，行贿的富豪就可以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潜在的牢狱之灾或是有损名誉的各种风险。

利益捆绑

送礼还只是行贿的冰山一角。随着投资赌注的增加，贿赂的规模和分配方式也会随之增加。除了送礼之外，行贿者还会设法通过

各种利益捆绑策略来行贿，这些策略巧妙地将政府官员锁定在和投资者互相挟持的破坏性关系之中。利益捆绑涉及一系列交换，它们会使声名狼藉的交易看上去也没那么不光彩。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以工资的形式向政治精英的近亲提供经济报酬和 / 或通过离岸工具向指定的代理人提供公司股份。

108

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投资者相比，来自新加坡、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等地的投资者在越南和缅甸开展业务时，对待利益捆绑的态度显得更加从容些。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区域性投资者本身就来自他们不得不与政府官员协调处理类似不透明关系的国家。此外，由于越南和缅甸都是小国家，地方政府很少调查海外腐败情况。

例如，韩国投资者受到《反海外贿赂法》(Foreign Bribery Act) 的限制；然而，在韩国以外的越南和缅甸等国家，人们就很难识别和打击跨境腐败行为。说归说，在 2014 年“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中，韩国在 100 个国家中排第 31 位(指数零表示最腐败的国家)。¹² 因此，尽管有《反海外贿赂法》，但在我对多个投资者的采访中，他们都表明自己无法避免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开展业务。为了降低风险，他们会与中央政府的关键官员建立长期的个人关系。

这些投资者在国家—市场关系中对这种赞助关系感到很自在，他们还向我描述了他们的这种文化相似性。俊 (Joon) 是一名来自韩国的 35 岁投资者，他向我解释说：

越南特别容易让我们想到早期阶段的韩国，所以当我们来到这里时，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市场潜力。这个国家有 9000 万人口，中产阶级也正在不断壮大。在过去的几年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2005 年的 700 美元上升到了 2015 年的 2200 美元。这说明了什么？新中产阶级（将会）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要

有更好的住房……和购物广场。我们知道如何满足这一点，因为我们在韩国也看到过同样的经济增长。我们所缺乏的是语言技能和人脉关系。越南（政府官员）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办事方式，他们也很难相处。

我问俊能否澄清他所说的“很难相处”的具体含义，他便给我详细讲述了他的公司必须处理的那种腐败行为。他解释说：“当你带着外汇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必须记住，你是在他们的土地上做生意。他们想确保自己能得到‘报酬’（他强调了一下‘报酬’这个词，意指贿赂）。他们总是希望你能来开发这里，然后在你完成项目后，再把你给一脚踹出去。”我问他，在这样一个普遍缺乏信息获取渠道、法律存在多种解释，而且腐败现象也很盛行的市场中，
109 他是怎么做生意的，他回答说：

当你填满他们的腰包时，你就能让他们对你心存感激。也不仅是他们需要钱，这对你自己也有好处，要是项目出了问题，你也总可以拿这个来威胁说要揭露他们。这是一个充满了诡计和报复的肮脏世界。你的公司雇佣党内官员的家属，关系越密切就越好……我会雇佣他们的侄子或侄女，但最好能是儿子或女儿，因为这样一来，如果他们想卸磨杀驴地赶走我们，（他们）也就相当于是把自己的家人拉下水。

俊所描述的是一种“相互挟持”和相互毁灭的关系：通过以离岸股权形式收受外国投资者的贿款，政府官员便将他们自己牵涉到了犯罪活动中来。聘用党内官员近亲的决定也能为投资者提供一些保证，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官员就不会随意揭露他们的不光彩活动，因为这样做也会伤害自己的近亲。为了让资金流入政府官员的口袋，

他们还承担了潜在的曝光风险。然而，东亚 / 东南亚的投资者不太会担心这种风险，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的政府不会在本国以外执行反腐败法。

一些受访者在描述他们的办公室环境和人员时，特别谈到了他们在招聘时所使用的策略。他们不是从第三方机构来聘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或经纪人，而是会花时间与越南当地商界和政治领导人有关系的第三方个人建立起个人关系。通过雇佣党内官员的近亲，他们便建立了靠近而又不过分亲密的联系，这让他们能够以种种遮掩方式来进行贿赂：通过提高官员亲属的薪水、向指定的代理人（这是为了保持匿名性）提供公司股份，以及后续会给到这些官员亲属其他公司员工所无法获得的投资利润分成来进行利益捆绑。澄（Jing）是一名投资经纪人，为一家驻地在越南的中国香港公司工作，他是这么解释的：

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人（越南当地人）都有着某种关系。他们不是这个官员的儿子，就是那个官员的女儿。我们并不是依赖他们的关系来谋取个人利益，它更多关乎谁可以拿到关键信息。

他的合伙人康（Kang）进一步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我们办公室，我们也雇佣了这样的人，他的工作职责就是在我们需要时能为我们提供关键信息。那个人会就如何与政府打交道、建立关系方面给我们提建议，所以很显然，他们必须要在政府里有人脉。他们会为我们提供很多有关送礼形式和金额大小的建议，从高层官员到下级底层官员面面俱到。当然，最终还是我们做决定，但他们在这方面给了很多的建议。

这些投资者会通过和官员建立密切的信任关系来与政府打交道，这能让他们获得有关市场的内幕信息、快速的审批流程并顺利完成商业交易。澄就这个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你提交文件让他们批准，但它只会被放在他们的桌子上而无人问津。他们会编造各种借口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继续推进文件的批准流程。比如说，表格上的某些内容没有填对，或者是你还需要另外五个签名，而此类签名并未在实际表格中列出。为了推进某些事情的进展，就需要有人过去处理这种关系。这就是一种关系，他们需要花钱来买。

通过认识到国家合法性的变化不定，了解到当地官员“子女”作为中间调解人的重要性，以及参与到当地的交易经纪方式中来，亚洲投资者就可以与国家层面上高层政府官员建立起间接的关系。

公司还会指定，要将投资交易的 5%—20% 的股份转给某位被提名人，比例的不同取决于与这些子女有亲属关系的政府官员处在何种政府层级上。康解释说：“代理人本质上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头所有者，只匿名持有部分交易。（上述政府官员的家属）一般会写上他们家的司机和女佣的名字（笑）。但是，如果投资出现问题，我们可以追踪到真正的所有者，（要是）有任何针对公司不当行为的各类调查，他们也会和我们一起倒台。”换句话说，官员的子女可能会因为拿交易回扣而遭到媒体曝光，这不仅会影响他们自己的声誉，也会连带影响到他们父母的声誉。

许多外国公司还与越南当地的精英富豪建立了关系，他们后来也会投资公司的项目。西莉亚（Celia）出身于越南当地一个精英家庭，她曾在美国的一所常春藤名校受过教育，今年 32 岁，现在在一家韩国资产管理公司的房地产部门工作，该公司在中国香港、

越南和中国上海都设有分公司。西莉亚反思过她在利益捆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这样跟我说：

在美国，我那些在各大银行工作的朋友都称这个为“亲友关系户”或“官二代子女”。各大公司会竞相聘用在美国上过大学，尤其是上过商学院和法学院的、（政治上）有最佳亲属关系的官二代。在越南就更是如此了，只是规模要小一些而已。这些关系对于维持在该国的影响力至关重要，但它们也是双向互惠的。

111

公司雇佣“亲友关系户”并支付工资，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有特殊技能的员工，而是因为他们的亲属关系。西莉亚的薪水就是一种利益捆绑形式，因为她带给公司的不是一套独有的工作技能，而是一系列的人脉关系和政治联结，这些关系可以帮助这家外国公司应对该国晦暗不明的官僚环境。亚洲投资者通过与当地商界领袖的子女建立起个人关系，也可以从当地银行筹集到资金。在这种当地的市场情况下，东亚 / 东南亚的投资者便无须参与到具有隐蔽威胁的行动中或公然行贿了。

虽然越南当地精英经常与有影响力的政治领导人建立间接的信任关系，但东亚 / 东南亚的投资者则致力于通过官二代来与政治精英建立起联系。官二代的孩子大都是在美国常春藤名校或韩国和新加坡的精英大学里接受的教育，他们是这些公司的重要人力资产，正如杨（Yang）向我解释的那样：“他们无法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快速完成工作，但是，他们通常能比我们更快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因为他们有直系亲属关联。”我想知道年轻的官二代越南员工具体协助他们公司做了哪些事情，便进一步追问杨，杨则回答说：

这取决于你遇到的问题。在我们公司的案例中，我们遇

到的问题是，一家当地建筑公司总是偷工减料，他们最后的工程也做得很差。他们还想要更多的钱来完成这项工程，而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能再付钱给他们施工了。在这方面，我们有认识当地法官的政治顾问，他们通常会就我们是否能成功立案或立案需要哪些准备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很多时候，我们的员工也帮我们与当地的投资机会牵线搭桥。越南开发商主导着市场，但我们有品牌优势，所以有时候，他们也会帮助我们获得一些合资项目。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当越南本地的合作伙伴在合资企业中出资时，外商投资企业才能拥有土地使用权。

通过雇佣越南本地具有政治或商业方面紧密关系的官二代或富二代，东亚 / 东南亚的投资公司就与年轻一代精英建立起了牢固的信任关系，这些官二代或富二代不仅给投资交易带来了关键的人脉关系，同时也能弥合在当地市场环境中进行交易时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而这是他们的父母做不到的。

112 为了加强在当地的交易经纪策略，摩根大通银行和高盛集团都雇佣过有家庭关系背景的关系户员工，为此，它们也都受到了美国政府的严格审查。与此相对，那些在当地拥有分公司的亚洲房地产开发商，就要比他们的西方同行成功得多，在推进交易方面也更快，因为他们可以绕开许多与贿赂和腐败等有关法律（如《反海外贿赂法》）的限制。韩国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以及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在越南采用类似的交易模式时不存在任何问题。出生于越南的亚历克斯（Alex）是毕业于美国三大顶尖商学院*的高材生，他这样向我

* 一般认为，美国三大顶尖商学院是哈佛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的商学院。

解释说：“这就是在越南乃至整个亚洲的商业运作方式，这里的一切都与人脉有关。亚洲公司永远会领先，因为他们根本不必担心会因为违反某项外国法律而被调查。”此外，结构性条件——管理外国投资的经济规则和预期等——也会形塑每种投资者可以利用的人脉关系搭建策略。

经纪业务费

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投资者最难与越南等地的地方当局建立起牢固的直接联系，因为他们还受到母国正式的全球治理结构的限制。西方国家的投资者与东南亚当地政治官员的距离最远，文化差异也最大。因而，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投资者通常会在市场已开发到更成熟的阶段才进入这些市场，此时，这类项目已经拥有了复杂的跨境法律和专业化审计，并且也已经开始了专业化的运作流程（例如建立董事会、从两套账转变为单套账等）。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投资者也为越南当地以及东亚/东南亚的开发商提供了一种退出策略，在东亚/东南亚投资者实现了专业化运营且大捞了一笔，准备清理和退出项目时，会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他们的资产。这类投资的规模从5000万美元到9亿美元不等。与东亚/东南亚投资者大捞一笔相反，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投资者也会面临地方当局征收的更高的税负，从而直接导致利润下降。因此，在一个腐败盛行、市场信息“分布不均”（因为市场或等级制度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国家，收取经纪业务费的机会便出现了。¹³ 经纪人（brokers）充当着第三方调停者或中间人，他们会打点疏通以推进项目，同时也承担了这方面的风险。

2009年，我开始采访刚接触到越南市场的西方投资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避开了征地阶段（即投资成本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

开发阶段)，因为这涉及多个官僚阶层的受贿问题。购买土地、重新拥有土地使用权，以及获得适当的营业许可证和建设许可证都需要行贿。在我的采访研究项目中，几乎所有西方投资者都通过筹集资金来寻求对房地产市场的投资，然后，他们会投资于当地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再由该公司来开发他们通过合资企业获得的土地。

来自美国的一名投资者凯文（Kevin）这样解释说：

越南的房地产市场仍然非常腐败。我们公司通常会在开发的后期阶段才进入这个市场。因此，当我们进入市场时，最腐败的阶段应该已经结束了。有时，我们会给后期可能会投资的项目提供一些建议，帮助他们建立好系统，例如将两套账改为单套账，将个人财务与公司的专业财务区分开来，聘请专业的审计师以及设立董事会等。

我问采访者他们在这个市场上如何与来自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投资者竞争，日本的一名投资者健二（Kenji）向我解释说：“我们为他们提供退出机制。他们出时我们才进，因而，我们完全是在不同的市场。他们会把投资转卖给我们和美国人。”美国的一名投资者安德鲁进一步就此进行了阐述：

进入这个市场会让我们付出更多的代价。我们基本不怎么考虑那些不超过1亿美元资金的交易项目。到那个规模时，项目基本已经算开发成熟，运作也很专业化了，但我们的投资回报显然也要低得多，不过，我们仍然会盈利。我想，你也许可以想象到，那些来自中国香港、韩国或中国台湾的开发商，在进入这个市场时早就想好了要以我们作为他们的退出机制。

安德鲁在这里提到的投资者，是指那些在早期阶段就进入市场的投资者，他们会先行开发房地产项目，然后再将这些项目出售给能够注资更多的后期投资者，后者希望发展到更大的私募股权时再退出——或者说，是最终的彻底退出，即在本国或外国的证券交易所进行首次公开募股。相比之下，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投资者更愿意等到投资项目发展到更为成熟的阶段，并产生明确的税务影响时才会进入市场。较大规模的投资使得本地基金经理能够直接与中央政府对话和打交道，从而也能够推动公司实现更大程度的透明化运作。例如，次郎（Jiro）这样跟我解释说：

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很腐败。但是，当你带着1亿美金进入这个市场时，你就知道，你会直接和这个国家的总理打交道。当然，我们也与当地一家公司成立了合资企业。但是，当这家当地公司进行这么大一笔交易时，他们就得接见我们、和我们一道开会，以便推动项目开发和透明化运作。如果该国政府不能自上而下地改变其行事方式，那么，没有人会愿意带着这么多钱进入这个市场。

114

我在2009—2010年采访的西方投资者大多都来自美国，他们也都以类似的陈述来回应这个问题。他们说自己无法承受参与贿赂或腐败的风险，因为他们可能会在母国面临刑事判决。乔纳森（Jonathan）是一名来自西雅图的40多岁的投资者，他说：“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样跟你描述的，但这些法律毕竟存在，像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和《反有组织犯罪及腐化组织法》等。除非我甘愿冒进监狱的风险，否则，我就不能在这里通过贿赂当地官员来做生意。”与此回应类似，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投资者伊桑（Ethan）也说：“我完全支持推动这个市场提高其投资透明度。归根结底，他们拥有土

地，而我们手里有资金。当你控制了资金，也就控制了交易中的某些条款。”来自纽约的投资者里奇（Rich）坚称：“我不相信非得要贿赂人们才能让他们完成分内工作的这套交易方式。这不仅是非法的，在道德上也是不对的。只要我能挤出一点利润，我宁愿避免这种交易方式。的确，我的利润率会比我的竞争对手低一些，但我宁可这样，也不愿让我的生意牵扯进那个灰色地带。”

最初进行的这一轮采访让我以为，贿赂只会发生在第一阶段的土地征用阶段，或是只会发生在越南当地企业家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交易中。起初，我将这些受访者都归入了“远离腐败”的小组中。随着我的研究继续开展，我发现西方投资者也会试图巧妙地利用这里的体制。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将它合理化。外国开发商乔恩（Jon）谈到，重要的就是要弄清楚如何行贿但又不至于将自己直接卷入犯罪活动中。例如，在一个开发项目停滞不前了五年后，乔恩向我阐述了他在当地促成房地产交易时采用的新策略：

在过去五年中，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每个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本地化。进入这个市场以后，你不能还以美国人的身份来告诉政府官员该怎么做。那套是行不通的，我尝到了苦头，也吸取了这个教训。如果你和某某某（指的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也是西方投资者）交谈，你就会发现，他们也适应了这里的行事方式。我不能与当地领导人建立直接的个人关系，因为不仅存在语言和文化障碍，而且作为一名投资者，这会让我太接近可能面临的腐败指控。我仍然在美国生活，我可不想因为国际法与当地做法的冲突而去冒险，然后落得银铛入狱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与中介机构或公共机构合作，建立起牢固的伙伴关系……我们与越南当地一家金融公

司有密切合作，还聘请了一支律师团队。我们必须与能够帮助我们与政府建联和打交道的人合作。

这里又提到了“与政府建联和打交道”。不管你是不是西方投资者，这种做法在这里无处不在。我对乔恩的采访，以及随后对其他几位西方投资者的采访都揭示了一点，即他们会通过经纪人策略来协商处理这类不名誉的关系：他们聘请了可以代他们行贿的第三方机构的调停者，以便抵御和联合承担刑事指控的风险。

在我 2009 年采访的投资者中，有近 60% 的人到 2016 年就离开了越南市场，他们都是按照西方的法律条款来应对当地市场，但没过几年便失败了。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则通过经纪人外包了当地盛行的行贿做法。第三方经纪人包括当地资产管理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公关机构，它们为投资者与当地的投资机会牵线搭桥。西方投资者有在其母国被定罪的风险，无法亲自参与到行贿和具有隐蔽性威胁的基础工作中来。或许正因此，他们才通过聘请被人称为“中间人”的当地调停者来在他们自己和当地官员之间建立起一种缓冲关系。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投资者埃里克（Eric）解释说：

如果你仔细观察我们在越南合作的不同律师事务所，你就会发现，所有事务所中都兼有外国律师和当地律师。外国律师会与我们会面，评估我们的需求、起草或审查合同，有时甚至还会给出项目建议书。我们通常不会在事务所里与当地律师会面。但是，任何好的律所都必须得有当地律师。他们是熟悉当地情况的耳目……事务所聘请的当地律师不用坐班执业。他们的工作就是去建立一个强大的人脉网络……我向他们支付“法律咨询费”。他们如何处理这笔钱财，则与我无关。

在同一次采访中，埃里克还澄清说：“要明确的是，他们没有做任何‘非法’（他用手指做了个打引号的手势，暗指不合法的可怕之事）的事情。从技术上来讲，付钱让某人好好完成他们的工作并不违法。（然而）花钱请人忽略掉一个明显的错误则是违法的。”在埃里克的例子中，他们设在越南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会聘请当地的律师，他们是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并能获得必要批准、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关键人物。为了追踪这种商业实践，我还与三位不同的当地律师讨论了他们如何在越南执业。一位 35 岁的律师“顺”（Thuan）向我解释说：

在越南当律师和在美国当律师不同。这些年我一直在学校里学习法律，但最终，最好的律师也未必会赢。你还必须得和法官有关系。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与法官和主要政党官员建立关系上。要是没有这些关系……那不管我这个人有多聪明……也不管我法律学得有多好、辩护口才有多么精湛……我们都会输掉案子。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不用上法庭进行辩诉。一旦我们向对方展示我们有多么强硬的后台关系，对方就会自动退避三舍，然后，我们便前去进行调解，或者是达成某项私下协议。

我问这三位律师，什么样的冲突可能会导致潜在的诉讼，他们都提到了某种形式的打款，包括项目完成后的投资回报，或者是向将外国投资者与当地投资机会牵线搭桥的经纪人打款。西方投资者必须依靠第三方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律师事务所及他们的相关工作——来促进房地产交易的达成。这些第三方公司中的个人就是调解者，他们是与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可以通过贿赂和送礼并利用他们自己的影响力来获得营业执照或是获取内

幕消息。

董（Dong）是C国的一位房地产投资者，他就认识并介绍给我这样一位调解者——崔（Thuy）女士。在我对董的采访中，他一直坚持要我去见见崔，以便也能把具有政治人脉关系的“顾问”包括进我的研究中来。崔同意在胡志明市的柏悦酒店里与我见面。我提前15分钟到达那里，并在房间的安静一隅找了个座位。随后，崔走了进来，只见她从头到脚穿的都是设计师设计的名牌服饰。在一开始的寒暄中，我们只是聊了聊她对时尚方面的兴趣。她告诉我，她经常会为了购物而满世界跑，也定期去巴黎，在那里，她会特意在巴黎的爱马仕旗舰店花费数千美元。这样一来，她就能留在他们旗舰店的贵宾名单上，从而拥有独一无二的率先购买资格，能够获得爱马仕超独家限量版的手提包。她掏出手机，给我看了一张她最近新得的战利品，那是一款鳄鱼皮钱包，售价达4.5万美元，但它在二级市场上被炒到了12万美元。聊了一会儿时尚话题之后，我便问了她一些有关她家庭背景和目前工作方面的问题。

崔告诉我说，她来自一个与政府高层有着密切关系的家庭。事实上，她还说：“要是没有政府的人脉关系，你在这个国家就什么也做不成。”我们慢慢进入采访的节奏，我请她告诉我她的家族史以及他们与政府高层的关系。她告诉我，她父亲一开始是一名电气工程师，后来转行成为一名建筑行业承包商。从那时起，他就慢慢起家，从承包小型房地产项目转向承包越来越大的工程项目。在崔接受我的采访时，她父亲正在经营一家建筑公司，他们与政府签订了许多大型合同。

117

崔是在英国接受的教育，她在那里获得了建筑学学士学位和室内设计的硕士学位。在她学成后刚回越南时，她经营着自己的一家室内设计公司，直到她父亲邀请她来帮他打理一些项目。后来，他们一起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那时，她担任外国投资者的当地顾问

和经纪人，主要负责为他们在当地寻找人脉广泛的联络人。虽然她父亲已不在政府机构中任职，但他的人脉关系仍然深广，因为还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党内工作、轮换调职。她有一个叔叔是负责评估土地使用权费用的政党官员，她将土地使用权费用描述为“为了‘使用’而不是购买土地而征收的税款。这与消费税或销售税一样”。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正如她向我解释的那样，土地会不断被重新估价，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纳税义务应该是多少，因为法律可以有多重解释。除了弄清土地使用权以外，投资者还必须获得投资证书和监管批准才能在此开展业务。因此，外国人就得依靠像崔这样的当地顾问来帮助他们绕过这些行政障碍。崔接着说：

投资证书可能需要一整年的时间才能批下来，一般情况下，如果不给点疏通打点费，你是无法获得投资证书的……由于政党领导人和当地企业家以及外国投资者之间关系密切，他们在这方面也赚了很多钱。规则一直在变化，似乎也没有人能真正弄清楚评估价值的实际百分比应该是多少。

当我问崔她承担的是什么角色时，她告诉我，她是一名在当地有着深厚关系网的投资顾问。我又问她是如何向潜在投资者表达这一点的，她回答说：

如果你付足够多的钱给合适的人，你就能一直待在这个市场游戏中。要是有人向你的关系人脉支付了比你支付的还要多的费用，那么，你就出局了……这里没有人会完全相信法治。问题的关键是，你的这些人脉关系有多广、多硬。

崔还向我描述了她的公司如何处理这些打款。她说：

因此，他们向我们公司支付了一笔“法律咨询费”，以确保所有的文书工作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并且确保他们是财产的最终所有者……就我们这方而言，我们知道政党的官员每五六年会换届一次，所以，我们赚钱的时间有限。因此，我们建立了合法的途径将我们的钱财转移到国外，主要通过离岸账户以外币的形式获得报酬。

118

虽然崔最初只同意与我会面一个小时，但我们的谈话最终持续了三个小时，因为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她的家人要在他们身居要职、尚有政治权力的一段有限的时期内，管理好她家当前的各种人脉关系的压力。崔似乎并没有将自己作为中间人的行为定性为市场欺诈。正如她所认为的那样，她为投资者提供了一项服务，这项服务就是获取内部消息、确保营业执照的准确办理等。崔没有将她自己视为贪官污吏（kleptocrat）的同党，她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填补一些制度上的空白，为投资者提供他们的投资组合可能需要的各种保障。

在我与崔会面后，董请我喝一杯，他很想了解她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和他约在一家鸡尾酒酒吧见面。在我们点了饮品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她是不是总在提醒你，关键不在于你所掌握的知识，而在于你认识什么人？”我笑了，并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我们便就此边喝边聊了起来。董接着向我概述了他需要采取的一系列漫长步骤，以及怎样聘请像崔这样的中间人来帮助他开展业务：

如果你想干成什么事，那你就必须先获得许可。要想获得许可，你就必须得有营业执照……你能在哪里获得营业执照呢？你得去政府部门办理。但政府办公部门不会主动做任何事情，除非他们能够得到报酬和好处，或者是上级命令他们要去做某些事。但不管怎么说，政府部门的部长为什么会偏爱一

个群体，而不是另一个群体呢？嗯，那通常都是因为钱。

我问董他如何向这些人行贿的，他告诉我：

这在任何地方都一样。政治权力在握的人本应该考虑他们国家人民的福祉和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未来。但是，贪婪会叫人堕落。比如，在我们与他们进行的最后一笔交易中，我们提供了比他们的预订价格还要高出 1000 万美元的价格，但我们把这笔款项设计成了一笔贷款。于是，他们就陷入了以下这种两难的困境：他们是现在就将这 1000 万美元收入囊中，并且在内部瓜分吗？但这样一来，该国的后代将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还是说，他们会先拒绝并表示他们想将这一切结算清楚，以便他们的子孙后代不需要来偿还这些贷款呢？换做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119 关于我提的“中间人是否拿走了 1000 万美元”这个问题，董没有直接回答。我至少试着提问了三遍，每次提的问题也都略有不同。第一次我是直接问的：“这么做奏效了吗？”

他回答说：“因为你不是我的有限合作伙伴之一，所以，我不必向你透露这一点。”

听完这话后，我有所收敛并后退一步，试图装出一副搞不懂的糊涂样子继续问他：“啊，真对不起，我有点搞糊涂了。这个策略最后奏效了吗？”

对于此次提问，他回答说：“你觉得呢？问问你自己，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

我回答说：“嗯，好吧，换作是我，我可能会拿走这笔钱，因为我知道，这能保障我一家人有个安稳的未来。”

他则回答说：“看吧，那么，你内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不是吗？”

在我进行的许多次采访中，像这种来回拉锯的对话也很常见。然而，几个星期之后，我在一家酒吧遇到了董和他的公关代理人，我又问到他们与崔的关系，这次他平静地说：“我得说，‘我既不能确认也不能否认’在这笔交易中支付的款项，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强大有效的策略。”

与董采取的方式一样，参与研究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投资者，也都与政府官员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们会通过中介机构等正式渠道来获得内部信息，以便促进交易经纪过程和开发他们所寻求的项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纪业务有助于简化社会互动、促进经济活动和推动发展与项目开发，但与此同时，它也能滋生腐败。¹⁴在我采访的所有投资者中，有两位投资者与众不同，因为他们更坦率地谈起了他们为了获得非正式的市场准入而行贿的做法。威廉(William)是一名来自英国的投资者，他如此直言不讳地谈道：

有很多西方投资者来到越南这里，总是不停地叨叨着要反腐。但在完成一笔交易之前，他们将会在等待一个项目的批准上拖个五六年。我们可不能这样做。我们的投资者可不能等个五六年才看到投资回报。我们永远不会用这些数据来筹集资金……我想，你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人们并不总是会对你坦诚相告的，因为，要是他们真告诉你他们实际做事的方式，他们可能会因此而锒铛入狱。但也许，我们应该更加开放一点，因为这些法律毕竟都是人为制定的，而它们并不能反映当地的投资需求。让我这么来告诉你吧……为了规避它(《反海外腐败法》)，我们会通过公关公司来转移资金。我们最近的一笔交易涉及100万美元，主要是通过一家公关公司给一个重要的大型项目转移资金。我们并不只给一个人好处，而是给了很多人。

更具体的一些细节，我就不能再跟你透露了，但我想，你已经能明白了。

许多西方投资者会利用公关公司来帮助他们与主要的政府官员建立起联系。公关公司经常会与政府机构密切合作，撰写新闻报道并宣传很多政府活动等。因此，这些公司与一些关键官员也有着重要的人际交往。本地和西方的公司都会支付费用给公关顾问，以便让他们安排一次与主要领导人的非正式会面，一旦他们能在交易上有所推进，他们就将向公关公司支付一笔写成是广告宣传费的资金，但其实，这些钱是用来答谢那位政府官员的报酬。

虽然越南律师和公关顾问向我谈起建立人脉关系的重要性时更加直接，但同一家公司里的西方律师和顾问则会坚称，他们不相信这会助长贿赂或腐败行为。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表面的公众形象，即他们都是反腐败法律的强有力的倡导者。然而，他们所宣称的价值观和他们的做法之间存在矛盾，这也是对越南市场经济环境的一种直接反映。在这些当地的具体情况下，西方投资者也别无他法，只好去聘请调解者（如资产管理公司、律师、委托代理人和公共关系专家）以便加快推进项目的开发。¹⁵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类做法在美国市场中也有。¹⁶通过在当地聘请第三方经纪人，投资者便可以获得有关经济的一些内部消息，并且他们也能获得对其利润率有重大影响的一些关键税收减免政策等。我对东南亚地区的西方投资者和当地经纪人（律师、顾问、委托代理人和公共关系专家）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这些采访也都表明，在2014—2016年，投资者通过经纪人实施的行贿策略，能够将其投资周期从5年内完成2笔交易提升至平均每年达成一笔交易。

窃贼

在最坏的情况下，信息不对称、资金管理不善和贿赂会共同造成猖獗的盗窃行为和“委托代理问题”。想要评估这种情况的普遍性极具挑战，因为很少有人会实时地谈论它。大多向我透露他们自己参与过盗窃的人，谈论的也至少都是两年前的交易了。

“谭”是越南当地的一名会计师，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交易咨询中度过的，在我对谭的一次访谈中，他谈了很多关于资金损失的问题。在十多年前，他的一支基金由于管理不善损失了大量金钱。一家名叫白丝绸合伙人（White Silk Partners）的外国集团与一家当地银行北四银行（North Four Bank）共同创建了一家投资管理公司，管理8000万美元的基金。白丝绸合伙人要求越南的合作伙伴先来筹集第一笔4000万美元，之后，白丝绸合伙人将筹集第二笔4000万美元。在描述这种合伙关系时，谭还告诉我，负责管理这支8000万美元基金的三个人，其实都缺乏在越南投资的经验。他们确实是拥有这笔巨款，但他们无处可以投资，因此，为了使他们看起来像是在注入资金，他们铤而走险，直接从基金中窃取钱财去投资了一些假冒公司。

121

我问谭是否可以给我提供一个人如何窃取资金的具体例子，他回答我说：

他们在大叻（Dalat）的山上投资了一个养虾场。但山上怎么能养得了虾呢？可投资人远在天边啊，他们甚至连大叻和湄公河（Mekong）都分不清楚！于是，这些人拿着钱就撒腿跑路了，当他们第二次筹集不到资金时，他们就跑到泰国或缅甸，或是其他的一些国家……

对谭的采访虽然只持续了两个小时，但它却是我进行过的信息量最大的采访之一。很多人在盗窃和欺诈问题上都会有所遮掩和暗示，不会坦率地对我说出来，但谭与他们不同，他是我采访到的最为直接的受访者。这使我相信，他遇到的情况或类似的一些情况，可能比被公开承认的案例发生得还要频繁，并且，人们会通过上述已分析过的利益捆绑和经纪人策略来掩盖资金流向。尽管如此，沿着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谭还是向我概述了他供职的基金公司所采取的从直接窃取到市场欺诈的全部运作方式。

在这次访谈之后，我对最常见的两种盗窃行为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它们分别是：（1）在海外建立非法金融结构，这会有效地让外国人控制境内公司，以及（2）出售有利可图的资产，以便首先使基金看起来有利可图，同时还要持有不良资产，以便筹集资金。谭也谈到了一个尽职调查的过程，但事实上，尽职调查流程徒有其表，没有任何人对提供的数据进行认真的双向核实。从本质上来讲，他们从事的是创造性的审计工作，可以展示成没有损失只有利润，他们本来就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掌控了财务报表。随着富豪的投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开始设立假冒公司并用基金来投资，窃取基金中筹集到的资金，然后就撒腿跑路到缅甸等其他国家。在那些国家，他们又可以故技重施，而那些新投资者则对他们过去的不正当交易完全不知情。

122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采用盗窃策略的从属蜘蛛也不光来自本国或周边国家。不管什么国家的公民都有可能盗窃。事实上，在一些案例中，就有美国人将前沿市场作为大本营，并针对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例如，2016年，美国司法部以电汇欺诈、洗钱和共谋等罪名从德国汉堡引渡了一个名叫迈克尔·威尔逊（Michael Wilson）的男子到纽约。投资者——这里指的是超高净值人士——纷纷指责威尔逊使用了假冒公司，这些公司挪用了本来属于投资客户的钱来

支付各类私人物品，包括一处波士顿州道（Boston State Road）房产的首付和好几辆汽车，他最终诈骗了投资者超过 800 万美元的资金。¹⁷

* * *

超高净值人士严重依赖他们的合作伙伴和高净值人士来帮他们在前沿市场建立和扩大资本蛛网，后者通过在一个从浅到深的灰色交易连续体中游走来做到这一点。在这个连续体的一端，是一小部分齐心协力想要避免腐败的人，而在它的另一端，则是彻头彻尾从事盗窃的一小撮人。那些力避腐败的人是极少数，他们往往要接受更高的交易成本，而获得的交易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只有那些打算在此长期经商，不急求资金回报的投资者，才会选择采用这类不涉腐败的商业实践。那些涉嫌彻头彻尾的盗窃的人则采取了一种短期策略，他们从超级大富豪和国有企业那里行窃，然后再撒腿跑到其他前沿市场去玩同样的把戏。

在不涉腐败的经营者和窃贼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群体，这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他们在灰色地带游走时会采取务实灵活的策略。在这种公职人员和商人个体的利益存在大量重叠的市场环境中，贿赂几乎是无从避免的。但正如我前面所展示的那样，贿赂其实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有一些不同类型的行贿者和合法的同谋者——我在本章中将他们分类成了润滑打点者、送礼者、经纪人和中间人，这些人都致力于掩盖在这些资本网络中的贿赂行为。与此同时，同一个人也可能会采用多种策略来推进他的投资项目。

通过蛛网资本主义的视角，这个例子便可说明，富豪和超级大富豪如何向世界各地的前沿经济体输出复杂的投资策略——在某些情况下，他们靠着抢先于当地的法律体系；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

123 他们又会去巴结政府官员。越南和缅甸也绝不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兼具这些不同类型的行贿者和合法同谋者的国家，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些策略也会通过那些认为它们有效的人进入其市场。¹⁸ 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和从属蜘蛛都认为，支付疏通打点费的做法在前沿市场上很是稀松平常，就像要给轮子上润滑油一样自然。只需以现金形式支付小额疏通费就可以加快官僚机构的手续办理过程，很少有人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润滑打点者还会利用法律来有效地使这些打款合法化和正当化，他们会支付小额疏通费，因为在当地的情况下，政府无法为官员提供更高的工资，而官员接受小额疏通费则是他们最务实的生存之道。然而，随着风险的增加，行贿的方式也会随之增多。受东亚 / 东南亚地区和西方国家投资策略的启发，当地的行贿者不是直接付现金——有时也会被隐晦地称为“喝茶钱”——而是制定了各种不同的行贿策略，比如通过送礼、利益捆绑和经纪代理费来掩盖这些不光彩的勾当。

在这三种贿赂形式中，送礼是最为私密和个人化的形式，而利益捆绑和经纪代理费则在收受贿赂的双方之间拉开了更多的距离，因此也容易被他人拿来合理否认贿赂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希望寻求内幕信息和国家优惠待遇的私人行为者来说，定制版的劳力士手表、备受追捧的爱马仕手提包、抽象艺术作品或者资产管理公司里高大上的工作都可以用来行贿，它们在这方面的功能相似，却更为谨慎。与此同时，推动专业化的投资运作也并不总是能一帆风顺。就算是通过更多注资来巧妙地利用这个市场的投资者，也会采取一种更加务实的做法，聘请经纪人、中间人或专门的业务员来为他们处理这项与贿赂有关的工作。迈向专业化的道路并不总是由正直的人大力推动。有很多从前生活在裙带关系之下的资本家也想要推动标准化运作，因为这有助于他们保护自己获得的不义之财，以便能抵御裙带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环境中所固有的不安和动

荡的影响。

这些资本网络的形成具有如此大的风险，其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自己容易受到盗窃和“委托代理问题”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从属蜘蛛会与当地的政府官员合作，从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那里窃取资金并洗钱，例如，北四银行和大叻假虾场的案例就是典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盗窃似乎并没有阻止新投资者进入该国市场，这是因为，投资者对过往财务损失的记忆都很短暂。他们的直觉让他们自以为会比市场上过去的那些输家表现得更好。

本章关注的是那些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人，以及他们所采用的种种行贿策略，这为概念化腐败和行贿策略提供了一种细致入微的研究方法。虽然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从来没有前往前沿市场去躬身实践这些行贿策略，但这个蛛网中的从属蜘蛛会代替他们来运作，并将非法交易洗白成看似无害且难以追踪的交易。尽管如此，前沿市场中的高净值人士也还会通过聘用其他的金融专业人士——经纪人、中间人或委托代理人，他们唯一的责任就是要巧妙地处理这些贿款——来分散行贿的高风险，从而又在蛛网中编织出了更多层级。在这些金融专业人士中，每个人都视野受限，专注于他们自身的独特角色和职能，因此，他们也很难在这个更广阔的资本蛛网中指认该站出来负责的某个人。然而，富豪 / 超级大富豪、他们的下属同伙以及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一直暧昧不明，这些交往关系也共同说明，在这个极难被系统追踪的资本蛛网中，合法 / 非法、正当 / 不正当、腐败 / 清廉的投资策略兼而有之，互相补充。

全球精英的税务策略

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投资者以多种方式来减少税务。¹ 蛛网资本主义的核心在于，离岸空壳公司能够帮助投资者将其税务负担转化为财务利润。税务专家经常会区分逃税、避税和税收确定性（tax certainty）这几种情况。逃税是非法的，而避税是合法实践，它指最大限度地减少应缴所得税。在前沿市场，避税通常涉及通过离岸结构来利用法律层面的策略，这些策略要么未引起国家监管机构的注意，要么使用者还未因此面临法律诉讼。² 税收确定性则是指在国家官员与境内的私人投资者之间建立的一套明确的境内缴纳税款协定。然而，仔细研究这3种税收结构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界限其实很模糊。³ 我认为，虽然逃税、避税和税收确定性的策略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最终都致力于一个相似的目标，因为各个企业都会努力减轻税收负担，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处理税务的不同策略会因很多方面的因素而有所不同，诸如投资者进入市场的时间、投资项目的开发阶段、与政府官员的距离和交情，以及公司是否具备专业化运作的的能力。我从资本网络的角度来审视跨境税收制度，也会审视投资者、国家行为者和金融专业人

士之间在不同投资阶段进行的必要合作。他们在这些不同阶段关注的是不同的税务问题，也采用了不同的税务策略，从而导致了境内税务策略上的异质性。重要的一点是，投资者与税务机关以及律师和会计师等金融专业人士的关系，影响了投资者在灰色交易中游走的尺度。

126

时间因素和关系维度影响了投资者所采用的税务策略。在投资项目的早期阶段，企业家一般会采用逃税策略，因为他们此时负担不起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专业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审计服务。然而，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会开始经历一个专业化的运作过程，聘请第三方金融专业人士来保护他们所累积的资产。寻求更大规模注资的公司会与专业律师、审计师和公司秘书签约，后者就如何建立离岸结构向他们提供建议，从而通过被称为“往返交易”（round-tripping）和“转让定价”（transfer pricing）的流程来避税。往返交易是一种金融黑客行为，它指的是出售一份资产，同时又以大致相同的价格立即将其回购。⁴ 转让定价是一种审计做法，即同一个公司的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收取商品和服务费，以此来合法抵消部分业务成本。⁵

然而，在投资的第三个阶段，随着政府开始警惕这类转让定价的做法，金融专业人士尤其是审计公司，又会一改先前口径，开始表达他们对建立税收确定性的渴望——他们会向投资者宣传他们最能避免潜在的审计、罚款和补缴税款风险。通过关注人们如何巧妙地利用这3种税收结构，我想重点强调的是，随着企业想要发展壮大和吸引外商投资而经历专业化运作，这些前沿经济体国家中的金融专业人士的网络之间，也会存在几种必要的合作类型。

逃税：早期企业家

早期企业家在所有经济领域都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时就进入了

市场，他们往往也承担着最大的投资风险。正如我们所见，早期投资者通常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国家官员关系密切、有参与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内部渠道的本地投资者；第二类是他们的外国合作伙伴或投资商。除了外国和本地投资者在身份地位上不同之外，投资的规模也很重要。较小规模的投资者通常费用有限，无法聘请专业律师和审计师来帮助他们建立合法的避税结构。

在所有的经济领域中——从房地产和采矿业等监管严格的部门，到制造业、服务业和技术行业等监管较少的部门——在发展的最初阶段进入市场的投资者都表示，必须抢占先机进行创业投资活动。如前几章中所述，抢先交易指的是在没有正规营业执照、许可证、正式注册或税收收据的情况下就开始经营业务的一种做法。然而，就税务方面而言，大多数人通过破土动工或未经国家批准就开始经营业务来逃避官方正式的纳税义务。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支付任何其他费用。相反，早期企业家遵循一种非正式的法律形式来促成交易，他们会与有裙带关系的政府官员建立起赞助关系，通过行贿绕过了许多官僚机构中烦冗的手续，在这种双方都受益的情况下，也就没有人会去执行合法的税收政策了。

127

丁（Dinh）是拥有一家小型连锁酒店的越南房地产开发商，他向我描述了一种抢占先机的做法：“在这里经商，想要保持竞争力的唯一方法就是抢先你的竞争对手一步。”我请他详细说明，他解释道：“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先购买土地并开始建设，然后，你再去按部就班地获得所有必要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有时候，你必须得在没有正式文书手续的情况下就动工和开展你的业务。”他继续补充说：“这个市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会奖励那些在没有得到太多保证的情况下就先行一步的人。这就是越南人的行事方式……你必须孤注一掷地把你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做生意，但这并不能保证你最终会获得政府部门的许可。”丁的妻子也补充说：“这是十分冒险

的……但是，如果你一味等着所有正式的文书工作和许可批准都办好，最后可能两年时间都过去了，你还握着一堆现金在那儿干等，赚不到一毛钱。”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早期的投资者，在获得正式许可批准之前就已经建立了他们的业务并开始运营。

抢先交易的做法还意味着，大多数投资者通过向地方当局支付小额贿款而有效地避开了市政税。一家小型餐饮连锁店的业主“海”（Hai）这样解释说：“你要是想到这里投资，只需要开张营业就行了，然后就等着地方当局来检查你的生意。我们开店经营了两年，都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几年之后，（地方当局）才开始注意到我们，此后，他们每个月都会过来这里征收税款。”他这里所说的“税款”是指向他们支付的贿款——每个月 200 美元左右，他支付这笔“税款”是为了避免正式纳税以及因经营不合税规而可能被罚款。

128 圭（Kywe）是缅甸一家小型家具厂的老板，他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这个国家，没有人会在有机会测试自己的生意点子是否能成功之前就正式注册登记他们的业务的。我们开了这家家具厂，开始生产和销售我们的产品。我们觉得，只要我们的规模还小得不足以引起政府当局的关注，他们就不会管我们。”对于新创立的企业或者那些规模特别小的企业，主要策略就是努力避开与税务部门的官员打交道，只要小企业不被当局注意到，他们就能够有效地逃税。

然而，其他领域的公司几乎不可能向当局隐瞒，因为他们还需要当局给盖章和办理许可证。例如，一家从海外进口卫浴产品的公司老板贾森（Jason）就表示：“在业务发展初期，你只需要贿赂海关当局，他们便会让你的产品通过海关。即便你想缴纳关税并且一切都按规章制度来做，你也承受不起，因为这会花费太长时间，而且，你的产品会一直被卡在自由港。”虽然逃税被认为是一种常见的税务策略，但贾森也阐明了其他一些问题，比如必须应对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在这种官僚机构中，地方官僚（在本例的情况下是指海

关官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试图合规纳税并不是一种可选项,因为这会减慢他们的日常业务运营。

那些会提交年度税务报表的早期投资者,通常会采用创造性的审计做账来逃税。其中的一种做法就是做生意时使用多套“账簿”,这些“账簿”在审计做账时造了假。厄尔(Earl)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一名会计师,他强调了做假账的模式:

许多越南私营企业确实有两套审计账簿……我见过账簿最多的一家公司有五套。他们有一套账簿是专门给税务局看的,另一套是他们可以给自己的投资者展示的,可能他们还有一套留给自己看的账簿。有个人还说,他给他妻子另外准备了一套账簿,另一个人则说,他给他的合伙人准备了另一套账簿,所以做多套账簿是常见的做法。每个人都有两三套账簿,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你就必须要使用两三套账簿。

仁是越南当地人,他经营的是一家专门从事食品和饮料行业的家族企业,也是他把我介绍给了厄尔。在一次采访中,仁向我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公司会有多套账簿。他们公司有一套账簿用于自己内部审计,另一套供税务机关查看,还有一套供其投资者使用。这样做的原因是,像他们这样的私营企业在早期阶段“将很多(他们的)个人开支与公司业务混在了一起”,这在家族企业中尤为常见。仁这样为多套账簿辩护:“在越南,如果你缴纳了15%、20%和30%的税,而你的竞争对手却没有纳税,那么,你势必很难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

武(Vu)是当地一家家族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在一次采访中,他还向我描述了他通过逃税策略来抢先于竞争对手的具体过程。他向我解释说,“所有审计其实都可以被操纵和利用”,能够保留住更

多的资金并将其重新用于投资的人，势必会比他们的商业竞争对手具有更明显的优势。作为当地一家家族企业的管理者，武意识到：“第一个手握现金的人会跑得比较快……拥有现金对我们企业的长期增长和战略计划都很重要。要是你被税务给套牢了，你手头就没有流动资金可用了。”

丁、伟、贾森、仁和武在向我说明他们“事后理性化”（*post-hoc rationalization*）的解释时都非常坦率，阐明了他们在自己的业务刚起步时如何采取逃税策略。在这些监管结构薄弱的市场中，纳税人对于税收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即与市场没有缴纳相同税额的竞争对手相比，纳税会导致他们赔钱。对他们来说，这关乎到可以将原本应该纳税的钱用于再投资，转化为公司的投资回报。正如仁所说，这笔税款转换后的利润率大致在15%—30%。

我询问那些明确表示有逃税行为的投资者是否会考虑聘请会计师来帮助他们“合法”避税，但他们都表示，聘请金融专业人士来帮公司做这项工作的成本太高。魁（Khoi）是越南一家食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向我解释说，小型家族企业无法“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来帮他们合法避税”。雇用他们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贿赂税务人员的花费。专门从事合法规避税务的会计师事务所通常会“为其提供的服务收取5万美元至10万美元的费用。谁会有那么多钱呢？”仁继续告诉我说：“当地的会计师事务所能做同样的工作，他们还与政府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因为这是越南当地人互相打交道，他们会以越南人的方式来行事。”与其他受访者相比，魁最为直接，他直言不讳地跟我说，他的公司采取的是逃税而非避税的做法。虽然逃税会让他们面临更大的风险，但他们根本无力负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专业服务，因此也就没办法让他们来合法地为其公司减轻税务负担。正如魁所说，逃税比合法避税更加划算。

那些想要遵守税法或者想要避免与地方当局发展和维持贿赂关

系的小企业家，也会发现这么做其实特别麻烦，因为地方官僚手握权力，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来解释法律。逃税非常普遍，以至于有几个受访者甚至还表示，想要合法纳税对他们来说才特别不容易。娥（Nga）是一家生产家具组装小零件的小工厂的首席财务官，她这样向我解释：

金（伯莉），这个地方真是太腐败了。我从一开始就不想行贿，因为我想做个合法纳税的负责任的人。我想要晚上能睡个好觉。但是，我去税务局填写了税务文件，他们一直把文件滞留在桌子上，不给我办理。他们也拒绝告诉我，我填错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事，就因为我不向他们行贿。但我（当时）就很固执，我只是枯坐在那里干等着，最后才不得不回去。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体重蹭蹭地往下掉，我觉得这根本不值得，因为太浪费我的时间了，我本可以待在我的工厂的。我冲着他们大喊大叫说：“我去你大爷的……一个个真他妈的蠢透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总是穷得要命……人们想要缴纳税款却不能！”

当娥苦笑着向我表达她的担忧时，我能看到她沮丧的神情，也能听出她双手举起示意她已经放弃了要合法纳税时语调中的愤怒。尽管在这种市场情况下，纳税的动力并不多，而且当局对不纳税的制裁似乎也比较少，但娥还是想承担起纳税人的责任，这样一来，她就可以用清晰的不涉贿的税务策略来吸引投资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缴纳税款并成为一位守法公民，远比简单地行贿并继续推进业务要更加耗时且手续烦琐。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逃税是一种策略，还不如说它是国家官僚机构效率低下的结果。

国家官僚机构办事不规范导致个体企业主在这个国家的纳税方

式存在众多差异。在越南的许多家族企业中，很少有人提到他们遵循某个协议或明确的程序来缴纳税款。事实上，他们都向我描述了这样一个制度系统：书面法条与实践中的法律条款是两相脱节的。奎是一位越南房地产开发商，他这样阐述这个税收迷宫：

你得知道，在越南，法律（luật）和先例（lệ）是两码事。每个人都知道法律是什么。这很清楚，也不难查找到法条。但在这里，重要的是先例，（那）可能会关乎 10%—15% 的税费差异。这就是为什么你有时候得去贿赂他们，以便获得正确的纳税税率。

越南的国家税收法规缺少公开透明性，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早期企业家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与政府官员和那些掌握了政治资本的人社交联络和斡旋游说，以确保他们能得到税收优惠，
131 并防止后续发生意外状况。从官僚的角度来看，强迫她去行贿也更加有效和实际，因为这能让他们捞到一点儿好处，毕竟，这个国家也没太大能力来支付使政府工作人员维持体面生活的工资。但正如奎所说，没有哪两次行贿打款是完全相同的。为了提高透明度并更有效地避免逃税，公司就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专业化运作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他们会逐渐从逃税的做法转向避税的策略。

避税

随着当地家族企业成长壮大并盈利，其管理者经常也会考虑如何在保护他们资产的同时，通过合资企业来扩大他们的业务。对许多企业来说，与外国投资者组建合资企业的部分吸引力在于，投资者会给他们带来与专业化运作相关的发展战略和专业知识。一旦一

家公司通过外国投资者的私募股权配售发展到足够壮大，那他们就有动力去聘请一支由律师、审计师和金融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来帮他们建立起跨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合法避税结构。然而，这种走向专业化运作的道路也伴随着更高的成本，得能从具有全球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中聘请到专业的会计师并能留住他们。

我努力想弄清楚“专业化运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一过程中，我得到了一位越南当地女性黎安（LeAnn）的帮助。黎安打理着一家经营化妆品和医疗保健业务的家族企业，她向我解释说，专业化运作的阶段通常都与家族企业的继任计划齐头并进——它出现在父母把家族生意交给他们的孩子来接管打理之际。但是，想要专业化运作的年轻一代，与他们的父母之间往往也存在代沟。她解释说，父母辈“通常不信任外国的投资者，他们还担心专业化运作会带来不必要的开销”。黎安的父母有着成功的发家史，这与他们理解越南的行事方式——要与地方当局搞好关系——有莫大关系。这些交好关系是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黎安的父母那一代人都不想改变。

但对于黎安这一代人来说，“改变是我们生存的关键”。她希望企业能够吸引到外国资本，使他们将分销点扩展到胡志明市和越南南部以外，可以在全国其他地区开设更多的店面。为此，他们就需要合作伙伴和资金来扩大企业。这些合作伙伴希望他们能够建立更好的税收结构，以便他们利用合法的跨境避税优势。

黎安所描述的代际紧张关系，道出了逃税结构和避税结构之间紧张关系的核心所在。黎安的父母通过有效地与当地税务机关搞好关系来开展业务，并且，他们对当地市场也有着深入的了解。然而，如果要按照黎安所设想的方式来壮大他们的家族企业，就需要吸引外国投资者。为了吸引高净值人士来注资并扩大他们的资本网络，家族企业就需要通过建立合法的跨境税务结构来实现专业化运作。

然而，这一运作过程对当地的父母来说往往是陌生的，因此他们需要大量的信任并反复权衡继任计划，才会让下一代来掌权整个家族企业。在税务问题上，我后来又采访了黎安3次，好让她阐明他们将会如何制定策略来发展家族业务并继续保持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她便开始向我阐述她对逃税和避税之间区别的看法。

从她的角度来看，在公众视野中知名度更高并且盈利的公司会吸引更多来自税务机关的随机走访，税务官员会伺机敲诈勒索以便获得更高额的贿款。在那个阶段，他们必须学会转变，得从一家努力成长的小公司转变成一家有声望的成熟企业，还得寻求创新的方法“来保护我们赚到的钱财，而不仅仅是急于去赚更多的钱”。黎安向她的父母解释：“一种方式（逃税）是非法的……每当地方官员来审计核查我们的账簿时，都要用喝茶钱来贿赂他们……但也还有一种合法的方式，它就叫避税。”专门聘请的咨询团队帮助他们企业建立了具有合法减免税收的结构。这一点对于吸引外资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外国投资者更想确切地知道税负将会如何影响他们投资的整体收益。

对于黎安来说，问题即在于：我们想花时间与谁建立关系？这关乎在地方税务机关官员和专业会计师之间做选择。虽然她父母很乐意与税务机关打交道，对处理多套账簿也没有感到不适，但黎安认为，重要的是与会计师建立关系，要足够信任会计师并向他们展示家族企业的账簿，因为会计师可以帮助他们以特定方式来操纵税收结构，而这将会保护他们的更多资产。他们会通过与其他公司合作来做到这一点，合作公司是她的人脉关系网中其他克服了类似障碍的人所推荐的。像黎安经营的这类公司，经常需要制定复杂的纳税方案，该方案既要符合税务要求，又不能引起税务机关的高度警觉。他们必须制定出一个长年发展规划，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增长和壮大。通过与外国合作伙伴合作并使用离岸法律结构来保护

其资产，本地公司就从灰色交易中的深灰地带走向了浅灰地带，同时也分散了一些相关的风险。黎安这里所描述的，是一种通过往返交易投资模式来吸引外国投资者来该国投资的免税政策，以此来达到合法避税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避税的方法是利用旨在吸引外商投资的一些法律漏洞。

133

秀（Tu）是一名当地税务顾问，他以一种更细致入微的方式向我阐明了越南和缅甸的避税情况：

缅甸就像是 15 年前的越南。缅甸没有避税法规，而越南也是直到 2017 年才通过了正式的避税法规。在此之前进入该市场的人比法律抢先了两步，而且还避免了纳税。但是（在 2014 年），（越南）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查逃税情况，并责令 720 家公司为其逃税行为补缴税款。所以，我们会告诉客户，如果他们想避免遇到这些麻烦，就必须要进行专业化运作。当你的企业规模很小时，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但是，当你发展壮大后，有了很多员工，情况可就不同了，这时候你就无法隐藏、逃税了。

我对秀和其他许多人的访谈都揭示了从逃税到避税相关的灰色地带。正如秀所说，越南政府直到 2014 年才开始关注避税问题，而缅甸随越南之后，直到 2017 年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然而，随着家族企业由小做大，它们面临着抽查和补税的各种风险。不管他们是故意要逃税，还是真的没搞懂复杂的法律条款，但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意识到需要通过专业化运作来转移一些风险。

西方国家的投资者希望尽可能远离灰色地带的经营活动，这也不仅是指“加快手续办理的钱”——为了让当地官员处理证明他们符合税收规定的文件而支付的小额款项。那些寻找法律和声誉风险

较低项目的投资者，通常会等其他人帮助这些本地公司开始专业化运作之后才会准备对他们投资。

我在越南当地开展研究的这段时间里，我频繁地看到他们与来自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投资者达成交易。这些区域的投资者更愿意与在灰色地带游走的公司打交道，并帮助他们转型为专业化运作的公司。他们在心里会将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投资者当作他们退出这个市场的策略。阿努拉（Anurak）是一名来自泰国的投资者，他在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134 他即将与当地一家经营食品饮料行业的家族企业达成交易。他这样向我解释道：

越南就像 15 年前的泰国，一切都是不可预测的，这也很令人兴奋。这是一个不同的前沿市场。每次政府换届，商界领袖都得观望，看看上任后的新官员将会如何处理营业执照、检查和税收……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国际竞争进入，这些本地公司需要成长起来。如果他们真的想走在前面或是跟上市场的经济曲线，那么，他们就不能再仅仅依靠国内的资金来源了。这时便是你有机会进入市场并提供外部资本——例如私募股权——的时候。

然而，至此，一群渴望开拓新前沿领域的外国投资者还只是成功了一半。在境内，他们还需要想办法说服不情愿的当地公司与外国投资者坦诚对话。这就意味着，当地公司不仅愿意与他人分享公司业务的账簿，而且还必须制订一套明确的策略来支付所得税和商业税。

在境内融资构成挑战的情况下，对有志于做大做强的本地公司而言，就必须考虑要不要采用一种新的股权结构并权衡其成本和收

益。外国合作伙伴给他们带来了一个由专家和各类人脉关系组成的社交网络，这对于帮助当地合作伙伴建立离岸结构至关重要，而这些结构对于跨多个主权国家利用多种税法又很关键。在从普遍的逃税策略过渡到避税策略的过程中，外国投资者及其当地合作伙伴都经历了一个密切合作的过程，涉及大量的关系工作，这样才能确保他们能最终达成一致。⁶阿努拉跟我解释了这一阶段会遇到的挑战：“我们意识到，不能揠苗助长、急于求成。这就好比，你总不能强迫一个5岁的孩童像成熟的18岁成年人那样行事一样。对于在灰色地带游走，我们并无不适，也乐于处理家族企业中的一些复杂安排。”

与此同时，阿努拉还跟我解释说，他们的附加价值其实是在国际层面建立正规的（企业）管理结构的专业技能。这很重要，因为这使他们的本地合作伙伴能够扩展业务网络并与国际接轨，建立起重要的联系，以便能够优化财务和业务运营。为此，他们制订了一项计划，打算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增加收入，从而也能使当地公司符合纳税法规。“审计做账时，你总不能从每年都亏损的财务状况，一下子变成盈利100万美元吧。那对审计员来说，无异于强人所难！”他解释道。

阿努拉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他愿意投入时间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信任关系，对此，他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文化熟悉度，并且也感到舒适。他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家族企业的董事会结构中会混有家族企业成员和专业领域人士。事实上，这个阶段会是最痛苦的成长阶段。在专业化运作的过程中，风险就会在本地公司、外国投资者和为公司提供交易咨询以使其符合税务规定的审计公司等多方之间被稀释和分担。对于所有外国投资者来说，这是投资风险最高的一个阶段，因为这一阶段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比如，不同的官员会对同一个法律条款有着不同的解释，投资者在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信任关系时也有许多工作要做。

对于来自新加坡的投资者克拉伦斯（Clarence）而言，目标是与当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并帮助它们实现专业化运作，然后再退出市场，将其投资转给注资规模更大的其他投资者。在投资者与当地合作伙伴签订合同时，外国合作伙伴通常会设立一些关键的目标，要是当地公司没能达成这些关键目标，那他们将会逐渐失去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克拉伦斯继续解释说：

在我们的合资企业中，我们设有一定的目标。我们只有很短的一个过渡期来进入当地市场并聘请一位首席运营官。我们还成立了一个董事会，聘请了一位专业会计师来为公司引进管理账簿所需的技能，并确保我们拥有所有正规的经营许可证。我们还为公司制订了一个发展壮大的计划，大致的想法是让公司从拥有 9 到 10 个店面发展壮大到在全国能有 50 个店面……此外，还要增加我们的业务量和销售额。为了吸引到大投资者，你就必须做好所有这些事情。

在使本地公司专业化运作的过程中，有许多工作都与跟上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有关。随着越南政府努力改善与商业和投资相关的法律架构和体制机构等，外国投资者及其当地合作伙伴就必须在这种环境下实现专业化运作，并且要确保落实在实际业务中。

对于像克拉伦斯这样的投资者来说，越南未来的增长才刚刚起步。随着政府不断努力吸引“更高质量”的外国资本，现在有了很多热切的投资者，他们的财力都十分雄厚，也都希望能接触新的前沿市场，克拉伦斯也希望自己能够驾着这股招商引资的东风，有一番大作为。实际上，外国合伙人的工作就是帮助小型的家族企业进行专业化运作，并使其朝着大型私募股权收购的方向发展。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虽然建立合法的避税结构肯定会

降低与逃税相关的风险，但交易成本也要高昂得多，因此，后期进入市场的投资者势必会错过一些最大最肥美的灰色交易，从而也就错过了巨大的利润（当然，也有可能是潜在的巨大损失）。当仔细思考我所收集到有关人们是如何从逃税策略过渡到避税策略的这些数据时，我忍不住想要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去问问金融专业人士避税的实际方法都有哪些。

避税方法

两种最常见的避税策略是往返交易投资和转让定价模式。越南和缅甸当地的公司也会遵循中国公司所建立的类似结构来进行往返交易，或者也可以用沈伟（Wei Shen）的说法——搭便车（piggybacking）。这就涉及在离岸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或者控股公司，从而使同一家当地公司能够以“外国投资者”的身份在境内再投资这家公司，以此来利用低税收司法管辖区的税收优惠政策。⁷虽然当地公司必须缴纳 20% 的公司税，但如果他们设立了一个离岸实体，他们就可以利用它在境内进行再投资，这种离岸工具会使他们看起来也像是某个外国投资者。除此之外，外国公司和合资企业也会参与一种被他们称为转让定价的交易做法：他们会在公司内部进行交易，这能让他们一方面在境内高税收管辖区登记其资产负债情况，另一方面在离岸的低税收管辖区登记其资产盈利情况。简而言之，他们所做的其实就是充分利用离岸空壳公司，然后为同一家被投资公司在高税收管辖区登记资产负债，而在低税收管辖区登记资产盈利状况。

正如在黎安的案例中被强调的那样，越南和缅甸等国家经常会为外国人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以便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其国内。但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却是以牺牲当地公司的商业利益为代价的。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公司就会进行往返交易，这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外国投资者相同的税收优惠。中国投资者往往会在中国香港或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类似的金融机构，于是，越南和缅甸当地的富豪 / 超级大富豪也纷纷效仿，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列支敦士登等其他避税天堂设立离岸公司。离岸注册的公司主要用于暂时持有在越南和缅甸所获得的投资利润，然后再将这些利润在这两国的境内市场重新投资。⁸

137 通过往返交易模式，离岸控股公司就成了一种金融工程形式，其本质是将一家境内公司重新包装为一家离岸公司，以便利用离岸司法管辖区较低的税收政策。在这种金融结构的设置中，那些拥有离岸结构的本地公司“只需要对（本地）运营公司的股息分红缴纳预扣税就行了”。⁹ 重要的一点是，“‘往返投资’模式反映了当地商界的偏好和担忧，人们偏向于将当地公司‘包装’成外国投资公司，并担心政府可能会对本国居民施加外汇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往返投资’模式……主要受本地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税收存在差别对待以及避税的不同理念驱动”。¹⁰ 与中国的许多投资者一样，越南和缅甸的本地投资者采用往返投资模式来获得税收减免和税收优惠待遇。于是，这种模式便极大地驱动了本地公司将他们的本地资本网络连接到的在离岸设立的更大资本网络中来。

越南当地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林（Liem）在接受我的一次采访时，这样向我解释：

这些法律的制定方式使得外国公司比当地公司更具有优势，因为他们缴纳的税款会更少。特殊目的公司是外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的最常见的结构，用来对越南境内进行直接投资。在中国（他提到了一篇新闻报道），“特殊目的公司是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外——通常是在中国香港，或是其他一些据说享有显著税收

优势并与中国签订了有利税收协定的地方——设立的控股公司，其特殊目的便是持有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同理，越南与中国香港之间存在双重征税协定，因此，预扣税率从 20% 降到了 5%。虽然中国的税务机关已经开始监管离岸股权交易，但是，越南、柬埔寨和缅甸等国家还尚未赶上其监管步伐。我们只比监管机构抢先一两步。

林这里所描述的就是通过“往返交易”来避税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例如越南）的资金流向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国香港或新加坡），并再次作为对本国（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而返回本国市场。这种策略让本地投资者获得了一些税收优惠，因为在再次投资之前，他们不过是将资金暂时存放在了中国香港或新加坡，但他们却可以享受到明显较低的税率。投资者和金融专业人士在提到“往返投资”时几乎总是会引用中国作为他们遵循的榜样。这并不是当地投资者、会计师或律师所发明的模式，而是该地区内较发达国家已经建立好的一种模式，它基于很多的案例研究和新闻报道之上。

138

在我与许多利益相关者讨论避税问题时，几乎每个人都强调这种做法合乎法规。在越南和缅甸都有投资的越南商人“明”（Minh）这样说：

从法律角度来讲，所有这一切都是法律的灰色地带。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税务结构策略在技术上而言就是合法的。苹果公司（Apple）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爱尔兰审计了税收（或资本盈利情况）。这对美国监管机构来说可能是灰色交易活动，但在爱尔兰，这却是干净的，非常清白。在这里也是如此。没有机构监管此事，因此，我们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这里的

关键是，要知道如何让法律的解释对你有利。

苹果公司和其他公司都使用了这一策略，这个事实表明，避税在全世界也都是一种普遍的商业做法。律师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例如，在我对成（Thanh）律师——他曾在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担任内部法律顾问——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向我解释了避税的过程：“你在这里看到的情况，和你在中国香港以及印度—毛里求斯等地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我们通常会利用这些案例研究进行风险评估。越南政府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但他们并没有严惩这种行为，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将会触碰到越南经济发展的底线。如果政府想吸引外资，那他们就必须让这个国家也经历印度和中国曾经经历的经济增长阵痛。”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避税结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取缔这些结构会阻碍外国投资者，也会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动产生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对这些避税活动视而不见的话，则会导致税收流失，从而造成国家在收入上的重大损失。

我让成律师用专业的法律术语向我说明什么是特殊目的公司，他告诉我，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是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其用途比较有限。出于法律和税务原因，空壳公司实体会与创办人或母公司分开，并且，它也可以合法地由多家公司来共同控制。它有着多种用途，第一个用途是，它通过将自己与母公司隔离开从而分散风险，因此，欠税或破产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投资。这些实体公司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摊风险，这样一来，公司就可以将诸多风险都集中在一个特殊目的公司中，并将其证券化（securitize）以便筹集资金或获得融资。

我试探性地问成律师，特殊目的公司分散风险的能力究竟如何。他向我解释说，特殊目的公司会将每一项投资都单独放在一个工具

公司中，这样一来，如果有一项投资需要补缴税款，国家是不能从其他投资所获得的收入中直接收取的。特殊目的公司有效地保护了公司的资产和其他一些投资。他解释说：“如果发生诉讼，索赔人也只能对这个公司实体中的所有东西设置留置权，但他们不能合法地接触到其他的资产。”在新兴的前沿市场中，各种形式的贿赂是做生意时的家常便饭，而特殊目的公司便在资本的蛛网中创建了一个隔离层，这使得国家官员和商业伙伴都很难找出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究竟把他们的钱或流动资产放在了哪里。

139

特殊目的公司还有助于合资企业中的本地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联合分担风险，因为它在投资资产和所有其他资产之间建立了一道法律屏障，所以投资者可以将一项投资的相关风险与其他投资分隔开来。

外国投资者或外国投资公司也会通过转让定价来避税，最简单的形式便是一种审计方法：跨国公司中的一个部门向同一家公司的另一家子公司收取商品和服务费用，以便能在司法管辖区之间分配利润。像苹果、星巴克（Starbucks）和菲亚特（Fiat）等大型跨国公司经常被人援引来作为转让定价的典型案列。大公司经常利用“转让定价规则中的漏洞，并通过对其进行创造性解释来人为地将公司的利润转移到税收较低或税收优惠政策更好的国家去”。¹¹ 例如，《福布斯》杂志前撰稿人霍华德·格莱克曼（Howard Gleckman）解释说：“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它所有产品的价值几乎都在它的专利和知识产权。”因此，苹果公司所做的便是在爱尔兰——一个低税收司法管辖区——设立两个实体，然后，公司再将其税前全球收入的三分之二集中转移到爱尔兰。¹² 换句话说，同一家公司的不同部门之间相互交易，并通过跨境转移公司内部的成本以达到避税的目的。公司在税率较低的司法管辖区为其商品和服务登记利润，并且有效地避免了跨国交易中对其商品和服

务征收的关税。

在税务规划领域，转让定价是会计、经济学和法学学者重点研究的一个主题，它一般被视为是跨国公司用来减少全球税收的一种简化策略。¹³ 经济学家发现的大量证据表明，“公司会在受控集团内部的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安排财务和公司内部的销售额流动，以便将在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的应纳税收入重新分配到在低税率国家的其他子公司中去”。¹⁴

140 然而，很少有学者去研究前沿市场中的小公司是如何修改和调整这些避税做法的。进入前沿市场的外国投资者都深知，当地政府尚无监管这些避税做法的能力。由于国家监管结构薄弱，金融专业人士和会计师会花费大量时间来向投资者提供建议，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构建税务结构以便利用这些监管漏洞。吴觉（Kyaw Oo）是缅甸当地一位拥有多元化投资组合的投资者，在我对他的采访中，他跟我解释说，在缅甸，由于政府官员对转让定价的运作方式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他们依赖商业界人士来向他们解释和报告自己的税务政策。“这次会议，你就坐我旁边，”他对我说，“到时候，你就会看到，会议演讲台上的的是商界领袖，而观众席上则坐着政府官员，这些官员还会问商界领袖国家应该如何来监管他们呢！”

吴觉意识到，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当地业务的不断增长，他们将不得不聘请全球会计专家来为他们的税务策略提供建议，从而实现公司业务的专业化运作。正是全球顾问帮助他们解释了为什么“离岸经营”会“节省一大笔钱”。吴先生强调说：“这不是我们国家发明的。”这些做法是从美国和中国的大公司那里借鉴来的，它们的国家现在已经开始监管这些做法了，但目前的前沿市场还缺乏这种监管能力。

吴觉所阐述的是一个专业化运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专业人士会帮助这个资本蛛网编织出新的部分，并会

将蛛网从前沿市场扩展到离岸中心。对吴觉来说，重要的是，要在缅甸政府还没有能力监管这些投资活动时，利用好这些税收漏洞。不过，他预计，总有一天缅甸政府也会效仿其他国家，开始严厉打击这些避税做法。他说道：

缅甸政府早晚会效仿美国、中国和印度的做法，严厉打击转让定价的避税策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现在，政府还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得让公司有机会来发展壮大，只有当公司发展足够壮大时，那才会是一个能摆在台面上来讨论的问题。我与政府官员有过多次对话，我总是跟他们说，你们起码得先让公司发展壮大吧，然后你们才能开始对它们征税。如果你们希望公司资产能从 100 万美元发展到 500 万美元，再到 5000 万美元的话，那么，我们还需要时间和税收优惠来保持这种增长势头，直到做大做强。

这里的基本前提是，只要境内的本土公司能够保持增长，它们就能以更好的条件来吸引华尔街的投资人——也就是说，是从实力出发吸引外资，而不是迫切而绝望地招揽外资。这个例子说明，一些资本蜘蛛在将它们的蛛网连接到更大的全球资本蛛网之前，会先驻扎在新兴的前沿市场，然后开始吐丝编织一些较小的资本蛛网。因此，富豪 / 超级大富豪会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从世界的多个角落

141

编织这些复杂的资本蛛网。

这些资本蛛网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高度专业化的从属型蜘蛛，他们正是通过分工协作、编织蛛网中他们独特的那部分而完成了大部分的蛛网构建工作。例如，温（Win）是缅甸一家大公司的会计师，他向我说明了他是如何为一群客户提建议的，这些客户都已经赚到了钱，并正在寻找能在海外保护他们资产的方法。他解释说：

我们会给他们建议三种方法：第一种保护策略与税务有关，也就是建立各种税务结构，从而使人们可以通过合法手段来保住更多的资金。第二种方法是告诉他们如何将他们的资产存储在更加安全的地区。比如，拥有一家新加坡公司会让他们感到更加安全，因为他们经历过动荡时期，那时候，政府会随意没收人们的资产。我们给出的第三种建议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来预测未来的变化。这意味着，我们会密切跟进政府在税法 and 政策方面的最新动态。

我和温之间的谈话也呼应了吴觉的大部分观点。缅甸等前沿和新兴市场尚未制定相关政策来监管跨境税务结构。正如我们所见，遵照前述大公司在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商业运作案例，当地公司也在低税收国家设立了离岸结构来登记他们的税务。但是，这种结构设置也允许他们将资金暂时存放在他们认为在政治上更加稳定和安全的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也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企业最终必然会发展壮大；随着国家制定法律来执行有关转让定价方面的法规，他们最终也不得不转变税务策略，并且发展到有能力遵守国家税收法规的境地。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些投资者得有能力聘请一支由律师和税务会计师组成的团队，以确保他们了解最新的税法，这样他们才不至于在技术层面上违反任何法律。

这些与被采访者的对话都表明，在很大程度上，转让定价策略在实践中与逃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逃税策略中，较小的公司会做出一套、两套、三套甚至是五套不同的公司账簿。而在法律上更为复杂的转让定价模式中，母公司会向外国的子公司收取它提供的“服务”费，并使用公司的内部账簿在他们的各个子公司之间分摊开销。对于大公司来说，这种做法还包括向他们自己的子公司收取专利费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知识产权费，而那些较小的公司则会向

自己的子公司收取海外投资项目的“咨询服务费、特许权使用费和服务费”等。此外，较小的国家尚未采用全球统一的独立交易价格（arm's-length prices）标准——这是为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而共同商定的国际统一标价。因此，在法律功能上，转让定价其实就相当于另类的逃税模式。

142

对建立税收确定性的渴望

2017年，越南政府开始实施新法令，以遏制根据2017年“第20号法令”（No. 20/2017/ND-CP）¹⁵所定义的合法避税策略。在越南，几大主要的会计师事务所都发布了有关这一新法令会造成什么影响的最新消息。¹⁶根据越南的这项新法令，纳税人必须记录和保存好提交给税务机关的文件，包括有关企业机构及其关联方的一般信息、企业机构的交易以及独立交易价格的计算方法——或者又叫公司内部服务的真实市值价格。¹⁷这项新法令有效地使国家与商人直接对话，协商和谈判如何正确计算境内的独立交易价格。

随着政策的转变，政府现在要调查转让定价的做法了，会计师事务所便利用这一时机来为投资者提供旨在提高税收确定性的各类服务。在接受越南网络电视台（VITV）采访时，约瑟夫·武（Joseph Vu）还在普华永道工作（现在则在毕马威工作）。武表示：“‘第20号法令’是越南在转让定价管理方面的一个里程碑。它也与越南的经济形势、发展和投资趋势保持了一致。”¹⁸税收确定性的目标包括维持离岸的合法避税结构，同时要在境内就可接受的转让定价与国家官员达成一致协定。例如，凯文（Kevin）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审计师，在越南，他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工作，他向我阐述了他的公司是如何从全国200人发展壮大到1200多人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帮助当地公司建立税务系统，这

些系统会“按照劳动法支付相应的员工税”并制定反贿赂和反腐败政策，这就使其更加接近税收确定性的策略。尽管该国经历了成长和发展的阵痛，但税收确定性仍然是人们所期许的。

143 能够为投资者提供一定程度税收确定性的审计公司也最能够吸引到国外最优秀的投资者，因为所有人都害怕被追缴税款。正如凯文所说，专业审计公司通过利用新法令来为客户提供建议而不断发展壮大，那些客户都希望能够避免与转让定价策略有关的高额税费和罚款。审计公司经常会给他们的客户提建议，比如，纳税人应该实时了解法令和政策的变化来追求税收确定性。¹⁹与此同时，在前沿市场中，避税和税收确定性策略之间的界限仍然十分模糊。没有哪个专业审计公司可以提供完全的税收确定性。然而，随着政府继续制定新法律，审计公司可以利用一些已经在西方、中国和印度开发好的类似工具，通过公平定价机制来帮公司设定价格。

我还跟进了其他几位投资者，以便了解新法令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投资策略。隆（Long）是一家物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这样说道：

十年前，也就是在 2006 年和 2007 年的牛仔时代，没有人知道什么是转让定价。现在，这个国家发展得如此迅速，你已经开始看到数额比以往大得多的交易了。泰国投资者和美国投资者都带着超过 1 亿美元的资金入场。有一家泰国公司向（当地的一家）公司投资了 11 亿美元。这些新闻报道随处可见。

他解释说，被报道后的可见性肯定会使该交易受到税务监管机构的特别关注，而公司在进行高度公开可见的交易时，越南的有关部门必然更加严格的执行针对转让定价的法令。小公司还需要时间才能赶上大公司的发展，政府也知道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来适应这些

新法令，但政府也意识到，他们需要制定更加清晰明确的税务规则，而不能让税法沦为当地官僚任意解释的工具。

隆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首先，较小的公司通常觉得，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发展他们经营的业务，因为他们还没做成能够立即引起政府注意的大交易。不过，隆也充分意识到，他的公司以及其他人的公司都必须经历转型，以便能跟上越南监管机构的变化。其次，在一个正在经历快速经济转型的国家中，为了不落人后，隆已经听取了有关新法令的情况介绍。本地企业必须要转型发展，聘请会计师团队来帮助他们建立审计系统、记录好转让定价的做法，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追求税收确定性方面符合新法令的要求。最终，迈向更高水平的税收确定性也将会使公司发展壮大，并能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正如隆所说：“每个寻求退出市场的私募股权公司，都必须有完备的缴税记录。税务是对一家公司风险评估的一部分，如果在交易之后还可能被要求补税，那么这家私募股权公司就很难获得高估值。交易后被要求补税简直是所有人的噩梦。相反，那些能提供一定程度的税收确定性的公司，最后将有能力在退出市场时将其投资转手给具有更高竞价能力的投资者。”

144

建立税收确定性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地企业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往往表现为，外国投资者和会计师都想推动本地家族企业进行专业化转型，以便从逃税策略转向避税策略。税收确定性被认为是理想的黄金门票，它能让公司在一众潜在投资者中自由挑选。然而，一些全球性和区域性公司仍然在试探并利用越南税法的局限性，因为它们在税收确定性方面遇到了一些挑战。

在一项广为人知的交易中，本土地区科技运输公司“随走的士”

公司（Grab Taxi）收购了“优步”越南分公司（Uber Vietnam）。然而，这笔交易仍然未能解决好纳税问题。多家越南新闻媒体报道说，胡志明市的税务机关向越南的“随走的士”公司发出请求，要求该公司提供与它最近收购其竞争对手“优步”东南亚公司（Uber Southeast Asia）有关的详细说明。“优步”公司和“随走的士”公司都利用全球离岸结构在荷兰设立了控股公司以及离岸银行账户，它们使越南政府无法执行当地的税法。据称，“优步”公司欠越南政府 230 万美元的税款，但它拒绝偿还这笔债务。“优步”公司声称，根据越南与荷兰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议，230 万美元的税款数字是被过分夸大的。²⁰

与此同时，随走的士公司则声称，230 万美元的债务完全是“优步”公司的责任，所以它拒绝支付“优步”公司的未偿债务。“随走的士”公司这样告诉《越南快报》（*VnExpress*）的一位记者：“这件事是“优步”公司的责任。“随走的士”公司并没有购买“优步”公司在越南的法律实体地位，所以该公司得自行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并与税务部门解决税务相关问题。”²¹ 然而，越南律师商事仲裁委员会中心（Vietnam Lawyers' Commercial Arbitration Center）的主席段文厚（Doan Van Hau）律师表示，“随走的士”公司违反了越南的法律，因为根据法律规定，“随走的士”公司得负责支付“优步”公司所有的欠税。在这个案例中，越南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虽然胡志明市的税务部门也曾要求 5 家当地的商业银行来帮助政府从“优步”公司那里收取未偿欠款，但都未能成功，因为该公司在越南根本就没有开设银行账户。²²

145 两家公司仍然在围绕这一税务纠纷互相扯皮，越南政府与两家科技公司之间的僵局将如何化解，还有待观察。这个公开的例子恰恰表明，虽然许多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能够从法规的加强中有所获利，因为它们有助于促进境内企业的专业化运作，以便吸引超高净值人

士前来投资，但是，朝着税收确定性的转变从来都不是直线发展的。由于公司会尽量避免纳税，地方政府对避税结构的监管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这个案例说明，在政府颁布和实施新法令之后，许多投资者仍使用各种避税方法，在逃税的边缘疯狂试探。这是一场国家和投资者之间的胆小鬼博弈（game of chicken）^{*}，前者在岸，而后者则使用离岸的特殊目的公司并将其资金持有在海外的银行账户中。现在，要想知道企业家们是否真的渴望更高水平的税收确定性，又或者，他们是否会像“优步”公司和“随走的士”公司那样，建立起复杂的资本网络从而在境内达到完全避税，都还为时过早。该案例也表明，在复杂的大型资本蛛网和国家监管机构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在资本蛛网中，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拥有更多可投资资金，而国家监管机构一方面希望能吸引到这些投资资金——这对国家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征收到这些投资在境内产生的税款。

* * *

本章通过蛛网资本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各种税务策略，它揭示了社交蜘蛛——在这里指的是本地和国外的投资者，以及由他们聘请的律师、会计师和公司秘书等——会如何根据投资项目的发展阶段而采用不同的税务策略。²³ 地方政府和境内企业之间玩的是一种猫捉老鼠的税务游戏，小企业会采取逃税策略来非法地将税收负担转化为企业的利润，因为它们负担不起合法的避税策略，而大公司则会建立合法的避税结构，并通过专业化的运作来保护它们的资产。

* 一种挑战游戏，输家就是先认输的人。其中的 chicken 表示“懦夫、胆小鬼”，也即“不要命的最大”，因为游戏中谁先退缩谁就输了，原名可能来自“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然而，没有一家公司的税务策略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致力于吸引区域和国际资本的本地公司，也都会在税务策略上有所变化。蓬勃发展的公司会扩大他们的资本网络，包括聘请专业化的审计公司，这些公司不仅能帮助他们合法地减税或避税，而且也能使他们的公司更加符合专业化的国际标准。本地公司与外国投资者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实现业务增长，但这种增长也会带来一种后果，即媒体关注度会增加，当地的国家税务机关也会加强审查。为了规避这种审查，税务网络就演变得更加复杂了，以便公司能将资产转移到海外，并将负债转移到境内。为了应对此类合法避税现象，当地政府会通过制定政策来扩大他们在境内的征税能力。然而，在前沿市场中，各国政府通常都是在与商界领袖密切协商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以便能在不限制企业经济增长和不影响外国投资的情况下，找出实现征税标准化的最佳方法。

146

正如本章所强调的，税收是市场和政治相互交织的主要领域。在征税的整个过程中，国家行为者通常也都意识到了存在不同程度的逃税、避税和税收确定性策略，因为这是小企业能够成长壮大到足以吸引更大投资的方式，这也能使国家在将来获得更大的税收份额。这里的数据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国家政府及其行政不力方面的洞见，它还让我们了解到，在前沿市场中，各部委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在道德水平方面存在一些差异。越南和缅甸的政府官员和商界领导人都会将他们国家的市场与中国、印度、泰国和其他国家的市场作比较，从而能让自己在市场发展的时间框架中找准位置，以便与其他国家相互学习和竞争。

对加布里埃尔·祖克曼而言，各国的隐藏财富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富豪 / 超级大富豪有办法将他们的大笔资金放在免税国家，从而变相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创收的能力。但是，他的理论框架中还缺少一些必要的说明，即在前沿市场中的税务策略连续体中，

国家和市场都会以哪些方式从这些税务策略中共同受益。这些不同税务策略的核心在于政府官员和私人投资者之间的一种共生关系，他们都从这些盘根错节的税务网络中获利，这就使得这些税收网络更加错综复杂，难以解开。在逃税策略中，国家行为者通过中饱私囊而受益，而私人行为者则减少了他们的税务负担，也因此能将这些本应缴税的钱用于投资，从而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随着公司不断盈利并经历专业化的运作过程，他们便开始利用避税策略来合法地变更其税务所在地。当地企业与外国投资者合作的产物，就是巨大的资本蛛网，外国投资者会聘请高度专业化的会计人员来从事创造性的审计工作，包括将公司财务损失转移到高税收管辖区，并将公司利润登记在低税收管辖区等。由于这些方法都非常复杂而且难以追踪，所以政府官员经常得依靠经济专家来帮助他们制定税收政策。因此，这个资本网络是一个企业也会参与制定规范他们自身的一些政策的系统。

从很多方面来说，逃税和避税在功能上都一样，共同目标都是要将税收负担转化为投资利润。其中关键的区别就在于本地公司是否已经发展壮大。要是本地公司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发展，他们就能负担得起聘请金融专业人士的开销，后者会帮助他们建立起一道合法的保护屏障。通过设立离岸控股公司和离岸银行账户，投资者就使监管和执法能力低下的当地政府更难以执行与转让定价有关的法令。

147

随着政府开始建立一个更大的监管机构来执行这些法令，企业家、会计师和金融专业人士也都会改变他们对外的口径，从之前的避税策略转变到渴望建立税收确定性的策略上来。渴望税收确定性就意味着要和当地的税务机关直接打交道，以便制定双方协商一致的转让定价，这样一来，国家就可以收取一些原本会流失到低税收管辖区的税款。然而，“优步”公司和“随走的士”公司的案例也表明，建立税收确定性与其说是一种被期许的理想，倒不如说是一种现实

考量的结果。虽然这里的研究数据侧重的是前沿市场中的资本网络，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些税务策略都是从世界上最发达的一些经济体所建立好的税务模式中引进的。前沿市场中的这些做法与脸书（Facebook）和苹果等大公司所建立的庞大资本蛛网并无二致，这些大公司也都是这样在全世界各地的复杂资本蛛网中运作的。法律和会计专业是制定各种税务策略的关键，这些税务策略能在一个大型的全球金融生态系统中将前沿市场与发达市场连接起来，这就使得世界上超级富有的那些大富豪能够赚到钱财，并且会一直赚钱。虽然这种赚钱方式最为枯燥乏味，但它无疑也是最行之有效和最为得体的方式，因此，它很少会引起公众的关注或招来审查。²⁴

隐形蛛网中的有罪不罚

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及其从属蜘蛛在境内外进行灰色交易时都能不同程度地逍遥法外，本章将重点研究使这些成为可能的离岸结构。超级大富豪几乎总是拥有多层办事人员和机构，这些人员和机构不仅可以保护超级大富豪远离犯罪和声誉风险，而且在真的发生丑闻时还能充当“落马者”（fall person）。“落马者”就是替罪羊，他们为超级大富豪工作使其变得更加富有，最后通常也会为此而承担责任。

但是，正如我将展示的，即使是“落马者”也很难被追踪到。这是因为，正如财经记者赖特（Wright）和霍普（Hope）在《鲸吞亿万》（*Billion Dollar Whale*）中所写的那样，资金经由“银行账户、离岸公司和其他复杂的金融结构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迷宫”而在世界各地流动，这些结构还利用了独立的尽职调查团队、律师、会计师和公司秘书等。¹在进行更大的交易时，不同部分的金融专业人士各司其职、分工合作，而这种迷宫般的结构就在他们之间建立起各种层级，这就使世界上的超级大富豪得以逍遥法外。一方面，法律网络帮超级大富豪建立起了保护性的屏障，使他们的曝光度大为

降低，因此，他们也就能够更好地被隔离在与非法和道德上令人谴责的活动相关的犯罪风险和声誉风险之外。另一方面，他们的专业人士同伙则会承担将资金投入高风险的前沿市场所涉及的大部分法律和犯罪风险，但这些人也因此而获得高额的报酬。实际上，特殊目的公司使超级大富豪能够将风险分散给他们的高净值人士同伙，与此同时，他们可以在保持高度匿名的情况下转移资金和赚钱，并免受惩罚。

149 马来西亚的金融家刘特佐参与了涉及 120 亿美元的马来西亚公共养老基金抢劫案，关于这点，我在导论中已经详细介绍过。与刘特佐不同的是，我采访的大多数高净值人士都说他们自己是不具名和低调的金融家，他们通过一种“满意原则”（satisficing）* 策略来经营业务，努力保持低调和维持较小的规模，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免受更多惩罚的情况下经营业务，也不会出现在政府监管机构的审查范围内。《鲸吞亿万》的两位作者用大鲸鱼和小鱼来类比刘特佐和他的同伙，但我会使用大蜘蛛和小蜘蛛的类比来指代，并在本研究中捕捉和分析小蜘蛛，也即那些更小、不那么耀眼并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起来的人。需要明确的是，与马来西亚“一马公司”抢劫案的 120 亿美元相比，这群小蜘蛛大体上参与的都是更为常见的一些小型交易，但是，这些交易可能比那些引起轰动和媒体关注的大宗交易更加重要。

本章的目标就是要分析这些庞大资本网络中超级大富豪与高净值人士之间存在的微妙而又显著的差异。在这种庞大蛛网中，超级大富豪用高薪酬来慷慨补偿高净值人士，因为后者充当了他们的替罪羊，承担了在灰色地带游走的犯罪风险和声誉风险。

* 管理学术语，是针对“最优化”原则提出来的，即最优方案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满意度最高的方案。“最优化”的理论假设把决策者作为完全理性的人，以“绝对的理性”为指导，按最优化准则行事。

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超级大富豪的匿名性和有罪不罚

威尔（Will）是一名 42 岁的越南裔德国人，在 2008 年雷曼兄弟（Leman Brothers）公司倒闭之前，他曾在伦敦为雷曼兄弟打理私人银行业务多年。在雷曼银行突然倒闭之后，他取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并搬到新加坡以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失业给他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巨大的冲击，以至于他当即决定，是时候自己独当一面，当一名超级大富豪了，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成为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是资本的打工仔”。对威尔来说，整个金融行业都腐败得很，你要么成为赢家，要么就会沦为输家。在 2008 年以失败者的身份退出西方金融圈之后，威尔就再也不想体验那种巨大的经济不稳定了。

威尔曾是华尔街金融圈的一位“大亨阔佬”（fat cat），在雷曼发展的鼎盛时期，加上年薪和奖金，他的年收入在 50 万—100 万美元。那时，他赚的钱早都已经够他躺平退休了。话虽如此，失去工作还是让威尔隐隐感到不安。他跑到新加坡是因为他从朋友们那里听说，亚洲即将成为下一个投资宝地，有着大把的投资机会。

在我认识他的时候，威尔已经成长为一只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了。凭借他所积累的资产，他想通过参股公司开始直接投资。但是，他不想运营一个没有办公室和员工支持的光杆司令公司（one-man shop），所以，他加入了一个家族办公室——一家为一个或少数几个超级大富豪家庭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私人财富管理公司。在威尔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为他提供跨东南亚地区的独家直接投资渠道。这个家族办公室设立了一项基金，用于在东南亚进行投资，管理资产超过了 1 亿美元。他们还通过担任董事会中的席位来对境内公司进行战略性少数股权投资，并为被投资公司提供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投资团队，团队成员拥有横跨金融、法律、管理咨询和业务发展各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投资的经济部门包括银行业、消费品、教

育、医疗保健、基础设施、科技和电信业等。对于较小的欠发达国家而言，典型的目标投资规模为 500 万—1000 万美元，投资期限一般在 7—10 年，使用的不是纯粹的债务或股权，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私下谈判债务和夹层工具（mezzanine instruments）。夹层交易（mezzanine deal）* 会因每笔交易的不同而不同。

威尔以一种满意原则策略来经营业务——也就是说，他满足于做一只安静的大蜘蛛，不会被贪婪所裹挟，因而不会进入到灰色交易的暗黑色深处，以免引起当地和外国政府官员的注意，而正是这种过分关注导致了刘特佐的落网。

在我们的采访中，威尔提到了马来西亚的“一马公司”丑闻案，他说的第一件事便是，关于金融业，首先要记住的事情就是“贪婪最后总是会压倒信任”：当人们认为银行会在交易中捞到好处时，他们就会把钱交给那些声誉不佳、最不靠谱的一类人。他解释说，银行必须根据其愿意提供服务的人来计算风险，而中间层银行则更有可能接受那些存款金额大到值得他们冒风险的“政治要人”。

关于“一马公司”事件，威尔是这么对我说的：“刘特佐是一个贪婪的自恋狂。你想象一下，如果他能低调点不那么贪婪，止步于 10 亿美元，会如何呢？如果他没有沉迷于那种花花公子式的生活方式，又会如何呢？那他就能侥幸逃脱，因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本来会将债务一笔勾销……以避免发生有损国家声誉的公开丑闻。”然而，有趣的故事并不是被记者大肆报道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案件，而是关于威尔这类人的故事，他们以最低调和最不起眼的方式开展各类交易，他们建立了空壳公司，并且能够在各路记者、

* 夹层交易属于夹层融资，夹层融资是指在风险和回报方面介于债务和股本融资之间的一种融资形式，如同建筑中位于两层楼之间的“夹层”。对于公司和股票推荐人而言，夹层融资通常提供形式非常灵活的较长期融资，这种融资的稀释程度要小于股市，并且能够根据特殊需求来做出调整。

国家官员以及大多数公众的视野之外开展业务。

威尔提醒我，我应该着眼于大局，看看像他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能在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的情况下运作业务。保持低调、保持安静和控制自己的贪欲，是他们得以留在资本游戏场中的关键，因为树大招风，赚得越多的人，也就越有被抓住的风险。威尔将自己描述为一只隐形蜘蛛，而不是像刘特佐那样招摇显摆的大鲸鱼——“贪婪的自恋狂”，他们会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贪欲而被捕。

151

当我问威尔他大约控制了多少个离岸结构时，他告诉我，他已经数不清公司为他们的每项投资设立的离岸结构的数量了。整件事情就像是一个迷宫，除非他能自己坐下来慢慢地画出来，否则，连他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他们的主要基金被置于根西岛（Guernsey），那里没有收入税、州税、公司税或资本利得税。但他们公司的大部分子公司都位于开曼群岛，他们在那里拥有免税权。

与此同时，他们有部分子公司设立在新加坡，并在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境内开展业务。它们在新加坡能够免税，但在越南、柬埔寨和缅甸，都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不过这些税款都很少，因为经由离岸工具分配给越南的资金主要用于支付运营费用，因此不会产生利润。相反，公司利润则会在新加坡入账，他们会根据新加坡的估值出售公司的股票，而这与越南在岸的实际业务运营会区分开来。

此外，他们还在卢森堡创建了一个共同基金，任何想要投资该基金的投资者都必须将资金电汇到卢森堡。除了伊朗等受制裁国家的人以外，任何人都可以投资该项基金。但是，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定，美国的投资者是不能直接投资该基金的；因而，他们必须和银行建立关系，从银行获得一名代理人，再让代理人来代表他们投资。我问威尔，美国投资者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威尔说：“例如，你在美国的嘉信理财集团公司（Charles Schwab）有一笔资金。美国的嘉信理财可以将资金电汇到伦敦，而在伦敦，该银行将

会选出一个‘代理人’。最后，那位代理人就可以将资金用于投资卢森堡的基金。”

威尔向我解释说，每项投资都是由一家独立的控股公司在运营。对于欺诈、盗窃和贿赂行为，尽管他们也尽了最大努力来维护一套明确的道德规范，但通常很难评估他的当地合作伙伴是否完全遵守这些道德规范，而这个问题也一直萦绕在威尔的脑海中。坐在新加坡的他也完全清楚，他在越南和缅甸的当地合作伙伴不得不在他们的合资企业中进行贿赂，但是，他对这种活动也只好视而不见。

152 威尔筹集到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那些发家于东南亚的精英，他对我说：

当然，在越南，有一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新贵。但是，也有不为人知的隐形富豪，他们这群人都很有趣，而且，他们的数量还挺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把钱留在自己的国家。他们会去新加坡，将钱再投资于泰国、缅甸等更加安全的离岸工具中，又或者，他们会带着钱跑路。有许多人（当地的超级大富豪），人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写的都是代理人的名字。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开曼群岛就是做这方面行政工作的，主要负责为此提供便利。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制作文书的工作量，没想到他竟然为这些国家的公司做了那么多的文书工作。曾经，他的主要客户都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现在则是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的公司客户也越来越多了。

威尔告诉我，这些结构都是合法的，它们也是让政府远离其商业事务的一种重要机制。重要的是，威尔任职的家族办公室筹集到的资金不光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他还能够从东南亚兴起的新贵

投资者中间筹集到资金。虽然该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促使海外投资者投资东南亚，但与此同时，它们也通过离岸空壳公司来帮助促成了东南亚地区的很多往返投资交易——让投资者的交易从东南亚地区再返回投资者的母国去。所有这些结构都没有出现在“巴拿马文件”中的任何地方。威尔自己检查过，后来我还试图上网进行搜索，但却找不到任何踪迹。

与此相反，2016 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披露的大规模泄密文件中，的确出现了“用于打点的基金”，这是威尔在越南的当地合作伙伴为贿赂当地政府官员而创建的，关于这点，我还会在本章后面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在我们的采访中，威尔还向我透露，他最近发现自己投资的一家越南公司在 2017 年泄露的“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 中被曝光。该公司实体是金猪集团（Golden Pig Group），是在开曼群岛设立的一家管理基金。他们从香港一家公司服务提供商的办公室里聘请了一名律师，该律师帮助他们在开曼群岛注册了该基金。这项基金有两个相互独立的工具公司，分别是金猪管理有限责任公司（Golden Pig Management Ltd.）和金猪影响力基金（Golden Pig Impact Fund L.P.）。而金猪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股东就是金猪影响力基金公司。金猪集团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行贿的基础，这是一种障眼法。虽然泄露文件中没有关于这一“基金”的任何确凿证据，但威尔还是担心，因为它与当地的中间人之间有关联。以此“基金”为幌子，在境内管理该公司的三名董事都参与了“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并且也“实施了贿赂”。

153

威尔向我解释说，该基金主要服务于两个目的：首先，根据“影

* 指 2017 年 11 月 5 日被曝光的一份财务报告，该报告揭露了数以百计知名公司和个人的离岸资产利益。2017 年 11 月 6 日，苹果和耐克公司等大企业的避税细节也遭到曝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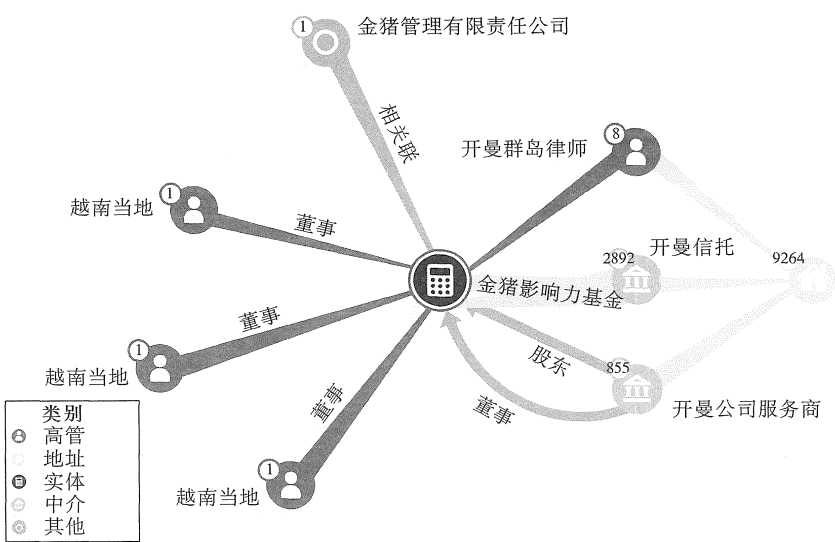
响力投资”的官方授权，投资将被用于那些旨在产生可衡量且有益的社会或环境影响时，还能产生经济回报的公司或组织。其次，该基金还被当作是遮掩给相关基金会“捐款”的面纱，这些基金会实则都与新一届政治领导人所倡导的“社会影响力议题”有关。每当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担任要职、握有权力，这些当地的基金经理都担心自己会因为被抓到洗钱而受到重罚，从而被排挤出该国的市场。为了规避这些罚款，该基金就被用来向中间人和政府官员支付“咨询”费用，以便能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正如威尔所说，整件事情都是“灰色交易”。虽然他们正在投资的公司都是那些据说可以促进该国教育、妇女赋权和人力资本发展的公司，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有多少资金从投资中被抽走了。只要他们能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而且政府官员没有太过贪婪地从基金那里抽走太多，那么这对所有相关方来说就都是双赢的。然而，如果贪婪占据了上风，而当地合作伙伴实际投入到声称要去资助的影响力投资项目中的资金却很少，那么，威尔的团队可能就会面临麻烦。我问威尔，他为该基金筹集了多少资金，他说道：

十个百万（即 1000 万美元）……的规模还很小，小到没人会注意到这支基金的动态。不过，是的，它出现在了（天堂）文件的泄露中，但那些文件根本无法告诉你有关该基金的具体内容，或是了解到它的一些交易流程的详情。这支基金还是这么小的一个小土豆，它无足轻重，我认为，根本不会有人想要去深挖关于它的信息……我们采取的模式就是保持低调和小体量，只要你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就没有人会关心你是怎么做生意的。

对于威尔而言，相较于他为了投资而设立的其他基金来说，“十

个百万”还只是一笔小数目。在我们的采访结束之后，我特意查了一下这支基金的名字，稍微进行了一些深度挖掘，并采用三角验证（triangulating）对比核实。我在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数据库找到了它。（详见图表 5.1）



图表 5.1 金猪集团的离岸投资结构，来源：金伯莉·凯·黄

重要的是，上面提及的复杂结构，与威尔自己或他在新加坡的所有工具公司，都绝对没有任何明显可见的联系。就算是通过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数据库进行搜索，也没有发现任何以威尔的名义注册的实体，或是任何与卢森堡或根西岛的基金有关的东西。此外，所有的官方文件中既找不到威尔的名字，也没有出现他在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的名字，这意味着，他们并没有被列为基金的董事或股东。我查询了金猪影响力基金的董事名单，发现该基金有三名董事和股东，他们都在越南，并且他们的名字也对外公开过。他们都是

高净值人士——威尔称他们为“关系经理”——同样也会在当地充当替罪羊。然而，数据库中除了明确该基金是一个离岸实体外，并未提供任何实质性的信息，我们并不知道与它相关的背后交易。

粗略地看一下这张图，我们只能得知这个网络的结构大致是什么样的；关于各节点之间的关系，它却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实质性内容。这个结构同样没有告诉我们，当前这个网络外部的人员和网络中的内部人员之间是什么关系。换句话说，这些图像只显示了某个网络中的一部分，它没有向我们展示不同的网络实际上是如何相互连接的。作为“资本所有者”的威尔，在这里根本无处可寻。他其实隐匿在一个单独的结构之中，但这个结构甚至都没有出现在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数据库中。对威尔来说，主要风险在于，他的当地合作伙伴可能会从金猪公司揩些油水，抽走基金中的一些资金，但他对此也毫无法律方面的约束力。就算彻底放弃用于行贿的那些基金的控制权，至多也只是做生意的一部分成本而已。威尔将他所有的合法权利都让渡给了高薪的金融专业人士（即高净值人士），从而有效分摊了使用这些工具可能产生的犯罪风险和声誉风险，因为这些工具是为行贿而设立的。令我大为吃惊的是，威尔居然愿意向我透露这一切内幕，他明明很清楚我们的采访内容最终会被我写进一本书里，但他仍然十分自信，认为他不会被人发现，并且能够掩盖好踪迹，因为他是隐匿在一个更大的隐形资本网络中来参与这一切的。

后来，当我遇到更多像威尔这样的人并采访他们时，我常常想知道，他们高薪聘请的那些同伙，又是如何管理他们自己那部分资本蛛网的？他们了解这一切所涉及的风险吗？他们又是如何在境内管理这些关系的呢？我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也研究了一段时间，这促使我想要去采访那些从属蜘蛛，他们遍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越南和缅甸之间的这些资本蛛网中。

从属蜘蛛：作为“落马者”的高净值人士

奥利弗·温（Oliver Win）是一名 38 岁的私人财富经理，他在香港一家联合家族办公室中工作。他的家人原本都住在缅甸，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的政治动荡期间，他们离开了缅甸。虽然我一直不太清楚他的家族真正发家致富的路子是什么，但听起来似乎是，他的家族曾经是缅甸的宝石贸易商，因此累积起了大量的财富，后来，他们在香港转型做制造业，生产塑料制品并出口到世界各地。14 岁时，奥利弗就被送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私立精英寄宿制学校上学，后来从纽约大学毕业，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他形容自己是一名普通的 B 等生，并不能完全适应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界。然而，他父亲隶属于一个秘密社团——一个由香港的百万富翁组成的社会精英团体。于是，通过这层人脉关系，他顺利在香港摩根大通银行找到了一份工作，多年来，他也一直在努力工作，最终成为了该银行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负责人。

对威尔这样的主导大蜘蛛来说，奥利弗只是一只从属小蜘蛛。奥利弗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好一名“关系经理”（relationship manager），这是一个人们常用来称呼他们的头衔，指的是像奥利弗这样与超级大富豪建立并培养关系的人。奥利弗则称那群超级大富豪为“亿万富翁”，这些客户大多来自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他在香港的银行办事处帮他们管理钱财。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他在多起并购交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和他的合伙人也因此赚到了 2500 万美元。大约就在同一时期，他感觉自己好像受到了某种“召唤”，很想要回到缅甸做点什么，因此，他花了一年在缅甸各地旅行，思考他接下来该做点什么投资项目。在他的反思型冒险旅行行将结束之际，他认为，想要做他真正感兴趣的那类大型投资项目，2500 万美元还远远不够，于是，他便开始筹集更多

的资金。奥利弗的目标是，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只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这样他就可以在幕后运筹帷幄，当一名安安静静的董事长，而不必亲自从事在境内投资的这类工作。

为了筹措资金，奥利弗设立了一项离岸基金，这样他就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直接投资资金。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在哪里设立离岸公司最好。他首先研究了一番开曼群岛，因为根据他多年的银行业从业经验，开曼群岛曾是亚洲人经营或所有的公司注册时最受欢迎的司法管辖区。开曼群岛如此受欢迎，是因为这里不征收公司税、资本利得税，对在海外开展业务的公司也不征收财富税。开曼群岛有好几家公司都在全球十大证券市场之一的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² 不过，奥利弗通过与朋友的私下交谈了解到，人们现在开始越来越担心还能否在开曼群岛保持匿名性，由于开曼群岛与美国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关联，它现在与美国监管机构共享的信息也越来越多的。因此，奥利弗便没有选择开曼群岛，他最后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了维尔京资本（VirginCapital），他的几个中国朋友也在那里设立了基金，因为那里采取的是“从不多问”的办事方法。

在奥利弗成立维尔京资本来存放他的新基金之后，他打算再成立一家离岸公司，以便打造一个难以追踪的迷宫结构。他的一位朋友给他介绍了香港的一家公司服务提供商。凑巧的是，在他要去见那家供应商之际，我正好也在香港，我便问奥利弗我能否跟他一起去这家公司的办公室。我们约在香港中央商务区一栋 25 层写字楼的一楼见面。在大楼的一层入口处，我们向接待人员出示了我们的护照，然后才拿到了可以刷电梯的门禁卡，接着通过安检后便来到了大楼的第 10 层。

进入办公楼层后，让我感到大为惊讶的是办公室的整体氛围。这家服务商的办公室只是那层楼内 30 间办公室中的一个，而且它也非常小。接待区很狭窄，一张窄窄的接待台前只有一个人在那里，

等候区的空间也只能勉强放下一张小咖啡桌和两把椅子。奥利弗上前报了名字，五分钟之后，一位名叫比阿特丽斯（Beatrice）的女人便过来接待我们。

比阿特丽斯邀请我们同她一道走去后面的会议室。我们走出接待区，后面就是办公室，我惊讶地发现，办公室里也没有什么迷人之处。那里有五六个开放的办公隔间，但大多数隔间都空空如也。靠后墙边有一排文件柜，挨着墙堆放着成千上万的文件。很显然，文件柜里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文件了，他们甚至已经开始直接把文件堆放在地板上，文件一堆又一堆地叠放着，一直快堆到了天花板，天花板上覆盖着一块巨大的蓝色防水布，好像是专门为了防止天花板漏水滴在文件上。如果说这堆文件是按照某种顺序或逻辑来摆放的话，至少乍看之下我是真没看出来。此外，每张办公桌上也都堆满了文件。办公大楼里还有另外两名员工，他们的办公桌上放着饭盒，他们正一边吃饭一边工作。办公室里亮着荧光白炽灯，会议室里也没有窗户。

157

我们穿过地板上所有这些文件，最后在一个四面都是玻璃的会议室里坐了下来，会议室玻璃外面贴着磨砂的白色窗膜，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被会议室外发生的任何事情干扰。比阿特丽斯递给我们每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关于他们的办公室和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的详细信息。奥利弗向她介绍说，我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教授，目前正在研究外国投资，他本人也是我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之一。奥利弗还告诉她，我是来观察他成立公司的具体流程的。

比阿特丽斯让奥利弗介绍一下他的公司。奥利弗告诉她，他已经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家族办公室，但他还想要设立一些子公司，并希望也仍然能在允许匿名的地方注册这些子公司。关于奥利弗为什么想要在一个允许匿名的司法管辖区注册公司，比阿特丽斯没有问任何问题。她只是告诉奥利弗，美国在“知悉您的

客户”和“尽职调查”等方面制定了一些新的法规,根据这些新法规,所有持有营业执照的注册代理人都必须要知道他们的客户是谁,并需要提供能证明客户身份和地址的相关文件。因此,在完全匿名的情况下购置一家离岸公司,在法律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客户的个人信息仅会保留在注册代理人处,而不会被归档在任何公共记录中。由于这些新规定,这家公司已经不再接受美国客户,因为相比其他国家政府,美国政府更有可能要求公司服务提供商向他们提供这些客户信息。由于奥利弗并不持有美国护照,这就不成问题。

158 接着,比阿特丽斯继续介绍他们公司提供的不同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提供一个“公司套餐”(company pack),罗列出全球可注册离岸公司的地方,并比较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优缺点,例如,比较萨摩亚和塞舌尔提供的服务有什么差异。除了提供所有注册文件和政府办公费用外,他们还能提供“隐私套餐”(privacy pack),其中会包含一名指定的专业董事和股东,以及一个离岸银行账户。接着,她继续向奥利弗推销萨摩亚,说它是一个新的离岸目的地,也是世界上功能最全面的司法管辖区之一,奥利弗可以在这里成立一家离岸公司。况且,选在萨摩亚也更加便宜,只需要900美元,她的公司就可以在香港办事处为他提供公司秘书服务,他们可以在香港办理好与成立一家公司有关的所有文书工作。这笔费用还包括:注册办公地址、注册代理服务、公司秘书维护工作、公司成立时需按规缴纳的所有政府办公费用、公司注册证书、公司备忘录和章程、任命第一任董事、董事会同意行动书、股权证书、董事和成员的登记,以及办理公司印章的费用。一个人就可以建立这一整个金融结构。

然后,奥利弗问比阿特丽斯,她是否能提供一份公司名备选清单,于是她就起身去拿名单了。她一走出办公室,奥利弗就对我说:“其实,我已经想好了一个公司名,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应该

看看他们提供的公司名——它们真是有趣极了。”当比阿特丽斯把带回来的名单给奥利弗看时，他指着一些诸如“幸运星7号”“快乐月亮4号”之类的名字大笑了起来。他问比阿特丽斯是否允许我把名单带回去，她应允了，并把这份文件放进了我的文件夹里。奥利弗问她这整个办理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她告诉奥利弗大概需要几个星期，等办理完成后，她会再跟他联系。当天，奥利弗就把相关文件交给了比阿特丽斯，让她成立粉叶投资公司（Pinkleaf Investment Corporation）作为维尔京资本的一个子公司。奥利弗在粉叶投资公司有一名专业的“代理”董事，这已包含在了一揽子注册计划中，而他自己则被任命为一位顾问。只需不到1000美元，服务公司的秘书就能帮助建立一种特殊目的公司，从而将一个实体的业务活动与另一个实体的业务活动区分开来。那些奇奇怪怪的公司名就足以说明，这个小办公室日常帮人设立的公司数量绝不在少数。

与比阿特丽斯商谈完毕后，我邀请奥利弗共进午餐并简单听取我对设立一家离岸公司过程的简述。我原本以为午餐谈话会持续一小时，没想到它最后演变成了长达八个小时的谈话，我们从午餐、下午茶，一直聊到了晚餐结束时。在那次谈话中，奥利弗向我解释说，他需要先成立这些公司，然后才能在香港开设离岸银行账户。他已经建立了大约五家不同的离岸公司，因为，正如他向我解释的那样，他不希望一项投资的负债影响到其他的投资。

在奥利弗看来，东南亚地区是由裙带资本家管理的。如果你想进行任何类型的投资，你都必须给政府官员和你的商业合作伙伴打钱。实际上，他成立的萨摩亚实体公司将会被用来支付贿款和经纪回扣，以便他能获得想要投资的那些特惠交易。正如他所说，这完全是一场“空壳游戏”，因为他为每个投资工具都聘用了不同的公司秘书、律师和金融专业人士，这样他就能确保，除了他之外，没

有人会将它们全部联系在一起。这实质上就是“腐败滋生腐败”：政府腐败这一事实，就要求那些希望能在该国取得成功的商人也要参与腐败行为。但是，奥利弗告诉我，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实体公司中工作的律师，并不知道萨摩亚的实体在做些什么业务，反之亦然。这种隔离分层也为奥利弗提供了一些保护和保险，让外人很难“抓到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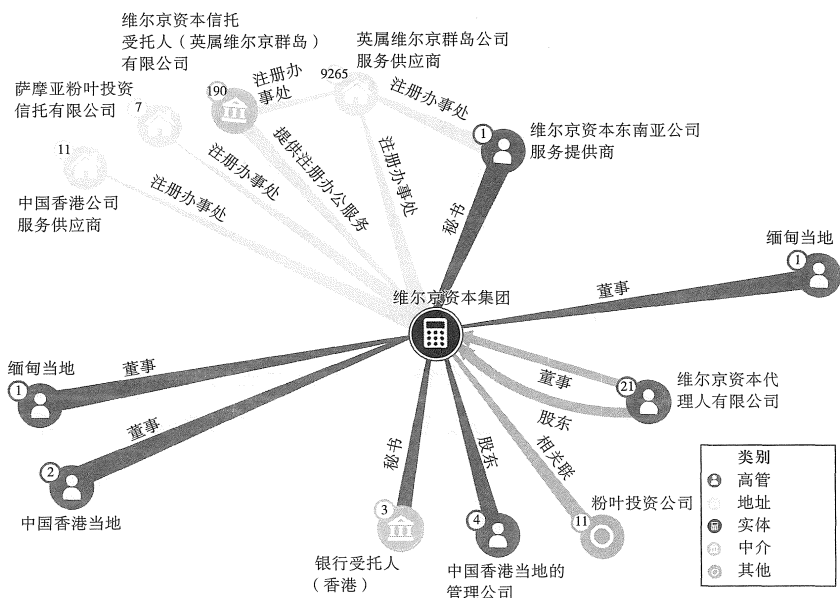
萨摩亚的空壳公司将被用于向政府官员支付回扣并隐藏这些打款行为，这么做是为了获得一些特惠的投资交易。我问奥利弗他是否担心有被曝光的风险，他援引了“巴拿马文件”的例子并告诉我，在当时，记者们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巴拿马文件”实际上包含了数百万份文档。记者会深挖那些数据，以寻找有权有势的政客的污点，这些政客大多来自比东南亚地区影响力大得多的那些大国。那份泄露文件对美国、俄罗斯、冰岛和巴西的报道范围，远远超过了它对世界偏远角落的小国家——甚至很少有人能在地图上准确标示出这些小国家的位置——进行披露的篇幅。

奥利弗还告诉我，缅甸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例子，因为该国的政治和经济都十分动荡，以至于银行业十分薄弱。那里仍然是一个以现金为基础的经济，很少有人会对银行机构存有什么信心。因此，离岸外包的做法在缅甸十分普遍。实际情况是，世界其他地区似乎并不怎么关心缅甸，加上离岸外包是在该国工作的大多数人的常见商业行为，这就使得奥利弗能够在几乎没有什么审查的情况下建立这些空壳公司，他也因此保持了更高层次的匿名性。

说到这里，奥利弗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又说道：“大多数人关注的都是规则的例外，而非规则本身。他们只会对这类耸人听闻的案例大书特书，但是如果你能关注生意场上的小人物，我猜若把他们的离岸交易综合在一起考虑的话，交易量其实还要大得多。”采取这类“满足原则”策略让即使是像奥利弗这样小的蜘蛛也不用担

心被人抓到，因为与刘特佐这样招摇显摆的大鲸鱼相比，小蜘蛛的可见度要低得多。

就“一马公司”案件而言，其实存在一个替罪羊。奥利弗说，那个替罪羊就是蒂莫西·莱斯纳（Timothy Leissner），曾是高盛集团的银行家。他负责行贿，而行贿是“一马公司”丑闻案中的一大部分。正如奥利弗向我解释的那样，每笔交易都有它的替罪羊。在奥利弗从事的那些交易中，他所扮演的也就是蒂莫西·莱斯纳的角色，如果交易被曝光，他将承担入狱的风险。像高盛的大主管这类大蜘蛛，也都分发过额外的好处，但他们中从没有人遭到过犯罪指控，尽管他们从这些交易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作为众所周知的“替罪羊”，奥利弗的名字会作为董事出现在这些注册实体的每一个文件上面（详见图表 5.2）。



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基金是成熟投资者很熟悉的合法工具，用于吸纳全球各地像奥利弗这样的投资者的资金。这里的灰色交易不像其他离岸司法管辖区那样“暗黑”，这让有限合伙人感觉更加安心。重要的是，在这里，用于“筹集资金”的工具将不同于用于“分散资金”的工具，此外，用于“分散资金”的工具与用于支付佣金回扣的工具也会区分开，这就使得任何人都无法在这一整个网络中从头到尾地追踪到一笔具体的交易。

161 关于英属维尔京群岛上的实体公司维尔京资本，奥利弗告诉我，他吸纳到的一些潜在投资者甚至都不知道缅甸在世界地图上的具体位置。他当作开玩笑似的跟我说，有一位潜在投资者在写给他的电子邮件中，总是拼错缅甸这个国家的英文名，老把“Myanmar”写成“Minmar”。但尽管如此，这些投资者仍然有兴趣跟他合作，因为他们也想要涉足亚洲的投资。奥利弗是这样对海外投资者宣传缅甸的：缅甸是一个新兴国家，在过去两年内，它的手机普及率达到了98%。这是一个直接跨越了互联网时代的国家，人们跳过了电脑，直接使用智能手机。随着新型智能手机的普及，他希望能够进入这个新兴市场，他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给用户，同时收集这些特定用户的个人信息数据。他跟缅甸一家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我们的采访中，他从未透露此人的姓名）有交情，他们正打算组建一家合资企业。

奥利弗在中国香港成立了一家子公司，他将利用该子公司来与缅甸方面组建合资企业。他正准备参与电信行业的一次竞标，而现在有一群投资者有兴趣竞标该交易。他们希望与当地的某家电信公司合作，通过向用户“免费发放手机”来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免费手机的前提要求是，用户得同意每天在手机上观看三分钟的广告，并允许他们通过手机上的某个应用程序来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他们不想为了获得电信行业的营业许可而直接与政府官员交涉，所以，

他们想与现有的一家电信公司组建合资企业。为了获得这家电信公司的授权，奥利弗同意设立一个离岸银行账户，给这家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作为个人账户，这样，他就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个账户来为他女儿支付在国外的学费和生活费了。他们合资的空壳公司就是他在萨摩亚成立的那个公司。这里的问题不只关于钱，还在于这位首席执行官想要将他的钱从缅甸转出去，但他却很难绕过重重资本限制，所以，他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给他女儿打学费，这样她就不用每次都拖着一箱现金去国外上学了。

奥利弗告诉我，在与这位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聊了几个小时之后，他便得知，这位首席执行官有个女儿在国外上学。奥利弗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如何支付孩子学费的。首席执行官告诉他，他们在美国没有可以依赖的家人和亲戚，也没有人能帮他照顾女儿。所以，他女儿每次从缅甸去美国时，都会把百元美钞夹在书页中，再把书放在她的手提箱里托运。这样，过海关时只有随身包会被检查。每当他女儿飞往美国，他都提心吊胆，生怕她的行李会在运输途中被机场的行李搬运工给弄丢，最糟糕的是，她也有可能因此而在美国移民当局拦截和搜查，并且不得不向海关申报这笔钱的“资金来源”。他更喜欢银行转账汇款，但很少有银行愿意帮他将资金直接汇到美国，奥利弗知道，他没有具体说明的原因无他，只因为缅甸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

162

为了帮助这位首席执行官解决这个难题，奥利弗便在萨摩亚设立了一个特殊目的公司——粉叶投资公司，他将用它来给首席执行官分发公司的利润分成，但该工具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是分开的，而且，奥利弗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的有限合伙人，也不会知道首席执行官在缅甸当地支付给别人的贿款。这种单独的工具将会保护有限合伙人免受其公民身份所在国可能提出的腐败指控。在奥利弗宏伟的投资蓝图中，这笔钱根本不值一提，他认为，这是他

与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建立关系必须付出的一笔小钱。虽然奥利弗从不需要向他的有限合伙人（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解释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特殊目的公司，但在我们的采访中，他明确跟我说，这笔回扣是正当的，他告诉我这笔钱也很少，而且在他看来，这笔钱还是在帮助当地的一位缅甸公民在国外接受大学教育。虽然严格按照法律来讲，这可能是非法的，但对他来说，这也算是投资缅甸的下一代。在我们随后的一次通话中，他大笑着说：“你就管这笔钱叫奖学金吧，它是在帮东南亚建立人力资本。”

我问奥利弗，他是否打算将这些信息透露给他在香港的公司秘书，他说绝不会。一个“顾问”会为此项目带来什么样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那“不关她的事”。我又问奥利弗，在他看来多少算是“小钱”，他笑着说道：“100个百万（1亿美元）以下都算小钱，但通常这笔小钱都会在10个百万（1000万美元）左右。”虽然奥利弗的工作涉及为许多不同的人处理好“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交易，但他实际上是一名被高薪聘请的金融专业人士，超级大富豪不仅放心地把钱交给奥利弗这类人来打理，而且也信任他们去处理一些最私人和最私密的事务，这样一来，他们才能在最后关头充当超级大富豪的替罪羊，并承担所有的责任与风险。

在我们首次见面的几周后，奥利弗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询问我的研究进展如何。我告诉他事情进展得不错。奥利弗说，他要到香港去取包含公司印章在内的“注册包”了，并问我是否想跟他一起去。于是，我们又同一个办公室见面了，这次，他与比阿特丽斯的交流全程持续了不到十分钟：她为奥利弗准备了一个信封，她事先查看了里面的内容，并告诉奥利弗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她。奥利弗得意地向我展示了新公司的印章，接着告诉我，他在一家银行还有个预约，并再次询问我是否想和他一道过去看看。这一次，他随身带着一个内里有很多文件活页夹的带滑轮的公文包（roller briefcase）。

在我们去银行的路上，他告诉我，他要去的是一家中型银行，因为他知道中型银行的监管要求会宽松一些。我们走进那家银行，他报出了一位银行客户经理的名字，他曾经和那位客户经理见过一次。但此人现在出去吃午饭了，奥利弗便让银行前台的接待员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们在银行里等她。他对银行工作人员的举止和说话语气都与此前他对待比阿特丽斯时完全不同。在银行时，他更加自信、有威严，就好像他是专家能手，而他们需要来为他服务一样。

最后，银行职员杰西卡（Jessica）终于出现了。接着，我们被接待到银行的后台办公室，奥利弗告诉杰西卡，他想为公司开设一个银行账户，他有公司的所有手续文书，还有公司印章。他拿出一个一英寸厚的活页夹，上面写着公司、董事的具体信息，还提到了这是一家外国基金公司，将会投资缅甸的电信行业。萨摩亚公司是用于缅甸投资的控股公司。实际上，奥利弗利用真实的生意往来和商业活动建立了一个公司银行账户，而该账户后续将变成他在缅甸的商业合作伙伴及其女儿的私人银行账户。银行账户里的初始存款是10万美元，他将分两次电汇。当银行职员要求他提供证明资金来源的文件时，他使用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实体公司和他以前作为银行从业人员所赚取的工资，以此来证明钱款的来源合法，而不是从其他什么地方洗钱后的赃款。

最终，奥利弗的这笔电信交易还是没拿下，一群韩国投资者中了标。在发给我的短信中，奥利弗为了挽回面子而开玩笑地跟我说，可能他的竞争对手给了电信公司首席执行官更多的好处费。我从来不知道他在海外设立的那些公司都做了哪些交易，我也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够再开设银行账户。尽管奥利弗的推销最后失败了，但我跟随他参观公司秘书办公室和银行等经历，也让我了解到了很多内幕，比如，在世界上那些没什么人会关注的小地方竟然有这些空壳公司

和离岸银行账户存在，而且我也对它们的结构和关联网络有了一定的了解。它也揭示了常规、普通的交易是如何在所有监管机构的审查之外发生的。每个离岸工具都与其他工具脱离，并且它们也都聘有不同的律师、银行从业者和公司秘书在整个拼图的不同部分各自工作着，所以，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很难把这整块拼图给拼出来。

归根结底，对金融专业人士来说，报酬是如此的丰厚，以至于没有人会关心全局的情况，因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便是他们的服务得到了高薪，他们并不关心客户是否从事了任何有损法律或道德的活动。正是这种激励结构最终使得精英蜘蛛能够在交易时保持一定程度的匿名性，并免于受到惩罚。我完成这本书的最终定稿时，
164 离我开始收集这些数据已经过去了五年，在这五年期间，我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像奥利弗这样的人落马，他们并没有因为设立此类离岸实体来进行各种贿赂而遭到起诉。

从伦敦到越南：从贫困的母亲和老祖母手里掠夺土地

空壳公司还使外国投资者和国家官员能够将剥夺当地穷人财产的责任归咎于对方。光（Quang）是一名 32 岁的投资助理，他在越南一家名为分级资本（Strata Capital）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他曾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获得了建筑学学士学位，接着回国后转行进入金融领域。在资产管理公司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各种投资项目。在我们的采访中，他对我说：“你知道吧，这个世界糟透了……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从秘密犯罪活动中脱身……而那些抗议的小人物，则会被投进监狱。”

我问光能不能给我一个更具体的例子，他便讲述了自己和公司的高管一起去伦敦参加伦敦证券交易所一些会议的经历。在去往伦敦的旅途中，高级管理人员乘坐的是商务舱。头等舱和商务舱的每

个人都获得了快速通行权，他们可以快速地通过出入境海关检查而无须排队。整个通关过程都不超过十分钟，而且还立即有人将他们护送出境控制区，也没有人问他们任何问题。头等舱和商务舱的登机队伍行进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这些人不会觉得外国人进入伦敦的通关手续会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但在这同一次旅行中，他们给光预订的却是经济舱座位，没有人给他快速通行权。相反，他不得不在入境通关的队伍中排了两个小时，“贱民”（riffraff）都必须排队，并且要经过几个警告牌，上面显示着会被缉获的各种非法物品——例如，烟酒、大麻和其他毒品——还有针对向英国贩卖人口的犯罪行为的警示语。公司老总们在行李提取处不耐烦地等待着光排队过检，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精英白领罪犯像他的老板们一样，有免于排队的快速通行权。对光来说，这是一个关于有钱能使鬼推磨、全世界的有钱人都能够用钱来免于受罚的简短教训，那些乘坐头等舱的人压根不用排队，也不用经受光他们所受到的警告或搜身检查。光告诉我，关于精英白领犯罪，要记住的一点就是，大多数时候，它们都是合法的，并且也超出了所有主权国家的审查范围。他称之为“平行经济”，在这里，没有什么规则来管控资金的流动。

我请他详细跟我说说他所说的“平行经济”是怎么一回事，以及为什么精英白领罪犯能不受惩罚地逍遥法外，他也提到了他们公司建立的离岸结构。他说：“分级资本基金被一家名为逐梦（DREAMS）的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授权给了某家银行。那家银行又将其授权给了超星新加坡（Superstar Singapore）公司，而超星新加坡公司又再次将其授权给了越南。”因此，他说，如果西方投资者想要对这支基金进行投资：

165

他们会买入逐梦公司的股份……所以，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这家公司是主要的母公司，然后才是子公司分级资本基金，而

我在越南为分级资本工作，其他子公司有超星越南（Superstar Vietnam），还有超星新加坡，它们受雇于逐梦公司，主要通过一个代理人结构来将（投资）授权给新加坡的公司。因此，如果你是一名投资者，你的投资就会直接流向拥有新加坡银行的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但你的钱永远不会流向越南，因为那里并不需要钱。所有的运营成本都是从逐梦公司借贷来的，越南没有资本，我们也不赚钱。所以你看，通过这种收入模式，新加坡的银行会借钱给我们来支付日常的公司运营……想象一下，它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联。假设我是逐梦公司，要是我有这么一个很棒的财产，又有这个很棒的标志和技术平台，我可能也会这么做。

我问光，他们如何将越南赚到的钱汇入自己的账户，他对我说：“每个人的做法也都不同。丹（Dan）和其他人是把钱放进了他们自己的空壳公司，他们都有一些名字稀奇古怪的公司。我在香港开设了一家公司，也在新加坡注册了一家公司，然后我把钱存放到这两家公司里面。”他继续对我说：“你可以想象一下，要是所有美国人在世界各地都有十个不同银行账户的话，他们就可以到处转移资金，他们还可以严格按照法律来说自己是在提供贷款或支付咨询费用。那么一来，就没有人为这笔钱纳税。”但他也说：“你必须得有钱，得有律师和专业人手来为你搭建这种结构……我不是有钱人，我只是捎带从我有钱的老板们那里赚点儿，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没办法这样做。”他对我说，有了新的银行法和税收透明法后，建立这些账户就不再那么容易了。但是，那些早早设置好账户、已经进入这个系统中的人，也将会变得更加富有，因为这意味着越来越少的人可以进入到这个平行经济中。这些家伙，光对我说，就是在伦敦机场入境过海关都不用排队的那群人。

光告诉我，这些结构的一个后果对越南产生了具体的影响。光提议我坐上他的私家车，随后，他开车带我经过了一群正在抗议的妇女。光开车绕着这群人转了四圈，好让我能拍上几张照片。光不让我下车拍照，因为公开抗议在越南是非法的，而且我一看就是个“越侨”（Viet Kieu）* 女人，这样贸然下车拍照的话，我可能会面临被捕的风险，或者拍照的电子产品会被没收。

166

光跟我谈到了一个尚未破土动工的土地开发项目，他说：“他们（指他们公司和政府官员）就那样拿走了土地……那些正在抗议的妇女，看起来都像是从村里坐公共汽车舟车劳顿了好几个小时才来到这里的一样。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我母亲或祖母肯定也会像她们一样，所以，看着她们那样在那里抗议，你真的很难以无动于衷地开车经过他们。可悲的是，她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她们采取抗议行动，为自己站出来讨要说法，但是，她们也可能会因此而被投进监狱，因为这种抗议活动是非法的。”

在光专注开车并在路上行驶时，我看到了一些醒目的抗议标志语，上面写着：“分级资本在政府的支持下，偷走了人们的家园。”我问光能不能就此为我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他告诉我说，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们一直在开展土地开发项目，想要打造一个全新的五星级度假胜地。于是，分级资本与政府官员合作，政府派了评估师来评估土地，他们也同意支付略高于市场价值的一笔钱来作为居民的搬迁费，因为毕竟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不便。但是，政府官员还希望分级资本能向他们支付一大笔款项，这样他们才答应会将这笔

* 这个词主要指的是寄居海外但并未入籍他国的越南人。近年来，该词在越南人的使用中开始发生意义上的变化，很多侨居外国并已入籍他国或取得他国永久居留权的越南人也被称为“越侨”，即使他们已不再符合“侨”一词的含义。

拆迁费分发给当前的土地租赁者（land leaseholders）*，并处理所有关于转让所有权的文书工作。然而，最后发生的事情是，要么是政府压根就没有把钱分发给当地居民，要么就是少付了他们拆迁费。于是，居民之中就有一些人坐着巴士涌进了胡志明市，站在分级资本的办公大楼和国家法院外面抗议，他们举着的抗议标语上写着是分级资本偷走了他们的土地和家园。这种标语对光的公司名声带来了很坏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对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来说，其实是政府官员中饱私囊，他们要么是侵吞了太多的钱，要么就压根没向这些抗议妇女支付过这笔钱。

无论如何，当光看到这些穿着家居服、戴着稻草帽的女人站在他公司的办公楼外，而他却不得不从她们身旁经过时，他还是无法对站在炎炎酷暑中抗议的她们视而不见。光告诉我，他自己在公司的职位很低，所以无法确切知道在公司和政府所做的这笔交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从他所收集到的信息来看，有些资金是通过离岸实体支付的，然后还有一笔单独的资金，那应该是准备分发给当前使用土地的居民的。不管怎么说，政府和公司都在踢皮球，互相转嫁罪责。与此同时，他们双方谁都不会坐牢，也不会招来官司或出庭受审。与此相反的是，那些在外面抗议不公的妇女，却有锒铛入狱的风险，因为越南政府禁止公众举行抗议活动。

接着，光又说，在戴草帽的祖母、分级资本的首席执行官和当地政府官员这三者之间的拉锯战背后，是那些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投资这个项目的外国投资者。但是，他们的名字永远都不会出现在这里的各大报纸、各种小报或任何有关这次事件冲突的文件记录中。光跟我说，这么一来，他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仍然只能算是一个

* 在越南，土地属于全体人民，国家作为所有者的代表统一管理土地。越南法律不承认私人拥有土地所有权，但国家可以将土地划拨或租赁给个人或者实体。此外，越南公民可基于对某块土地的稳定使用而获得政府对其拥有该块土地的使用权的承认。

“精英白领奴隶”，因为他受制于背后的董事长，最终，他也还要对那些离岸吐出蛛丝牵走这里人钱包的大蜘蛛负责。

* * *

与动不动就招摇显摆的十亿美元大鲸鱼不同，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及其从属蜘蛛是在一种隐形的经济中运作的，它们在此建立了庞大的资本蛛网，但这些蛛网通常不会引起国家官员、普罗大众，甚至是帮他们构建部分网络的金融专业同伙的注意。通过采取“满足原则”投资策略，他们努力保持低调，控制自己的贪欲，也从不用担心会有被抓住的风险。我所研究的投资者涉足的都是一些小型市场和小笔交易，因此，他们通常也不会成为国际调查的目标。

尽管如此，本章中的这些案例还是表明，我们有必要区分嵌入在这些更广泛的资本网络中的超级大富豪和富豪。很多有关全球精英的研究著作都笼统地将这两个群体归为同一个类别，但其实，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质的差异。在这个领域之中，富豪视他们自己为超级大富豪的精英白领奴隶。高薪聘请的金融专业人士通过成为投资交易的代言人或灰色交易中的“替罪羊”来赚取钱财，但他们也都明白，他们将承担起在灰色交易中的所有犯罪风险、财务风险和声誉风险。

通过建立起多层次的资本网络，超级大富豪和富豪就创建了多重保护屏障，这能让他们在政府监管机构监管之外的平行经济中运作。特殊目的公司能够让资本的所有者和从属的金融专业人士参与到灰色交易中来，并能够帮他们保持一定的匿名性，因此让他们免于受罚。在任何一家公司的董事长面临潜在的入狱风险之前，充当交易公开形象的“关系经理”都将会成为第一个“替罪羊”。这便是董事长为保护自己而建立各种金融机构的逻辑所在，与此同时，

这些机构还能帮他们避税，并从这些贫苦的老妪手里窃取她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168 简而言之，通过建立互不相干的公司、信托和基金会等，全球精英得以在一种平行经济中从容地游走，他们能够轻松自如地在全球移动，也能够跨境转移他们的钱财，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在这样运作时几乎都能免受惩罚。归根结底，虽然“一马公司”案代表了马来西亚国内前所未有的高贪腐程度，但国际上也仍然广泛存在着沆瀣一气的同谋关系，因为有大量资金被跨境转移，而背后运作之人却逍遥法外。³ 只要我采访的投资者通过一些隐蔽的小型资本蛛网来分散交易，他们将能够继续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内积累起数百万美元的资本，与此同时，他们还能保持高度的匿名性，并且基本上免受惩罚。

道德困境和合理辩护机制

加里（Gary）是一位已经隐退的技术专家，他现在转型成了一位企业家和一名天使投资人，他主要投资技术及移动通信公司。我计划和他一起旅行一次——从越南的胡志明市飞往中国上海。飞行时间大约四小时五分钟，恰好在中午。我当时正在研究一些问题，加里主动提出，他可以回答我就此提出的任何问题。截至那时，我的民族志研究和各种采访大约进行了一年时间。加里想听听我的研究进展如何、到目前为止我了解到了什么，以及还有哪些问题我还没有找到答案。我和他讨论了一些囊括很多个方面的宽泛主题，因为它们都与我的研究有关，比如，不同类型的腐败、税务策略，以及我对超级大富豪能够几乎不受惩罚地利用前沿市场的一些看法等。他听我所说的大部分内容时不住地点头，然后问我，是什么让我在那时候没能写出这本书来？我当时其实也说不清楚，但我脱口而出：“我觉得这本书好像没有灵魂。”

他大笑道：“资本本来就没有灵魂！”

但接着，我又回应说，他说的这句话似乎也有些不太对劲。一方面，我太过专注于人们如何做市，以及他们是如何巧妙地利用这

些复杂的当地环境，以至于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对“不得不在这些市场中做那些灰色交易来赚钱”有何种感受？另一方面，在一起旅行了多次之后，我慢慢了解这些人，开始明白他们也是复杂、多维度的人。我在书本上和公共媒体上读到过的那些关于他们的讽刺漫画，与我花好几个小时与这些人交谈的体验并不相符。为了能够深入挖掘，我有时候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听人们详细跟我解说，他们是怎样根据具体的环境而使用不同策略的，我只是在倾听，并没有深入探讨他们是如何思考或合理化这些事的。我很想要了解他们的自我意识是什么样的，即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正如社会学家阿尔·扬（Al Young）的经典论述：“相较于优先考虑（研究对象的）行动和行为……（我更寻求）将他们的思想意识置于研究的中心舞台。”¹ 换句话说，正如文化社会学家米歇尔·拉蒙特（Michelle Lamont）所强调的，人们经常会将他们的道德困境置于他们所嵌入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中来考量。² 在一种环境中的不道德或非法行为，在另一种环境中则未必如此，再加上现在人们会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所以我想要更多地了解，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道德情感是如何发生转变的。

在那次搭乘飞机的过程中，对想要继续在新兴前沿市场做一名天使投资人的愿望，加里进行了合理的辩护。他给了我两种解释：首先，他告诉我，因为他是由单亲妈妈带大的儿子，所以他对贫穷带来的艰辛苦楚有着一番独特的体悟。现在，作为三个女儿的父亲，他想确保他的女儿们在经济上有足够的安全感，这样，她们就能“始终知道自己的价值”。加里希望女儿们能有足够多的钱并感到强大和充满力量，可以掉头离开有毒而侵蚀人的工作环境，能在离婚时也不必担忧经济保障，并且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女儿们知道自己配得上幸福生活，而这是他自己的母亲被剥夺的那种生活。其次，加里还提到了我的第一本书《欲望交易》——这是我对越南性工作者

的一份研究，他告诉我，他绝不希望他的女儿们走到那样一种卑微而绝望的境地，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给这个世界。加里说，在这个世界里，男人似乎统治着各行各业，包括他曾经从事的科技领域，也包括他现在投身于其中的金融行业。

与加里的谈话让我醍醐灌顶，我了解到，在蛛网资本主义的这些交易和勾当背后，存在的其实是一群有真情实感的人，一群会反思的人。当你追问时，他们其实也有很多话想说，关乎他们自己的个人困境，关乎不得不在这种环境中不断调整他们内心的道德指南针的矛盾过程。这些前沿市场，正如猜氏兄弟的战略投资总监哈里斯所描述的那样：“它是一个道德迷宫，充满了道德风险……怎么说呢，生而为人，我们都必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中考验我们的道德自我。”在采访中这么说时，哈里斯还指了指他自己的手表，并解释道：“比方说吧，你知道我内心的道德指南针是对准那里的，对吧？（他指着手表上12点钟的方向）好吧，要是我飞到了世界上的什么地方，而那里看起来却像是这样（他指着9点钟的方向），并且有的地方又有点像是这样（他指着6点钟的方向），那么，我的指南针也就不会停在原来那里了（12点钟的方向）。”

对于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来说，“什么是道德的？什么又是不道德的？”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以及他们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合作伙伴的类型。在本章中，我将重点关注的是，参与被认为在道德上具有腐蚀性的行为活动时，人们如何阐述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内心的道德指南针的过程。这种研究方法很重要，因为在研究道德和市场的关系时，聚焦点主要是神圣与世俗之间的这种双重关系，以及金钱污染社会或腐蚀社会的种种途径。³但是，正如社会学家玛丽昂·富尔卡德（Marion Fourcade）和基兰·希利（Kieran Healy）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对市场和道德的看法必然是具有自反性的（reflective）。也就是说，

人们在参与这些空间维度时也会反思他们自己的行为。因此，本章重点关注人们所使用的道德辩护机制，一方面会关注这些人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另一方面也会看看他们非常个人化的对内心道德指南针的调整过程——为了能够“在灰色地带游走”，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去调整。⁴我在本章中也描绘了人们在反思这些道德困境时使用的一些方法——大多是与他们的合作伙伴和家人倾诉，此外，这些方法在不同地理空间也会有所不同，它们与具体的历史文化和背景有关。

关系型道德困境

绅士与穴居人的对比：不同的社会性别关系

在东南亚这里，绅士和穴居人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你是一位绅士，穴居人就会把你撕成碎片。如果你是一个有着绅士风度的穴居人，那么，你永远也不会赢得他们的投资。

——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38岁，香港大亨之子，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现为皇家资本（Royal Capital）的执行董事

克里斯托弗说自己是一位世界公民。他出生于香港，曾就读于美国东北部的一所精英寄宿制学校，后来就读于一所小型文理学院，毕业之后，他在纽约当了四年的投资银行家，从中“累积不少经验”。在美国工作多年以后，他开始怀念起小时候那种与客户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家有经营零售业的家族企业，他从小就对此耳濡目染。克里斯托弗也怀念那份说走就走的自在随性，他可以跳上任意一架飞机，然后在短短两个小时内，就置身于完全不同的城市。

克里斯托弗的家族是靠经营香港的食品、家具和时尚零售行业

而发家的，还在世界各地拥有几家大型特许经营店，但他自己的目标，却是要将“国际品牌转化为本地零售”的模式引入东南亚地区的欠发达国家。他们的家族办公室在东南亚地区的六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他的哥哥姐姐打理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市场，而他目前正在努力将其家族业务扩展到东南亚的一些欠发达经济体中。他的三个目标国家是越南、柬埔寨和缅甸，在过去几年里，作为一名中小投资者的他一直在和这些国家的当地合作伙伴发展关系，希望能在这些地方做大、做强。

172

对克里斯托弗来说，越南和缅甸市场的启动成本都很低，这就使得它们的增长潜力更大。他选择这些地方也是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希望自己能在家族企业的某个领域发挥领导作用。通过协商谈判，这个家族企业集团拿到了数个品牌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特许经营权。这意味着，他们根本不必担心当地合作伙伴会将他们挤出市场。与此同时，他们也能对市场注入资本，因此，最大的挑战在于他们将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与当地的合作伙伴打交道。

克里斯托弗告诉我，当遇到潜在的合作伙伴时，他首先会评估他们是属于他所说的“绅士”还是“穴居人”。对他来说，道德体系的建构与他打交道的不同类型的人有关。他会仔细审查他的合作伙伴怎么对待其他人，尤其是女性，然后，他会据此来调整自己对待他们的方式。克里斯托弗引以为豪的是，他既能做一名绅士又能成为一个穴居人，因为在不同的商业伙伴关系中，他能根据自己身上的双重特质来调整。当我进一步要求他举出具体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时，他告诉我，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成功取决于弄清与他打交道的那些人的道德心理。

克里斯托弗认为，每个国家也都有穴居人和绅士，但他们十分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对他而言，在一群穴居人周围表现得像个穴居人，这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遇到绅士时，他就

需要像对待绅士那样对待他们。我请他给我提供一些与绅士和穴居人打交道的更为具体的例子，他便告诉了我他和他的投资者的故事。他目前正在合作的是越南当地两个不同的合伙人——茂（Mau）和宗（Dzung）。茂是一位绅士，毕业于常春藤名校。他们两人是通过在香港举办的一个校友会活动认识的。克里斯托弗认为茂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非常真诚，也以家庭为重。他将茂归为这样一类越南人，他们在金钱往来方面非常可靠，在具体办事层面也十分注重细节。然而，由于茂不愿意在深夜外出陪客户喝酒，也不愿意与政府官员的主要经纪人搞好关系，因此，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获得了投资上的一些重要信息和经营许可证。跟一位绅士打交道也有劣势，比如，克里斯托弗认为，茂这个人在工作上表现得不紧不慢，不太热心，所以生意也可能会因为进展太慢而无法起步。

173 而另一方面，宗则是一个穴居人。宗在办事方面要快速得多，他是一个担任要职的政治精英的侄子。和宗做商业合伙人的问题在于，他是西贡有名的花花公子。每当克里斯托弗来西贡时，他都要被迫陪宗一起喝酒。他不得不以“通过离岸账户行贿”的形式来向宗“打钱”，以便获得一些施工许可证，并能让他的货物顺利通过海关检查。克里斯托弗告诉我，虽然他对此早有预料，但这种打款绝不是一次就能搞定的。由于政府的海关程序缺乏透明度，所以，这种贿赂关系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克里斯托弗向我袒露心声：在许多个外出的深夜，他真的觉得宗的行为是在大大考验他内心的道德指南针。

克里斯托弗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宗邀请了一名海关官员加入他们的聚会。随着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利润也越来越丰厚，海关官员开始暗示自己希望能从利润中分成更多。宗试图向克里斯托弗保证，他会处理好与政府方面的关系，叫克里斯托弗不必担心。那天晚上，这群人开始和一群在他们面前跳舞的女性亲热起来。克里

斯托弗并不清楚这群女性究竟只是晚上约出来一起玩的女性朋友，还是专门在夜晚寻找客户的高端陪酒女。随着夜幕渐深，宗也不管克里斯托弗是怎么想的，就邀请他们去了三个不同的酒吧。

每到一家新酒吧，海关官员和这群女性的亲昵互动就会变得越来越忘乎所以。夜越来越深，这群人最终来到了宗的一处顶层豪华公寓，很明显，一场性狂欢派对即将在此上演。克里斯托弗没有被任何一个女人吸引，对这处私人空间也感到很不舒服。当他告诉宗自己准备离开时，宗变得很暴躁，并告诉克里斯托弗，在海关官员回去之前不准离开。他们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拉锯着，直到最后克里斯托弗决然离开。

第二天早上，克里斯托弗和宗一起吃了一顿早午餐，宗还打趣地说他拒绝参加前一天晚上性狂欢派对的行为很孩子气，特别幼稚。克里斯托弗对此置之不理，宗则试图解释为什么打理好与海关官员的关系会如此重要。宗解释说，一起“做肮脏勾当”将会有助于巩固个人关系，这样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协商谈判来降低给海关的贿款数额。克里斯托弗予以回击并告诉宗，他宁愿“他妈的花钱来收买海关官员，也不愿意跟他一起参与性狂欢派对”。宗也反驳说，贿赂就是个无底洞，根本没有上限，因而，巩固更加私人的关系可能还会帮他们少付点贿款。

克里斯托弗接着对我说：“海关官员就他妈的是个穴居人，而宗则介于穴居人和绅士之间。你想，穴居人需要的是什么呢？就他妈的食与色！他们需要‘开荤’。”克里斯托弗提高嗓音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血压飙升。但无可否认的是，我也觉得有些尴尬，因为他是在一个相对安静的咖啡馆里这么破口大骂的，我们周围都是人。我试着冷静地问他，他对这一整个社交互动过程作何感受？他的回答却让我大感意外。他告诉我，这是降低行贿成本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穴居人的性派对和狂欢仪式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从好的方面

来说，这能够让他们领先市场，减少行贿成本，并解决海关放行效率低下等问题。与穴居人打交道的不利之处在于，你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正如克里斯托弗多次强调的那样：“如果你是一位绅士，穴居人就会将你撕成碎片，吃干抹净。”

我问克里斯托弗被穴居人撕成碎片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穴居人认为，从你那里偷窃东西、稀释你的公司股份，或者把你赶出交易市场都是不成问题的。然后，他对我说：

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是，我还愿意在灰色地带走多远……我内心的道德指南针需要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我称那类人为“清白之人”（cleaner）——在你旅行到别处时，提醒你不要参加摆在你面前的这类婚外情活动。过去几年，我在亚洲各地旅行，只见到过两个男人能做到这样，不包括我自己，而是另外两名男性，他们拒绝玩这种情色游戏，这真的很了不起……因为这不仅仅是欺骗……你需要像宗这样顶级的家伙，然后，你要和他们一起出去玩几次，这样你就能看出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其实都是）一些小事——比如，你和一个陪酒女孩玩在一起，但你却没有给她小费，而你还是个千万富翁——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说，等时候到了，（要是）你找到了方法……你也打算敲诈勒索，想把我给毁掉呢？

克里斯托弗这里指的是有关陪酒的一些规则和仪式。他向我解释说，绅士是那种在酒吧里尊重女性的男人，而不是在夜晚派对结束时才给廉价小费的人。穴居人就是那类给廉价小费的人。在那些地方对女性态度特别差的男人，也是那类愿意为了几块钱就毁了合伙人的穴居人。

在我与克里斯托弗的谈话中，他多次提到，这样的夜晚经常会

让他在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陷入心理阴霾，因为他会过度分析前一天晚上的社交互动。这些时刻促使他反思自己，在他为这些商业伙伴关系下赌注时，是否愿意参与到一个充满性和毒品的世界中去？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弗对其个人的自我道德意识进行反思之外，这种“男一女一男”的三角关系也还是像他这样的男人所利用的重要工具，他们每个人都会用它来评估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调整自己内心的道德指南针，以便与当地的合作伙伴维持好关系。175

有趣的是，我采访过的许多男性经常认为，他人的道德指南针是稳定不变的，而自己内心的道德指南针却一直都在拨动、校准。男性在这些空间中的行为也揭示了他们在与其他商人和政府官员合作时的一些道德品质。克里斯托弗会观察宗和海关官员如何对待女性，并据此来评估他与之打交道的人到底是穴居人还是绅士。例如，他会比较关注以下这些问题：他们给的小费多吗？他们有礼貌吗？他们有没有表现出一点绅士风度？本书第2章中曾详细介绍过的男性同性社会性联结的小故事，也都是用来评估商业伙伴的道德品质的好方法。⁵了解他们是“绅士”还是“穴居人”，能够有助于制定出一个图式，以便知道在商业事务中该如何来与他们打交道。

家庭关系：为家庭做出的终极牺牲

朱希（Chu Hy）是一家合资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在越南经济的多个领域持有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其中的一个是在越南胡志明市的一处住宅房地产开发项目。朱希是我从领英上接触到的越南当地人。很幸运的是，他回应了我的采访邀约，并同意在房地产开发项目处的办公室里与我会面。他把地址发给了我，并嘱咐我要是司机无法从主干道上找到那条街，就叫司机给他打电话。

那栋建筑大楼确实很难找，因为它位于一条新近铺设的道路旁，要经过一大片空地，而且还隐藏在被河流环绕的一个小角落里。等我的出租车停下来时，我看到有保安人员在大门两侧检查每辆开进来的汽车。在大楼的前面有代客泊车服务，还铺着一条红地毯，直通接待处，地毯两侧拉起了由天鹅绒绳索组成的护栏。朱希的一位助手“武”下楼来迎接我。他告诉我，朱希让他带我参观一下周边的场地。

176 在参观的过程中，武告诉我，此处新开发项目打造的是一种度假村风格，整套设施包括沿河开发的私人海滨长廊、带多个游泳池和水疗中心的水上乐园、配套齐全的健身房，以及配有顶级设备的豪华公寓。武解说了很多，并介绍说这里是新近越南房地产市场上最抢手的豪华住宅区之一。建筑大楼是由一个国际建筑师团队设计的，建筑师来自日本、泰国、越南和美国，他们就该项目提供建筑咨询，并在多个阶段与开发商协作。此处建筑群还包含各种各样的树木和开阔的草坪，给人营造一种度假胜地的氛围。

参观完这处房产后，武把我送到了朱希的办公室。朱希递给我几本介绍这处房产的小册子，我告诉他，我很欣赏他们对细节的关注，也非常喜欢那里的草坪绿地空间，因为这在城市的钢筋丛林中很难寻得。朱希告诉我，他在网上读了几篇关于我和我第一本书的文章，还问我写作那本书的经历。等我们一结束有关我和我的目标之类的闲聊，我便单刀直入地询问他的背景经历，以及他与这处房地产的关系。我从谈话中得知，他曾在俄罗斯学习过几年，并在那里经营过一家企业，通过这家企业，他认识了现在的商业伙伴，而后他便邀请他们到越南合作。他们在越南共同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并投资了这个房地产项目。

据朱希称，该房地产项目估值为5亿美元，在建筑项目竣工之前，就有超过98%的单元房已经售光了。虽然我感觉这些数字被

有意夸大了，但我也无法去核实，因为我无法查看他公司的审计账簿。我所参观的这处房地产开发项目，只是全球各大新兴市场中的众多房地产项目中的一个而已。他们的有限合伙人隶属于一个更大的集团，该集团拥有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私人控股公司，并在越南、泰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也进行了类似的投资。他们投资于不同的经济领域，包括房地产、制造业、建筑行业和物流业。这家合资股份公司专门在欠发达的新兴市场从事中高端项目的开发。

我正式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从当地企业家的角度来看，与外国合作伙伴成立一家合资企业有什么感受？他告诉我，这很像在政府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一种平衡艺术，因为当地人试图与政府打交道，而外国投资者则能注入开发资金。然而，在成立合资企业之后，他与合伙人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因此，他决定将大部分的股份都转卖给那位合伙人。朱希说，外国投资者希望能在项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是投资者，他们还想成为开发商和运营商。虽然朱希现在只拥有少数股权（不到 10%），但他仍继续作为政府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中介方承担大部分工作，以便确保投资者获得土地租赁权，并使投资者和当地合作伙伴在该房产的估值或注资方面达成一致。

177

朱希还告诉我，在越南这样一个监管机构不那么强大的国家，离岸基金更容易“把赃款投放”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上，因为根本没人关心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以不到 1000 美元的价格就在新加坡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他怀疑这家企业被用来洗钱，然后再通过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离岸账户将洗过的钱打给越南官员来行贿。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越南这个国家一直很难监管发生在国外的洗钱活动，但更难追踪裙带亲信放在其他国家的资金，这些裙带亲信都需要在某个地方暂时存放他们的投资资金，而此类资金流向极难追查。

虽然朱希从未透露自己从合资企业中赚了多少钱，也没有透露

他在新加坡为交易而设立的所有权结构，但他明确告诉过我，他们在新加坡设立了完全合法的银行账户来管理投资。在我们的采访中，他从未公开承认自己为了换取商业利益而行贿，但他又明确说过，不打钱给别人的话，几乎是不可能办成任何事情的。在我问朱希对于在这种结构中经营业务有何感受时，他对我说：

所以，这里的股票交易市场十分不透明。这很可怕，很多人不想持有股票。钱多压身，特别是当你有很多钱的时候。越南有很多钱可赚，对吧？那么，每当你赚了钱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每当你醒来，你发现自己有了一大笔钱，你会做些什么？我叔叔曾经当过狱警——他靠这个赚了很多钱，但那都是赃款。他头天签了一个文件，然后第二天早上，钱就会从天上掉下来，还全部是现金。你必须记住的是，让我们回到最基本的原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为了钱而工作。有很多人把钱放在了这栋大楼里。我只是充当了外国开发商和当地人之间的中间人而已，前者把洗过的钱投进了整个项目，而后者则把小额资金投给了单元房。

我问朱希，他在处理自己所谓的“赃款”时是否有任何道德顾虑，他立即打断我，并反问我是否认为我的父亲为家人做出过牺牲。我点点头说：“那是当然。”接着，他又打断了我，并对我说：“那就是越南人的做事方式。”朱希将他的这些行为合理化成了一种道德上的牺牲，一种他以及许多其他男性都会为家人而做的道德上的牺牲。

接着，朱希就开始给我“上课”了，说我本质上还是太过美国化，竟然不懂越南人的文化了。谈到越南的腐败问题时，他告诉我，曾有两家不同的美国公司抛来橄榄枝想要和他一起合作，成立一家

合资企业。然而，这些公司的尽职调查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他认为这不值得，最后转而与东欧的公司合作。对于像他这样的越南北方人来说，与美国人做生意还不如与俄罗斯人做生意有吸引力，因为至少在越南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时，俄罗斯还曾为许多越南北方人提供了一些教育和培训。他对我说：

你在越南时，还会想教民主的那一套吗？他们在这里做生意，还想教这里的人要平等？在这里做生意，那就要付个好价钱。你还以为自己是来这里参加社交活动的吗？那对不起，也别告诉我：“我来这里是为了赚钱，但我有我办事的原则，我不玩越南人（玩）的那套。那么，你觉得这怎么样？”我就会对他们说：“打个比方，一个越南人跑去了美国，然后跟人家说，我不按美国的那套规则办事，我只按越南的规则做事，你们会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呢？”要是你想在越南做生意，那你就得用越南人的办事方式……他们还试图跟我说什么得有规则和国际标准，我说：“好啊，那太棒了，请问越南采用的是国际标准吗？明显不是。那么，你这么说又能有什么意义？”

对朱希来说，贿赂当地官员或者从交易中获得回扣的想法并不是道德妥协。现在的问题是，西方人那些高大上的理想并不适配当地的投资环境。这就是越南人做生意的方式。他继续强调，想要进入这个市场的外国佬都必须明白，这里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想要获得交易，那就得付费。

当我们更深入地研究道德上存在的问题时，朱希告诉我，无论在哪个国家，所有商业领域“都是遍布魔鬼的海洋——当你在人群中时，你还可以吹嘘一番，胡说八道，但当我们都碰在一起，在这种金融魔鬼圈里聚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则完全不同……你若不喜

欢,那就别来”。然后,他又叫我好好反思我父亲为家人所做的牺牲。我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他接着又告诉我,他将自己置于这种魔鬼圈里就是一种牺牲,他觉得自己必须做出这种牺牲,以确保他的父母、岳父母、妻子、孩子及其后代的未来会更好。他指出,韩国商人会为他们的家人建立起庞大的财阀帝国(韩国的大型家族企业财团),但当腐败指控坐实而变得难以承受时,他们要么入狱,要么就自杀。⁶在特别成功的那些韩国商界大佬中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要是没有坐过牢,那就没有真正参与过资本游戏。在这里,坐过牢反而成了一个表明人们的确富有而强大的标志。

179 只有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足够密切,人们才能获得这种巨额财富。朱希向我解释说,这与越南的发展进程和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一致的。他告诉我,亚洲的许多其他国家也都是这种情况,这并不是越南所独有的。并且,这个问题并不能算是道德问题,因为入狱更多的是与政治结构的变动和掌握权力的职位上换了新官有关。朱希认为,从道德上来讲,一个男人入狱甚至自杀,是他可以为家人做出终极牺牲的标志,他这是为了给家人和后代提供经济保障。

对于像朱希这样的人来说,解决道德困境的方法,就是去探询参与腐败行为是否为了服务于一个更高的道德目的。通过将涉及脏款的风险合理辩解成是“为家庭做出的终极牺牲”——像韩国和中国等其他新兴国家中的男性也都会这么做——朱希利用的便是那类与家庭相关的,要养家糊口、要做顶梁柱的男性气概,这有助于他为自己在工作中的行为进行合理辩护。这也就是朱希在涉及“肮脏交易”的日常工作生活中自我创造意义并找到目标感的方式。

受地理空间约束的道德困境： 两个分离的世界——“相互隔绝的领域”

尼科洛（Niccolo）现年 57 岁，拥有意大利和加拿大双重国籍。他目前居住在温哥华，过去 15 年来，他一直在此生活和工作，但作为一位私募股权专业人士，他经常会出差到世界各地。在加拿大生活期间，他先是在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工作，之后，他创立了一家总部位于温哥华的精品投资集团。他们的大部分投资都投放在总部位于东南亚的一些中型市场公司。尼科洛也一直是一家投资集团的有限合伙人，该集团在越南投资了大约有十年，并已经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投资集团，目前正在准备探索在缅甸开展业务的机会。

仅去年一年，他的飞行航程就超过了 20 万英里。他本人是一个关心孩子的父亲，从不会错过孩子们成长中的任何重要活动，与此同时，尼科洛还管理着集团在东南亚的投资，他为自己能兼顾事业和家庭而感到自豪。尼科洛说，他对东南亚的兴趣最早来自阅读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缅甸岁月》（*Burmese Days*）和《一九八四》（1984），在读这些书时，他还是个青少年。在我们的采访中，尼科洛多次告诉我，作为一名常乘喷气式飞机环游世界的“空中飞人”，他十分低调，大多时候都会乘坐经济舱。事实上，他告诉我，他只有在航空公司提供免费机票或是可以用航空里程升级舱位的情况下才会乘坐商务舱，这样他才能证明更频繁的往返飞行是正当合理的。他的妻子和孩子对出差旅行和东南亚地区都没有兴趣，所以，他们也很少和他一起出差旅行。

我请他跟我谈谈，在世界上两个不同地区生活是种什么样的感受。他告诉我，这种生活世界和工作世界截然分开的生活方式对他很奏效，因为这能让他在不同的文化和地理环境中重新设置和校准

他内心的道德指南针。尼科洛跟我说：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然不能给自己安上一个坏名声，因为这将伴随我一生，而家人还要我养家糊口。但我已经意识到，我所创造的其中一件事……是组建了一支能了解我内心道德指南针的强大团队。

我会对你直言相告……我不唱卡拉 OK，我也不经常赴宴喝酒。我是来这里工作的。既然你选择和我做生意，那我会乐意花一整天时间参观一家工厂或是到访一家零售店，但我不是来这儿参加派对的，我是来这儿工作的。

当你到这里做生意时，你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和它的行事方式所吸引。你会调整内心的道德指南针，并改变你的行事原则，因为归根结底，问题主要在于价格，以及怎么去降低价格……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暗地里塞给你 10 万美元，你会不会接受呢？在我那个时代——我现在已经 57 岁了——有那么一个阶段，我认为和我一起出差旅行的一些人都非常诚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知，而且，那时候的我对他人品性的判断也非常糟糕。所以，这一切都没有表面上看得那样好，里面有很多障眼法。直言不讳地跟你说吧，在我碰到的人中，有道德的人并不多。我真的很少碰到有道德的人。所以，你就必须调整好你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在温哥华有家庭生活、可以让我重新调整是一件好事。

尼科洛在这里所指的是一些关键时刻，这时，人们必须重新评估内心的道德指南针。作为外国投资者，刚来这些地区时是人们开始质疑或反思道德问题的关键节点，但随着交易的进行，他们还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评估和回应。例如，在我请尼科洛更加具体地

谈谈那些促使他调整内心道德指南针的情形时，他像克里斯托弗和哈里斯一样，也提到了卡拉 OK 派对和贿赂行为，以及接受人们在各种障眼法中展示他们自己的过程。对尼科洛来说，温哥华和东南亚之间的严格界限，有助于防止他自由落体般坠入（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哈里斯所描述的那种不道德的世界。当我问尼科洛如何与挑战他内心道德准则的人合作时，他说：

这真的是一个问题，也就是你怎么做生意，以及你愿意为了钱而放弃什么，这就是问题所在，对吧？你能被收买吗？你是否又能出卖谁？你晚上想睡个安稳觉吗？说真的，你遇到了多少真正有道德的人？请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我保持沉默，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儿他问的这些问题，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稍事停顿后，尼科洛继续跟我说，在每段商业关系中，合作双方都要能觉得他们各有所得。在该地区经商的关键在于，要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让每个人都能赚钱，而国家也能感受到经济的增长。贿赂之所以成为这个方程式中不可预测的变量，终归还是在人。

181

尼科洛对我大谈特谈了一番他如何通过分隔工作和生活领域来解决他的道德困境，他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他在亚洲作为外国投资者、乘飞机到处出差旅行的生活方式，另一种是他在温哥华的家中过的温馨的家庭生活。他对我说：

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他们让我稳住重心、脚踏实地。他们对我而言确实如此。当我第一次去东方投资冒险时，我还感到很失望，因为我的家人似乎对此并不关心，也懒得过问……出差旅行是孤独的，当你在这里时，你的脑子里就会

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这里有这么多的诱惑，你也能看到，有这么多的家庭最后都分崩离析了……精神崩溃、偏执狂，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心理问题。但现在，对我来说，让这些不同的世界分开来是很有必要的。有些孩子，最好永远也别知道父母为了养育他们所做的那类事情……你知道的，对吧？

对尼科洛来说，在亚洲的“灰色地带游走”就是要在地理空间上划清界限，区隔他在其中赚钱的生意场和神圣的家庭生活领域。在我们的采访中，他坚持认为，在东南亚这个新的地理环境中，其他所有人都是腐败或不道德的。与此同时，他又不希望灰色地带的残酷现实影响到孩子们的世界观，所以，他倒是很乐意让他们一直留在加拿大。他的家人对东南亚缺乏兴趣，这也有助于他维持好这两个分开的独立领域之间的边界。他有雄厚的财力，能够定期离开东南亚，飞回自己位于加拿大的家中，这也有助于重新校准他内心的道德指南针，以避免自己成为克里斯托弗所称的那类“穴居人”。

在没有道德指南针指引时——盗窃就是这场游戏的代名词

保罗（Paul）是一名30岁出头的律师，他曾在澳大利亚接受律师培训，最近离开了一家精品律师事务所，该事务所在新加坡、曼谷、越南和柬埔寨都设有代表办事处。在采访保罗之前，我对他做了一些背景调查，发现他在越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三年，之后该事务所的两个合伙人要求派他去缅甸，带头在那里设立一个代表办事处。在缅甸尝试设立新的办事处两年都未果后，保罗便辞去了在该律所的工作，并在当地开设了一家自己的精品律所。

在缅甸的第一家律所工作了不到一年，保罗便在领英上将他的自我介绍更改成了金斯顿—瑞律师事务所（Kingston-Swe Law

Offices) 的管理合伙人, 这是他与缅甸当地的一个合伙人共同打理的公司。保罗没有正式的办公室, 而是在他位于仰光的公寓大楼的客厅里设立了一间办公室, 而且, 他所有的业务也都是来自熟人推荐。我们约在他公寓大楼下的一家咖啡馆见面, 他通常也在那里进行一些商务会面。在采访中, 我问他为什么会离开之前那家律所。保罗直言不讳地告诉我, 他的前老板马克 (Mark) 曾多次因逃税和行贿而被定罪。他进一步解释说, 那个家伙 “(就是) 一个反社会分子……有很多关于他的黑历史, 但他花钱请了一些搜索引擎优化专家, 让他们帮忙从搜索结果中撤下了有关他的那些黑料。那些专家还给各大网站发信, 要求他们删掉有关马克的这类负面爆料”。保罗告诉我, 他花了很长时间清理马克丢下的烂摊子, 而根本不是在处理法律上的业务。他的前老板曾经在荷兰学习法律, 但似乎从未在那里执业。他直接进入了一家税务咨询公司, 并在波兰和比利时实施过逃税计划。他赚了数百万美金, 然后就跑到了泰国…… “把钱全部挥霍在可卡因和妓女身上, 接着, 他又在泰国入狱, 坐了一阵子牢”。

保罗声称, 当他开始为马克工作时, “他当时正在开展的业务计划都是合法的, 但回顾性 [retrospective, 他可能是想说 ‘有追溯效力的’ (retroactive) 这个词] 立法则使一切都变成了非法业务”。欧洲当局就这些逃税案在四处寻找马克的时候, 马克早就跑到了柬埔寨, 他又在那里重新创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提供税务咨询服务。该公司随后又搬到了越南, 他们在那里进行一些非常狡猾、难觅其踪的交易。保罗还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 在柬埔寨, 有一位美国投资者向马克买一份特许经营权, 并附带给他 350 万美元的疏通费。那个美国人之所以会联系马克, 就是因为马克臭名昭著, 是那类会帮你打脏款的家伙。保罗也不知道马克是怎么做到的, 但他的确做成了这笔交易。可当马克去柬埔寨收取酬金和疏通费时, 航班一落

地，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叫他半小时后立马返回机场，再搭乘飞机离开，不然他就要坐牢了。马克被他一直贿赂的那个政府官员给设计陷害了。

跟我详述了这种情况之后，保罗接着又说，这件事深深动摇了他内心的道德指南针，以至于最后他不得不离开那家公司，自己再去重新创立一家公司。危险的红牌警告实在是亮了太多太多次了。他为之工作的那个人参与了各种各样的盗窃犯罪。保罗跟我说：

这种工作环境真是太有毒了。你通常不会被他要求亲自去做什么违法之事。你知道，马克这个人非常幼稚、不成熟，也很粗鲁。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那是挺有毒的一种工作环境……我一直在想，他应该还没有傻到让律所的两名律师都参与腐败活动的地步，因为要是那样的话，你还如何能对你的腐败活动保密呢？

许多前沿市场都吸引了很多像马克这样名声很坏的外国人。如果你真的很擅长你所做的事情——虽然我这么说会带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也显得我卑鄙刻薄，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擅长你所做的事情，而且你也真的能在新加坡或曼谷好好赚钱的话，那你又为什么会跑来缅甸呢？大概率都是因为犯罪！所以，根据我的经验，盗窃就是这场市场游戏的代名词！

我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提问，保罗就接着说道：“让我来给你详细说说……我这个人很愤世嫉俗。有很多的精英白领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四处活动。”他就是在这时开始向我解释说，虽然西方人自诩来自发达国家，更加廉洁奉公，但其实，腐败往往会发生在“他们那里，而且是更大程度的一种腐败……那里的人真正知道它是如何奏效的”。从表面上来看，交易“似乎很干净……西方有权有势的

富豪经常会干这种勾当”。保罗的观点是：“千万不要认为，发达国家的市场就是干净的。那些来自西方国家的家伙带来了这些腐败计划，他们在比本地监管机构抢先两步的情况下来实施它们。”他又向我解释说，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会聘请一个律师”。他曾经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就是以这样做而闻名的，如果你想在这里玩灰色交易，你就会去找他们。

保罗告诉我：“这不是合不合法的问题。我在谈论的是道德问题，这关乎你在道德良心上是否问心有愧，以及你愿意在灰色地带走多远。灰色地带的范围很广，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些小额疏通费，然后就慢慢发展成了大笔的盗窃。”我甚至都不必追问保罗什么是他所说的“盗窃”，因为此刻的他就像泄闸的洪水一样，滔滔不绝地向我诉说。他告诉我，常见的西式腐败规模还要大得多：“因为你会聘请咨询顾问来疏通交易、促成付款，其实这笔咨询费会被转手打款给某个人，但在你的账面上，这仍然还是笔咨询费。”对保罗来说，为马克这样的老板工作也让他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大多数时候，这些犯罪之人都能逍遥法外。”当然，他说，“总是会有被抓住的风险，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不会被逮住”。但在每天照镜子时，保罗就是无法感到良心安稳，他也做不到在表面上和别人握手，转身又去偷人家的东西。他就是办不到，因为他就不是那样一种人。保罗相信因果报应，他确信，这一切最终肯定都会以某种方式再轮回到他身上，成为他所背负的“业”。

在这里，保罗所勾勒出来的是一个法律和道德的边界，围绕的是那些本身可能并不违法，但绝对是不道德或有违伦理的行为。随着谈话继续深入，保罗告诉我，这种工作极大地挑战了他的自我道德感，以至于他最终不得不辞职离开，因为马克的行为越来越明目张胆。我请保罗告诉我，让他决定辞职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他告诉我，那是由于一起马克充当中间人的贿赂和欺诈案。马克假

装自己与中东的某个人有关系，这个人据说握有政府方面的人脉，能够接触到一支主权财富基金^{*}。该基金将要投资越南的两个大型水电站项目。本来投资者有一笔贿款，那是准备支付给外国官员，感谢他们来投资的，但马克却将这笔钱收入了自己囊中，然后就直接撒腿跑路，离开了这个国家，随后又在缅甸设立了新的办事处。

随着故事的发展，马克决定在缅甸开设新办事处的真正原因也渐渐浮出了水面，保罗觉得，也是时候离开了，因为在一个“盗窃就是游戏代名词的世界中，人们总是在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永无宁日……”对保罗来说，这绝不是他想要的那种生活方式。他不想损人利己，靠着从别人那里窃取太多财富来取胜，他觉得要是那样做，他其实就是在掠夺潜在投资者的利益——不是指他们的利润，而是指他们的投资资金本身。对保罗来说，揩油揩走最上面的一层浮物（利润）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为了维持公司正常运转而行一些小贿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投资者能看到一定的投资回报就行。然而，保罗也给自己画出了一个底线，那就是不能把别人的投资资金花费在维持自己奢靡的生活方式上。对保罗来说，马克就是个罪犯，可以毫无羞耻地将他偷窃来的钱花在自己的奢靡生活上。“盗贼是没有荣誉可言的，因为他们内心没有道德指南针，也没有灵魂！”他如此激昂地宣称。保罗很担心，也想再次校准内心的道德指南针，因为一直看着马克继续过那种只瞻前不顾后、过河拆桥、没有退路的生活，他也早已筋疲力尽了。一方面，保罗不想让自己锒铛入狱；另一方面，他也为马克罪行的受害者感到痛苦。他最后辞职离开决定，不仅仅是出于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考虑，也是因为他越来越多面临问心有愧的道德拷问。

^{*} 指一种由国家拥有的投资基金，一般投资于股票、债券、房地产、贵金属等实体和金融资产。

然而，对保罗来说，辞去这份工作也让他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他不再有全职薪水，也没有能给他带来稳定业务的客户群。从头再来就意味着，他只能指望自己过往的个人积蓄过活，在住房的客厅里开设办公室，试图在那里建立起一种符合他内心道德准则的律师事务所。很显然，辞职的决定对保罗来说极具挑战性，因为这意味着他踏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里，诚实可能并不会产生最直接的收益。但是，随着保罗与马克的工作伙伴关系越来越紧张，马克缺乏任何道德准则的行为最终迫使保罗辞职离开，去自己开创一家律师事务所。在我们的采访中，我能感觉到保罗在做这个决定时内心的冲突与挣扎。最后，保罗还是决定斩断这种“戴金手铐”的风险，因为这不仅可能会使他身陷囹圄，而且也动摇了他内心的自我道德感，并给他带来了更加严重的焦虑。离开公司并自己从头开始创业是保罗能看到的唯一途径，这能让他摆脱所有道德上的问心有愧和良心不安。从许多方面来讲，保罗代表了被推到极限的一类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看到前任老板撒谎成性、偷窃和作弊成瘾，而且大多时候还都能逍遥法外时，他的道德底线也就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入狱的威胁并不是促成保罗辞职的终极原因，与此相反，正是他内心的道德感驱使他辞职，因为，他的道德指南针已经被拨到了灰色交易中过于暗黑的，他已经无法承受的地带。

185

* * *

我询问了很多不同的人对玩灰色交易有什么反思和感想，许多人不仅跟我诉说了他们要在其中应对和游走的各种道德和社会困境，还向我阐明了他们不得不去校准自己内心道德指南针的种种方法。布鲁斯·卡拉瑟斯（Bruce Carruthers）和特伦斯·哈利迪（Terence Halliday）等学者通过国家的视角研究道德问题，其研究

表明，成熟市场中的政府官员会致力于使市场中的道德良好，以此来作为一种激励方式，从而让普通公民增加投资。⁷

然而，在我能够联系并采访到的那些人中，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自己在灰色地带游走时，我发现他们脑子里很大一部份都在思考不同的道德辩护机制。他们不仅会花费大量时间来思考如何才能做到利润最大化，还会反思这些商业交易如何促使他们对其合作伙伴进行道德评估——当然，其中也有他们对自己的自我道德意识的反省。在采访中，他们仔细审视了过往的每一次交易互动过程，并评估自己是怎样不得不调整个人道德准则以适应这个市场的。与此同时，他们也评估了商业伙伴——看看他们是绅士还是穴居人。

在反思自己为何不得不在灰色地带游走时，人们一般会通过关系、地理空间和法律品格来区分市场道德的边界。在寻找合作伙伴时，他们划定了道德和社交界限，限定了他们将与哪些人打交道，这是由于他们面临着在那类道德上成问题但又可做合理辩护的活动中相互牵制的压力。为这些活动辩护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这些道德上成问题的活动在东南亚是经商的常规做法。其次，人们认为这是为了家人的财务健康而甘愿做出的终极牺牲。

还有一些人是通过地理和物理空间来划定严格的道德界限的。作为世界公民，他们的资本网络大多跨越了多个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因而，他们的主观角色和地位也会随着他们所嵌入的不同文化环境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他们的自我意识提供了一种更深入也更具个人化的观点，即人们会根据自己在这些网络中不断变化的位置，来校准内心的道德指南针，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前沿市场。在本章中，尼科洛的例子说明，在全球市场中人们可以依据两套不同的道德秩序准则来运作，在一个地方以一套方式行事，而在另一地又以另外一套方式来行事。对于那些经商时内心没有道德指南针的投资者而言，盗窃就是这场资本游戏的代名词。但是，像保罗这

样的人却难得地看到了盗窃行径的局限性，因为他被推入了一个有毒的工作环境中，在那里，他感到自己已经被逼迫到了极限，以至于最后不得不辞职离开。保罗的例子足以说明，无论在什么样的文化环境或地理空间，人的道德良知和正直诚信总是有一定忍耐限度的。

统而言之，这些人的例子共同强调了个人在这些资本网络中所建立的道德辩护机制。每个人都会对自己做出评估，他们也会对自己是绅士还是穴居人的身份做出评判。他们会反思的其他内容，还有他们的合作伙伴是谁、他们未来将会与谁合作，以及当面临多维度的道德困境时他们又将如何与这些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打交道等。尽管这些都是非常个人化的经历，但正是这些经历促使人们去反思和审问自己身上的道德良知，看看自己是否问心有愧，以及为了追逐财富甘愿在灰色地带中走多远。

退出市场：盛宴与饥荒

在前沿市场投资经商，得到的不是盛宴就是饥荒。这是极具风险的，明明你的投资今天还在上涨，第二天可能就暴跌了。要是你经历了投资后颗粒无收的大饥荒，并直接亏本触底，那事情就会变得异常危险。当你看到投资正在暴跌（并陷入）大饥荒时，你会挫败到丧失一切信心，只能看到自己身上最糟糕的一面。

——丹尼尔，一位 50 多岁的加拿大投资者

对于像丹尼尔（Daniel）这样在越南和缅甸等前沿市场大量投资的人来说，“退出”——正如他们所称呼的那样——是指投资者出售其公司股份的过程。退出市场时一般会涉及两个极端，要么是盛宴，要么是饥荒。“盛宴”指在收获巨额利润后退出市场的经历，而“饥荒”则是指投资者在遭受惨重损失之后黯然退出市场。我正好采访了 14 位相关的投资者，他们都处在清算资产并打算从这些前沿市场中退出投资的阶段。在我采访的这 14 人的小群体中，只有两位投资者收获了投资“盛宴”，也即以巨额利润获得了投资胜

利并打算退出市场。而其余 12 人则都因为遭受巨大损失而陷入了投资饥荒的境地。

从本质上来讲，盛宴和饥荒属于协调和破坏两种关系的产物。能否成功退出这个市场取决于投资者的协调能力，在蛛网中的每只蜘蛛都可以在这种协调互利的关系中获益。然而，当贪婪占了上风时，破坏关系就会导致两种可能的结果：（1）其中一个投资者通过欺骗合作伙伴捞走了更多利润，或者（2）这种破坏关系渐渐演变成了一种一损俱损的相互毁灭的关系，它毁掉了将资本蛛网连接在一起的那些关键蛛丝。在本章中，我一方面会关注最终收获盛宴和落入饥荒的投资者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为了使资本具有一张更加人性化的面孔，我还将重点关注在这个市场的盛宴和饥荒中那些私密、个人而又具体的个体经历，并会审视投资者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个市场上成功或失败的关系。

从作为一名研究者的经验来讲，我对成功退出的精英投资者的采访时间都比较短，基本上持续一个半小时左右。我能感觉到受访者表现出不耐烦，想要快点结束采访，因为鉴于他们新近获得的成功，很多人都争先恐后地想要采访他们、占用他们的时间。然而，我对那些在市场上损失惨重之人的采访时间却都十分长。其中有一次采访持续了整整七个小时。他们围绕着投资饥荒经历的叙述，使这些资本网络中的蜘蛛显得更富人性，也刻画出了在充满风险的前沿市场中的经济不稳定，而这也是以往研究精英的人很少会去关注和审视的方面。遭遇投资饥荒、赔得血本无归的经历，对投资者个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为这些人与当地合作伙伴、政府官员和投资合伙人就他们之间的关系中相互挟持的经历进行谈判，导致最后失败退出。虽然我并没有能力改变他们在市场中的地位，但其中的许多受访者还是愿意花好几个小时与我交谈，因为他们相信我有能力写出他们的故事，从而为那些想要在他们之后进入这些市场的人给出

一些警示。本章仔细审视了一些投资者个人的故事，深入探讨了拉里（Larry）和埃文（Evan）收获投资盛宴的经历，并探讨了乔治（George）和达米安（Damien）讲述的引人深思的有关投资饥荒的经历。在本章中，我着重强调的是盛宴和饥荒的结局给投资者带来的社会—情感性体验（socio-emotional experience）。

盛宴和饥荒的经历共同凸显了一种特殊的经济不稳定性，这是从属型蜘蛛在与全球的主导型大蜘蛛的关系中所感受到的。成功退出市场的富豪渴望能够成为主导型大蜘蛛，在退出市场之后，他们可能会休息上一阵子，但一直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在他们脑海中挥之不去：应该如何与市场保持关联，以及如何将他们的巨额收益转化为更大的利润。那些血本无归、失去一切的人报告说，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想弄清楚该如何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里编织起新的资本网络。这些故事共同表明，对于寻求开拓前沿市场的一些全球精英来说，利润从来都不是直截了当和光明正大地获取的，因为他们面临着来自商业伙伴的多种不同方式的阻力，此外，那些努力编织自己的新蛛网的小蜘蛛，也在伺机出卖和欺骗这些资本大蜘蛛。

盛宴：赚得盆满钵满

189

拉里和埃文都刚刚成功退出了市场。这两人也都表示，他们的投资之旅要比最初预计的多花了很多年。私募股权投资者初入这些市场时定的目标，通常是在投资五到七年后退出市场。然而，拉里和埃文都在前沿市场上待了十多年，他们都做过新公司的创始人、普通合伙人和关键股东。在成功退出市场之前，他们的公司都经历了专业化的转型过程，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将其转手给新来的投资者。投资获胜的经历揭示出了个人的焦虑和恐惧，人们对撤离市场后的自己会变得无关紧要而感到焦虑不安，或者又会因为错过新兴

前沿市场中的下一个投资机会而感到忧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投资盛宴的故事中，我才开始了解到，相较于超级大富豪，富豪对经济不稳定感的感觉更强烈，哪怕他们已经赚了大笔钱，也总想着要将自己的净资产再翻一番甚至增至三倍，并因此而备感烦恼。

拉里

拉里是一位加拿大公民，但在东南亚地区工作了 20 多年，在能源和自然资源领域的私募股权赛道上取得了卓著的成就。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他第一次来到越南，在其职业生涯早期的大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致力于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转型，通过使用他所谓的“有缺陷的体制”来获取勘探、采矿和投资方面各种不同类型的许可证。拉里以 15 万美元的资金与他人共同创立了一家矿产公司，筹集到了很多资金。十年之后，他以超过 2.5 亿美元的价格将该公司卖给了一家亚洲投资基金。与此同时，他还是另一家天然资源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这家公司最后也以 5000 万美元的价格被收购。

在这些投资都成功退出市场之后，拉里本来可以轻松在越南退休，好好与妻子过安稳舒适的生活。然而，他因成功退出市场而受到了铺天盖地的宣传，这些宣传又引来了一批想要利用新兴前沿市场来赚钱的投资者——有些甚至还是资本大蜘蛛。由于这些新的人际关联，拉里决定，他要再去追逐一些更新的前沿市场，因此他又开始探索缅甸和柬埔寨的天然资源领域，其中包括可再生能源和绿色能源。他还担任了其他几家已经上市的天然资源公司的独立董事。

拉里第一次成功售出投资项目是在 2000 年前后，我请他描述盛宴时刻有什么感受。他停顿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

后抬起头说道：“是解脱感……我感到如释重负。”多年以来，他一直在那个项目上纠结，总是要处理许可证方面那些不可预测的问题，还要在不断变化的股东之间搞好人事关系。有些时候，他也曾充满深深的疑虑。但在成功抛售投资项目之后，突然之间，一切的疑虑都已消散，特别是在他将利润分给了所有相关人员之后。

他告诉我，他只是“纸面富贵”（rich on paper）*，纸上财富的基准线水平比较高而已，这就使他能够去探索一些新的投资机会，也不用像其他人那样焦虑或者不安。虽然他在成功退出投资那一刻感到安心，但他还没准备要完全放弃工作。他很难想象退休后的那种简单闲散的生活，因为他担心自己会感到孤独。工作能帮他感受到与他人的联结，也能让他去探索和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而且现在，他也已经成长为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支配型大蜘蛛了，他想要在新的市场领域中找到成长和重塑自己的新方式。

在我遇到的所有人中，拉里可能是最低调的一个。他一点也不浮夸炫耀，不会花时间泡在昂贵的酒吧或餐馆里，也不喜欢在有任何邀请他参加的社交名流团体或耀眼炫目的活动中被人家“看见”。拉里不会将他自己与更有钱的富人比来比去，他更喜欢跟一堆学者和艺术家待在一起，花上好几个小时与学者谈论历史，或是与艺术家探讨他们增进技艺的方法。即使是在我陪同拉里去参加的那些社交聚会上，他也会花更多时间来询问他的同伴，却很少谈起他自己或他的工作。在工作中，拉里经常被地质学家所吸引，会与他们一起前往世界各地的偏远角落去参观、勘探和挖掘各种各样的矿藏。在这些地方，他就不像之前那样慎言了，而是不惜花费几个小时来

* 指因为股票的新奇性和部分公司估值的困难，某些公司的股票被炒上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高价，这就会造成公司的原始控股股东看上去十分富贵的现象。

谈论某些天然矿物的不同特性。对他来说，最有趣的是待在那些对科学比对金融更感兴趣的人周围。

为了与更广泛的人群建立人脉关系，他打算将他的角色和资本蛛网扩展到东南亚的其他地区，比如缅甸和柬埔寨。拉里能力出众，很快便成为一名从事不同勘探任务的独立董事，与此同时，他也通过开拓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一些潜在投资机会来管理他的资金。拉里还加入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以便在采矿、天然资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建立一些公司，力促这些公司成长壮大，并安排好最后的退出机制，以此来积极地管理他自己和其他人的私募股权投资。

191 拉里在管理资本收益方面积极主动，但是，埃文的投资盛宴故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走向。埃文的故事揭示出，高净值人士和金融服务提供商在构建部分蛛网方面发挥着积极主动的作用，而这不仅遮掩了蛛网资本主义的结构，也遮掩了在其结构背后运作的代理人。

埃文

埃文是一名美国人，曾在华尔街从事金融服务行业，他那时过着舒适的生活，刚 29 岁就已经年收入超过 30 万美元了。虽然他赚的钱已经比他父母毕生赚的都还要多得多，但他觉得生活缺乏目标感，不够刺激。他涉足越南市场其实始于一次度假之旅。在那次度假中，他与当地街头小贩多次交流，在这些交流中，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吸引他的那种活力和创业上的蓬勃生机。这个市场有很大的潜力，他惊叹道。他与一位已经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朋友取得了联系，之后便决定带着他的 15 万美元现金积蓄去往越南。来到越南以后，他先是在一家公司里工作，该公司主要是为越南的企业创建网站。这也使埃文能够尽快熟悉这个国家和市场，他后来成立了一家自己的求职公司。

在创业早期，埃文公司的运作方式很像一家科技创业公司。他们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了一家作为离岸工具的公司，以便获得代表办事处执照。在公司成立初期，他们也通过“先行一步、抢占先机”的普遍做法来运营业务：一方面，他们创建了平台后就立马开始运营；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等待官僚机构通过缓慢的手续流程来给他们颁发正式的营业执照、设立代表办事处，并将他们注册为一家当地公司。回想起来，这种设置其实非常冒险，因为越南当时还没有一套关于外资所有权的明确法律。他们聘用了一位名叫兰（Lan）的越南当地女性，埃文想将她指定为公司的代理人并会支付她一笔薪水，她同意“在纸面上持有这家公司”。他们付给兰的薪水极大地改善了她的生活，以至于她完全信任他们，甚至在没有阅读条款的情况下就签署了埃文要求她签的任何东西。在公司内部，埃文聘请了一位办公室经理，此人还兼任公司律师和会计师，主要负责全权打理与当地行政区领导的关系，后者经常会要一些“喝茶钱”，这样他们才会得到一些内幕消息。例如，如何以及何时给其他“检查员”——比如，当地的消防部门——打些小费。

让我们快进到12年之后。此时，埃文和他的同伙曾多次尝试退出市场并售出投资生意，但这些尝试都失败了，所以他们最终聘请了一家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来帮他们打

192

理这笔生意的抛售过程。这家投资银行帮埃文推销，并最终以2400万美元的估值将他的公司出售给了一家日本公司。按照这一估值，他们以22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该公司89%的股份。在缴纳完税款并给其他股东分成利润后，埃文净赚了1200万美元。

在最初的这笔交易中，他不得不去新加坡签署所有文件。等文件签署工作都完成以后，他留在新加坡等待钱款进账。终于，在交易完成当天，新加坡时间晚上8点钟左右，资金到账了。埃文回忆道，为了庆祝一番，他自己去了酒店的酒吧喝了几杯酒，以回味钱终于

到账的事实。然后，他就回自己的房间睡大觉了。凌晨1点钟左右，他的电话铃声响了，出现在他的手机上的的是一个美国号码。

在跟我描述这通电话时，埃文说：“整件事都叫人很兴奋，因为那是摩根大通银行。他们说，‘欢迎成为大通银行的私人客户（Chase Private Client）’。我已经从普通民众级别升级成了大通的私人客户，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来回味这一点。”我让埃文说说大获全胜的盛宴时刻有什么样的感觉，他回答说：“突然之间，所有财务上的不确定性都消失了……虽然只是些金钱……还有，‘金钱买不到幸福’的陈词滥调，也的确是真的……一旦我拿到了钱，我就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压力，我想要保住我的财富，并追求新的理想……因为如果我这次能赚到钱，那我应该还能赚到更多的钱。”

埃文在摩根大通银行的钱存入的是现金储蓄账户，而不是投资理财账户。在华尔街的工作经验让他对私人银行家抱持着谨慎态度。所以，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就坐拥这些钱，什么投资也没有，只是做一些触及灵魂的自我反省。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埃文也像拉里那样，决定要好好管理自己的资金，去投资其他创业公司，并支持年轻企业的发展。这些投资的进展都很顺利，而且也让他增长了见闻，他觉得很有趣。但是，新一轮等待期又开始了，埃文投入了他的新资金，并等着看他能否将自己的1200万美元翻一番到2400万美元。那是他定的新目标。对埃文来说，盛宴不仅仅是在投资胜利和成功售出后退出市场。事实上，他所认为的盛宴恰恰相反：它是指要找到一种新方法来保持与投资市场的关联，继续待在资本游戏中，继续扩大他的人脉网，并赚取更多的钱财。

在我们的第一次采访后过了将近4年，我联系埃文进行后续跟进采访，以便看看他在这个新目标方面的进展。在经济精英的阶梯中，埃文希望自己能再上一层，从富豪层级攀登到超级大富豪层级，但是，由于整个世界在新冠疫情期间都陷入了危机，埃文也开始觉

得他的攀登之旅岌岌可危。在三年的时间里，有几位财务顾问联系他，想提供专业服务来帮助他管理资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埃文很快了解到，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资本正流入私人的家族办公室。这些家族办公室与一系列区域性金融服务供应商都有关联，这些服务供应商拥有设立和打造投资工具的专业知识技能，这些投资工具就是一些金融结构，能够使他利用专门为该地区的新技术投资所设立的免税期。

他们还帮助埃文将投资转向了新的经济领域，即从科技行业转移到制造业和物流业。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全球个人防护物资严重短缺，埃文便利用这个机会，投资了一些致力于提高相关供应链效率和多样化的企业，从而收获了巨大的利润——这同时也巩固了越南作为西方国家个人防护物资供应商的地位。

转向新的市场和经济领域就意味着，埃文不得不依赖这些金融和公司服务供应商。他们为埃文提供专业化服务，帮助他设立新的离岸公司，扩大他目前所处其中的新资本网络。只要他能够从这些投资中获得股息，就不会关心这个资本网络上的技术性细节。事实上，当我问埃文是否见过参与构建他部分投资的公司秘书或律师时，他告诉我没有。埃文将大部分管理这些关系的工作都交给了他的财务顾问去处理。

这些与埃文的后续对话，揭示出了资本蛛网的社会化特征，也进一步阐明想要为全球资本描摹出一副面孔是充满挑战的。像热带雨林的那些社交蜘蛛一样，富豪 / 超级大富豪已经雇佣了从属蜘蛛大军，他们各司其职，协同合作，为富豪 / 超级大富豪打造了这些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资本蛛网——这是一种没有明确开始或结束的三维结构，因此，它既难以再现或复制，也难以追踪。

饥荒：赔得血本无归

194 许多投资者都说，他们最害怕的是投资失败并失去一切，毕竟他们最初是靠着一种“直觉”的驱动才进入这些高风险和无法预测的市场。被捣毁的资本蛛网充其量只是破坏关系的一种表现，它在最坏的情况下就是共同毁灭。在这个市场上遭受巨大损失的经历使人们陷入了情绪的最低谷，甚至是充满绝望。事实上，当我与那些正遭受如此惨重损失的人交谈时，他们都还没来得及处理好这些事件，不知道自己该如何从中恢复，也无法想象该怎样重新开始。

虽然我没有大规模的定量数据可以用来计算人们经历盛宴与饥荒的概率，但我的确拥有丰富的定性数据，它们都来自处于饥荒状态中的投资者，因为他们正试图理解他们的损失和随之而来的关系的破裂。蛛网资本主义严重依赖关系性联结，当这些关系性联结分崩离析时，投资者将遭遇的就绝不仅仅只是金钱上的损失。这些关系破裂时刻将影响和重塑他们对曾经信赖的合作伙伴、他们自身，甚至是他们曾深刻认同的自己的市场投资地位的感受。

由于资本蛛网最终被捣毁，乔治和达米安都各自损失了数百万美元。在他们跟我描述他们认为问题出在哪里时，这种经历对他们而言仍然难以承受，而且极具创伤性。对乔治来说，他与政府方面关系的破裂导致了巨大的损失。而对于达米安来说，当地合作伙伴的抵制给他和他的外国合作伙伴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乔治

在采矿和天然资源投资领域，乔治的经历就与拉里完全不同。乔治与越南的关系始于1989年的第一次越南旅行。当时，一小群投资者来到越南，准备寻找所谓的“黄金国”(El Dorado)，后来

这个词就被他用来指代他的公司。鉴于越南的采矿行业规模非常小，我决定不仅要对矿场的名字作匿名化处理，甚至要对矿产资源本身作匿名化处理。出于本书的匿名性目的，我将会使用“维特拉尼姆”（vietranium）来作为乔治提到的真正矿物的化名。

乔治告诉我，在当时，“典型的矿区往往都开发得非常好，管控严密，所有权也被严格控制。所以，你总是得继续寻找，最好有机会能找到一些更好的东西，一些更大的矿藏资源”。他当时在澳大利亚工作，那里已经很难再找到好的矿物开采地了，因为所有主要的矿山也都已经利用先进技术勘探过了。

于是，越南对乔治和他的团队就很有吸引力，因为彼时它才刚刚对外开放，也还没有利用现代技术来勘探矿产资源。乔治告诉我，他们对此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回顾过去的历史即可表明，曾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家到越南开采矿物资源。在筹集资金的一次公司路演展示中，他们做了一个幻灯片展示，详细介绍了可以追溯到1850年的越南采矿历史，当时是中国采矿者首次发现了“维特拉尼姆”。接着，在20世纪最初的一些年里，一家主要的英国开采公司通过挖掘有限的坑道开采了一些小而浅的矿坑。在1950—2000年的某段时间内，来自某个国家（根据我们的采访内容，很可能是指泰国）的一群人也挖了几条矿场坑道，但他们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矿物的价格实在太低了，不值得他们费力勘探、开采和挖掘，于是便结束了勘探开采作业。

从乔治的立场来看，他的团队对这种矿物的投资也具有内在的风险，那就是要处理好与越南政府方面的复杂关系。乔治认为，与他打交道的国家政府官员并不了解“现代商业的运作结构，也不了解矿物研究和探索阶段所需要具备的技术”。与此同时，他也感受到了政府官员的担忧，要是乔治和他的团队控制了这种矿物资源并且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官员就会觉得很不公平，他们认为，这种

矿物是越南的一种天然资源，因此，取得的任何利润都应该属于越南人民。

与这个市场上的许多其他投资者一样，乔治与被称为中间人或经纪人的中介方合作，这些中介是帮他与政府官员谈判打交道的关键，正如乔治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不断协商和变化的过程”。法规和立法上的不明晰就意味着，开采流程的每一步都必须要有协商谈判。此外，由于担任政府要职的官员每隔几年就会换届，所以，所有这些关系都必须在每次新选举之后重新协商，这就使得制订长期计划变得异常具有挑战性。

鉴于乔治在越南生活多年，其他投资者就会认为，他最知道如何与政府方面打交道，也肯定会在这方面游刃有余。事实上，投资于不同经济领域的其他几位受访者也是这么告诉我的，他们经常会去请教乔治怎么和政府方面打交道。所以，我便问乔治，这些年来他在和政府打交道方面的策略是如何发展演变的，他回答我说：

这正是在越南要处理的一个谜题。我认为，你永远也不能完全解决掉这个谜题，因为这个谜题在不断地变化……这就好像其政治制度被设计出来（是为了）没有人能真正获得全面的决策权。它总是需要来自他人的支持。那些政治联盟或忠诚同党都是不断变化的，他们都有用于不同项目的不同政治资本，而且，风向也在不断变化。你总是会陷入一阵迷茫，想知道你是否会有足够多的支持来让项目进展顺利。

196 乔治继续向我描述说，“我 70% 的时间都花费在如何与政府方面搞好关系上”，他还跟我说，对他来说，最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与勘探、开采和生产等实际采矿过程关系并不大，反而更多的是与政府官员不断协商谈判的动态关系有关。这类投资严重依赖国家官

员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互利关系，当这些关系在控制权和利润分成的拉锯战中惨遭破裂时，它可能就意味着，整个投资也都打了水漂。

在30年的投资过程中，该项目从各种来源筹集了超过1.4亿美元的资金。乔治解释说，要是这种关系管理得当，事情进展顺利，“（我们的）投资资金也会很充裕，那么，每个人也都能分得一杯羹，拿到报酬”。

从乔治的立场来看，在他成功管理这些关系多年以后，政府发现，该矿业在商业上已经可以独立发展了，于是，他们便通过发出补缴税单的方式想要有效地迫使他们停业。政府此举是为了把外国投资者赶出越南市场。乔治继续跟我解释说：

有一天，我们一觉醒来，税务部门就过来说，我们欠他们1500万美元的税款，与此同时又无凭无据。他们对其他人（乔治在另一家大公司做高管的朋友）也做过类似的事情，而且我认为，还有另一家汽车公司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这就是一次敲诈。财政部告诉那些效率低下的政府部门，他们现在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这就像过去的国企那样，政府会让企业缴纳更多的资金来满足国家的预算开支……

乔治解释说，这件事也很难让律师参与进来，因为本地和国外的律师事务所在越南都不能很好地执业。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法律，这些法律并不符合国际标准。他向我解释说，法治“绝不是基于蛮力的法律，在这种法律中，政府只会不断地发号施令”。乔治说，与此相反，根据他的经验，这“主要还是（一种）协商谈判”，在这方面，他就必须依靠他与某个部门中的某个人的关系，来与另一个部门中的某位政府官员合作。例如，乔治的公司与科技部的代表关系更密切，他们也能更加准确地了解乔

治的公司在矿产勘探和加工阶段的报告，并向税务部门提出建议，说明在勘探阶段的征税方式不应该同矿物加工和分发阶段的征税方式相同。

197 尽管如此，由于乔治无法支付 1500 万美元的欠税，他们便处于一种“税收胁迫”（tax coercion）的状态。乔治解释说，这意味着税务机关会不断地过来拿走他们的发货单账簿，从行政管理上进行管控，给他们制造一场噩梦，最后，这的确会有效地导致他们停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乔治和他的团队开始积极游说多家律师事务所来帮助他们。然而，许多律所都拒绝受理他们的案子，因为此案涉及政府最高层的一些官员——乔治说这些人都“异常腐败”。有几家律所还告诉乔治，他们“不想”为了乔治及其团队的利益来“动用他们的政治资本”。相反，他们建议乔治尝试支付追缴税款中的 10%（即相当于 150 万美元）作为贿款。然而，支付如此巨额的一笔贿款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乔治向我解释的那样，他们的母公司已经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了，那儿依据的则是非常严格的证券法，因此，参与行贿可能会导致他们面临刑事指控并有人入狱的风险。

在乔治看来，在税收方面缺乏明确的法规就意味着政府可以任意征收 1500 万美元的补税，这将会使他们的投资处于一种不合规的状态，也会影响到他们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母公司。这种不合规状态可能会迫使公司破产，从而让政府有效地将他们赶出越南市场。事实上，多年以后，当我再查找有关乔治公司的信息时，我找到了带有破产申请的法庭文件。

乔治还跟我描述，他很难获得适当的媒体关注，也很难让他们来报道他们眼中这个故事的另一面。他将越南和韩国做比较，并告诉我，“有少数真正实力雄厚的越南商人同时也是政治家，他们正试图学韩国人的方式，收取全部的投资”。那些政客控制着媒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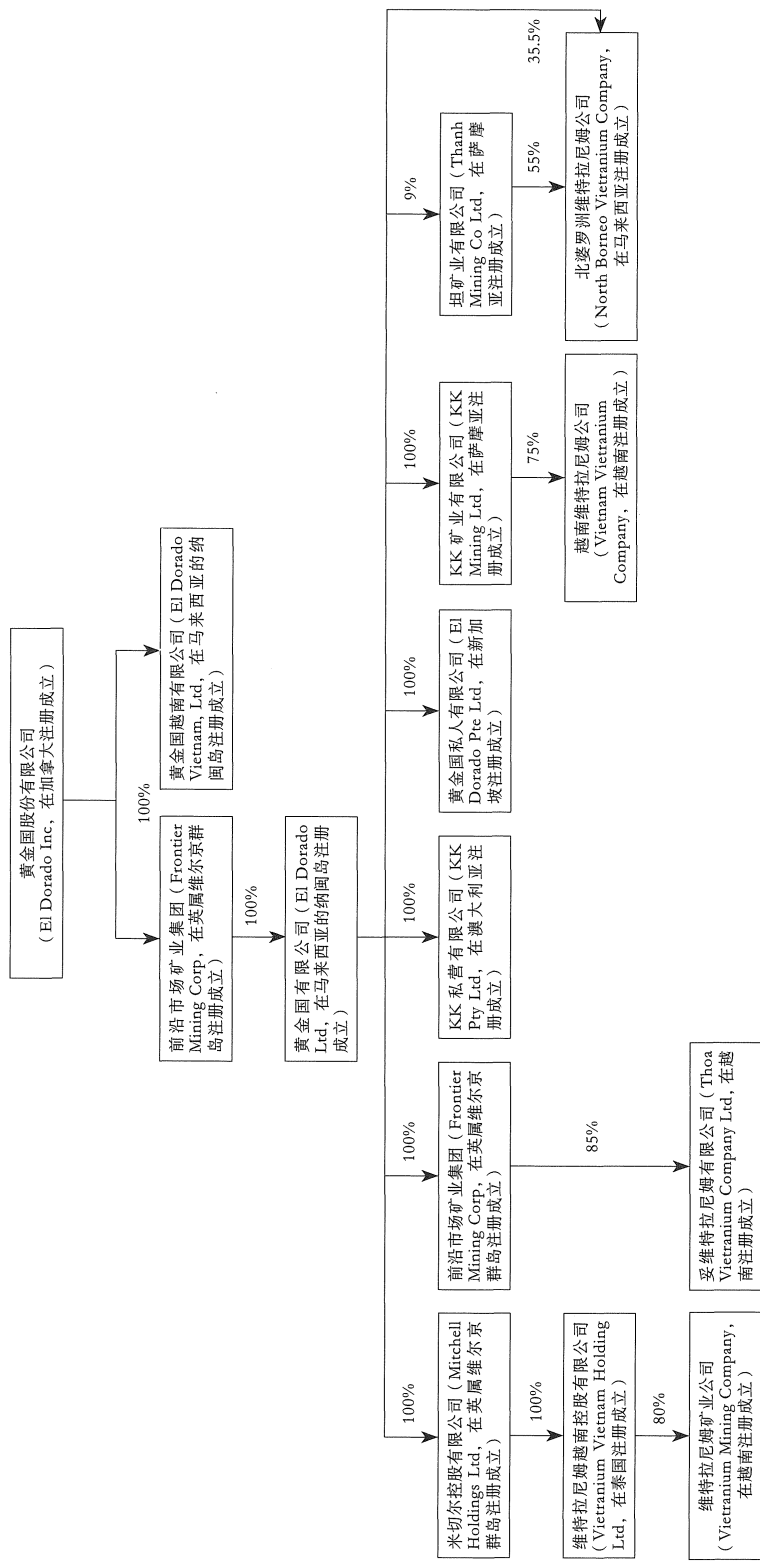
而且有能力对付外国的投资者，因为正如乔治告诉我的那样，“越南（的政客和官僚）都特别信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同时又几乎抱着仇外的心理。他们讨厌看到外国人来这里开采天然资源并从这个国家赚走钱财”。乔治所描述的是在这整个地区都会引起共鸣的一种紧张局势，当地政府精英努力驱逐外国投资者，以便将大部分采矿所得的利润都留在国内——这是反殖民主义的一种延伸。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些天然资源属于这个国家，因此，不能允许外国投资者轻易开采。

虽然我无法正式采访与这个特定项目相关的政府官员，但还是存在一些记者的采访和报道，它们有助于我从政府的立场来对这个案例进行三角验证。在接受一次采访时，税务局局长告诉媒体：“有迹象表明，这些公司将矿产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他们的母公司，又以高价进口材料来避税。”在这同一份报道中，该国副总理还告诉地方当局：“在颁发新的许可证给开采‘维特拉尼姆’的两家公司之前，我们必须收取他们所欠的税款来做担保。”¹ 2014年，这家矿业公司报告称，它已累计亏损了3000万美元，而这笔欠税是在他们报告了之后才评估的。政府官员这里所指的是这样一个流程：投资者在越南境内登记了负债，却同时在另一个离岸国家申报了资产利润。这表明，长期以来，外国投资者一直都在使用这些避税策略。

199

在阅读了政府官员的公开声明后，我查阅了法庭文件，找到了该矿业公司在宣布破产时拖欠税款的详细图表。法庭文件揭示出了这些公司具有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这导致政府最终得出结论：乔治和他的团队试图在越南境内逃税（详见图表7.1）。

图表7.1显示了乔治和他的团队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合法离岸结构。越南的实体公司只是泰国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的子公司，而后两者最终又是另一家在北美注册成立的公司的子公司。鉴于这种



复杂的结构设置，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政府会得出结论，认为乔治和他公司团队的收入报告不属实。

在两年的税收账单谈判都未果后，越南政府吊销了乔治的营业执照，迫使该矿业公司全面停业。公开报道称，在被吊销营业执照期间，该矿业公司已经损失了超过 1.45 亿美元。2017 年，乔治和他的公司宣布退出越南市场，并表示将出售这些公司以偿还债务。

然而，这些公司的买家却是该公司的两名前任高管。当地政府的顾问展开调查，他们这样告诉媒体：“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家负债累累的公司还能卖得掉呢？买家势必要先行了解这些公司存在的问题，因此，他们为什么要购买如此糟糕的公司呢？这是一个谜。也许，买家已经找到了解决公司这些问题的办法，还是说这根本只是外国投资者在玩的把戏呢？”（重点为作者所加）

乔治却坚持跟我说，所有这一切，都是越南政府为了抹黑他们在该国的形象而精心策划的伎俩。他坚称，公司的报账属实，还说他们是身陷一个坏系统中的好商人，据说，在这个糟糕的坏系统中，200每个人都会漏报营业收入。乔治说：

我们回应过（那些报道），表示我们是一家国际公司，我们已经在有信誉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了；我们接受国际审计师的审计，所以我们不可能那样做。但他们当时总有一种心态——他们不切实际，心里想：“我们知道审计师可以被收买，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的。”总之，他们不信任我们。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真的不相信我们，还是早就有把我们挤出去的打算，但结果就是，压力来自四面八方，也很少有人愿意支持我们。

坦率地说，我们不能支付这些巨额贿款；我们不能今天在这里支付 20 万美元，明天又在那里支付 50 万美元，之后又在哪儿支付个 100 万美元。这我们可做不到。

乔治向我阐述了他关于人们在越南创造财富的一套理论：“我认为，人们在越南创造的大部分财富都来自腐败和拿到内部合同……来建设基础设施、道路、桥梁、法院和机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坚信，在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中，私人投资者能够起诉政府。美国人在中国投资也有类似的问题，因为 97% 的经济领域都是由政府掌控的。”如果没有像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这样的协议给予全力支持，像乔治这样的投资者就无法与拥有当地法律支持的政府官员合作。在乔治的案例中，他的公司无法更新营业执照，当他们去人民委员会办理时却被告知，除非他们聘请拥有一定所有权占比的越南合作伙伴，否则他们都将无法更新执照。政府希望由越南当地的合作伙伴来控制矿山和资金流。

由于新闻媒体被国家控制，乔治根本无法处理这种紧张局势。乔治告诉我：“媒体受到了控制，当我们（对人民委员会）说，如果你们要继续征收补税，那我们宁可关闭，而他们的回答则是，‘不要威胁我们’……我们根本不是在威胁他们，这是事实！我们付不起那么多钱，他们又会说我们很小气……我们被困住了，进退两难。没有人会来买下这个项目，越南是个贱民（pariah）社会……没有人会投入更多的钱。”

201 乔治在这里所描述的，是黄金国矿业公司与越南政府之间最后摊牌和互相破坏的关系。他们双方都不信任彼此，不知为何，双方也都觉得自己被对方给彻底欺骗了。随着黄金国矿业公司向一些外国大使馆和政府寻求帮助，双方的紧张态势进一步加剧，但越南政府不愿意让步，这导致乔治和他的团队开始在同一集团内部对公司的出售和转让做财务策划。从政府官员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草率的举措。然而，在与政府僵持了两年多之后，乔治将他们在公司的股份卖给了公司的另外一群高管。不久之后，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他们便宣布破产并永远地离开了越南。在我与乔治的最后一次跟进访

谈中，他们正在伦敦寻求法律建议和公共关系方面的专业咨询，但他们对与越南政府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方案也不抱什么希望。

乔治所描述的那种损失非常难以承受，因为，近30年不间断地与政府协商谈判，最后却导致政府直接接管了他们的业务。这类损失也正是造成这些前沿市场充满风险和不可预测性的原因。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中，乔治已经在伦敦。他曾多次恳求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多位国家元首向越南政府施压，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最终乔治和他的公司还是决定从越南撤资。这次合作破裂之后，乔治一直在世界各地进行路演，他也会在这些路演中破坏越南的国家形象，警告潜在的新投资者注意在这些前沿市场中协商关系的风险。

达米安

正如当地的政治精英能够破坏投资项目一样，在与外国合作伙伴成立的合资企业中，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抵抗方式和破坏模式。关于前沿市场外国企业家的研究文献有许多，但它们主要关注那些因投资而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这些文献还会假设，相比于来自第一世界的外国人，第三世界经济体中的所有人都处于劣势、从属和弱者的地位。然而，这种二元划分并没有反映出资本蛛网不同部分的蜘蛛之间在破坏关系上所呈现的矛盾。

常驻新加坡的俄罗斯公民达米安也在技术领域进行投资，但与埃文不同的是，他用战争隐喻来描述他退出投资的故事。在这场达米安遭到“被投资公司挟持接管”的冲突中，他把当地合作伙伴使用的策略形象地称为“游击战术”。我在一家雪茄酒吧面见了达米安。我们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聊了五个多小时，这可能是我最难忘的一

次采访。达米安向我讲述的这个故事就像一个五幕剧一样，故事中的每一幕和具体细节都栩栩如生，在他重温和描绘这段经历的时候，我感觉当时自己也和他一起在现场似的。

达米安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专门投资他所谓的“投资不足的数字技术新兴市场”。他们在全世界各地投资，不仅在东南亚有投资组合公司，而且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也有公司。他们的大部分投资都集中在提供电子商务服务的数字技术领域。他将自己的商业策略称为“分散下注”（spray and pay），具体是指：“与一群不同的公司建立浅层关系，与一群你听不懂他们语言的人一起工作，事先知道大部分的投资都将会导致亏损，同时希望少数投资会产生足够的回报，以弥补整个投资组合中的损失。”他们的策略就是，在本地公司估值在 300 万—400 万美元时，尽早进入市场投资，目标是帮助本地公司发展 to 估值为 1500 万—2000 万美元的规模。

达米安说，在这个早期阶段，“我不会将（这一点）告诉我的投资者，但我们完全控制不了那类流氓企业家”。在关系重于一切的地方，这才是重要的工作。外国投资者必须对被投资的当地公司给予极大的信任，因为你要仰仗他们去承担与当地官僚机构打交道的任务，那是指“为了玩灰色交易，要让他们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正如达米安所指出的那样：“只要他们确切告诉我们他们有多少本账簿（审计账簿），我们就不会强迫他们坦承一切。毕竟，我们的目标是资本增值。”

2008 年，一位德国投资者来找达米安，他想去越南寻找一家目标公司进行投资。他萌生了一个想法，想要以 50 万欧元的成本创建一个电子商务平台。公司成立后，他们共同决定，要从德国、俄罗斯和新加坡的投资者那里筹集到更多资金，让投资金额达到 1000 万美元。这将是他们在东南亚的第一笔重大交易，为了能够一举成

功，他们感受到了空前巨大的压力。

就这样，投资了一两年之后，他们与当地合作伙伴——俊（Tuan）之间就开始麻烦不断。按照达米安的描述，俊“不知道如何扩大公司的规模，也不知道该如何与一支由负责专业化运营的工程师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更大的团队一起成长”。公司内部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因为这个当地合作伙伴不喜欢在他周围有这些经验丰富的资深人士向投资者报告他的现金流向。随后，该公司在4个月时间内损失了超过80万美元。起初，“没有人怀疑是俊在偷钱，因为他们都认为，俊也想在首次公开募股前将公司的业务发展到5000万美元，这样他才能够收取巨额回报”。

203

但当他们一致同意要去聘请一位称职的首席财务官时，俊就开始变得极具防御性。这位新来的财务官开始表达担忧，他认为，俊将个人开支与公司开支混在了一起。在高管们就公司为何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提出了几个问题之后，俊便打算要辞退由外国投资者引入的这些高管，而聘请了一些“可控制”的、完全没有业务能力的、不称职员工。达米安称被俊聘请的这群人是“一群滑稽的人物”。新的收银主管是俊的表兄，采购和销售主管是他的母亲，而新的会计则是他的姑姑，达米安形容俊的这位姑姑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可怕的女士”。

已经到了外国投资者必须要采取重大行动的时刻了。他们飞到越南，进一步“挑事”，试图将俊从公司中除名。他们向俊提出了一笔交易。俊留下他在公司的所有股份并拿着100万美元离开，老老实实去做公司的一名董事长，这样，他还能继续在越南市场上保住自己商界明星的声誉和地位。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居然有人在公然盗窃公司资产后还可以获得职位晋升和百万美元的私下和解，这不仅表明这里的盗窃行为是多么司空见惯，也表明投资者根本没有三思而后行，而只是想办法让俊带着这笔钱退出并保住尊严。

但是，俊并不打算轻易离开。他觉得“这个职位完全是他应得的权利，公司本来就是他的，所以，给他钱的人不应该对他施加任何义务”。在电话里，俊同意让位离开。所以，外国投资者都飞回了越南，以为他们即将签署在电话中已经商定好的新解决方案的新合同。

但就在这时，俊的破坏战术又上演了。

等外国投资者团队一到越南，他们就被塞进一间没有空调的小房间里。外国投资者本来预计将会与五六名公司的骨干员工会面并签署合同文件。但事实是，有 50 个人都挤进了这个房间，事情的走向也变得离奇而尴尬。等到房间里的人都到齐了，俊进来并说道：“你们都坐下来听吧。”在达米安告诉我这个故事时，他还颇不自在地笑着说：“就在这个时候，他团队中的第一个成员站了起来，开始用越南话阅读一张纸上的公告声明，俊给他做了现场翻译，他说的大致是：‘这是我们的衣食父母（father），我们公司的创始人（founder）和我们所热爱的领袖（leader）。我们永远不应该被卖国贼、一群投资者安插的外国人以及打压社会主义的……人所控制……’等等。接下来是第二个人，再又是第三个人和第四个人。”他们都宣读了类似的声明。

204 然后，俊以一种非常戏剧化的姿态说道：“伙计们，我本来是愿意退位的。请相信我。但是，公司的团队成员起来反抗了。要是没有他们的支持，公司怕是什么也干不了。你们瞧，我还是必须得留下来，承担起这份重任。”在达米安的当地合作伙伴这边，这变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抵抗形式。

投资人怒不可遏地离开了这个国家，并给俊发了一条信息，告诉俊他们知道自己都上了他的当，他们还告诉俊必须要让位，否则他们将会采取一系列法律措施来对付他。达米安继续说道：“那么，俊后来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他转身就把公司的董事会给解散了。”

达米安告诉我，这之后发生的事就是“共同毁灭”。他们找了几个驻越南的外国大使馆，并试图以所有可能的方式来阻止俊的行动。他们冻结了俊在新加坡开设的银行账户，还求助于越南政府和警察，试图阻止俊进入办公室。但他们对越南政府官员的呼吁并没有奏效。达米安笑着说道：“更有意思的是，越南警察部门各支队队长以上的每个警官都同步放假了，都不再（接他们打的电话了）。”

在他们推动越南政府进行干预的大约一个月后，俊离开了这个国家，并把所有的营业执照和公司印章都交给了他姑姑来保管。达米安说，他随后与这位姑姑的交流简直令人终生难忘：

这位 70 岁的越南老太太简直是个霹雳小火球。我们请她坐下来和我们好好谈一谈，就是简单解释运营公司所需的各项事项，包括文件、印章、资金等。

（她）面对满屋子怒火中烧的律师和投资人，却无视他们，兀自掏出了一部小巧而精致的手机。老太太打电话给她儿子——也就是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表兄，也是公司收银部门的负责人，并用越南语对他说了几句话，大致翻译过来就是：“我被当作人质给扣押了！赶快来救我！”

达米安告诉我，20 分钟以后，办公楼的门外就挤满了 200 来号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穿着公司制服。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公司的快递人员，他们可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人。这群人还带来了他们的朋友，所以当时在大街上出现了看起来就像是乌泱泱一大群抗议者在抗议的壮观景象。在外人看来，街上似乎要发生骚乱了，因为人群正试图冲破公司办公楼的大门。公司的一位经理率先在人群中高呼：“我们都是兄弟，我们都是朋友，我们都是越南同胞。”

俊的大家族所引发的这些戏剧性场景，感觉就像是在向外国投

资者集体发射的情感手榴弹。外国投资者没有对这种游击战式战术做好准备，这种战术不涉及实际的武器，而是利用情绪操纵工具。达米安和他的外国投资者团队都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场景。他们也都明白，如果俊不选择保持体面地退出，那他就会带着整个公司一起倒下。一方面这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如果忠于前老板的大批员工都辞职离开的话，他们也很难重建这家公司。

但事情还没有就此止步。在他们要求查看公司账目文件和相关的密码时，俊的这位 70 岁的姑姑告诉所有人，她忘记了所有的密码，不知道公司印章放在哪里，公司也没有剩下的钱了，她更不知道哪家银行存放着哪个账户。此外，公司的后端工程师还通过让电脑感染病毒而关闭了数据中心的所有系统。

总而言之，游击战式战术——让拿着公司印章和银行账户的老太太充当被扣押的人质，随后再自导自演一出抗议的大戏——都是当地商业实践中惯用的恐吓伎俩，为了让外国投资者和他们的律师感到寡不敌众，没有能力反击。俊和他家人的如意算盘可能是，希望投资者能在所有这样的情感消耗战中感到筋疲力尽，这样，他们最后就会放弃投资并离开这个国家，从而让俊及其家人实际控制这家公司，并在越南境内开展业务。

达米安告诉我，他的确无法应付这种超越了普通商业关系的“越南游击战式策略”。参与这场闹剧的不仅仅有俊的家族成员，还有公司里所有的当地员工，这迫使达米安只得退出投资。他将他们在新加坡实体公司的股份出售给了另一位投资者，也许这位投资者更有能力应对在越南境内的这种戏剧化场面吧。在退出这次投资之后，达米安和他的团队就彻底离开了越南。俊破坏外国合作伙伴的企图，最后以整个资本和关系网络的彻底坍塌而告终，这使达米安别无选择，只能退出越南市场。

盛宴与饥荒中的社会—情感性体验

在社会学家马里奥·路易斯·斯莫尔（Mario Luis Small）的著作《能够谈心的人》（*Someone To Talk To*）中，他强调，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大量证据都表明，当人们处在生活中的困难时期时，向其他人倾诉会显著改善身心健康。斯莫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人们遇到个人困难，想要与人诉说时，他们会选择与谁去交谈呢？他的研究发现是，人们“更愿意……向那些平时不那么亲近的人倾诉，而非像常识所暗示的那样与身边亲近的人倾诉”。这是因为，与我们常想象的有所不同，在与不亲近的人交谈时，我们可以“不用那么深思熟虑、有所顾忌，不太会被过去发生的事情所牵绊；相反，我们会对交谈的期望更加敏感，也会对环境的反应更为敏锐”。²虽然斯莫尔重点研究的是那些投资失败后处于“饥荒”状态的人，但是，这对那些在投资后经历“盛宴”时刻的人来说，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也需要在那些人中进行调查。那么，在投资者遭遇失败或者经历非凡的成功之际，他们会选择跟谁去倾诉谈心呢？

206

无人可以倾诉

我的研究发现极具讽刺意味。那些因成功退出投资而赚取了数百万美元的人，觉得他们无人可以倾诉。他们新获得的财富使他们近乎偏执到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也是在问了投资者一个简单的问题之后，才开始了解到他们的这种孤独感。我问他们：“您如何庆祝这一巨大的成功时刻？”埃文告诉我，他独自一人在酒店的酒吧里喝了几杯酒。埃文有所警惕，不敢告诉任何人，因为他觉得已经有很多人在找他了。从银行家、律师到私人财富经理，每个人都

试图联系他，向他推销专业化服务。

当我追问埃文他将如何与朋友或家人一起庆祝时，埃文告诉我，他甚至从未与妻子分享过收入上的细节。她只知道他卖掉了公司，但她从来不知道他的个人银行账户里进了多少钱。我又问埃文为什么选择对妻子保密，他跟我说：“金钱是会腐蚀人的。它会改变人们之间的关系。”当我进一步追问，想知道他是不是刻意向妻子隐瞒钱财时，埃文却反驳说，他妻子不是见钱眼开的人，她只是不太关心金钱的具体数目。只要他能够养家糊口——负担所有的家庭开销，在特殊节日时送她名贵礼物，支付孩子们的私立学校学费——她就毫不在意他实际赚了多少钱。为了庆祝这次成功，埃文不惜为妻子豪掷万金，买了梵克雅宝（Van Cleef & Arpels）价值 4.3 万美元的钻石手链送她，并带着全家去了马尔代夫度假，他们住在那里的一处四季度假村。据埃文说，这让他妻子感到很开心。在后续的跟进采访中，我们通过 WhatsApp 应用程序进行了文字互动，埃文向我解释说，他和妻子的关系比较传统。他挣的钱是他们共有的，但她挣的钱则只归她自己花——这意味着，埃文要负责支付他们每个月的家庭开销和育儿花费。他妻子其实是一名职业教育培训师，因而，她挣的所有钱都还是她自己的，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207

我问拉里如何庆祝胜利的时刻，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可能没有人会告诉你这个，但其实高处不胜寒。”和埃文一样，拉里也没有人可以一起庆祝投资胜利的时刻，他也不想和别人吹嘘说自己银行账户里的美元陡增。和埃文一样，拉里也没有真正可以倾诉谈心之人。在当时，拉里正和越南当地的一位女性交往，他还给我看了他购买的一枚漂亮的、淡黄色钻石戒指，那是他准备即将向她求婚时用的，戒指上还有绝美的六克拉钻石。拉里不愿说出这枚戒指的价格，他只告诉我花了六位数美金。拉里的未婚妻同样不知道

他在最后的退出投资中赚了多少钱，也不知道这些钱存放在海外的什么地方。但据拉里所说，只要他能负担得起他们的家庭日用开支，并时不时地在这里或那里安排上几次假期，她就会很开心了。她是一位艺术家，和拉里在一起也让她找到了自由空间，可以不断完善自己的技艺。

由于身边没有人可以倾诉谈心，拉里和埃文也都提到，他们在退出投资后的最初几个月里都遭遇了强烈的孤独感。他们在过去为了工作而每天打交道的那群人，突然之间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因为投资售出后，周围的人也开始转向其他的投资业务。在他们以往的社交网络中，还没有可以与之讨论如何在市场上重新投资或怎么与市场保持关联的人。拉里向我描述了一个尖锐痛苦的时刻，他“抬头仰望”《福布斯》杂志上所有那些比他有钱得多的人，也希望能将他的人脉网络扩展到其中一些人。曾有一些人来找过他，但他们都是“试探买家”，想探索一个新的东南亚前沿市场，但仍不愿意真正进行投资。然而，这本杂志上面还有很多他不认识的人，在寻找可以倾诉谈心之人的过程中，他制定了新目标，那就是弄清楚如何进入这些社交网络。

可以倾诉谈心的人

这个市场的投资饥荒经历会伴随着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情绪并涉及形形色色的人。在这个分类中，没有两个受访者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他们遭遇的饥荒经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所有人都有可以与之倾诉的“知己”，只不过这些“知己”往往都是全然的陌生人，有时候还来自世界各地。那些处于投资饥荒状态的人，会转而向他们的律师、公关代理人和提供公司服务的专业秘书这类人倾诉。有些人找了能与他们在线虚拟会面的心理治疗师，而

208 另一些人则去酒吧里寻找陪酒女来为他们提供一份远离现实的短暂慰藉。

伊芙（Eve）是一位科技领域的企业家，她曾是缅甸一家大型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在与伊桑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后投资失败，赔得血本无归。伊桑是一位外国投资者，他后来成了公司驻新加坡的首席财务官，而伊芙最终发现，伊桑不仅偷走了她创立的公司，还让它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在他们开始合作筹集资金时，伊桑就通过挟持手段实质性地接管了公司，他让公司秘书给他分配了更多的股权，以此来稀释伊芙及早期投资者的股权。伊桑通过稀释他的合伙人的股份来确保所有其他股东控制公司的股份不超过49%。这也是伊桑的策略的一部分，为的就是要在公司首次公开募股之前，将伊芙跟她的投资者都踢出公司。

伊芙向我解释说，这完全是一个骗局中的一环，伊桑想借此将这家公司——彼时尚未有实际业务经营，甚至都没有收入——在公共证券交易所上市。她说：“那时候还什么都没有，没有实质性业务经营……尤其是在作为伦敦二级市场的另类投资市场上，还没有实体存在。”一开始，她尽量不予过问，以便在处理事情时保持礼貌，因为她真的很想维护自己的名声，并且也想保护公司的股东。但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她陷入了一场法律纠纷，她尊敬的那些投资者和朋友也发出了她所谓的“大量异议”。

在描述这段经历时，伊芙告诉我：“创立公司需要你付出很多辛劳。尤其是在初创的第一年里。它需要你劳心劳力。”在遭遇这一危急时刻时，她所依赖的是她的亲密朋友，包括公司的前首席技术官以及她的兄弟姐妹。她还与一位人在澳大利亚的心理治疗师详谈了这次投资失败经历中的大部分情况——这是因为，在东南亚还没有这种专业化治疗的机会——她们定期会在网络上会面。所有这些人都很关键，他们帮助伊芙理清思路，接受现实，并找到勇气再

去创立一家新公司。这一次，她与一群当地的新投资者合作创办公司，因为他们完全了解她的创业故事，也相信她有能力让新公司起步运营。在我们的第一次采访近两年后，我又与伊芙进行了多次后续跟进访谈。她告诉我，这些经历也让她吸取了教训，并帮她致力于一种投资盛宴策略，即不能以造成他人的投资饥荒为代价，尤其是那些信任她并把钱交给她来打理的人，还有那些因为她拥有优质公司创始人的声誉而大量投资给她的人。

和伊芙一样，乔治在遇到投资麻烦时也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脉网络。在乔治投资失败后的两年里，我花了很长时间通过“Skype”即时通讯软件、手机和短信来与他交流。尽管乔治的兄弟们也和他身处同一个行业，但一想到要与他们讨论自己的个人心理挣扎，他就感到很不舒服，因为他们也都有各自的问题要处理。当他在越南的事业蓬勃发展的那些年里，我采访过的很多人都将乔治称为是“他们可以与之倾诉谈心的人”，因为乔治知道该如何在他们置身其中的这种独特而又复杂的资本网络中巧妙地游走。但是，当乔治遭遇投资麻烦时，他并没有求助于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作为第一个进入越南市场并进行了深度投资的人，乔治也不觉得其他投资者能帮上什么忙。在乔治的案例中，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拥有可以在越南当地帮助到他的那种人脉网。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乔治在他的人脉网中获得情感支持主要是依赖平时那些和他关系较弱的人，正如马里奥·斯莫尔的著作中所揭示的那样。在乔治投资失败时，与他关系密切的两个人，一个是他在伦敦聘请的一名律师，另一个是他在新加坡聘请的公关代理人，前者经由国际法庭来帮助乔治处理此案，后者负责帮乔治打理在越南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媒体报道和新闻稿发布。为了帮助我的研究，乔治也好心地把我介绍给了这两个人。在我告诉他的律师我不能担任乔治此案的专家证人之后，我就没有从她那里得到什么有用

的信息了，但是，我还是设法与乔治的公关代理人达妮（Dani）展开了一次有趣的讨论。

达妮向我解释说，她的工作职责就是危机管理。人们会在遭遇危机时与她的公司接洽，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团队来帮他们弄清楚该如何管理危机。“我们请他们说明几乎一切方面的情况，因为他们并不总能知道该如何处理危机。”她与乔治一起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通过管控和搭建外部叙事来向越南当地的政府官员施压。因为越南当地的媒体肯定会永远站在国家这一边，因此，像乔治这样的投资者就必须想方设法吸引到国际媒体和大众的支持。

乔治并没有找一位心理治疗师。但他有达妮，她基本也把自己看作是乔治的心理治疗师。在乔治看来，达妮的本职工作做得很出色，而且与她交谈也感觉很轻松。据乔治所说，达妮擅长公关工作，原因在于她很擅于倾听，她对自己的计费工作时间也很“公道”，并没有为这些谈话而多收取他费用。达妮的公司团队为乔治提供了一个应对危机的计划，叫他们直接在公司网站上进行说明，正面应对黄金国集团复杂的税务问题，以尽可能向公司股东展示透明度，从而使这项失败投资的问题看起来更像是出在越南政府这方面，而不是出在负责管理境内项目的投资者团队身上。

归根结底，在投资失败后的饥荒中，对那些物质和心理受到双重打击的人来说，有人可以倾诉谈心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发现，这种关系性联结不是发生在与他们亲近的人之间，即不是“在附近”，而是在那些他们感到自己会被理解的人当中，这些人有相似的背景经历，也遭受过投资赔得血本无归的耻辱性经历。事实证明，不过分亲近的弱关系是所有投资者在遭遇失败后恢复和振作起来的关键，无论他们最后找到的方法是在新的行业领域里重整旗鼓，还是在其他国家的新兴市场中东山再起。

* * *

盛宴和饥荒是投资者退出市场时的两个极端：一头是完胜，另一头是全输。输赢不仅仅关乎人们是否成功执行了一个可靠的商业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市场上的成败还取决于投资者的人脉关系是否足够广，以及是否能够获得市场内部信息或优惠待遇。因此，影响这些不同结果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与协调各种关系有关，这会产生互惠互利或相互破坏这两种主要关系模式之一。在相互破坏的关系中，要么会产生一个赢家和一个输家，要么双方一损俱损，共同毁灭。

正如我们在本章中所见，投资盛宴的体验伴随着短暂的经济安全感和如释重负感，接着，它就会慢慢演变成一种偏执，人们总是会担忧要如何在这个市场中保持相关性而不是被排除在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投资获胜的经历也伴随着一种负面感受，即人们觉得“没有人可以倾诉谈心”，没有人可以分享他们投资的成功和胜利，即使是对那些与他们有着最亲密的关系、共享着最私密的个人空间之人，也不能够倾心交谈。

投资饥荒的经历往往是互相破坏的关系造成的后果，这种破坏关系摧毁并扯断了将这个资本蛛网联结在一起的那些早已磨损的关系网。然而，那些赔得血本无归的投资者却找到了可以与之谈心的人。这些人既不是他们的亲密朋友，甚至也不是他们的商业合作伙伴。与此相反，这些可谈心之人是金融投资圈以外的人，比如律师、公关代理人和酒吧女招待——所有这些人都很关键，因为他们能帮助投资者找到迅速恢复精神的方法，并且能帮助他们从毁灭性打击和损失中振作起来。

伴随着盛宴和饥荒经历而来的，是情绪上的快乐巅峰或绝望谷底，无论投资者经历的是哪一种情绪，最终，每个人也都会退出他

们在这个市场中的投资。因为没有什么投资交易可以长存。此外，随着这批投资者退出这个市场，下一批新的玩家也将会带着他们新的资本和不同的人脉网络进入这个市场，而所有新进入市场的人又都希望，他们自己将会在下一场轮盘赌游戏中收获盛宴，赚个盆满钵满。

解开混乱缠结的蛛网

在过去四年的研究中（2017—2021年），当我一直在努力将拼图的不同部分拼合起来，理解构成蛛网资本主义的不断演变的主题和在灰色地带游走的策略时，我曾有幸向一些观众展示了我的一些初步研究发现，这些人中至少包括30名不同的学术听众，还有一些是在我所采访的几家私营公司内少数几场内部会议上的听众。那些关心正在扩大的全球不平等的学生几乎总是会问我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解开这些混乱而缠结的蛛网？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番思考，认为答案似乎就藏在我参与全球精英内部讲演展示时所得到的回应里。也就是说，这些资本蛛网在结构上建造得如此庞大，并且涉及如此多的人在不同的蛛网层次上运作，乃至最后没法找到一个具体的恶棍追责。在我采访的所有人之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该对这些导致了更广泛形式的不平等的全球资本网络负有责任，尽管他们自己也会声称，他们并不想生活在一个不平等日益严重的世界之中。事实上，蛛网资本主义恰恰旨在隐藏由个人行为导致的不平等的后果。

蛛网资本主义存在的这个问题是系统性的。

212 具体来说，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名为“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的社会运动。人们占领了一个公共空间——纽约市金融区的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以此对企业的贪婪和普遍的经济不平等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华尔街的局外人质疑财务主管们因在房地产市场上疯狂投机而获得红利，因为这对普通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人们不仅失去了他们的住房，也失去了最大的投资。公众异常愤怒。这个故事中的恶棍，是那些像广阔乡村投资公司（Countrywide）的安杰洛·莫兹罗（Angelo Mozilo）和美林公司的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斯坦利·奥尼尔（Stanley O’Neal）等财务主管。莫兹罗在 2003—2008 年间就足足赚了 4.7 亿美元，而奥尼尔在 2006—2007 年一年就获得了 9000 万美元的薪资。¹ 这些津贴红利并非他们帮助他们的公司所赚取的利润分红，而是来自他们多年以来所从事的非生产性的投机交易。

占领华尔街运动可能提高了公众对不平等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谈论不平等的方式，但事实是，它并没有改变造成这种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² 美国的这些抗议活动都未能在国内外实现系统性的转变。事实上，就在美国社会公众对不平等加剧的批评抗议发生近十年以后，又有一个全球抢劫案的消息传遍了世界各地，“一马公司”遭人侵吞高达 120 亿美元的资金。马来西亚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马来西亚的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在马来西亚被判处 12 年有期徒刑，他的另外两名同谋哈德姆·阿尔·古拜希（Khadem al Qubaisi）和穆罕默德·巴达维·阿尔·侯赛尼（Mohammed Badawy al Husseiny）也在阿布扎比被判刑。但是，世界其他地方却都保持了沉默，而那张蛛网中的主导型大蜘蛛刘特佐则仍在藏匿之中。有些人怀疑刘特佐躲在中国，也有一些人怀疑他在欧洲。³ 关键是，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他，而且更可怕的是，存在着这样一个

人际网络，它不仅保护刘特佐本人和他窃取的赃款，还让替罪羊为他担负责任。

此外，在“巴拿马文件”事件曝光近五年以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记者又在被称为“潘多拉文件”（Pandora Papers）的事件中再次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它披露了涉及 1200 万份机密财务记录，揭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富人和有权势的政客如何找到方法来藏匿他们的钱财。“潘多拉文件”事件中牵涉了包括来自 90 个国家的 300 多名政客和政府公职人员的信息，这足以说明，自 2016 年“巴拿马文件”事件炸开锅以后，一切似乎都没怎么改变。⁴

这又怎么可能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解决掉这个问题呢？很大程度上，答案在于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即便是在彻头彻尾的犯罪盗窃案件中，人们通常也很难在这些庞大而错综复杂的资本蛛网中找到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据我所知，在我的研究当中，还没有一个受访者被指控从事任何犯罪活动。实际上，庞大的资本蛛网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藏匿起来，因为离岸外包是公司普通且日常的业务中的一部分，最为重要的是，它还是公司用来削减成本的一种合法方式。⁵

美国：世界上最大离岸司法管辖区的所在地

213

蛛网资本主义绝非发生在诸如马来西亚、越南或缅甸等遥远小国家“那边”的故事。所有这些国家的市场，最终也都与美国和西欧——这些具有市场透明度、健全法治以及较低的腐败或逃税水平的地方——联系在了一起。事实上，正如我的同事、商学院教授哈尔·韦茨曼（Hal Weitzman）所发现的那样，美国既是本国的公司和富人最大的“国内避税天堂”之一，也是美国以外富人的“离岸司法管辖区”。⁶这乍一听可能会让人感到意外，因为美国的法规是

最为激进严苛的，它要求美国公民向国家税务机关申报他们在海外的收入和银行账户收支情况。如果外国金融机构不遵守美国《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的话，美国还会对其处以巨额罚款，该法案要求它们报告其美国客户的账户上所持有的外国资产。

尽管如此，财务责任和企业透明度联盟（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Corporate Transparency Coalition）的副主任克拉克·加斯科因（Clark Gascoigne）认为：“目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容易设立匿名空壳公司的地方。”⁷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报告强调了几个例子，说明政治官员和私人金融行为者之间有着紧密关联，这种关系还会一直延伸到最高级别的政府办公室。例如，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就曾利用一家在特拉华州注册的空壳公司来从一家与俄罗斯寡头有关联的公司收取款项。⁸ 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党派问题。彭妮·普利茨克（Penny Pritzker）是前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商务部部长，也是奥巴马的长期支持者，她在海外也拥有自己的空壳公司。⁹ 普利茨克对两家总部位于百慕大的公司的投资还曾被美国列入一份联邦道德档案，在该文件中，普利茨克最后承诺出售其投资，以避免引发利益冲突。¹⁰ 联邦道德法案限制了政府内阁成员“亲自且实质性地”参与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财务利益的政府事务的能力。但有文件显示，在2013年6月，普利茨克将公司股份转让给了一家在特拉华州注册的德拉比特投资有限公司（DRBIT Investors LLC），该公司“由受益人为彭妮·普利茨克子女的信托机构所持有”。¹¹ 特拉华州是美国（离岸）对冲基金的首选地之一，因为那里有一套成熟的交易策略和广泛的投资者基础。¹²

特拉华州、怀俄明州、内华达州以及越来越多的州，比如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和南达科他州等，都成为不住在美国的外国所有者的空壳公司注册地。虽然美国出于税收目的要求美国公民披露

个人在海外的资产和银行账户，但美国自身——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共同创始国之一——并未参与执行共同报告标准（CRS），这一标准会自动交换全球范围内的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事实上，美国也拒绝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合作，这些政府往往希望追踪避税者的私人储蓄账户，那些避税者大多利用特拉华州等地作为避税天堂，来逃避其公民身份所在国的纳税义务。

特拉华州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说明了合法与非法以及正当与不正当交易之间的界限十分不明确。正如法裔加拿大作家阿兰·德诺（Alain Deneault）所写的那样：“在税务方面玩弄文字的能工巧匠（expert wordsmiths）不啻对特拉华州的民主美德做了一番非常细致入微的辩护，为的是将其与百慕大和塞舌尔等黑帮离岸司法管辖区区分开来。”¹³ 当我缠着几位受访者，让他们向我介绍他们的离岸结构时，其中的一些人是这样说的：“这个领域最大的黑帮其实是在美国。”事实上，奥巴马政府还以“来源于……劳动的私人财富的积累”将使广大工薪阶层受益为借口，为在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的外国公司提供合法减税策略。¹⁴ 对于非美国公民而言，特拉华州就是离岸避税天堂，它可以提供银行财务保密和极低的税率。¹⁵

特拉华州还说明了在岸 / 离岸的定义不仅因主权国家的边界而异，而且也会因人们的国家公民身份而不同。这里对那些在技术上合法但在道德上却应受谴责的活动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那些玩弄文字的能工巧匠参与到了这个使某些实践活动合法化的游戏中来，这些实践活动扩大了不平等并合法化了资本的积累。

如何去监管监管机构自身？

对于解决各个国家隐藏财富的问题，法国经济学家兼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提出的最激进方案便是实行全球资产登记。祖克曼提出了一个强有力且令人信服例子，即美国可以通过单方面放弃公平定价、对公司的全球利润征税、提高个人股息税率以及将企业税计入股东名下来彻底改革美国公司的税收制度，而无须进行太多的国际合作。¹⁶ 祖克曼认为，如果美国和欧洲采用这种激进的解决方案，那么这种方案收取的税收将占整个世界生产总值的近 50%，因此，它将对缩小贫富之间的税收差距产生重大的影响。

然而，正如祖克曼自己所指出的，也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揭示的那样，在中国、俄罗斯、中东和东南亚等国家产生的全球财富，都在使用这些或类似的离岸结构。与此同时，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一个由美国和欧洲为其他国家制定游戏规则的世界之中了。如果我们考虑到现存于美国和欧洲之外、占到整个世界生产总值 50% 的国家，那么，在这些政治和经济权力不仅重叠而且相互勾连的国家中，蛛网资本主义还可以在其他地方蓬勃发展。因此，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急需一个合理结构，此结构要让世界上拥有最富有之人最多的国家参与到这个全球财富的登记中。这不仅需要美国和欧洲，还需要中国、俄罗斯、中东和东南亚（仅举几例）等地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鉴于这些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局势十分紧张，这种协调目前似乎不大可能实现。一方面，美国正在努力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其他世界大国的迅速崛起也意味着，其他国家也在不断地相互竞争和协调，以争取瓦解西方在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式的霸权地位。

上面列出的许多非西方国家，也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深度缠结的地方，这些资本蛛网将继续在世界各地兴起并蓬勃发展。因而，无论是在美国或欧洲境内外，这个问题始终都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即该如何要求监管机构监管他们自身？然而，在政治和经济

权力不仅重叠而且相互勾连的国家，这个系统几乎是不可能被拆除的。更复杂的情况是，我所采访的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全球精英担心，国家对他们征税会使他们的竞争力低于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同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监管机构不仅不会打击离岸金融机构，甚至反而会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然而，却没有系统的机制来规范监管者自身。事实是，也没有办法公开处理并处置那些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监管者。例如，本书的一个限制是，我无法以任何系统的方式去研究那些自己也参与灰色地带活动的国家监管机构里的监管者。我发现，最具挑战性的一件事，莫过于说服国家官员坐下来接受我的正式采访，因为在这类采访中，我会询问他们各自在体制性腐败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是他们可能参与过的离岸机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法律规定，如果个人的学术工作被政府视为具有颠覆性，那么，该个人将可能要面临长期的监禁，这一规定便造成了个人在自我审查方面的寒蝉效应。在这些地方，对国家政府的恐惧感非常真实且明显，所以，我只好小心翼翼地绕过它，这就限制了我们想要更深入地挖掘我在本书中所概述的资本蛛网层次的能力。即便在本书的写作接近尾声时，对如何系统地研究越南、缅甸、中国香港甚至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我依然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

216

对“全球”进行理论化分析

本书中的例子都强调，监管机构和金融行业私人参与者在跨主权国家的协调网络中存在内在的勾连，它迫使我们所有人面对这样一个大问题：“究竟什么是‘全球’？”目前，对“全球”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述，正如我在导论和第1章中所阐述的那样，包括世界体系、世界秩序和全球城市框架。然而，如果所有这些金融

网络都只是一个全球经济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我们该如何想出创新的方法来解开这些缠结的蛛网呢？祖克曼所提出的方法是，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官僚机构，我认为，这几乎很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官僚主义原则（形式化规则、专业化、等级严明等）。例如，尽管祖克曼不是这样进行表述的，但他的解决方案是要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官僚国家，并在主权国家之间进行协调和信息共享。我会争辩说，全球性的官僚机构无疑是一个强大的思想观念，但还没有人能够设想出使之成为现实的运作机制。不过，仅仅将它作为一种可能性提出来也是一种重大的贡献，并且，它也是解决由灰色经济导致的蛛网资本主义问题的重要一步。

在跳出旧有的框框进行思考时，祖克曼引入了另一种构想全球的方式。为了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在未来的工作中，研究者还必须提出以下这个问题：“什么是全球？”这将需要持续不断地开展创造性、协作性和真正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活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同样精细复杂的全球运动、组织和研究网络，旨在重建各国人民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土地和资本的关系。

217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东西都不会被完全抹去。当前构成蛛网资本主义的各国人民、民族国家、土地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一种转变，而这种新形式势必将需要我们对是什么构成了这种超越国界的“全球”概念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新型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ies）*的兴起表明存在一种可能，即一种替代美元霸权的方案。取代国家法定货币的快速金钱兑换是一种标志，表明我们正在朝着一种取代主权国家的全球新秩序迈进。随着替代货币的兴起和国家法定货币的贬值，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新政治结构，目前还

* 一种公共网络的、非政府发行的加密电子货币，它使用加密法来确保支付及收取金钱时的交易安全。

有待观望。但无论如何，关键的一点是，推动加密货币的人已经在尝试重建货币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正是真正解决蛛网资本主义的问题所需要的思维方式。无论一个人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倾向如何，任何对这种蛛网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结构的回应，都需要在全球层面上激发创新思维并采取行动，而祖克曼和加密货币的例子则表明，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迈进。

一个岔路口

全球超级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与合作也在全球各地的小国家中产生了巨大的连锁反应。我本来计划在2020年和2021年夏天返回越南和缅甸，但由于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这两次旅行都被推迟了。然而，当我通过Zoom、Whatsapp、领英、脸书和Instagram与人们重新建立联系时，我也不禁想知道，这个资本蛛网最终将会如何重新配置它自身。

2021年2月1日，在昂山素季和她的全国民主联盟成员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后，缅甸军方夺取了缅甸的控制权。军方的武装部队声称选举存在严重舞弊，并逮捕了昂山素季，指控她操纵了此次选举的结果。随着军事骚乱席卷整个缅甸，抗议者走上街头，而军方则以残酷暴力回应，造成了600多人死亡。¹⁷此次政变使缅甸重新成为一个完全由军政府统治的国家。军方控制了广播网络、电话和互联网接入，成百上千的人在关门倒闭的银行外排队等着提取他们的储蓄。由于发生了政变，与我保持密切联系的许多暂居缅甸的外国人也纷纷逃离了这个国家。

在后续我与缅甸一家投资公司的副董事长信昂（Tin Aung）的谈话中，他告诉我：“缅甸现在特别糟糕。军事政变让这个国家至少倒退了十年。”随着新冠疫情感染病例的激增，加上缅甸的医疗

保健系统本来就很薄弱，还会有更多的人受苦和死亡，而且也看不到任何解决方案。盛温（Sein Win）是一家新加坡投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曾率先在缅甸投资了多个项目，他告诉我，缅甸的短期和中期发展前景都十分黯淡。他非常担心“排外的军政府不利于透明的外商投资”，怕它会更倾向于接受一些“来自某些国家的可疑投资”。他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他解释说，虽然“缅甸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但也有着大量的人口，急需大范围升级基础设施，而政变之后的这个政府只会吸引那些习惯于完全缺乏市场透明度环境的外资。

摆在缅甸的外国投资者面前的，只有三个选择：离开、暂停业务，或者选择留下来并与新的军政府合作。¹⁸在我所能接触的小部分研究对象中，几乎所有人都在出售他们在缅甸的子公司。经营制造业的投资者已经暂停业务，以此向军政府发出信号。有些人则选择留下来，但他们在保持沉默的同时，也在观望这将如何影响他们的投资。菲尔德·皮克林（Field Pickering）是较早进行投资的缅甸种子子公司（Seed Myanmar）的首席运营官，他在接受“日经亚洲”（Nikkei Asia）的《亚洲交易报》（*Deal Street Asia*）的采访时表示：“至少在这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那一年，该国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是不可触及的……任何一家制订了2021年筹款计划而且能够挺过因新冠疫情而变得艰难的2020年的缅甸公司，都将面临双重打击，由于筹款不足，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大量企业倒闭。”¹⁹

随着缅甸转向内向型经济，似乎不祥之兆也开始显现，该国似乎将回归到裙带资本主义的形式，这种形式将会使统治阶级和军阀富裕起来，同时加深了大企业和政客之间的连接。²⁰当一小部分与军方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控制着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时，绝大多数人口都将陷入更加幽深的贫困之渊。政变发生以后，缅甸军政府公开支持中国，中国现在是缅甸最大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供应国

和捐助国。²¹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宣布了一条通往缅甸的新贸易路线，该路线旨在连接印度洋上的仰光港和中国边境的云南省，从而促进双边贸易，并提升中国方面在缅甸的影响力。²²

与缅甸相比，越南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领导者。与更为发达的国家相比，越南不仅有效地应对了新冠疫情危机，将新冠疫情病例和死亡人数保持在了较低水平，而且，在个人防护用品的制造和供应方面，越南也被证明是领先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之一。截至2020年12月，越南的制造商向北美、欧洲和亚洲周边地区出口了将近12亿只口罩。²³ 勐力合作伙伴公司（Raise Partners）的一位合伙人武美美（MiMi Vu）参加了派驻在河内的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参观旅行，他们参观了在河内郊外的两家工厂，在这里，美国大使馆海事安全支队的队员们与越南政府官员及经济部门的官员一起参观了棉花是如何被纺织成口罩的。在那次会晤之后的新闻报道中，一名越南记者强调了越南方面在应对全球新冠疫情时所做的努力，它向几个邻国捐赠了数百万个口罩，也向美国运送了大量的个人防护物资和手套。²⁴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生产的口罩，在2021年1月乔·拜登（Joe Biden）总统就职典礼期间曾经被公开佩戴过。在这场全球新冠疫情危机中，戴德梁行（Cushman & Wakefield）曾评估称，越南现在是仅次于中国、具有全球第二大成本优势竞争力的制造中心。随着贸易战的进一步升级，中美开始转向与越南贸易，越南拥有9700万精通技术的专业人才，其经济快速增长地区通过基础设施规划和经济区（Economic Zones）的税收优惠联系在一起。²⁵

这一出“双国记”（tale of two countries）*——越南和缅甸，在中美之间处于关键地缘政治地位的两个国家——一方面上演了缅甸

* 作者这里模仿的是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的名字。

方面表现出退缩和保护主义的故事，另一方面也是越南的国家主导资本主义在该国蓬勃发展的故事。尽管如此，这两个国家都被定位为美国和中国继续争夺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关键场所。这种战略竞争在 2021 年 8 月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访问越南期间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在访问期间，她敦促越南与美国一道来反对中国。²⁶ 哈里斯还宣布，美方会给越南捐赠 100 万剂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但是，在她的飞机发生延误时，中国方面迅速派特使前往越南，并承诺会为其提供 200 万剂疫苗。²⁷ 尽管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越南人民能获得越多的疫苗自然是越好，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兄弟（姐妹）大国之间陡增的紧张关系，以及它们与东南亚小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中美两国都努力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化国家，而两国之间的竞争就意味着，如何协调拆除蛛网资本主义的庞大金融结构可能会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思想课题之一。

猎物：深陷资本蛛网之中

虽然本书的重点是研究全球精英如何开拓和利用前沿市场，但我基本上没有研究的是这些庞大蛛网中被捕获到的猎物。我认为，深陷蛛网的猎物也是指我们其他所有人——在这些政治和经济权力网络之外的所有人，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深受这些资本大蜘蛛及其从属蜘蛛的权力游戏的影响。

这些庞大网络存在的一个后果便是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有大量证据表明，财富集中在一小撮资本蜘蛛手中会导致贫困加剧，争夺稀缺资源也会导致犯罪率增加，还有难以获得公共卫生和教育等社会服务的问题，并且与穷人相比，富人对监管者和享有政治权力者的影响要大得多。²⁸

临近本书写作的尾声，我不禁回想起它带我经历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环球之旅。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什么东西的内部度过：比如，有色窗户的汽车里、豪华酒店的大堂中、风景迷人的办公大楼的顶层——所有这些地方都远离了普罗大众。像我所研究的那些精英一样，我是从半悬的空中瞥见了一些景象，了解了开拓前沿市场时所涉及的一些策略手段和道德困境。然而，与街道上的污垢和这些行为的后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物理距离就意味着，占主导地位的大蜘蛛与严酷的现实相脱节，但他们的投资实际上又深深影响着那些无权无势的人们的日常生活。

例如，在越南，由于政府关闭了上文提到的那家外商投资的矿场，成千上万人失业。而就在我研究期间，数百名越南当地的渔民因一家外国钢铁厂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环境破坏而失去了全部的生计，据称，该公司通过管道将有毒废弃物排放到海洋中，导致约 70 吨死鱼被冲刷到海岸上。²⁹ 环境社会学家安德鲁·勒（Andrew Le）认为，这种生态环境灾难引发了大量的人口外迁，人们不得不离开越南，因为越南政府将外国投资者的利益置于本国民众的利益之上。³⁰ 类似的外迁模式也出现在了缅甸，因为那里正在上演着各种宗教和种族暴力事件。³¹ 与此同时，自 2021 年缅甸发生政变以来，那些在缅甸为外国公司工作的人们都生活在一种担忧之中，他们担心，要是外国公司撤出投资，他们自己是否还能保住工作？陷入他们无法控制的资本蛛网中的普通人，往往要面临它对自己的生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而这些还只是后果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221

这些结构化的蛛网产生了相互关联的复杂后果，其中就包括贫困、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以及被投资国的人口外迁。这些问题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需要公民社会的集体努力才能达成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称的一种新的社会契约。这种新的社会契约始于在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实现

一种更加平衡的愿景，并且要反对人们和机构所从事的合法但在道德上应受谴责的行为。³² 在全球范围内，我认为这需要各国展开更大力度的协调行动，也需要人们有更大的修复腐败和败坏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意志。

这本书旨在解开资本蜘蛛织就的错综复杂的金融之网，并试图揭示他们从灰色交易中获利的一些方法，但它也只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小步。然而，由于蛛网资本主义是全球性和系统性的，所以我们需要创造性、跨学科性和集体性的努力才能够开始拆解这些盘根错节的资本蛛网。取代这个蛛网的应是这样一个真实而美好的世界，在其中，富人和穷人并不会生活在不交叉的平行宇宙中，或者就像记者纳尔逊·施瓦茨（Nelson Schwartz）所说的那样，富人和穷人并非被置于一个由天鹅绒绳索拉起来的围栏的两端。³³ 未来的人们必须有创造性的意愿，去建立一个带有政策性保护措施的社会，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拯救这颗星球，减少经济不平等，并防止大多数人在这些庞大的资本蛛网中被捕获、榨干，最终被吃掉。毕竟，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资本蛛网中，那些没有财力或资源来建立他们自己网络的人最终都会沦为猎物。

研究精英群体的性别悖论

这本书让我有幸踏上了一段不可思议的社会科学发现之旅。与大多数民族志研究一样，在研究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总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因为我在探索中又发现了最终成为本书核心的新层次。在我努力从数据收集转向分析和展示初步发现的过程中，我收到了很多的反馈，大多是关于我怎样能够研究世界各地如此难以接触到的富人群体的问题。因此，在本书附录中，我将反思自己通过研究精英群体来“钻研”有何意义。然而，这本书无疑也“扩大了民族志研究的范围”，因为它所涉及的是一种不拘泥于任何一地，而是带着我环游整个世界去做实地研究的田野调查。在拼凑出一个全球性资本网络的过程中，我不仅致力于从定性研究方面解开这个资本网络中不同节点之间的连接方式，也研究了能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实质性内容。

附录的第一部分将概述研究项目的演变过程：从 2009—2015 年期间的构想，到 2016—2017 年期间密集的数据收集，以及 2017—2020 年期间的后续系列访谈。我将说明我的研究问题是如何转变的，这些问题的转变不仅仅是由于发现新数据，也由于这一研

究是在数据与现有文献之间来回转移的辩证过程。我从这些数据中汲取观点，以权衡学术界围绕数据透明度和数据可复制性的广泛辩论。我认为，在这个研究项目中，如果使用被采访者的真实姓名来加倍提高透明度，那么这种努力不仅会使这个项目变得完全不可能，而且忽视了定性研究中的主体性价值，因为这种研究的目的是要在没有可复制的参照目标的情况下，实现理论的普适化。我还将概述我是如何接触到这群精英富豪，以及我分析数据的过程。认识论上的见解使我能够将障碍转化为推动我走上新研究路径的机会，也使我能够重新审视核心经验难题及由此衍生的理论框架。

224 在本附录的第二部分，我将反思自己作为研究者的独特社会地位。我是越南移民的孩子，是一名女性，也是一位在世界顶级大学任教的教授，我的第一本书《欲望交易》颇受公众的欢迎，但它在越南却是禁书。在第二部分，我将专注于阐述我所谓的“性别悖论”：尽管我是精英大学机构中的一名女性教授，但是，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中，我作为女性的身份也让我享有一种能够获得免费或高折扣商品的经济优惠。与此同时，身为一名女性，我也会付出一定的个人成本，其中最好的情况便是受到公开谴责，而最坏的情况就是不断地受到性骚扰。我的大多数研究参与者都不认为我有任何威胁性，因而，在很多情况下，我认为他们表现得都要比他们在接受男性研究员采访时积极热心得多。因此，本书中最好的见解来自我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与人们共度的那些时光：在酒吧里、短途和长途的飞机上，以及餐馆里。虽然采访中的一些环境对我来说并不理想，因为我通常都是一群男性中唯一的女性，但这些环境也是能够让男性放松警惕，同时也能坦露愤怒、真实和脆弱的地方。

经验难题

这本书的灵感来自我完成的第一部专著《欲望交易：亚洲崛起、西方衰落、全球性产业中的资金暗流》后所遗留下的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在那本书中，我阐明了全球性产业中的非法活动如何帮助塑造了资本的流动，主要是通过为外国投资者、本地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提供了一个在高级应召女郎酒吧内建立信任关系的空间。第一本书的调查结果来自广泛的实地调查，当时我每天在这些酒吧担任女招待长达12个小时或更久。这就让我对在酒吧以外促成的交易，以及西方人或女性可能为交易的达成而采取的一些替代策略的看法十分有限。

在2012—2015年的暑假和寒假期间，我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以便测试这一项目是否具有可行性，以获得潜在的外部资助机会。2014—2016年期间，我草拟了研究提案并开始申请外部的研究资助，以便能返回东南亚去回答这份提案中的一些问题。最初的项目提案提出了一些相当简单的难题：在新兴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投机行为，而且在这些市场中，社会性非契约关系才是协商谈判法律合同的关键，那么，西方和东亚/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者又是怎么将他们自己融入这些新兴市场中去的呢？西方人需要建立可执行的法律合同并遵守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来促成资本交易，这种要求是否会限制他们参与惯于操纵腐败市场的东亚/东南亚地区投资者的社会实践呢？

225

在为第一本书开始做一些初步研究工作时，我在2005—2015年期间花了近十年的时间进出越南国境，但即便如此，事实依然是，我并没有从我的第一个研究项目中获得太多线索来回答这些新的研究问题，因为我研究的领域发生了转变。在越南，有一位新总理上任，于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市场参与者，他们希望能抓住机会与新掌权者

搞好关系。我在 2009 年认识的一些关键参与者都离开了越南市场，他们要么是因为交易失败而损失了大量资金，要么是赚了很多钱并将这些资金投资于越南以外的更为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中。这些人中也有一小群人冒险进入了缅甸市场，这促使我在 2014 年第一次去到缅甸，并看到缅甸出现了一批新的投资者，他们利用自己在越南的交易手段去追逐一个新的前沿市场。

正如我在导论部分所描述的，我先通过为越南的两家投资管理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两位不同的首席执行官担任私人助理，开始接触到这个世界，这些公司在房地产开发和制造业项目方面都拥有各种各样的投资组合。在我与投资者初次会面之后的 5 年间，我又跟进他们的情况，研究西方投资者在努力接触对达成投资交易至关重要的关键政治官员后如何改变他们的投资策略。这种访问使我能够收集来自西方和东亚 / 东南亚地区的公司与其投资者之间交易的民族志数据。

在公司内部，我主要从事房地产交易方面的工作，在与外国投资者会面时担任翻译和会务记录员。这个职位使我能够观察本地公司与外国投资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时的互动。然而，我在后台办公室所学到的知识远不如我在其他地方学到的多，例如咖啡店、餐厅和休闲空间（酒吧、高尔夫球场等），外国投资者可能会在这些地方参与某种形式的娱乐活动——对于经纪人要在洽谈商业交易之前建立个人关系的商业风格而言，这一点至关重要。我在这些不同环境中都写下了民族志田野研究笔记。围绕民族志、法律和数据透明度的一些辩论，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研究策略。

226 民族志和法律：围绕数据透明度和可复制性存在的争议问题

研究全球资本流动的标准经济学、社会学或政治学方法，会涉

及对跨国资本流动总额或净额、国际储备和外国直接投资等数据的定量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研究所缺乏的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即没有考虑促成资本交易的人。

为了加入这方面的文献研究，我以两位经济人类学家侯凯伦和凯特琳·扎鲁姆（Caitlin Zaloom）的研究工作为基础，他们使用定性的研究方法揭示了纽约、芝加哥和伦敦的世界领先的金融机构是如何通过投机的技巧策略来改变经济文化的。¹ 通过在公司内部进行深入研究，这两位学者揭示了投资银行家、交易员、业务经理、金融分析师和软件工程师是如何协作建立新市场的。我通过一种定性研究来扩展他们的理论和实证方法，首先研究东南亚地区的房地产投资。

与这些房地产公司的合作本可以使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类似于侯凯伦和扎鲁姆在公司研究中所达到的深度。然而，当我了解到在越南和缅甸的那些最常见的做法，按照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却被视为非法或腐败的做法时，留在这些公司里的两个障碍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在对艾丽斯·戈夫曼（Alice Goffman）及她为其著作《在逃》（*On the Run*）² 所进行的研究的兴趣迅速兴起和衰落之后，整个学界都卷入了一场关于数据透明度和可复制性的公开辩论之中。戈夫曼被指控为犯罪活动的从犯，并且还伪造了研究数据。坦率地说，虽然我一直对她的学术研究保持批评态度，但我认为，这种对她研究工作的猎巫式性别迫害是特别极端的，因为在一场关于定性研究之优劣的更广泛且信息不全的辩论中，她沦为了替罪羔羊。

正是这种民族志研究中的辩论，使我就研究对象咨询了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机构审查委员会（University of Chicago's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我从那里了解到，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机构审查委员会的

主要关注点，其实只涉及保护研究对象，而不是保护研究人员本身。有人建议我去咨询芝加哥大学的律师。在咨询了律师以及我所在大学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机构审查委员会的管理人员之后，我决定不再对一两家公司进行民族志研究，而改为仅进行一些采访。

我这么做是因为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相关法律限制，它要求研究者不得参与任何类型的非法活动——比如翻译电子邮件、
227 全程随听会议，以及可能目睹某次微妙的贿赂行为——因为这些活动实际上都会使我成为犯罪活动的从犯。然而，我也被告知，如果我的研究参与者告诉了我此类非法活动或做法，我并没有报告它的义务。

我想在这里概述一下我收到的建议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诚然，我和艾丽斯·戈夫曼也都不是第一批研究一群从事非法活动之人的研究人员。然而，多年以来，研究犯罪的犯罪学家和研究性工作的性学学者却一直在这一方面被人诟病，并遭到大范围的指控。³

值得注意的是，1974 年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成立和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兴起的女权主义认识论，共同创造了一个对属于边缘群体的研究人员更加友好的学术环境。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机构审查委员会成立之前，研究人员完全受制于同行根据非正式的、隐含的文化禁忌对他们的研究进行道德上的评估。这对女性研究人员来说格外重要，因为在 20 世纪的美国，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献记录显示，与男性相比，女性在伦理行为方面承受着更多非正式的双重标准。1974 年美国《国家研究法案》（The National Research Act）的颁布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制度支持，以防止对女性研究人员的非正式攻击，即便她们的同行继续怀疑她们在研究领域中的道德问题，她们也可以诉诸最初得到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机构审查委员会的许可，来捍卫她们的研究工作。⁴与此同时，女权主义的认识论也更加科学地让不同学者的工作得到了合法对待，

因为这些认识论都强调，社会科学需要持多种多样不同立场的研究人员。⁵

然而，正是在这种对研究人员的地位重新有了敏锐认识——由女权主义的认识论唤醒——的背景之下，一种自称是“街头社会学家”（rogue sociologist）的研究者出现了，他们重新提出了关于“自我”在研究领域和学术展示中的地位的基本问题。素德·文卡特斯（Sudhir Venkatesh）曾在其《黑帮老大的一天》（*Gang Leader for a Day*）的研究中非同寻常地参与了帮派的活动。根据文卡特斯的说法，他的研究一方面帮助拓宽了“主流社会学的边界……（它们）是古板沉闷的，也因每天沉浸在学术象牙塔和公共视野中而失去了与现实的相关性”，同时也实现了合乎伦理且极其严谨的科学研究。⁶

2015年，这场辩论再次浮出水面，当时，几位记者和法律教授史蒂文·卢贝特（Steven Lubet）都指责艾丽斯·戈夫曼研究数据造假，并认为她的一些主张难以进行事实核查，这个现象是民族志研究中更广泛的问责问题的征兆。卢贝特还声称，戈夫曼在该领域的研究活动使她成为了犯罪活动中的一名从犯。2016年，在一场由加里·阿兰·法恩（Gary Alan Fine）主持的西北大学的学术会议上，卢贝特曾做了一场关于“民族志和法律”（Ethnography and Law）的主题报告，他告诫我们所有人都不要去研究非法活动。他的论点是，如果这种研究会让研究人员涉及犯罪活动，那就完全不应该去研究它。

为了应对一些关于数据可复制性的批评，《语境》（*Contexts*）²²⁸杂志的编辑举办了一场关于“如何正确地进行民族志研究”（How to Do Ethnography Right）的论坛。在那期特刊中，亚历山德拉·墨菲（Alexandra Murphy）和科林·杰罗马克（Colin Jerolmack）呼吁社会学家要彻底摆脱匿名性。他们争辩称：“我们的默认做法应

该是指名道姓并且说出地点，除非有特别具体的个案理由才能不这样做。”这种将透明度加倍的方法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这些论点完全忽略了一个观点，即定性研究会优先考虑研究人员的主体性。就算两位研究人员进入同一个田野调查现场，他们也几乎不可能获得相同的调查数据。我们在田野调查中的定位、主体地位和独特的人际关系，不仅决定了我们可以接触到谁，而且也决定了人们愿意给我们分享哪一类信息。当我在课程中教授民族志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并将学生送到同一个田野研究地点时，他们的田野调查笔记自然也都看起来迥然有别，因为这取决于他们每个人所关注的独特问题。

其次，虽然墨菲和杰罗马克逐个地说明了不要采取匿名方式的原因，但我很想知道这将如何适用于艾丽斯·戈夫曼的案例。如果他们在戈夫曼的研究案例中提倡去匿名化，那么，我的研究案例又会有什么不同？戈夫曼的研究对象比我的研究对象处在一个更加脆弱的位置上，而且事实上，暴露其身份也会对戈夫曼的研究对象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

尽管如此，我还是发现自己一直想问，如果我正在研究的市场本身就充斥着腐败行为，那么我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为什么要冒险去暴露那些愿意向我敞开心扉的人呢？毕竟，正是这些对我敞开心扉的人，才让我有机会去尝试了解在他们的行动中发挥着更广泛作用的力量和做法。此外，我们该如何在保护研究对象的同时，真正去揭露不正当、非法或是犯罪的行为呢？在涉及对不正当或非法活动的研究时，又有哪些限制呢？

当然，这本书提出的问题，要远远多于它能给出的答案。

在国际环境中，也在关于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机构审查委员会研究伦理方面出现了几个相互矛盾的问题。例如，一些欠发达国家并没有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机构审查委员会，而获得“社会科学和

行为科学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或是建立“海外学术机构合作关系”的任务可能会非常艰巨，因为人们往往要经过多层级官僚机构的手续。例如，在缅甸，大学和非营利组织机构是不可以为研究学者提供签证担保的。为了以一名研究人员的身份进入缅甸，我必须利用富布赖特学者的身份，也就是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的身份，才能获得美国驻缅甸大使馆的外交照会，帮助我向缅甸的外交部申请许可，然后以一名知名研究员的身份进入该国。同样，在越南，我的研究提案在通过了多个办公室的公文手续流程之后，还必须得到越南国立大学校长的批准：先是到国际合作办公室，再到院长办公室，最后到校长办公室。这些手续流程需要六至九个月才能走完，而且，这些办公机构也都没有道德审查部门。对于他们而言，似乎更重要的是审查我的研究活动，而不是保护参与研究的对象。

229

与此同时，在越南和缅甸的经历告诉我，关于什么是合法或非法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社会建构的问题，它会因司法管辖区的不同而异。这就给一位美国研究人员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尤其是当该研究者想要研究外国环境中的商业实践时，因为在某些地方，腐败很猖獗，而且也是人们日常经商过程中的一部分。此外，法律执行上的不一致也使得对某些活动的禁止在许多从事这些活动的人看来不起作用，而且毫无意义。如果行贿只是司空见惯的做法的一部分，那我们又该如何揭露这些社会黑洞，以便揭示真实的人是如何在世界各地转移资金，以及他们又是如何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应对复杂挑战的呢？

我当然不会声称自己知道所有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也愿意持开放心态，为适应未来的工作而修改我的研究方法。当我在现实生活中梳理这个复杂的网络时，我决定通过多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决定离开这些公司，因为我知道，我会为了研究广度而牺牲研究的深度。对我来说幸运的是，在我进行这项研究时，布鲁克·哈林

顿 (Brooke Harrington) 出版了她的《资本无国界》(*Capital without Borders*) 一书, 该书着眼于世界各地的私人财富管理机构。⁷ 这也为如何进行多地点的全球研究项目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此外, 这种选择也不完全是出于我自己。似乎我所在的整个学院和律师朋友都认为, 为了可能会收集到的研究数据而把自己也搭进犯罪活动中去是不值得的。

因为维护研究的机密性存在风险, 我决定不写我工作过的公司。然而, 我意识到, 为了继续推进这个项目, 我需要扩大我的研究范围, 以涵盖更多的经济领域, 而不仅仅是房地产业和制造业——这些是我最初提出的研究领域。第一, 这是因为, 在我为研究房地产市场进行了 75 次采访后, 我对这一行业的研究达到了一种趋于饱和的状态, 而在发表了一篇文章⁸ 之后, 我意识到, 我也不可能在牺牲我承诺给研究参与者的匿名性的情况下写出一整本书来。第二, 我所采访的大多数投资者都在极其多样化的经济领域进行投资。230 第三, 我特意采访了 300 多个研究对象, 以至于我根本无法在脑海中清楚记住任何一个采访者的私密细节。事实上, 在这一点上, 我对他们的了解更多出于他们的假名, 而非他们的真实姓名。当我在后续访问东南亚时再次偶遇他们时, 我还经常会因为不小心使用了他们的假名而不是真名来称呼而感到十分尴尬。最后, 我故意不从头到尾追踪某笔交易, 而是会利用多个案例来对更广泛的交易实践进行三角验证。

这些方法论上的选择, 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研究进程, 以及我可能会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之前的研究焦点是立足两个国家, 而现在, 焦点转向了本质上具有全球性的范围。随着新型研究数据的出现, 我无意中发现了离岸外包的世界, 而我在研究开始前, 甚至都没有想过要去研究它, 于是, 我觉得我必须修改研究问题。激发这本书的一些新问题是关于如何连接起这些错综复杂的资本网络, 以

便能够绘制和揭示出一个更大的网络系统。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定性研究的优势，我还对将某个网络中的两个节点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实质性问题感兴趣：在它们之间流动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样流动？

有关资金、访问接触、招募人员、 数据分析和演讲展示方面的说明

资金问题

与大多数民族志研究相比，本研究项目成本极高。要是我没有得到用于数据收集方面的外部资金，如富布赖特全球学者奖（Fulbright Global Scholar Award）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跨区域学者奖（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Transregional Scholar Award），那么这项研究也是不可能展开的。此外，芝加哥大学也通过资助我一整年的研究休假来支持我的这项研究，这样一来，我便可以用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富布赖特学者项目中得来的所有研究资金支付我在国外的机票、酒店住宿和膳食费用。我还获得了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和性别与性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ender and Sexuality）的研究资助，以及芝加哥大学内部的杰夫·梅特卡夫助研教师项目（Jeff Metcalf Internship Program）、一项由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W. Small）设立的小型研究资助奖金所提供的实际资助，以及一项为新获得终身教职的员工所颁发的大卫·赫夫特奖（David Hoeft Award），其中的部分资金用来资助在这个项目研究的各个阶段帮助过我的本科生研究助理。这些奖金资助中的绝大多数都被我花在了机票、膳食，以及我通过许多研究参与者的公司内部福利所获得的优惠折扣很大的

231 酒店住宿上。我租住了一些便宜的公寓，虽然这些公寓有时候会非常不舒服，但这是我能负担得起四处旅行和下榻酒店费用的唯一方式。我很痴迷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试图采访尽可能多的人，并且会抓住一切机会前往投资者正在筹集资金和寻找投资交易机会的各个不同地点。一起旅行的时间也极为有助于我的研究，因为我能更好地了解投资者，并且，我也能够在旅行的过程中提出后续想问的一些问题。

接触和采访受访者的问题

当我向学术界展示我的这些研究发现时，几乎总是会被问到以下这些问题：我如何接触到这么多有权有势的人？此外，我又是如何能够让他们谈论起他们在这些市场中游走时最为个人、最私密的一些细节的？我认为，有两大关键因素有利于我接触到这些超级富有的精英、金融专业的从业人士，以及他们的离岸和海外投资世界的。

首先，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身份。实际上，当我在波士顿学院担任助理教授时，我就开始构思这个研究项目了。在那期间，我也访问了越南和缅甸，但在接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的过程中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那时候，我发送给潜在受访者的电子邮件、领英消息和脸书消息常常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我开展的前35—40次采访，都是通过滚雪球抽样法和熟人介绍完成的，受访者主要是通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校友网络在胡志明市举办的社交聚会和晚宴认识的。

但是，自从我入职芝加哥大学以后，这便从根本上帮我正式启动了这个研究项目。我很快便了解到，在国际金融界，众所周知的是，哈佛商学院和沃顿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主宰着全球各地的资产管

理公司。校友会的社交网络不仅对招募金融专业人士和高管，而且也对筹集资金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芝加哥大学以其在全球范围内拥护自由市场经济而闻名。我遇到的许多人都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和布斯商学院视为是将理论热情和学术严谨性与全球金融相结合的两个地方。这两个系所和学院的名声，常常会遮掩我作为一个批判精英的“左派社会学家”的地位，而当我还是波士顿学院的一名教师时，这个身份曾让别人对我产生怀疑，毕竟，波士顿学院一向是以倡导社会正义而著名的。

此外，在我的第一本书《欲望交易》出版之后，我于2015年入职了芝加哥大学。这本书荣获了几个奖项，这让我在芝加哥大学校友办公室的校友名册上十分显眼。在2016年，我便受邀为位于中国（香港、北京和上海）、新加坡、德里和孟买的芝加哥大学校友会做了六场“哈珀专题讲座”（Harper Lectures）。在这些地方，我遇到的大多数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校友都在银行业、律师事务所和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他们在为我引荐世界各地的精英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重视学术严谨性和辩论力量的校友，他们对我试图理解更广泛的交易流程和实践的这一项目极具同理心，他们也相信，我并不是想要写出一本揭露任何一家公司或个人腐败行为的专著。这些社交人脉网对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机构审查委员会和道德审查流程给予了极高的信任，这些流程都非常重视对研究对象及其匿名性的保护。

232

第二个帮助我获得采访机会的因素是，我的新书当时在越南很流行。这本书在越南报纸《沸点新闻》（*Zing News*，网址参见：zing.vn）上进行了一共七个系列的专题内容报道。当我在驻胡志明市的美国大使馆发表了一次公开讲座之后，这些在报纸上刊载的文章也引来媒体对我做简短采访。这些文章在越南获得了如此高的媒体关注，以至于我在那里接触到的大多数研究对象都已经在媒体上

听说过我了，并且也知道我为第一本书所做的研究工作。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很多人想要见我是因为对我产生了好奇，并想要更多地了解我的研究背后的故事，因此可以说，我们的采访会谈是让彼此都有所受益的。

与此同时，我所研究的也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也几乎总是会在同意坐下来接受我的采访之前对我进行尽职调查。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阅读过网络上免费提供的新书导论部分。所以，当我们坐下来进行面对面的采访时，我本认为需要我做的一些旨在建立融洽关系或让他们放松下来的热身工作，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困难。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我在上一本书中能够讲述一个如此宏大故事的能力印象深刻，他们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也认为我所讲述的故事是真实的，同时还关注到我仔细地匿名化处理了所有的消息来源。因此，人们通常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知道你其实知道这门生意是如何运作的，所以，你还想知道些什么呢？”他们希望我能单刀直入地切入正题。起初，我发现这点时几乎还感到震惊，但是，这对于帮助我收集采访中生成的极其丰富的数据是至关重要的。

招募受访者的流程和差旅相关问题

我培训了一支由 13 名本科生组成的研究助理团队，他们陪同我采访、撰写叙述性摘要、转写录音、进行新闻报道、编码数据和整理关于《越南经济时报》(*Vietnam Economic Times*) 文章的档案。采访可能会随时随地进行，持续时间在一到七小时。我们最长的一次采访录音转写文档上有 3.5 万个单词，这体量本身就可以充当一个案例研究了。

理一起工作：其中有三名学生助理陪同我去了越南，有两名陪同我去了中国香港。这个研究助理团队帮我组织整理好了11年的《越南经济时报》（2006—2016年）、四年的《亚洲交易报》（2014—2017年）和三年的《缅甸前沿市场报》（*Frontier Myanmar*, 2016—2018年）上与房地产投资有关的报纸文章，以便更好地分析相关数据。从这些报纸文章中，我们确定了几位关键联络人来邀请后续的相关采访。我们通过一些个人的人脉介绍在网络上联系到了一些被采访者，但我们也同样在没有任何个人引荐的情况下通过领英等社交平台联系上了一些人。在每次采访之后，我们都会要求受访者给我们提供其他一些人的联系方式，这些人可以来自我们原本拟好的待采访名单，也可以是来自他们所熟识之人，即他们认为会对本研究项目提供有用信息的人。每场采访我都会亲自到场，学生们则会轮流陪同我去采访。他们从来不会单独行动，因为我觉得我在采访现场很重要，这样一来，我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引导采访对象，也能迅速让自己熟悉收集到的数据。

特别要称赞的是，与我一起前往越南的三名学生在帮助我启动这个项目方面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他们都无所畏惧，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更加精力充沛。事实上，在行前会面的时候，我还担心他们在越南会不会去酒吧或者惹上麻烦之类的，毕竟我是他们几个在国外的唯一监护人（*chaperone*）。然而，事实证明，我完全是杞人忧天。出国后，这几个学生助理都在我身边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并积极实施他们的受访者招募策略。当我为项目感到筋疲力尽时，他们的兴奋、精力和纯粹的求知欲则让我能够继续前行。我们共同的出行经历和对大量数据共有的惊讶，也帮助我开始思考数据收集中新出现的一些主题。

在进行了前75次左右的采访之后，我意识到，通过报纸和杂志搜集到的受访者还只是揭示了这个故事的一小部分。通过滚雪球

式的他人引荐过程，我们了解到，我正在研究的许多交易实际上从未出现在任何新闻报道中。这是因为，许多人担心媒体对这些交易的报道会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并可能会导致政府追缴其所欠税款。因此，无论我们对报纸上报道的交易进行多么系统的分析，也还是会留下许多大到无法填补的漏洞。在我们研究过而且已经登上报纸的那些公司交易中，大多数也都已经完成了专业化运作的过程，并且那些公司可能都为首次公开募股做好了准备了。为了捕获关于交易周期所有阶段的投资信息，我们更多依赖通过滚雪球抽样法进行采访。

234 我在越南和缅甸大约进行了 181 次采访，并通过这些受访人士的社交人脉网，寻求对其他管理离岸投资的律师事务所、银行、公司秘书办公室和家族办公室的介绍。接着，我跑到了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每个城市都驻扎了六个月，以便追踪资金流动并开展更多的采访。重要的是，当我驻扎在越南、缅甸、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进行研究工作时，我还曾多次与投资者一起在本地和世界各地旅行，前者是在他们寻找交易机会以便部署资金时，而后者是在他们满世界筹集资金的时候。

这种体验就好比是被鞭打着马不停蹄地满世界狂奔，因为我经常会在某家酒店的房间里醒来，忘记了我现在置身于哪座城市，以及下一步又将要去往哪里。我的日程安排通常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的，会有不同的金融专业团体邀请我跟他们一道去旅行。旅行时我住的那些折扣酒店，比我在仰光市租的位于 4 楼的无电梯公寓，或者在胡志明市以每月不到 700 美元租的位于 12 层的公寓都要豪华得多。在这些地方的租房生活也让我想起了在 2009—2010 年期间，我作为一个研究生在越南开展实地考察时的生活。

截至本项目结束时，我总共进行了 302 次采访。然而，其中只有 49% 的受访对象允许我对采访过程录音。对于那些不允许我在采访中录音的回答，我也做了大量笔记；如果有某个学生陪同我一

起，那他 / 她也会这样做笔记，这样一来，我每次采访完都会拥有两份采访笔记。

为了保护我的研究对象并给予我在采访中所承诺的匿名性，我不会使用任何人员和公司的真实姓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我也不会透露他们的企业是从事何种自然资源交易的。诸如黄金或钨等战略性矿产资源，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等，都很难保持匿名性，因为该国可能只有两到三个大型的采矿项目。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要是我指出了战略资源是什么，就会使我的研究对象无法保持匿名性了。此外，在某些情况下，我会创建一个综合性案例，将具有相似投资者的多个案例杂糅为一个案例，这么做是为了让我与交谈的所有人不被认出来，进行“去识别化处理”。此外，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会利用法律文件、新闻稿件和媒体采访来对我的采访数据进行三角验证，以期能从研究对象（我的受访者们）之外获得一些视角和观点，因为他们在采访中一般会主导着故事的叙述。

数据分析和演讲展示

回到芝加哥以后，我聘请了另一支由八名本科生研究助理组成的团队，他们转录了采访录音，并与我一起分析这些数据。尽管我在打开录音设备之前征得了研究对象的同意，并且他们的全名也没有在录音时被提及，但我还是让学生编了代号，这样可以保证他们都不知道被采访者的真实姓名，也没有带有真实姓名的总名单。然而，采访本身有着太多私密细节，所以，当一些非常聪明的本科生好奇地试图识别出一两个受访对象的真实姓名时，我就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虽然我从未确认过他们提出的任何相关问题，但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与学生们共享研究数据的方法。

有鉴于此，我便故意混淆了一些采访，这样一来，就没有学生可以接触到完整的一组采访，或是在社交网络中可能相互关联的那些采访了。因此，每个学生接触到的录音数据集都不会超过完整录音数据集的6%。我计划要在项目完成后销毁掉这些采访录音，我不打算公开分享任何采访的转写记录，因为其中包含着很多可以被识别出来的信息，包括公司名称、前雇主、他们与银行和公司秘书办公室的关系，以及有关一些未公开交易的详细信息。

除了转写这些采访录音，学生们还为每次采访写了一个叙述性的摘要总结，这帮助我发展出了最初的编码集。这些叙述性摘要总结对于帮我为这本书制定叙事脉络至关重要，它们也帮我确定了将成为本书各个章节的主题。从这些信息出发，我在 NVivo 软件中编码了这些数据。在最初一轮编码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每个研究对象都描述了两个迥然不同的过程：第一个是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际网络，他们主要依靠这些人来筹集资金和构建他们的投资交易；第二个是他们与当地官员不同程度的关系，这种关系要么会促进要么会阻碍他们的投资项目。

虽然我没有着手分析世界各地复杂的社交网络，甚至也没有分析投资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交好程度，但我在注意到投资者讨论他们与政府关系的频率很高之后，发展出了二级编码来捕捉以下三点：（1）离岸外包的结构；（2）投资者在接触政府官员时遇到的障碍和机遇；（3）投资者为了将自己融入政治精英的紧密人际网络，或者为了在自己与政治精英之间建立物理和象征性边界而采取的一些做法。

在第一轮研究编码完成之后，我回到了有关离岸外包和新的资本布局、法律和腐败以及道德市场的文献研究中，以期能从这些数据中思考和梳理一些新出现的主题。通过在我收集的数据和这些文献之间来回参考的这一辩证过程，我开始了从案例研究中构建出理

论的过程。这个理论构建的创造性推理过程基于一些令人惊讶的研究观察，通过这一理论构建过程，我就自己正在探索和解开的相互关联的资本蛛网提出了一组新的问题，接着，这些问题又促使我在其他国家展开一些新的采访，以便于追踪数据。⁹ 236

只要有可能，我就会通过在谷歌上能搜索到的在线公开的媒体报道、法律文件、宣传手册和演示文稿等对我的采访转写记录进行三角验证。这些文件也有助于我分析和充实采访数据中未被涵盖的部分故事内容。

2019年7月，我与珍妮弗·卡尔森（Jennifer Carlson）、刘思达（Sida Liu）和格雷塔·克里普纳（Greta Krippner）共同主持了一次书稿研讨会，他们分别阅读了本书的初稿。那一稿的故事性很强，但理论化和概念化程度都比较弱。他们花了一天时间与我一起讨论我的数据，并帮助我构思出了这本书的全新架构。我一直记着他们给我的评论意见，并且花了一年来修改，然后，我与芝加哥大学的同事杰夫·沃特克（Geoff Wodtke）、阿曼达·夏基（Amanda Sharkey）和帕特里克·贝格曼（Patrick Bergemann）又一起举办了第二次书稿研讨会，他们每个人也都给我提供了实质性的反馈意见，帮助我完善和提升了这本书中的理论部分，我在获得反馈之后继续修订一些内容。我也有幸收到来自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特伦斯·哈利迪和汉娜·阿佩尔等人的批判性反馈意见，在最后一轮的书稿修订中，他们都帮我进一步推进了理论化构建。

研究精英男性时的性别悖论

在任何田野调查现场，每位民族志学者的主观自我意识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所获得的数据类型。然而，所有民族志学者也都是具有不同自我的多维度个体，我们会根据自身所处的关系背景

来激活这些不同的自我。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作为一名教师的我，并不等同于在田野调查中出现的那个住在国外、在世界各地忙着收集数据的我。在独特而全然不同的社交空间之间移动和导航的能力，对于开展本研究项目很关键。例如，在东南亚，我身份中的各个不同部分比其他因素显得更加重要，这些身份包括：作为一名出生在美国的越南战争难民的女儿，家庭成员中也存在着那场战争中的敌对双方；作为芝加哥大学的一名教授，以及作为一个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通常不具有什么威胁性的女性。我的这些身份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到了我能够接触到的人群，也影响到了他们愿意在我的民族志研究过程中与我分享哪些事情。

在我所进行的采访中，有90%的受访者都是男性。鉴于在华尔街和更广泛的金融圈中存在的性别差异，对许多人来说，这一点也不奇怪。¹⁰ 然而，这也意味着，在前往项目现场或筹集资金的所有旅行中，我通常都是跟随一群男性出行的唯一的女性。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有很多时刻都让我感到极其不适。为了能够接触到在未修好的土路上的那些难以抵达的工程项目地点，我经常要和完全陌生的人一道上车。我也曾经在并不清楚最终要去哪里的情況下，就跟别人一道上了飞机。我在实地研究时做出的这些瞬间选择，也是我后来会经常回顾反思的，我很想知道是否还可以用其他方式来与他们协商。

在采访过程中——大多数采访对象都是男性——不管是在饮品店还是在酒吧里，有些男性总会不断地与我搭讪，就像他们对调酒师和女招待所做的那样。对他们来说，女人都是可以明码标价的物品，很容易就能够用花哨的晚餐或者奢侈的礼物买到手。在我的田野研究现场，虽然也有更加有权势的女性能够阻止针对她们的一些类似骚扰，但我显然不属于她们中的一员。富有且有权有势的女性——她们有能力利用其他女性的劳动来取悦她们的潜在投资者和

其他男性合作伙伴——和我之间存在巨大鸿沟。那些女性可以直接拒绝这种骚扰，或者径直走开，离开那些前来骚扰的过于咄咄逼人的男性，因为她们拥有那些男性在商业交易中想要获得的东西。而反观另一边的我，对这些男性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我都不具备这种价值。

在他们的这个世界中，我无权无势，也没有力量，所以我常常得忍气吞声，保持沉默，同时也小心翼翼地想方设法去避开一些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情形。例如，有一天晚上，我和5位男性的小团体一起外出——其中有3个是来自韩国的外国投资商，一个是在越南工作了15年以上的越南海外侨民，另一个是越南当地的投资合伙人。我们先是一起吃了晚饭，接着又来到了一个可以360度欣赏胡志明市全景的思凯德克（Skydeck）酒吧，享用了一些精美时髦的鸡尾酒。结束之后，我们又来到了一家夜总会。在每个聚会场地，我都观察着这些男性，他们都在和那些桌子边的单身女性打情骂俏——没有人知道她们到底是女招待/性工作者，还是仅仅只是一些来这里参加派对的可爱姑娘。但是，随着夜幕降临，我们又都被安排去了一个在私人住宅里举行的派对。到了凌晨3点钟，很明显，这个派对活动逐渐开始变得亲昵狎邪起来，想必很快就会演变成一场性狂欢派对了。

当我走到门口想要逃离这种性狂欢派对现场时，有两个女人挡住了前门，用越南话对我招呼道：“大姐姐，大姐姐，可不要把我们丢在这儿呀！”我直勾勾地盯着她们的脸并告诉她们，我要走出这扇门，也欢迎她们跟我一道走。我离开了派对，但她们都噘着嘴选择留下来。事实上，我永远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迫使她们留下来。我从来都没有问过这些女人的名字，要是我再次看到她们，我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会再认出她们来。

第二天早上，我还得与那些来自韩国的客户进行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他们非常详细地描述了我离开后的派对场景，以及他们与

那些醉酒后不省人事的女性的集体狂欢。虽然我没有过多地探听个中究竟，但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挑战，我在试图表现得不带偏见的同时，还要若无其事地进行采访。虽然我对逐个回放派对场景完全不感兴趣，但我不得不聆听这些叫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以便能获得有关交易细节方面的一些信息。然而，即便我非常努力地想要忽略掉这些故事细节，但多次听到这些故事还是让我意识到，这些经历对于男性之间的同性社会性联结是多么的重要，这一点也形塑了本书中的部分论点。

通过这种方式，我变得有些像一位心理治疗师，因为有一些人向我敞开了心扉，和我谈及他们自己在必须穿越这类道德迷宫时的一些困惑。通常情况下，采访持续的时间都会比预期的时间要长得多，而且，受访者也经常会跟我分享大量的个人化细节，而我并没有在这方面过多地探究。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当我问这些人在这些需要道德妥协的情况下是否有朋友或亲密的知己可以交流谈心时，绝大多数人都告诉我，没有这样的谈心对象，因为他们担心这会有损自己的名誉，或是担心其他人可能会利用这些信息来害他们。顺便说一句，我经常也很想知道，为什么人们愿意敞开心扉与我分享这些事情，毕竟，他们的这些事在社会上是不受欢迎的，但我很少就这点来询问他们，部分原因是，我也害怕这么一问，可能就会让他们停下来不和我分享这类信息了。然而，在我的研究接近尾声时，我终于鼓足勇气问了埃里克，他是一位曾经多次向我吐露自己涉及不道德行为的受访者。他是这么对我说的：“我想，大概因为你是个女人，没有什么威胁性，也因为你的职责是要对此守口如瓶。你也不能对我造成什么伤害，而且，归根结底，这些国家中也没有那么多的心理治疗师。”

在调查研究现场，我明确表示自己已婚，此外，我也十分注意在外出时佩戴好我的结婚戒指。然而，这似乎没有阻止许多男性靠

近我，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做着很多女人每天都在不停地做的一些事情：躲避搭讪、沉默以对，并想方设法摆脱掉那些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情形。有好几次，我从长时间、加了多道菜的晚餐中所建立的对话里获得了一些最佳的采访数据。这些男性给我介绍了一些世界上最棒的餐馆。对我来说，它们是进行私密采访的完美场所，因为餐馆的环境通常都很安静，如果我被允许录下采访谈话，背景中也没有太多的噪声。餐桌通常也足够大，让我可以有充足空间在我的手机上或是一个小笔记本上做一些笔记。我记录下一些细节和关键性短语，好帮助我在采访后回忆起我们所展开过的对话。然而，在每顿晚餐结束时，我都会确保自己一定要付账，以便和受访者划清界限，在一顿长时间的晚餐后不留下任何可以被对方错误解读的余地，也即，这不是一次约会，这只是一次采访。

239

能和我的几位本科生研究助理一起工作，我感到很幸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比起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我的研究助理招募广告更能吸引到经济学或公共政策专业的学生。在田野研究现场，我的五名研究助理中有四名都是在18—20岁的年轻男性。我的学生们在采访时总是穿得很正式，就算不打领带配西装外套的话，至少也会穿着带纽扣的笔挺衬衫。每当我们一起走进某间办公室，或者当我们在咖啡店或是餐馆等待我们的受访者时，大多数的人都会误认为我的学生是教授，而把我误当作是我学生的研究助理，从而立马导致了一系列对于学生和受访者双方而言都颇为困惑和尴尬的介绍。当然，芝加哥大学教授的身份让我们能有机会进行采访，但很明显的是，我花费时间采访的大多数男性都认为我不具备什么威胁性。我研究采访过的许多男性都曾邀请我这些极具才华的研究助理到酒吧，想要借此将他们纳入我在本书中所写到的相同类型的“男性同性社会性联结”经历当中。此外，我们所研究和采访的人也积极游说和招募我的研究助理，这些人想要他们在当地的公司做一些更加

有利可图的实习工作。

作为一名身材娇小的亚裔美国女性，虽然我在这种环境中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尊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我的外形还招致了一些我不得不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忍辱吞下的骚扰和尖酸刻薄的言辞，但这种情况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几乎没有任何权力也就意味着，我可以提出一些看似愚蠢的问题，并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详细讲解。很多时候，我在当时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我在采访几周后对录音转写稿内容进行编码和数据分析时才察觉到了这一点。

在转录这些采访数据时，我的学生经常不得不听到这些男性在采访中对我尖叫着说，女性在金融领域一无是处，或是指责我对基本的经济学缺乏了解。虽然学生在听和转写这些录音时表达了一定程度的不适感，但我只得提醒他们，那些时刻其实都为我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和探寻机会，让我可以去深入挖掘细节，它们往往最终都会产生一些更加丰富的见解。

事实上，关照和控制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我作为一名女性或者说一个清贫的老师、一个有着工人阶级家庭背景的移民后代所拥有的主体位置，让我得以进入这个精英的世界，没有任何人觉得我的存在让他们受到了威胁。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的公司为我提供优惠机票、折扣酒店，以及大幅折扣乃至免费的商品这一系列经济优惠，我也根本无法在这些地方度过那么多的研究时光。从一开始，我的研究对象和他们的妻子就影响了我的着装选择，他们帮我挑选搭配合宜的服饰，以便更好地适应和融入这些特定的环境。从一开始，我就穿着这些他们的妻子送给我的现成的名牌衣服，这些衣服都是全新的，上面的标签都还在，这样一来，在我们同行的旅行中，我就不会在一群人中显得特别突兀了。在我的采访研究对象中，有些人还拥有全球奢侈品牌的特许经营权，他们为我提供了

一些购买奢侈品手包、鞋子和服装的优惠渠道，有时候能给到的最优折扣甚至只要一折。在这个研究项目结束时，我衣橱里的整个服饰风格都发生了剧变，而且事实上，我对服装、食物、旅行，以及一个诱人世界——若非有他们的引荐，或许我永远都无法进入这个世界——的品位和理解，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正是我身上的这种性别悖论——既是一名受过高等教育、在世界顶级大学之一执教的教授，同时又是一名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中的女性——形塑了本书中出现的那些分析框架和研究理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我的多维度主体定位不仅改变了我的研究论点，而且最终也改变了我的自我意识。为此，我也深深感谢我的那些受访者，他们不仅对我敞开心扉，带我进入他们的私人世界，也为我提供了用来在他们的社交网络和资本蛛网中导航的有力工具。

致谢

我来自一个越南难民和工人阶级家庭，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说真的，为了写这本书，我跑遍了全世界，涉足了一些我能想象到的拥有最多特权的空间和领域。在成长过程中，我明白了我们的社会是按照阶级来划分的。在我的想象中，有钱人都住在封闭式社区中装饰簇新的房子里，房屋周围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他们与我们其他所有人中间横亘着一堵厚厚的墙。然而，在为写这本书而做研究的过程中，我了解到，遍布全球的一些最为精英的社交圈子里也存在这样一种无形的划分，只不过藏匿起来的是巨额财富。

研究有钱人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尽管很多社会学家已经在一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他们已经足够了解富人是如何生活和消费的，也了解他们的财富与那些不幸的穷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少有人系统地研究过有钱人是如何赚钱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做到既能保护他们的钱财又能保护他们的名誉的。我既没有上过任何一所精英预科学校或常春藤名校，也没有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响当当的金融公司工作过，所以，我特别像是一个局外人，试图打

开与我相隔绝并对我隐匿起来的那个世界的大门。迄今为止，这是我开展过的最困难也是最雄心勃勃的一项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接触世界各地的富人极具挑战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想要在这些富人的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中将他们之间的关系串联起来，感觉就像是被困在一座找不到任何出口的迷宫中一样。

viii 若是没有那些让我得以进入他们的社交圈和商业圈的人，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些人不仅花费时间接受我的采访，还向我介绍了（这些介绍十分关键）其社交网络中的其他一些人。他们不仅带着我在世界各地穿梭，让我可以进入那些我原本无法得其门而入的空间和领域，也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向我解释他们在新前沿市场中经商时所使用的一些策略和面临的困境。这些精英人士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且在他们各自领域中都是佼佼者，所以研究他们有时候也令人生畏。此外，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我也常常思忖自己能带来什么价值。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在采访了这么多人后，我了解到，在这些庞大的资本蛛网中很少有人有足够的时间来连接网络中那些复杂的节点。我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他们对我很有耐心，有时又非常严厉，他们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让我可以研究和分析这个世界，并向其他在这个世界之外的人解说这一世界。

我非常感谢芝加哥大学的学术团体为此项研究提供的经济资助和智性支持。在我刚到芝加哥大学工作时，我的同事都鼓励并鞭策我要去思考和研究一个“创意大项目”，让它“在理论和经验上都要比我的第一本书更雄心勃勃”。这既令人生畏又令人兴奋。在拿到终身教职之前，这听起来像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任务。我的同事都在智性上鼓舞和推动了我的研究，我也同样从四位不同的系科主任那里得到了大力支持，他们分别是伊丽莎白·克莱门斯（Elisabeth Clemens）、卡瑞恩·克诺尔·塞蒂娜（Karin Knorr

Cetina)、琳达·韦特 (Linda Waite) 和安德烈亚斯·格莱泽 (Andreas Glaeser), 她们都帮我找到了抵抗压力的勇气, 让我不必急于用不太严格的数据和分析来快速获取研究结果, 而是要放慢研究速度、安心踏实地去做一个创意大项目。我还受到了戴维·尼瑞伯格 (David Nirenberg) 和阿曼达·伍德沃德 (Amanda Woodward) 两位院长的很多支持, 他们在这个项目的早期阶段就对我表示支持, 并在我获得外部基金项目时为我提供了帮助。

这个研究项目是我在与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学生的交流中不断形成的。我要特此感谢以下朋友: 安德鲁·阿伯特、帕特里克·贝格曼、卡瑞恩·克诺尔·塞蒂娜、爱德华·劳曼 (Edward Laumann)、乔纳森·利维 (Jonathan Levy)、约翰·李维·马丁 (John Levi Martin)、克里斯滕·施尔特 (Kristen Schilt)、阿曼达·夏基、福里斯特·斯图尔特 (Forrest Stuart)、珍妮·崔利塔波利 (Jenny Trinitapoli) 和罗伯特·瓦尔加斯 (Robert Vargas) 以及杰弗里·沃特科 (Geoffrey Wodtke)。他们都校读了本书在各个阶段的部分初稿, 并且都非常慷慨地提供了诸多批评性的反馈意见, 这些反馈意见帮我一些重要方面进一步完善了我的理论架构。在研究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有很多本科生研究助理与我合作, 他们好奇而无所畏惧, 我也特别感谢他们: 科亚·范·霍华德 (Khoa Phan Howard)、卢卡斯·佩妮多 (Lucas Penido)、高拉夫·卡瓦尼 (Gaurav Kalwani)、凯文·彼得森 (Kevin Petersen)、奎因·阮 (Quinn Nguyen)、艾米莉·朱 (Emily Zhu)、蕾娜·布瑞达 (Lena Breda)、尼克莱什·齐特朗亚 (Nikhilesh Chitlangia)、谭志勇 (Zhi Rong Tan)、温韵涵 (Yunhan Wen)、帕拉维·安娜德 (Pallavi Anand)、理查德·吴 (Richard Wu) 和安娜·葛瑞罗 (Ana Guerrero)。布赖恩·菲洛蒂 (Brian Fenaughty) 阅读了整本书的初稿, 也提供了敏锐犀利的反馈意见, 此外, 在

本书写作的最后阶段，他也是我非常宝贵的交流伙伴。我也很感谢国际研究（Global Studies）中心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李·普赖斯（Lee Price），在学生陆续进入校园之前，我需要隐匿到某个安静之处写作，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温暖而又热情的工作环境。

ix 2020年，我有幸为本书举办了一次研讨会，那时，珍妮弗·卡尔森、格雷塔·克里普纳和刘思达都慷慨地阅读了这本书完整的初稿，并提供了一些非常宝贵的反馈意见，这使我能跨多个学科领域深入分析并阐明本书的理论贡献。此外，特伦斯·哈利迪和汉娜·阿佩尔也都阅读了本书完整的初稿，并慷慨提供了许多批评意见。哈娜·E. 布朗（Hana E. Brown）和珍妮弗·琼斯（Jennifer Jones）一直是我写作时的坚定支持团队，十多年来，我们每两周开一次组会。他们阅读了我写过的所有东西，从一些最不成熟的想法到最后修改完善的书稿。在这个项目中，我也遇到了一些最具挑战性的困难，他们的友谊也一直支撑着我。

这本书的研究成本很高，因此我要感谢一些机构和组织，他们为我提供了慷慨的资助项目和各种奖金来支持我的研究。要是没有富布赖特全球学者奖和“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跨区域青年学者研究基金：亚裔语境与相关方面研究”（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Transregional Research Junior Scholar Fellowship: InterAsian Contexts and Connections）的慷慨资助，那么，此项研究中的实地调查便不可能完成。在芝加哥大学，我获得了以下机构和奖项的资助：性别与性研究中心、新任教职工大卫·赫夫特奖（David Hoeft Award for Newly Tenured Faculty）、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阿尔比恩·W. 斯莫尔奖金（Albion W. Small Grant），还有位于香港和巴黎的芝加哥大学分校提供的各类基金资助。这些奖金帮助我支付了旅行、住宿和餐饮的费用。因而，我才能够一方面进行采访，

一方面与那些参与构建这些错综复杂的资本蛛网中的不同人员进行联络。鉴于教学、服务和指导全球性研究项目要占用我大量的时间，我要感谢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Fellowship）的基金项目使我能够得到一次休假机会来完成本书的最终定稿。

在这个研究领域，我有幸得到了很多机构和人的支持。我要感谢以下越南机构中的所有人士对此项目的支持：越南国立大学、南方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国际合作办公室（Southern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华森大学（Hoa Sen University）和越南富布赖特学者大学。我还要感谢在缅甸的美国大使馆、缅甸联邦共和国的外交部以及仰光政治学院（Yango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对本项目的支持。

田野调查和写作可能都是极其孤独的工作，我很感谢我的许多朋友，他们不仅给了我友情的陪伴，而且经常在我谈论新冒出来的一些想法时充当倾听者，让我得以检验那些想法。特此衷心感谢丹尼·潘（Danny Phan）、丽塔·阮（Rita Nguyen）、杰米·乔·埃斯兰热（Jamie Jo Eslinger）、洪宣（Tuyen Hoang）、卡瑞达·布朗（Karida Brown）、迈克尔·罗德里格斯—穆尼斯（Michael Rodriguez-Muñiz）、戴安娜·卡斯蒂略（Diana Castillo）、蒂法尼·周（Tiffany Chew）、杰茜卡·科布（Jessica Cobb）、劳伦·贝雷斯福德（Lauren Beresford）、哈齐（Chi Ha）、武美美、达纳·段（Dana Doan）、安一民·多（Anh-Minh Do）、桑尼·苏（Sonny Swe）、阮潮（Thao Nguyen）、克里斯特尔·兰（Crystal Lam）、马库斯·陈（Marcus Chen）、纳塔莉·范（Nathalie Pham）、西尔维娅·索·麦克凯基（Sylvia Saw McKaige）、兰美美和兰·曼夫妇（Mimi and Man Lam），以及许许多多想要保持匿名的朋友——你们都知道我说的是谁，我衷心感谢你们。

我还有幸将这本书展示并介绍给了许多听众，他们也为我提供了检验自己想法的机会，还提问和挑战我，让我得以继续深化分析，其中就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北伊利诺伊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南加州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康奈尔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伯勒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Greensboro）、普渡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律师协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俄亥俄州立大学、马里兰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和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的听众。本书中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和《性别与社会》（*Gender & Society*）期刊上，我也从匿名审稿人给的意见那里受益匪浅。

我非常感谢本书编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米根·莱文森（Meagan Levinson），她在仔细阅读整本书稿时给我提供了很多支持性和专业性的审校建议。在当下，很多出版社都会要求作者为了普通读者而简化书籍内容，而我更加欣赏米根的方法。她尊重读者的智慧，并为微妙的差别和内容上的复杂性留足了空间。米根十分了解本书所涉及的学术研究课题，而且她也没有催着我把这本书变成一本关于富人如何思考、行事或花钱的那类浅显之作。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主任克里斯蒂·亨利（Christie Henry），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最严重的时期，他不仅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让我得以支付育儿开销，而且在我写作遇到瓶颈时还耐心地给我写最为暖心的电子邮件，让我再次生出了想要铆足劲完成这本书的动力。杰奎琳·德莱尼（Jacqueline Delaney）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整个出版团队一直都是我乐于与之合作的梦之队。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丈夫罗伯特·巴尔加斯（Robert Vargas）。

他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者，也是我最坚定的支持者，更是我一生的挚爱。这个项目研究将我们之间的爱推向了未曾抵达过的新境界，它也同样让我了解到在操持一个双职工小家庭时会遭遇何种全新生活的可能。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一起迎来了我们的女儿伊夫琳(Evelyn)。在女儿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我们没有任何帮手，在我努力完成这份手稿期间，是罗伯特细心照顾我们母女俩。作为一个小家庭，我们一起在居家隔离期间共度的日子，将会是我永远珍惜的一段时光。我全身心地爱着你们俩，还有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伊夫琳，妈妈爱你。我只希望我能活得足够久，好看着你以你自己的方式成长，并在你热爱的领域中大获全胜！



序言 越南，胡志明市

- 1 所有受访者的姓名均为化名，以便保护参与研究者的隐私。
2. Palan and Nesvetailova (2014) 形容超级大富豪“无处可觅，又无处不在”。

导论 蛛网资本主义

1. Porteous and Menkes (2013). 参见伯恩斯坦等人的著作（2016年）。
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20).
3. Wright and Hope (2018).
4. Piketty (2014), Zucman (2015).
5. Ho (2009).
6. Knuth and Potts (2016).
7. 关于合法进行资产转移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Potts (2020)。
8. Palan, Murphy, and Chavagneux (2009).
9. 参见 *Uneasy Street*, Rachel Sherman (2017)，在这本书中，谢尔曼只勉强采访了来自 42 个不同家庭的 50 个人，其采访重点在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取得的财富，而非他们如何赚钱。贾斯汀·法瑞尔（Justin Farrell, 2020）也在他的书《亿万富翁荒野》（*Billionaire Wilderness*）中描述了采访精英人士所遇到的重重挑战。
10. 关于编写法律条文的著作，参见 Pistor (2019); Potts (2018)，关于不断变更的法律地理，请参见 Potts (2016)。
11.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 North (1990). 关于精英和声望，请参见米尔斯的著作（[1956]2000）。

12. Veblen (1921, 4–5). 关于裙带资本主义, 请参见 Evans (1995), Kang (2002)。
13. 有关利润转移方法和税收的内容, 请参见 Dharmapala (2017), Dharmapala (2019)。
14. 例如, 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要关注国家塑造该国市场的能力(相关例子, 请参见 Panitch and Gindin [2012], Armijo and Katada [2015])。从这方面看来, 民族国家是他们主要的关注点, 而离岸司法管辖区则涉及另一种不同的主权, 这些地区能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税率, 吸引到富豪和超级大富豪的资产流入(请参见 Panitch and Gindin [2012, 1])。有关各种不同资本主义的文献中的很多理论, 都将第三世界国家形容为是没有相关法律机构的弱势国家, 其资本掠夺性不强, 而这些国家拥有从公民社会中收取各类资源的强大能力(参见 Evans [1995])。在这个框架之下, 民族国家主要负责去创造一些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条件, 在国家强制权力的支持之下, 司法行业在制定法律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有关国家垄断合法暴力的相关论点, 请参见 Weber [(1922)1978], 也可参见 Pistor [2019]。)拥有民主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将会迎来经济的增长和繁荣, 而那些将权力狭隘地集中在精英手中的榨取型经济的国家, 将会掣肘甚至是阻碍该国的经济增长(参见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
- 242 15. Sassen (2000).
16. Sassen (2001).
17. Sassen (2001).
18. Sassen (2001). 其研究重点在全球城市构成经济全球化的一些实践, 主要关注的是生产以及分散的工厂、办公室和服务网点的运行所必需的专业服务等。但这种对生产的关注未能解释清楚这类复杂的所有权结构, 因此, 它也没能厘清全球很多城市与离岸主权(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特别关联。
19. Reich (1983).
20. Palan and Nesvetailova (2014).
21. Piketty (2015, viii).
22. Zucman (2015).
23. Shaxson (2011).
24. Palan, Murphy, and Chavagneux (2010, 51)。也可参见 Fichtner (2015, 1); Palan and Nesvetailova (2014) (援引自 Akhtar and Grondona [2019, 1])。
25. Young (2018, 59).
26. Young (2018, 59–60).
27. 正如罗内·帕兰(Ronen Palan)和阿纳斯塔西娅·内斯维索娃(Anastasia Nesvetailova)所解释的那样,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全球金融体系已经经历了许多次变革, 它导致了“新的法律或准法律空间和金融创新的兴起和持续性增长, 它们要么旨在规避国家法规, 要么意图最小化国家法规对经济的影响”(Palan and Nesvetailova [2014, 2])。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之上, 谢娜·波茨(Shaina Potts)恰如其分地指出:“这些经济地理不仅与商业参与者密不可分, 而且与法律及政治上的参与者也密切相关,(这是因为)法律将经济地理锚定在国家空间和(通常是相互矛盾的)有着不同等级的国家利益之中。”(Potts [2018, 1–2])
28. Krippner (2017).
29. Sherman (2017), Mears (2020), Farrell (2020).

- 30. Tsing (2005), Harms (2016).
- 31. Mills ([1956] 2000).
- 32. 有关资本主义的合法生命，请参见阿佩尔的著作：Appel (2019)。
- 33. 关于破坏策略，请参见 Veblen (1921); 关于协调策略，请参见米尔斯的著作：Mills ([1956] 2000)。
- 34. 有关全球民族志的其他示例，请参阅：Block-Lieb and Halliday (2017), Burawoy 等人的研究 (2000)。
- 35. Freeland (2012).
- 36. 有关精英的研究，请参见：Cousin, Khan, and Mears (2018), Sherman (2017), Mears (2020), Freeland (2012), Atkinson and Piketty (2007), Bourdieu (1984)。
- 37. Cousin, Khan, and Mears (2018).
- 38. Forbes (2021).
- 39. Freeland (2012, 48).
- 40. Forbes (2019).
- 41. Mills ([1956] 2000), Cousin, Khan, and Mears (2018).
- 42. 这一理论框架的首次出现是在我与本杰明·康威尔 (Benjamin Cornwell) 的谈话中。
- 43. Zarroli (2016).
- 44. 参见附录部分。
- 45. Hoang (2015).
- 46. Sassen (2001).
- 47. Ong (2011).
- 48. Ong (2011), Koolhaas (2004).
- 49. Nam (2012, 2011), Hoang (2015).
- 50. Zoellick (2010), World Bank (2012).
- 51. Merrill Lynch and Capgemini (2011).
- 52. Ahmed (2014).
- 53. O'Neill (2013).
- 54. Gray (2017).
- 55. 参见埃斯特瓦和帕拉卡什的著作：Esteva and Prakash (1998)。(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经济系统中，对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世界的更为深入的评估，另可参见莫汉蒂的著作：Mohanty [2002])。

243

第1章 社交蜘蛛的缠结之网

- 1. Goldman (2016).
- 2. Richkoff (2018).
- 3. Smith (1986).

4. 在尼克拉斯·沙克森 (Nicholas Shaxson) 的《金银岛》(*Treasure Islands*) 一书中, 他介绍了一种资本蛛网的概念, 指的是在离岸金融结构和商业中人为地操纵跨境金融交易记录。沙克森指出, 由会计师假造的金融交易记录之外存在着一条真实的资本流动路线, 是一个分层级、呈轮辐式展开的避税天堂网络, 在他研究的案例中, 其中心是伦敦市 (Shaxson [2011, 13–17])。在沙克森的理论框架中, 有三个主要的环线: 其内环包括英国的三个皇家属地: 泽西岛、根西岛和马恩岛。向外一层环线则包括了英国的 14 个海外领土。第三个环线, 也就是最外层的那一环, 是由更为多样化的一些避税港湾组成的, 例如中国香港和巴哈马群岛。将这三个环线相互联系起来的, 是大英帝国和殖民主义的一段历史 ([2011], 17–18)。更重要的是, “这个蛛网让伦敦也参与进了在英国可能被禁止的商业业务, 这就让伦敦的金融家远离了不法行为, 从而让他们有了合理的推诿理由…… (这样一来) 当一笔钱流动到伦敦的时候……它就已经被洗干净了” ([2011, 18–19])。这个经验性的例证就是我建立蛛网资本主义这一理论的基础。然而, 尽管沙克森的叙述中有一个明确的经济中心 (在他的例子中, 要么是美国, 要么是英国), 但我的理论框架则认为, 这是一个没有明确经济中心或环线的全球现象。换句话说, 不存在这样一个简单的“英国蛛网”或“美国蛛网”。与此相反, 蛛网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没有明确经济中心或锚点的全球经济蛛网。

5. 与我采访的人有关的公司名称, 也是我虚构的化名。

6. Piketty (2014).

7. “战略行动领域是一种中观层次的社会秩序, 在这里, 行动者 (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 与其他行动者彼此之间进行互动、交流知识, 他们在一系列共识的指导下能够了解这一领域的目的, 这一领域中的各种关系 (比如, 谁拥有权力? 以及为什么此人拥有权力?) 以及这一领域中的各项规则……而当他们在一个更大的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进行互动时, 该领域也就成为了一个战略行动领域。” Fligstein and McAdam (2011, 3).

8. 有关“利害攸关”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援引自 Fligstein and McAdam (2011, 3–5)。

244 9. Fligstein and McAdam (2011, 11).

10. Harrington (2016).

11. Leigh, Frayman, and Ball (2012).

12. 紧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 各国政府都增加了税收力度, 以补偿他们各自在战争中的花费。而那些想要逃避高涨的新税之人, 则把他们的金钱转移到了瑞士。

13. Lane and Milesi-Ferretti (2017, 9).

14. McCoy (2016).

15. Treanor (2017).

16. Shields and Franklin (2015).

17. Harrington (2016, 13).

18. Bruner (2016).

19. Zucman (2015, 25).

20. USTR (2016).

21. Baker (2012).

22. Pennington (2016).
23. Swanson (2018).
24. Lee (2018).
25. O'Neill (2013).
26. World Bank (2018).
27.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7).
28. Bahree (2015).
29. Witt and Redding (2013).
30. Beresford (2008), Kerkvliet (2001), Gillen (2010).
31. Nguyen, T. P. (2014, 100).
32. Malesky, McCulloch, and Nhat (2015, 681).
33. Kim (2017).
34. Koolhaas (2004), Ong (2011), Hoang (2018).
35. Nam (2011).
36. Kim (2017).
37. 监管不透明 (Regulatory opacity) 涉及国家机构和城市开发商的做法, 因为他们既会在城市层面也会在国家层面协商大量的城市发展规划。相比之下, 监管透明度 (Regulatory transparency) 则突出了国家的努力, 即国家与多边机构进行合作, 以解决城市发展中的政府腐败问题。参见金的著作: Kim (2017)。
38. Hoang (2018).
39. 英国在 1824—1948 年期间曾统治缅甸。在缅甸独立之前的几年里, 日本又在 1942 年入侵并占领了缅甸。随后, 在由昂山将军领导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 (Anti-Fascist People's Freedom League) 的支持下, 英国帮助缅甸实现解放。但在 1947 年, 昂山和他组建的临时政府中的六名成员遭到了政治敌手和竞争对手吴努 (U Nu) 的暗杀。1948 年, 缅甸独立, 吴努担任缅甸的总理。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 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分裂成了两个派系。1962 年, 总参谋长奈温将军领导了一场军事政变, 将吴努赶下了台。
40. Turnell (2009).
41. 1988 年, 昂山素季成为了促进缅甸民主转型的领导人。为了平息民主社会运动, 该国政府逮捕并杀害了数百名民主活动人士。一场内部的军事政变导致了国家法律和秩序恢复委员会的成立, 该委员会宣布将缅甸国的正式英文名称从 "Burma" 更改为 "Myanmar"。(更多有关的历史背景信息, 请参见 Turnell [2009]。)
42. Turnell (2011).
43. Jones (2014).
44. Jones (2014).
45. Turnell (2009).
46. Jones (2014).
47. Szep and Marshall (2012).
48.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0).

49.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0).
50. Szep and Marshall (2012).
51. 参见 Hoang (2018, 2015), Hoang, Cobb, and Lei (2017)。
52. Harrington (2016, 19).
53. Aung (2017).
54. 普里茨克 (Pritzker) 家族以其在凯悦连锁酒店 (Hyatt Hotel) 的商业业务而闻名。据估计, 普里茨克的个人净资产高达 35 亿美元。
55. 沙克森 (Shaxson, 2011) 援引了《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杂志来指出, 鲁珀特·默多克 (Rupert Murdoch) 的“新闻传媒公司缴纳的税率仅为 6%——而他的竞争对手迪士尼公司的纳税税率为 31%”(第 7 页)。另可参见“Rupert Laid Bare,” The Economist, March 18, 1999。
56. Block-Lieb and Halliday (2017)。

第2章 吐丝织网：促成新的投资交易

1. Khanna and Palepu (2010).
2. Bussell (2013), North (1990), Rose-Ackerman (1999).
3. 本章从 Viviana Zelizer's (2012) 的关系工作概念中汲取了灵感, 进而对公共领域中的关系资本主义过程进行了理论化处理。泽利泽的著作表明, 在相关数据很少的市场中, 交易经纪活动通常会涉及个人关系, 这种关系为投资者提供了类似某种保证及一种亲密的“直觉感”, 进而让他们愿意在新的前沿市场中承担更大的风险。
4. 更多有关“关系工作”的信息, 请参见泽利泽的著作: Zelizer (2012)。
5. Hoang (2015, 2020).
6. Mills, [1956] 2000, 98. 财富积累的关键在于, 富有的个人能够利用腐败的政治制度, 并能聘请律师来执行法律步骤, 就像 19 世纪的强盗大亨一样, 他们随后便能自由地“榨取国家资源, 在他们内部发动经济战争……(并)使私人资本脱离公共领域”。参见米尔斯的著作([1956] 2000, 95)。
7. 同性情欲三角关系 (Homoerotic triangles) 将 C. 赖特·米尔斯和伊芙·赛吉维克的著作联系了起来, 它们揭示了在那些具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男性之间, 女性是如何被他们当作工具来建立男性之间的信任关系的。我将 C. 赖特·米尔斯([1956] 2000) 的掌权精英概念——或者又叫政治及经济精英结盟的概念——与伊芙·赛吉维克(1985 年) 的情欲三角概念之间进行了对比, 以进一步推进一种理论来说明商业交易中的性别差异关系。为了推进这一理论框架, 我对公职人员和私人投资者之间如何建立信任, 和 / 或他们是如何通过利用自己与女性身体的关系来相互要挟进行了一番实证研究。
8. René Girard (1966) and Eve Sedgwick (1985).
9. 赛吉维克论证道: “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说, 在所有男性主导的社会中, 男性同性社交(也包括同性恋)欲望与维持及传递父权制权力的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参见赛吉维克: Sedgwick [1985, 25])。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同性三角关系的理论方面, 也可参见黄的著作: Hoang (2020)。

10. Cooley, Heathershaw, and Sharman (2018).
11. 关于文化匹配, 可参见 Rivera (2012)。

第3章 不同类型的腐败和贿赂

246

1. 奥斯博格 (Osburg, 2018, S149) 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腐败行为不仅无处不在, 而且还或多或少被制度化成了‘不成文’的游戏规则, 试问在这样的语境下, 国家又该如何打击腐败呢?” 在奥斯博格的基础上, 我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不过这次我翻转了这个问题, 因此, 我研究的重点不是国家该如何打击腐败, 而是研究投资者是如何巧妙地利用了当地的投资环境。
2. Aguilera and Vadera (2008), Rose-Ackerman (2010).
3. Gorsira, Denkers, and Huisman (2018).
4. Irrawaddy (2021b).
5. 我的研究对象称之为“灰色地带中的偏白部分”(white of the gray) 与“灰色地带中的偏黑部分”(black of the gray)。我发现, 这种划分对于某些人来说, 会具有种族主义内涵, 也即, 默认白色是干净的, 而黑色是肮脏的。因此, 我在本研究中没有采用这种对比明显的黑白颜色词汇, 而是选择了“偏浅还是偏暗”(lighter vs. darker) 这两个词, 以便能更好地描绘这个过程。
6. 可参见: 15 U.S.C. § 78dd-2(B) and Deming (2011)。
7. Spalding (2015).
8. “交换礼物推迟了双方的互惠, 并将这种交换重新定义为是属于友谊方面的表示……为了完成礼物交换这个过程, 就必须先存在人际信任或社交行为……利益捆绑利用多个被视为无害的礼物交换, 用这种‘交叉补贴’(cross-subsidization) 来合成一个被人们视为禁忌的交换……利益捆绑使……有损名声的交换表面上变成了一组不损声望的(交换)”, 因此, “行动者可以……留有这种借口, 也即, 他们之间的礼物交换不存在(什么违法不当行为)……经纪业务公会找到第三方来承担这种交换礼物的责任”。参见 Rossman (2014, 43, 48, 53)。
9. Rossman (2014).
10. Mauss (1990).
11. Lainer-Vos (2013).
12. Lee (2016).
13. Stovel and Shaw (2012, 140).
14. Stovel and Shaw (2012).
15. Sanyal (2012).
16. Rossman (2014).
17.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6).
18. 这个“出口腐败”(exporting corruption) 的观点是在北伊利诺伊大学的社会学系座谈会上发表演讲后, 由那里的杰弗里·基德尔(Jeffrey Kidder) 教授提出来的, 这也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富有远见的分析。基德教授提出这一点的背景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在向监管结构较为宽松的其他国家出口排放污染物，他据此询问，是否存在与出口腐败有相似之处的例子？我特别感谢杰弗里在这个问题上的洞见。

第4章 全球精英的税务策略

1. 有关税收理论的文献中存在着显著空白，这颇令人惊讶，因为马克思（Karl Marx）、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齐美尔（Georg Simmel）等经济学学者早已对税收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进行了反思（Aalbers [2017]）。
2. Sayer (2015).
3. 关于合法和非法税务策略之间界限模糊的相关论点，另可参见：Braithwaite (2009b), Maurer (2008)。
4. Shen (2010).
5. De Mooij and Ederveen (2008).
6. Zelizer (2005).
7. Shen (2010).
8. 中国相关的案例，也可参见 Harrington (2016)。
- 247 9. Shen (2010, 212).
10. Shen (2010, 212).
11. Zhao (2014).
12. Gleckman (2013). 在格莱克曼的这篇文章中，他还引用了哈佛大学教授史蒂夫·谢伊（Steve Shay）的著作，后者将这类钱财称为“海洋收入”（ocean income）或是“直接消失在深蓝大海中的收入”（revenue that simply disappears into the deep blue）。
13. 相关案例，可参见：Desai, Foley, and Hines Jr. (2006), Desai, Foley, and Hines Jr. (2004)。
14. Desai, Foley, and Hines Jr. (2004, 2730).
15. 直到 2016 年，中国才制定了一套转让定价规则（Bell [2017]）。
16. Nguyen (2017).
17. TMF 集团概述了这一新法律的一些主要特点。根据（越南）新颁布的第 20 条法令：
 - 所有权门槛将从 20% 提高到 25%；
 - 相互之间交易额超过 50% 的销售，购买双方实体将不再被视为是关联方；
 - 档案必须包括确定关联方的交易价格和数据源基准；
 - 现在的 TP 存档（TP documentation）包括一个关于全球集团信息的主档案和一个关于当地的档案，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利润报告。
18. Vu (2017).（这里所引用的采访在网上已不再可读，但约瑟夫·武的同期采访可以在普华永道转让定价播客 *TP Talks* 上获取访问权。）
19. Klassen, Lisowsky, and Mescall (2017).

- 20. Le (2018).
- 21. Tu and Le (2018).
- 22. Le (2018).
- 23. 很少有学者会注意到市场上不同参与者的不同策略，以及他们是如何相互合作的。经济社会学家和法律社会学家不太会关注作为全球资本流动中重要变量的税收情况。大部分有关税收的工作是由经济学家和法律学者完成的，他们会使用大型数据集，而不会去关注人或人际关系，他们也可能使用单个的案例研究作为他们的分析单元。这一学科中也有零散一部分会将税收与职业社会学（参见 Halliday [1987]）、国家理论（参见 Tilly [2007]）以及反对税收的社会法律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参见 Braithwaite [2009a, b]），并致力于建立跨国法律秩序（参见 Genschel and Rixen [2015]）。
- 24. Worstall (2016).

第5章 隐形蛛网中的有罪不罚

- 1. Wright and Hope (2018, 9).
- 2. DaCosta (2010).
- 3. Gunasegaram (2018).

第6章 道德困境和合理辩护机制

- 1. Young (2004).
- 2. Lamont (1992).
- 3. 关于神圣和世俗，请参见涂尔干：Durkheim (1995)；关于金钱污染社会的方式，请参见道格拉斯：Douglas (1966)；关于金钱腐败的方式，请参见泽利泽：Zelizer ([1979] 2017), Friedman and McNeill (2013)。
- 4. 关于社会道德秩序的转变，参见波兰尼：Polanyi ([1944] 2001)。关于社会道德秩序，请参见韦伯：Weber ([1922] 1978)。
- 5. 有关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分类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赛吉维克：Sedgwick (1985)。
- 6. 韩国财阀指的是由个体所有者或者其家族经营和掌控的大型工业集团。
- 7. Halliday and Carruthers (1996).

248

第7章 退出市场：盛宴与饥荒

- 1. 为《越南经济时报》(*Vietnam Economic Times*) 上 2016 年的一篇文章，为了保证我的研究对象的匿名性，我在这里没有附上文章内容。
- 2. Small (2017, 6).

结论 解开混乱缠结的蛛网

1. Ferguson (2010).
2. “占领华尔街”的社会运动直接改变了公众的看法，有关这方面的更多信息，请参见：Gaby and Caren (2016)。
3. Dhanoa (2020).
4. Gladstone (2021).
5. Lewin and Peeters (2006).
6. Weitzman (即将出版)。
7. Woodman (2018a).
8. Woodman (2018a).
9. Woodman (2018b).
10. Woodman (2018b).
11.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 (2017)。
12. Fagetan (2021).
13. Deneault (2011, 92–93).
14. Deneault (2011, 83).
15. 参见以下网址：https://corpfiles.delaware.gov/whyDE_chinese.pdf，援引自德诺：Deneault (2011)。
16. Zucman (2014).
17. Goldman (2021).
18. Agence France-Presse (2021).
19. Nguyen (2021b).
20. Coyle (2021).
21. *The Irrawaddy* (2021).
22. Zhou (2021), Davies (2021).
23. Davis (2021).
24. Nguyen (2021a).
25. Tonkes (2020).
26. Lee (2021).
27. Mahtani (2021).
28. Birdsong (2015).
29. Sands (2016).
30. Le (2020).

31. 有关缅甸的罗兴亚危机 (Rohingya Crisis)*, 请参见 BBC 新闻: BBC News (2020); 更多关于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 可参见: Gonzalez (2020)。
32. Stiglitz (2019)。
33. Schwartz (2020)。

附录 研究精英群体的性别悖论

249

1. Zaloom (2006), Ho (2009)。
2. Goffman (2014)。
3. 更多相关案例, 可参见以下著作: Bernstein (2007), Bourgois (1996), Contreras (2013), Ralph (2014), Vargas (2016), Stuart (2016)。
4. 1974 年美国的《国家研究法案》与女权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关联, 首先是由伊丽莎白·朗 (Elizabeth Long, 莱斯大学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 提出的, 在我与朗共同撰写的一篇未发表的合著论文中, 她指出了这一点, 该论文标题为《为什么街头研究正流行? 关于帮派、毒品和性工作的民族志研究》(“Why is Rogue in Vogue? Ethnographies on Gangs, Drugs, and Sex Work”)。这篇文章的标题后来修改为《女权主义认识论和社会学中的性别化职业》(“Feminist Epistemology and Gendered Careers in Sociology”), 并于 2017 年 8 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美国社会学协会年会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in Montréal) 上被宣读, 会议宣读小组的组会讨论主题为“定性方法论之一: 认识论和民族志”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I: Epistemology and Ethnography)。
5. Doucet (2018)。
6. Venkatesh (2008)。
7. Harrington (2016)。
8. Hoang (2018)。
9. 想了解溯因理论建构的更全面的框架, 也可参见: Tavory and Timmermans (2014)。
10. 参见: Bear et al. (2015), Mears (2020)。

* 罗兴亚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 主要分布在缅甸、孟加拉国和泰国等国家。然而, 由于长期以来的种族歧视、社会压迫和政治冲突, 罗兴亚人一直面临着严重的人权侵犯和生存危机。

参考文献

- Aalbers, Manuel B. 2017. "Financial Geography I: Geographies of Tax."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2 (6): 916–27.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17731253>.
-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 Agence France-Presse. 2017. "Vietnamese Banker Sentenced to Death in Fraud Saga That Exposed Deeply Rooted Corruption in Financial Syste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9, 2017.
- Agence France-Presse. 2021. "Leave, Suspend, Or Stay: The Choices Of Foreign Investors In Myanmar." *Barron's*, July 8, 2021. <https://www.barrons.com/news/leave-suspend-or-stay-the-choices-of-foreign-investors-in-myanmar-01625751007>.
- Aguilera, Ruth V., and Abhijeet K. Vadera. 2008. "The Dark Side of Authority: Antecedents, Mechanisms, and Outcomes of Organizational Corrup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77 (4): 431–49.
- Ahmed, Kamal. 2014. "Twenty-Four European Banks Fail EBA 'Stress Test.'"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October 26, 2014.
- Apkhtar, Jahanzeb, and Verónica Grondona. 2019. "Tax Haven Listing in Multiple Hues: Blind, Winking, or Conniving." Research Paper no. 94. Geneva, Switzerland: South Centre.
- Appel, Hannah. 2019. *The Licit Life of Capitalism: US Oil in Equatorial Guine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Armijo, Leslie Elliott, and Saori N. Katada. 2015. "Theorizing the Financial Statecraft of Emerging Powers."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 (1):42–62.
- Atkinson, A. B., and Thomas Piketty, eds. 2007. *Top Incomes over the 20th Century: A*

- Contrast between European and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ung, Myo, and Michael Peel. 2017. "Myanmar: The Military-Commercial Complex." *Th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 2017.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3249258_Myanmar_the_military-commercial_complex.
- Bahree, Megha. 2015. "Military, Political and Business Cronyism at Heart of Land Seizures in Myanmar." *Forbes Asia*, March 30, 2015.
- Baker, Peter. 2012. "Obama to Visit Myanmar as Part of First Postelection Overseas Trip to Asia."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8,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11/09/world/asia/obama-to-visit-myanmar.html>.
- BBC News. 2020. "Myanmar Rohingya: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Crisis." *BBC*, January 23, 2020.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41566561>.
- Bear, Laura, Karen Ho, Anna Lowenhaupt Tsing, and Sylvia Yanagisako. 2015. "Gens: A Feminist Manifesto for the Study of Capitalism." *Theorizing the Contemporary* (Fieldsites). doi: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gens-a-feminist-manifesto-for-the-study-of-capitalism>.
- Bell, Kevin. 2017. "China's New Transfer Pricing Rules Keep Arm's Length Approach." *Offshore News Flash*, April 5, 2017. (Possibly reprinted from Bloomberg BNA *Tax Management Transfer Pricing Report*.) <http://www.offshorenewsflash.com/2017/04/05/chinas-new-transfer-pricing-rules-keep-arms-length-approach/>.
- Beresford, Melanie. 2008. "Doi Moi in Review: The Challenges of Building Market Socialism in Vietna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8 (2): 221–43.
- Bernstein, Elizabeth. 2007. *Temporarily Yours: Intimacy, Authenticity, and the Commerce of Sex*.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rnstein, Jake, Petra Blum, Oliver Zihlmann, David Thompson, Frederik Obermaier, and Bastian Obermayer. 2016. "All Putin's Men: Secret Records Reveal Money Network Tied to Russian Leader."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CIJ), April 3, 2016. <https://www.icij.org/investigations/panama-papers/20160403-putin-russia-offshore-network/>.
- Birdsong, Nicholas. 2015. *The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Inequality*. Kansas City, MO: Seven Pillars Institute.
- Block-Lieb, Susan, and Terence C. Halliday. 2017. *Global Lawma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Crafting of World Marke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and Loïc J. D.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urgois, Philippe. 1996.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aithwaite, Valerie. 2009a. *Defiance in Taxation and Governance: Resisting and Dismissing Authority in a Democracy*.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Braithwaite, Valerie. 2009b. "Tax Evasion." In *Oxford Handbook of Crime and Public Policy*, edited by Michael Tonry, 381–405.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uner, Christopher. 2016. *Re-Imagining Offshore Fi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rawoy, Michael, Joseph A. Blum, Sheba George, Zsuzsa Gille, Teresa Gowan, Lynne Haney, Maren Klawiter, Stephen H. Lopez, Seán Ó Riain, and Millie Thayer. 2000. *Global Ethnography: Forces, Connections, and Imaginations in a Post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ussell, Jennifer. 2013. "Varieties of Corruption: The Organization of Rent-Seeking in India." Westminster Model of Democracy in Crisis? Conference at Harvard University.

Cihák, Martin, Aslı Demirgüç-Kunt, Erik Feyen, and Ross Levine. 2012. 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Database. In *Benchmarking Financial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17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12031/wps6175.pdf?sequence=1&isAllowed=y>.

Contreras, Randol. 2013. *The Stickup Kids: Race, Drugs, Violence,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oley, Alexander, John Heathershaw, and J. C. Sharman. 2018. "The Rise of Kleptocracy: Laundering Cash, Whitewashing Reputa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29 (1): 39–53.

Cousin, Bruno, Shamus Khan, and Ashley Mears. 2018.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athways for Research on Elites." *Socio-Economic Review* 16 (2): 225–49.

Coyle, Kenny. 2021. "Burma's Communists Say Military Coup a Symptom of Myanmar's Crony Capitalism." *People's World*, April 26, 2021. <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burmas-communists-say-military-coup-a-symptom-of-myanmars-crony-capitalism/>.

Credit Suisse Group AG. 2017. *Annual Report 2017*.

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 2011. "The Base of the Wealth Pyramid." In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1*. DaCosta, Gene. 2010. "Cayman Islands Companies: The Asia Connection." Conyers Dill & Pearman, December 2010.

Davies, Ed. 2021. "China Envoy Visits Myanmar as New Route to Indian Ocean Opened." *Reuters*, September 1, 202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china-envoy-visits-myanmar-new-route-indian-ocean-opened-2021-09-01/>.

Davis, Brett. 2021. "Vietnam's Textile Industry Combats Pandemic With PPE Switch." *Forbes*, March 24, 2021. <https://www.forbes.com/sites/davisbrett/2021/03/24/vietnams-textile-industry-combats-pandemic-with-ppe-switch/?sh=10fa2ccb5b4f>.

Deming, Stuart H. 2011.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 Norms*. 2nd ed. International Practitioner's Deskbook Series. Chicago: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 De Mooij, Ruud A., and Sjef Ederveen. 2008. "Corporate Tax Elasticities: A Reader's Guide to Empirical Findings."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4 (4):680–97.
- Deneault, Alain. 2011. *Offshore: Tax Havens and the Rule of Global Crime*. Translated by George Holoch.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Desai, Mihir A., C. Fritz Foley, and James R. Hines Jr. 2004.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 World of Multiple Tax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 (12): 2727–44.
- Desai, Mihir A., C. Fritz Foley, and James R. Hines Jr. 2006. "The Demand for Tax Haven Opera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0 (3): 513–31.
- Dhanoa, Sandeep. 2020. "The Hunt for Jho Low: Where is Low Laying Low? Where is Whale- y?" *Unreserved*, January 9, 2020. <https://www.unreservedmedia.com/the-hunt-for-jho-low/>.
- Dharmapala, Dhammika. 2017. *The Economics of Tax Avoidance and Evasion*.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Critical Writings in Economics 334.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Dharmapala, Dhammika. 2019. "Profit Shifting in a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9: 488–92.
- Doucet, Andrea. 2018.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and Ethics: Ecological Thinking, Situated Knowl- edges, and Epistemic Responsibilities "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thics*, edited by Ron Iphofen and Martin Tolich. London: SAGE Publishing.
- Douglas, Mary.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New York: Routledge.
- Durkheim, Émile. 199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Edited by Karen E. Field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Esteve, Gustavo, and Madhu Suri Prakash. 1998. *Grassroots Post-Modernism: Remaking the Soil of Cultures*. London: Zed Press.
- Evans, Peter.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agetan, Ana Maria. 2021. "The Non Regulation of Hedge Funds in Offshore Jurisdictions: Cayman Islands, British Virgin Islands, Mauritius, and Delaware." In Fagetan, *The Regulation of Hedge Funds: A Global Perspective*, 283–331.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Farrell, Justin. 2020. *Billionaire Wilderness: The Ultra-Wealthy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American We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erguson, Charles. 2010. *Inside Job*. United States: Sony Pictures Classics.
- Fichtner, Jan. 2015. *The Offshore-Intensity Ratio: Identifying the Strongest Magnets for Foreign Capital*. London: City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re, City University London.

- Fligstein, Neil, and Doug McAdam. 2011.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Strategic Action Fields." *Sociological Theory* 29 (1):1–26.
- Forbes. 2019. "Billionaires: The Richest People in the World." *Forbes*, March 5, 2019.
- Fourcade, Marion, and Kieran Healy. 2007. "Moral Views of a Market Socie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285–311.
- Freeland, Chrystia. 2012. *Plutocrats: 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and 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Friedman, Daniel, and Daniel McNeill. 2013. *Morals and Markets: The Dangerous Balan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Gaby, Sarah, and Neal Caren. 2016. "The Rise of Inequality: How social movements shape discursive fields."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1 (4): 413–29.
- Genschel, Philipp, and Thomas Rixen. 2015. "Settling and Unsettling the Transnational Legal Order of International Taxation." In *Transnational Legal Orders*, edited by Terence C. Halliday and Gregory Shaff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llen, Jamie. 2010. "An Examin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ate and Nonstate in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Urban Geography* 31 (1): 90–113.
- Girard, René. 1966. *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 Self and Other in Literary Structure*. Translated by Yvonne Freccero.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Gladstone, Rick. 2021. "Pandora Papers: A Money Bomb With Political Ripple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4,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04/world/pandora-papers.html>.
- Gleckman, Howard. 2013. "The Real Story on Apple's Tax Avoidance: How Ordinary It Is." *Forbes*, May 21. <https://www.forbes.com/sites/beltway/2013/05/21/the-real-story-about-apples-tax-avoidance-how-ordinary-it-is/?sh=335819546523>.
- Goffman, Alice. 2014. *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ldman, Jason G. 2016. "Meet the Spiders That Have Formed Armies 50,000 Strong."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124034948/http://www.bbc.com/earth/story/20160122-meet-the-spiders-that-have-formed-armies-50000-strong>.
- Goldman, Russell. 2021. "Myanmar's Coup and Violence, Explained." *New York Times*, May 29, 2021. <https://www.nytimes.com/article/myanmar-news-protests-coup.html>.
- Gonzalez, Nathaniel James. 2020. "Living with Violenc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current Buddhist-Muslim Violence in Myanmar." Doctoral Dissertation,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 Gorsira, Madelijne, Adriaan Denkers, and Wim Huisman. 2018. "Both Sides of the Coin: Motives for Corruption Among Public Officials and Business Employee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51 (1): 179–94.
- Gray, Alex. 2017. "These Are the World's Fastest-Growing Economies in 2017." *World Economic Forum*, June 9, 2017.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7/06/these->

- are-the-world-s-fastest-growing-economies-in-2017-2/*.
- Gunasegaram, P. 2018. *1MDB: The Scandal that Brought Down a Government: a Prime Minister, a Whizz and the Biggest Kleptocracy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Petaling Jaya, Malaysi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Halliday, Terence C. 1987. *Beyond Monopoly: Lawyers, State Crises, and Professional Empower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lliday, Terence C., and Bruce G. Carruthers. 1996. "The Moral Regulation of Markets: Professions, Privatization and the English Insolvency Act 1986."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1 (4): 371–413.
- Harms, Erik. 2016. *Luxury and Rubble: Civility and Dispossession in the New Saigon*. Asia: Local Studies / Global Themes 32.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rrington, Brooke. 2016. *Capital Without Borders: Wealth Managers and the One Perc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 Karen. 2009. *Liquidated: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oang, Kimberly Kay. 2015. *Dealing in Desire: Asian Ascendancy, Western Decline, and the Hidden Currencies of Global Sex Work*.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ang, Kimberly Kay. 2018. "Risky Investments: How Local and Foreign Investors Finesse Corruption-Rife Emerging Marke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3 (4): 657–85.
- Hoang, Kimberly Kay. 2020. "Engendering Global Capital: How Homoerotic Triangles Facilitate Foreign Investments into Risky Markets." *Gender & Society* 34 (4): 547–72.
- Hoang, Kimberly Kay, Jessica Cobb, and Ya-Wen Lei. 2017.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Inter-Asian Capital Circulation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Methodological Positions."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25 (4): 633–44.
- ICIJ. 2016. "Giant Leak of Offshore Financial Records Exposes Global Array of Crime and Corruption: Overview of the Panama Papers." 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 April 3, 2016. <https://www.occrp.org/en/panamapapers/overview/intro/>.
- ICIJ. 2017. ICIJ Offshore Leaks Database: Power Players: Former Secretary of Commerce, US (2013–2017) Penny Pritzker.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https://offshoreleaks.icij.org/stories/penny-pritzker>.
-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0. "Timeline: US-Burma/Myanmar Relation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2 (3): 434–36.
- Jones, Lee. 201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yanmar's Transi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4 (1): 144–170.
- Kang, David C. 2002. *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rkvliet, Benedict J. Tria. 2001. "An Approach for Analys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 Vietnam."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16 (2): 238–78.
- Khanna, Tarun, and Krishna G. Palepu. 2010. *Winning in Emerging Markets: A Road Map for Strategy and Execution*.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Press.
- Kim, Hun. 2017. "Capturing World-Class Urbanism Through Modal Governance in Saigon."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25 (4): 669–92.
- Klassen, Kenneth J., Petro Lisowsky, and Devan Mescall. 2017. "Transfer Pricing: Strategies, Practices, and Tax Minimization."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4 (1): 455–93.
- Knuth, Sarah, and Shaina Potts. 2016. "Legal Geographies of Finance: Editors' Introduc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8 (3): 458–64.
- Koolhaas, Rem. 2004. "Beijing Manifesto." *Wired*, August 1, 2004. <https://www.wired.com/2004/08/beijing/>.
- Krippner, Greta R. 2017. "Unbounding the Economy." *Socio-Economic Review* 15 (3): 686–90.
- Lainer-Vos, Dan. 2013. "The Practical Organization of Moral Transactions: Gift Giving, Market Exchange, Credit, and the Making of Diaspora Bonds." *Sociological Theory* 31 (2): 145–67.
- Lane, Philip R., and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2017.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ashington, D.C.: SSRN.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78676.
- Le, Andrew N. 2020. "The Quest for Mobility: The Constraints of Privatized Migration Control, Opportunistic Brokerage, and Migrant Resistance in Vietnam." Doctoral Dissertation,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publication no. 20040).
- Le, Thanh. 2018. "Grab Refuses to Release Details of Uber Buy-Out to Vietnam's Tax Man." *VnExpressInternational*, April 19, 2018. <https://e.vnexpress.net/news/business/grab-refuses-to-release-details-of-uber-buy-out-to-vietnam-s-tax-man-3738911.html>.
- Lee, Cheol-Sung. 2016. *When Solidarity Works: Labor-Civic Networks and Welfare States in the Market Reform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e, Yen Nee. 2018. "Vietnam Unseats Singapore as Largest IPO Fundraiser in Southeast Asia." *CNBC*, December 26, 2018. <https://www.cnbc.com/2018/12/27/vietnam-unseats-singapore-as-largest-ipo-fundraiser-in-southeast-asia.html>.
- Lee, Yen Nee. 2021. "Kamala Harris Kicks Off Vietnam Visit by Calling Out China's 'Bullying' Tactics." August 25, 2021. <https://www.cnbc.com/2021/08/25/vp-kamala-harris-talks-south-china-sea-in-vietnam-amid-us-china-rivalry.html>.
- Leigh, David, Harold Frayman, and James Ball. 2012. "The Offshore Trick: How BVI 'Nominee Director' System Works." *The Guardian*, November 25, 20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2012/nov/25/offshore-trick-bvi-nominee-director>.
- Lewin, Arie Y., and Carine Peeters. 2006. "The Top-Line Allure of Offshor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ttps://hbr.org/2006/03/the-top-line-allure-of-offshoring>.
- Mahtani, Shibani. 2021. "Harris, in Vietnam, Gets a Dose of China's Challenge to the U.S." *The Washington Post: Asia & Pacific*, August 25, 2021. <https://>

- 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kamala-harris-vietnam-china-coronavirus/2021/08/25/77e51efa-0564-11ec-b3c4-c462b1edcfc8_story.html.
- Malesky, Edmund J., Neil McCulloch, and Nguyen Duc Nhat. 2015. "The Impact of Governance and Transparency on Firm Investment in Vietnam."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3 (4): 677–715.
- Maurer, Bill. 2008. "Re-Regulating Offshore Finance?" *Geography Compass* 2 (1): 155–75.
- Mauss, Marcel. 1990.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New York: Routledge.
- McCoy, Kevin. 2016. "U.S. Slaps \$1.3B in Penalties on Swiss Banks." *USA Today*, January 27, 2016.
- Mears, Ashley. 2020. *Very Important People: Status and Beauty in the Global Party Circui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errill Lynch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 and Capgemini. 2011. *2011 Asia-Pacific Wealth Report*. https://www.capgemini.com/us-en/wp-content/uploads/sites/4/2017/08/Asia-Pacific_Wealth_Report_2011_English_Version.pdf.
- Mills, C. Wright. [1956] 2000.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2002. "'Under Western Eyes' Revisited: Feminist Solidarity through Anticapitalist Struggle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8 (2): 499–535.
- Nam, Sylvia. 2011. "Phnom Penh: From the Politics of Ruin to the Possibilities of Return."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Review* 23 (1): 55–68.
- Nam, Sylvia. 2012. "Speculative Urbanism: The Remaking of Phnom Penh."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Nguyen, Duy. 2021a. "Vietnam Produces Face Masks for US Marine Corps." *Hanoi Times*, February 8, 2021. <http://hanoitimes.vn/vietnam-produces-face-masks-for-us-marine-corps-316217.html>.
- Nguyen, Thi Bich Ngoc. 2021b. "Investors Slam on Brakes in Myanmar in Wake of Coup: Country 'Untouchable' during State of Emergency, Says Venture Capitalist." *DealStreetAsia*, Nikkei Asia, February 6, 2021.
- Nguyen, Thi Thanh Thuy. 2017. Updates on Transfer Pricing in Vietnam. TMF Group Regulatory Update, June 8, 2017.
- Nguyen, Tu Phuong. 2014. "Rethink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Vietnam: The Cas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Ho Chi Minh City." *Asian Studies Review* 38 (1): 87–106.
- North, Douglass.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Neill, Jim. 2013. *The Growth Map: Economic Opportunity in the BRICs and Beyond*. London: Penguin Books.
- Ong, Aihwa. 2011. "Introduction: Worlding Cities, or the Art of Being Global." In *Worlding Cities: Asian Experiments and the Art of Being Global*, edited by Ananya Roy

- and Aihwa Ong.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 Osburg, John. 2018. "Making Business Personal: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and Elite Networks in Post-Mao China." *Current Anthropology* 59: S18, S149–59.
- Palan, Ronen, Richard Murphy, and Christian Chavagneux. 2009. *Tax Havens: How Globalization Really Work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alan, Ronen, and Anastasia Nesvetailova. 2014. "Elsewhere, Ideally Nowhere: Shadow Banking and Offshore Finance." CITYPERC Working Paper No. 2014-01. London: City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re, City University London.
- Panitch, Leo, and Sam Gindin. 2012. *The Making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Verso.
- Pennington, Matthew. 2016. "Obama Orders U.S. Economic Sanctions on Myanmar Lifted." AssociatedPress, October 7, 2016. <https://www.pbs.org/newshour/world/myanmar-economic-sanctions-lifted>.
- Piketty, Thomas.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iketty, Thomas. 2015. Foreword to *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 The Scourge of Tax Havens*, by Gabriel Zucman. Translated by Teresa Lavender Fag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istor, Katharina. 2019. *The Code of Capital: How the Law Creates Wealth and Inequa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olanyi, Karl. [1944] 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 Porteous, Kimberley, and Emily Menkes. 2013. "Highlights of Offshore Leaks So Far."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CIJ), April 4, 2013. <https://www.icij.org/inside-icij/2013/04/highlights-offshore-leaks-so-far/>.
- Potts, Shaina. 2016. "Reterritorializing Economic Governance: Contracts, Space, and Law in Transborder Economic Geograph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48 (3): 523–39.
- Potts, Shaina. 2020. "(Re-)Writing Markets: Law and Contested Payment Geograph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52 (1): 46–65. First published online April 5, 2018. <https://doi.org/10.1177/0308518X18768286>.
- Ralph, Laurence. 2014. *Renegade Dreams: Living through Injury in Gangland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eich, Robert. 1983. "The Next American Frontier." *The Atlantic Monthly*, 43–58.
- Richkoff, Cheryl Adams. 2018. "All About Social Spiders, the Spiders That Live Together In Enormous Webs." *Weird Nature, Ranker*, updated September 23, 2021. <https://www.ranker.com/list/what-are-social-spiders/cheryl-adams-richkoff>.
- Rivera, Lauren. 2012. "Hiring as Cultural Matching: The Case of Elite Professional Service Firm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7 (6): 999–1022.

- Rose-Ackerman, Susan. 1999. *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for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e-Ackerman, Susan. 2010.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Bribery and Extortion."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6 (1): 217–38.
- Rossman, Gabriel. 2014. "Obfuscatory Relational Work and Disreputable Exchange." *Sociological Theory* 32 (1): 43–63.
- Sands, Gary. 2016. "Vietnam's Growing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other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Shows that Ordinary Vietnamese Are Becoming More Vocal." *The Diplomat*, October 29, 2016. <https://thediplomat.com/2016/10/vietnams-growing-environmental-activism/>.
- Sanyal, Rajib. 2012. "Patterns in International Bribery: Violations of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54 (3): 299–309.
- Sassen, Saskia. 2000.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Sassen, Saskia. 200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yer, Andrew. 2015. *Why We Can't Afford the Rich*. Bristol, UK: Policy Press.
- Schwartz, Nelson D. 2020. *The Velvet Rope Economy: How Inequality Became Big Business*. New York: Doubleday.
- Sedgwick, Eve Kosofsky. 1985.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haxson, Nicholas. 2011. *Treasure Islands: Uncovering the Damage of Offshore Banking and Tax Havens*.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 Sherman, Rachel. 2017. *Uneasy Street: The Anxieties of Afflu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ields, Michael, and Joshua Franklin. 2015. "Credit Suisse Will Sell Its US Private Bank." *Reuters*, September 13, 2015.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r-credit-suisse-plans-to-sell-us-private-bank-newspaper-2015-9>.
- Small, Mario Luis. 2017. *Someone To Talk T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Deborah R. R. 1986. "Population Genetics of *Anelosimus eximius* (Araneae, Theridiidae)." *Journal of Arachnology* 14 (2): 201–17.
- Spalding, Andy. 2015. "Notes from IACA, Part Three (concl.): A Facilitation Payments Question We Could Not Answer." *The FCPA Blog*, August 5, 2015. <http://www.fcpcablog.com/blog/2015/8/5/notes-from-iaca-part-three-concl-a-facilitation-payments-que.html>.
- Stiglitz, Joesph. 2019. *People, Power, and Profits: 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 of Disconten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Stovel, Katherine, and Lynette Shaw. 2012. "Brokera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8 (1): 139–158.
- Stuart, Forrest. 2016. *Down, Out, and Under Arrest: Policing and Everyday Life in Skid*

- Ro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wanson, Ana. 2018. "Trump Proposes Rejoining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w York Times*, April 12,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4/12/us/politics/trump-trans-pacific-partnership.html>.
- Szep, Jason, and Andrew R. C. Marshall. 2012. "Special Report: An image makeover for Myanmar Inc." *Reuters*, April 13, 2012.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yanmar-cronies-image-idUSBRE83B0YU20120413>.
- Tavory, Iddo, and Stefan Timmermans. 2014. *Abductive Analysis: Theoriz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The Irrawaddy*. 2021a. "Myanmar Junta Backs Beijing in Spat With US Over Origins of Coronavirus." *The Irrawaddy*, September 3, 2021. <https://www.irrawaddy.com/news/burma/myanmar-junta-backs-beijing-in-spat-with-us-over-origins-of-coronavirus.html>.
- The Irrawaddy*. 2021b. "Over 50 Top Officials from Myanmar's Ousted NLD Govt Face Long Jail Terms." *The Irrawaddy*, November 30, 2021. <https://www.irrawaddy.com/news/burma/over-50-top-officials-from-myanmars-ousted-nld-govt-face-long-jail-terms.html>.
- Tilly, Charles. 2007. *Democr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nkes, Paul. 2020. "Covid-19 a Catalyst for Vietnam Manufacturing." *Business Times*, updated October 26, 2020.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asean-business/covid-19-a-catalyst-for-vietnam-manufacturing>.
- Treanor, Jill. 2017. "US Authorities Lift Threat to Prosecute HSBC." *The Guardian*, December 11, 2017. <https://www.hic.com/en-gb/2017/12/12/us-authorities-lift-threat-to-prosecute-hsbc/>.
- Tsing, Anna Loewenhaupt. 2005. *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u, Anh, and Chi Le. 2018. "Grab Says It Will Not Pay Any Back Taxes Owed by Uber in Vietnam." *VnExpress*, April 6, 2018. <https://e.vnexpress.net/news/business/grab-says-it-will-not-pay-any-back-taxes-owed-by-uber-in-vietnam-3732953.html>.
- Turnell, Sean. 2009. *Fiery Dragons: Banks, Moneylenders, and Microfinance in Burma*. Copenhagen, Denmark: NIAS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ress.
- Turnell, Sean. 2011. "Myanmar in 2010: Doors Open, Doors Close." *Asian Survey* 51 (1):148–54.
-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6. "Hamburg Man Extradited from Vietnam on Fraud Charges." News release. Buffalo, NY: US Attorney's Office, We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December 9, 2016. <https://www.justice.gov/usao-wdny/pr/hamburg-man-extradited-vietnam-fraud-charges>.
-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20. "Goldman Sachs Charged in Foreign Bribery Case and Agrees to Pay Over \$2.9 Billion." News release.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October 22, 2020. <https://www.justice.gov/opa/pr/>

- goldman-sachs-charged-foreign-bribery-case-and-agrees-pay-over-29-billion.*
- USTR: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n.d.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TPP-Strategic-Importance-of-TPP-Fact-Sheet.pdf>.
- Vargas, Robert. 2016. *Wounded City: Turf Wars in a Violent Chicago Barri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eblen, Thorstein. 1921. *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New York: B. W. Huebsch, Inc.
- Venkatesh, Sudhir. 2008. *Gang Leader for a Day: A Rogue Sociologist Takes to the Streets*. New York: Penguin Press.
- Vu, Joseph. 2017. "Recent Changes to Vietnam's Transfer Pricing Regulations." *TP Talks*—PwC's Global Transfer Pricing Podcast. Episode 12. April 12, 2017. <https://www.pwc.com/gx/en/services/tax/transfer-pricing/podcasts/episode-12.html>.
- Weber, Max. [1922]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i, Shen. 2010. "China's Dilemma: How Can a Weak Company Law Regime Support a Strong Market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s? A Real 'Piggybacking' Case." *Business Law International* 11 (3): 195–224.
- Weitzman, Hal. 2022. *What's the Matter with Delaware? How the First State Has Favored the Rich, Powerful, and Criminal—and How It Costs Us Al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Hous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2016.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President Obama's Trade Agreement."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issues/economy/trade>.
- Witt, Michael A., and Gordon Redding. 2013. "Asian Business Systems: Institutional Comparison, Clusters and Implications for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Business Systems Theory." *SocioEconomic Review* 11 (2): 265–300.
- Woodman, Spencer. 2018a. "Michael Cohen Scandal a Reminder That the U.S. is a Tax Secrecy Paradis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CIJ), May 21, 2018. <https://www.icij.org/inside-icij/2018/05/michael-cohen-scandal-a-reminder-that-the-u-s-is-a-tax-secrecy-paradise/>.
- Woodman, Spencer. 2018b. "Paradise Papers Helps Reveal Illinois Governor Candidate's Offshor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CIJ), March 15, 2018. <https://www.icij.org/investigations/paradise-papers/paradise-papers-help-reveal-jb-pritzkers-offshore-connections/>.
- World Bank Group. 2018. Economy Profile of Vietnam. Doing Business 2019.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0827/131869-WP-DB2019-PUBLIC-Vietnam.pdf?sequence=1&isAllowed=y>.
- Worstell, Tim. 2016. "What Facebook and Apple Can Teach You about Transfer Pricing." *Forbes*, July 29, 2016.

- Wright, Tom, and Bradley Hope. 2018. *Billion Dollar Whale: The Man Who Fooled Wall Street, Hollywood,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chette Books.
- Young, Alford A. Jr. 2004. *The Minds of Marginalized Black Men: Making Sense of Mobility, Opportunity, and Future Life Chances*. Princeton Studies in Cultural Soci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Cristobal. 2018. *The Myth of Millionaire Tax Flight: How Place Still Matters for the Rich*.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Zaloom, Caitlin. 2006. *Out of the Pits: Traders and Technology from Chicago to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arroli, Jim. 2016. "JPMorgan Chase Agrees to Pay \$264 Million in Chinese Bribery Scheme." News segment, *All Things Considered*. Washington, DC: National Public Radio, November 17, 2016.
- Zelizer, Viviana A. Rotman. [1979] 2017. *Morals and Markets: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Zelizer, Viviana A. 2005. *The Purchase of Intim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Zelizer, Viviana A. 2012. "How I Became a Relational Economic Sociologist and What Does That M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40 (2): 145–74.
- Zhao, Grace. 2014. "Transfer Pricing Lands Apple, Starbucks, and Fiat in Hot Water." *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June 18, 2014. <https://gfintegrity.org/transfer-pricing-apple-starbucks-fiat-hot-water/>.
- Zhou, Laura. 2021. "China Announces New Myanmar Trade Route as It Seeks to Bolster Ties with Military Junt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5, 2021.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47583/china-announces-new-myanmar-trade-route-it-seeks-bolster-ties>.
- Zoellick, Robert B. 2010. "The End of the Third World? Modernizing Multilateralism for a Multipolar World." Delivered at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s, Washington, DC, April 14, 201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Zucman, Gabriel. 2014. "Taxing across Borders: Tracking Personal Wealth and Corporate Profi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 (4): 121–48. <https://pubs.aeaweb.org/doi/pdfplus/10.1257/jep.28.4.121>.
- Zucman, Gabriel. 2015. *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 The Scourge of Tax Havens*. Translated by Teresa Lavender Fag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索引

(本书索引标注页码皆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

阿伯特，安德鲁 (Abbott, Andrew) 236
阿佩尔，汉娜 (Appel, Hannah) 10, 236
埃斯特瓦，古斯塔夫 (Esteva, Gustavo) 19
爱尔兰 (Ireland) 139
昂山将军 (Aung San) 244n39
昂山素季 (Suu Kyi, Aung San) 18, 38, 41, 92, 217, 244n41
奥巴马，巴拉克 (Obama, Barack) 1, 37
奥巴马政府建立的合法税收减免政策 (Obama administration, legal tax breaks for foreign companies created by) 214
奥尼尔，吉姆 (O'Neill, Jim) 37
奥尼尔，斯坦利 (O'Neal, Stanley) 212
奥斯博格，约翰 (Osburg, John) 246n1

B

“巴拿马文件” (Panama Papers) 1, 152, 159, 212
贝格曼，帕特里克 (Bergmann, Patrick) 236

波茨，谢娜 (Potts, Shaina) 242n27
波德斯塔，约翰 (Podesta, John) 37
波德斯塔集团 (Podesta Group) 37
不平等 (inequality): 对全球资产登记的提议 (global asset registry, proposal for) 214–215; 精英 (elites and) 12–15; 抗议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Occupy Wall Street protests against) 211–212; 蛛网资本主义和日益不平等 (spiderweb capitalism and increasing) 220
布什，乔治 (Bush, George W.) 41

C

财富管理公司 (wealth management firms): 普通合伙人 and 有限合伙人 (general and limited partners in) 28; 投资网络和投资策略的示例 (investment network and strategy, examples of) 26–27, 150–164
超级大富豪 / 超高净值人士 (ultra-high-net-worth-individuals [UHNWIs]): 定义 (definition of) 12; 腐败 (corruption

and), 见“收受贿赂”“腐败”; 举例 (examples of) 25–26; 特殊目的公司的用途 (special purpose vehicles, use of), 见“特殊目的公司”; 依靠当地专业人士 (local professionals, reliance on) 78; 有罪不罚 (operating with impunity) 148–149; 与富豪的关系 (relations with HNWI), 见“蜘蛛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只只有罪不罚的隐形蜘蛛 (as a stealth spider operating with impunity) 149–155; 作为主导大蜘蛛 (as the dominant spiders) 5, 24, 27–28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New York Convention”]) 50
从属蜘蛛 (subordinate spiders),
见“富豪 / 高净值人士”

D

搭便车 (Piggybacking) 136; 另见“往返交易”“避税策略”
代理董事声明 (nominee director declaration) 32
代理人 (nominees): 通过指定代理人来掩盖贿赂的手段 (designation of as a means of obfuscating bribes) 110; 指定代理人的例子 (designated, example of) 191; 作为从属蜘蛛的代理人 (as subordinate spiders) 32–33; 作为注册包的一部分 (provided as part of an incorporation package) 158
戴德梁行 (Cushman & Wakefield) 219
盗窃 (theft) 91, 120–122, 182–185, 203
道德 (ethics): 机构审查委员会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IRBs]) 226–229, 232

道德困境 (moral dilemmas) 169–171, 185–186; 法律—道德的边界 (legal-moral boundaries) 183–184; 将行为视作为家庭而牺牲 (family sacrifice, framing actions as a) 170, 175–179; 绅士与穴居人得性别关系 (gentleman versus caveman, gendered relations and) 171–175; 要解决的地理边界 (geographic boundaries to address) 179–181; 已达极限的道德指南针, 以退出作为回应 (moral compass pushed to the limit, exit as response to) 181–185; 正当性 (justifications), 见“正当性”

德诺, 阿兰 (Deneault, Alain) 214

第 13310 号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 13310) 41

第 20/2017/ND-CP 号法令 [越南] (Decree No. 20/2017/ND-CP [Vietnam]) 142

定义 (definition of) 12; 公司秘书 (company secretaries) 32; 会计师 / 审计师 (accountants/auditors) 30–31; 基金经理 (fund managers) 30; 例如 (examples of) 25–26; 联结仪式, 背负风险 (bonding rituals, shouldering the burden of) 82; 律师 (lawyers) 31; 满足策略 (satisficing strategy of) 149, 150, 159, 167; 私人财富管理人 (private wealth managers) 29–30; 银行家 (bankers) 31–32; 与超级大富豪 / 超高净值人士的关系 (relations with UHNWIs), 见“蜘蛛间的关系”; 中间人 (fixers), 见“中间人”; 作为“落马者” (as the “fall person”) 148–149, 154–164; 作为白领阶层奴隶的富豪 (as white-collar slaves) 167; 作为从属蜘蛛 (as the subordinate spiders) 24, 28–29;

东南亚 (Southeast Asia): 缅甸 (Myanmar), 见“缅甸”; 越南 (Vietnam), 见“越南”; 中美在东南亚的竞争 (China-United States competition in) 36–37, 219

董事的辞职信 (director's resignation letter) 32–33; 剥削当地穷人 (dispossession of the local poor) 164–167

独立资产管理者 (independent asset managers) 35

段文厚 (Van Hau, Doan) 144

对全球资产登记的提案 (global asset registry, proposal for) 214–215

F

法恩, 加里·阿兰 (Fine, Gary Alan) 227

法雷尔, 贾斯廷 (Farrell, Justin) 241n9

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 (Anti-Fascist People's Freedom League [AFPF]) 244n39

反腐败者 (anti-corrupters) 91–98

《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 16, 40–41, 99, 112, 225–227

《反海外贿赂法》[韩国] (Foreign Bribery Act [FBA; South Korea]) 108

《反有组织犯罪及腐化组织法》(Racketeer Influence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RICO]) 40

方法论 (Methodology): 采访过程 / 经验 (interview process/experience) xi–xiv, 15, 17–18, 232–234, 237–239; 采访时长和投资者的成功之间的关系 (length of interview and success of investor, relationship of) 188; 定性数据 / 方法 (qualitative data/methods)

194, 223, 226–228, 249n4; 滚雪球采样 (snowball sampling) 18; 获取民族志数据 (access to ethnographic data) 225, 231–232; 男性主导世界中研究工作的性别悖论 (gendered paradox of research in a male-dominated world) 224, 236–240; 匿名隐私问题 (anonymity, issue of) 15, 17, 228–230, 234; 全球民族志 (global ethnography) 10–18; 数据分析和展示 (data analysis and presentation) 234–236; 数据透明度和可复制性 (data transparency and replication) 223, 226–230; 研究伦理与机构审查委员会 (research ethic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nd) 226–229; 研究问题的发展 (research questions, development of) 224–225, 230; 在灰色地带中研究 (research in the gray) 16–17; 资金 (funding) 230–231

菲亚特 (Fiat) 139

风险 (risk): 不能理性计算风险 (rationally calculating, impossibility of) 73; 通过特殊目的公司 (syndicating through SPVs) 138–139, 148, 155; 通过同性社会性联结来相互劫持对方以便帮助管理风险 (mutual hostage-taking through homoerotic bonding to help manage) 81; 投资于前沿市场和新兴市场 (investment in frontier/ emerging markets and) 59–60; 刑事指控的风险的经纪策略 (of criminal charges, brokerage strategies and) 115; 最小化 (minimizing) 65; 作为专业化过程的一部分 (syndicating as part of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135

弗雷格斯坦, 内尔 (Fligstein, Neil) 28

腐败 (corruption) 90–91, 122–124; 避开

腐败行为, 尝试腐败行为 (steering clear of, attempts at) 91–98, 114; 盗窃 (theft) 120–22, 182–185; 需要的腐败 (corruption required by) 159; 研究人员的伦理和方法论问题 (et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for researchers on) 226–229; 在西方有更高水平 (at a higher level in the West) 183; 在越南和缅甸 (in Vietnam and Myanmar) 38, 200; 另见 “收受贿赂” 富尔卡德, 玛丽昂 (Fourcade, Marion) 171 富豪 / 高净值人士 (high-net-worth individuals [HNWIs]) 5–6; 被盗窃 (theft by) 121–122; 代理人 (nominees) 32–33;

G

高盛集团 (Goldman Sachs) 1, 112, 160
戈夫曼, 艾丽斯 (Goffman, Alice) 226–228
格莱克曼, 霍华德 (Gleckman, Howard) 139
公共关系 (public relations) 119–120, 209
公众政治人物 (politically exposed people [PEPs]): 通过离岸金融中心支付的贿赂 (bribes paid through OFCs by) 36; 在私人资产 / 财富经理背后运作 (operating behind private asset/wealth managers) 15
古拜希, 哈德姆 (Al-Qubaisi, Khadem) 212
关系工作 (relational work): 关系经理 (relationship managers) 155–156; 前台工作 (front-office work as) 3; 绅士与穴居人的对比 (gentleman versus caveman) 171–175; 送礼 (gift-giving) 104–107; 通过关系工作的利益捆绑、相互要挟和一损俱损 (bundling, mutual hostage and sabotage through) 107–112; 同性社会

性联结 (homoerotic bonding) 78–82, 173–175, 238; 退出市场时的关系协调和关系崩坏 (coordination and sabotage in exiting markets) 187–188, 见 “退出 / 退出策略”; 由于关系工作失败而遭蓄意破坏 (sabotage as the result of failed) 200–201, 203–205; 由于关系破裂, 退出市场时出现经济饥荒 (breakdowns in, famine in exits due to) 193–194; 与国家官员关系破裂 (breakdown in relations with state officials) 195–201; 与在岸合作伙伴关系破裂 (breakdown in relations with onshore partners) 201–205; 与政府官员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见 “政府官员”; 在税务机关和会计师之间选择 (with tax authorities or accountants, choosing between) 132; 重要性 (significance of) 65, 69, 202, 210; “做见不得人的坏事” 以巩固关系 (“doing the dirty” to cement relationships) 173; 另见 “收受贿赂”

国际商业公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rporation [IBC]) 33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CIJ]) 152, 212

国家法律和秩序恢复委员会 (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 [SLORC]) 41, 244n41

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S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 [SPDC]) 41

《国家研究法案》[1974年] (National Research Act of 1974) 227, 249n4

H

哈里斯, 卡玛拉 (Harris, Kamala) 219

哈利迪, 特伦斯 (Halliday, Terence) 185, 236

哈林顿, 布鲁克 (Harrington, Brooke) 44, 229

海外路演 (roadshows offshore): 保护投资者 (investor protections) 62–64; 通过海外路演来筹集资金 (raising capital via) 55–56; 投资机会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64–65; 推销投资团队 (selling the investment team) 60–62; 准备幻灯片演示和最初展示的幻灯片 (preparation and initial PowerPoint slides) 56–60

《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2010年]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of 2010 [FATCA]) 34–35, 213

海洋银行 (Ocean Bank) 38

韩国 (Korea, Republic of [South]): 腐败和贿赂 (corruption and bribery in) 108; 入狱是成功商人的标志 (jail time as sign of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in) 178; 作为“新钻十一国”成员 (as “next eleven” country) 37

侯赛尼, 穆罕默德·巴达维 (Al-Husseiny, Mohammed Badawy) 212

候, 凯伦 (Ho, Karen) 3, 226

胡志明市 (Ho Chi Minh City): 试图强行收税 (attempted tax enforcement by) 144–145; 资本在房地产市场中的流通 (circulation of capital in property markets of) 39

花旗银行基金管理者 (CITI-Fund Administrator) 26–27

霍普, 布拉德利 (Hope, Bradley) 148

J

机构审查委员会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IRBs]) 226–228, 232

基德尔, 杰弗里 (Kidder, Jeffrey) 246n18

基金经理 (fund managers): 为看跌的投资者敲定交易, 基金经理的作用 (sealing the deal for bearish investors, role in) 82–87; 为看涨的投资者敲定交易, 基金经理的作用 (sealing the deal for bullish investors, role in) 77–78; 作为从属蜘蛛 (as subordinate spiders) 30; 作为境内投资者旅行的接待者 (as hosts of onshore investor tours) 72–73

加密货币 (cryptocurrencies) 217

加斯科因, 克拉克 (Gascoigne, Clark) 213

加速手续的钱财 (speed money), 见“疏通费”

家族企业办公室 (family offices) 29, 150, 193

监管透明与监管不透明的区别 (regulatory opacity distinguished from regulatory transparency) 244n37

交易经纪过程 (deal-brokering process) 54–55, 87–89; 筹集资金 (raising capital) 55–56; 筹集资金: 境内投资者旅行 (raising capital: onshore investor trips) 66–73; 筹集资金: 离岸路演 (raising capital: offshore roadshows) 56–65; 达成交易 (sealing the deal) 77–78; 达成交易: 避开“花钱玩灰色交易”的行业领域 (sealing the deal: avoiding sectors that require “pay to play”) 82–87; 达成交易: 关系资本主义和同性社会性联结 (sealing the deal: relational capitalism and homoerotic bonding) 78–82; 感觉和本能及其重要性 (feeling and instinct, importance of)

71-73, 76-77;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及其重要性 (connections between people, importance of) 65, 69, 另见“同性社会性联结”; 寻找交易 (sourcing the deal) 74-77

杰罗马克, 科林 (Jerolmack, Colin) 228
解开蛛网资本主义的困难 (spiderweb capitalism, difficulties of unraveling): 解开蛛网资本主义的障碍 (barriers to unraveling) 6-10; 美国的离岸司法管辖区 (offshore jurisdi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213-214; 缺少监管监管机构的机制 (regulating the regulators, lack of mechanism for) 214-216; 需要关于“全球”的理论化 (theorizing “the global”, need for) 216-217; 蛛网资本主义的系统性 (systemic nature of spiderweb capitalism) 211-212

金勋 (Kim, Hun) 39

金融精英 (financial elites): 标示了世界上最富有之人的地图 (map of the world's richest people) 14; 收入最高的前 10% 人群 (income of the top 10%) 13; 与金融精英相关的保密工作和缺乏社会团结 (secrecy and lack of social solidarity associated with) 16; 与美国和日本相比, 非西方金融精英所享有的优势 (advantages enjoyed by non-Western compared to American and Japanese) 34-36, 47-48, 114, 157; 越来越多的金融精英来自西方和第一世界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increasing numbers of outside the West and First world) 12, 15; 政治精英和金融精英 (political elites and) 35-36; 另见“富豪 / 高净值人士”“超级大富豪 / 超高净值

人士”

金砖四国 [巴西, 俄罗斯, 印度及中国] (BRIC [Brazi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countries) 37

经纪业务 (brokerage) 112-120; 另可见“收受贿赂”“中间人”

经济合作组织与发展组织共同报告标准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CRS]) 214

精英 (Elites): 金融 (financial), 见“金融精英”; 在拥有政治权力的男人和拥有经济资本的男人之间斡旋 (men with political power and men with economic capital, brokering relations between) 79, 见“同性社会性联结”; 政治 (political), 见“政治精英”

K

卡尔森, 珍妮弗 (Carlson, Jennifer) 236

卡拉瑟斯, 布鲁斯 (Carruthers, Bruce) 185

科恩, 迈克尔 (Cohen, Michael) 213

科威国际不动产 (Coldwell Banker [CBRE]) 71

可口可乐 (Coca-Cola) 44

克里普纳, 格雷塔 (Krippner, Greta) 236

空壳企业家主义 (paper entrepreneurialism) 8

控股公司 (holding companies) 44: 使用控股公司的示例 (example of use of) 163; 所有权结构 (ownership structure) 62; 作为连接全球金融要素的黏合剂 (as the glue that connects the elements of global finance) 9; 作为一家空壳公司 (as a paper company) 4

库哈斯, 雷姆 (Koolhaas, Rem) 19

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36–37, 200

会计师 / 审计师 (accountants/auditors):

税收确定性, 争取提供好的服务 (tax certainty, offering services that strive for) 142–144; 作为从属蜘蛛 (as subordinate spiders) 30–31

会计实践 (accounting practices): 操纵

(manipulation of) 129; 盗窃 (theft through) 121; 多套账簿的操作 (multiple books, operating with) 128, 141; 公平交易价格的计算 (arm's-length prices, calculating) 142; 往返交易 (round-tripping) 126; 转让价格 (transfer pricing) 126, 139–142

L

拉蒙特, 米歇尔 (Lamont, Michelle) 170

拉扎克, 纳吉布 (Razak, Najib) 1, 212

莱纳-沃斯, 丹 (Lainer-Vos, Dan) 107

莱斯纳, 蒂莫西 (Leissner, Timothy) 160

赖特, 汤姆 (Wright, Tom) 148

赖希, 罗伯特 (Reich, Robert) 8

朗, 伊丽莎白 (Long, Elizabeth) 249n4

勒, 安德鲁 (Le, Andrew) 220

离岸公司 (offshore companies): 国际金融 (in global finance) 1–2; 设置 (setting up) 156–160; 另见 “特殊目的公司”

离岸金融中心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s [OFCs]): 民族国家 (nation-states and) 9; 瑞士 (Switzerland) 33–34; 特拉华州 (Delaware) 213–214; 向东移动 (the shift eastward) 34–36; 新前沿市场 (new frontiers) 36–38; 另见 “香港” “新加坡”

离岸金融中心的用途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s [OFCs], functions of): 薄弱的当地银行机构 (weak local banking institutions and) 49–50; 避税 / 逃税 (tax avoidance/evasion) 48–49, 136–138; 更容易的离岸退出策略 (easier offshore exits) 52–53; 接触到更广泛的潜在投资者群体 (access to a wider pool of potential investors) 50–51; 离岸仲裁 (offshore arbitration) 50; 免受诉讼的资产保护 (asset protection from lawsuits) 51–52; 隐私 (privacy) 46–48

黎光定 (Lê, Dinh Q.) 107

利益捆绑 (bundling) 107–112

刘思达 (Liu, Sida) 236

刘特佐 (Low, Taek Jho) 1, 151, 159, 212

卢贝特, 史蒂文 (Lubet, Steven) 227

罗尔杜金, 谢尔盖 (Roldugin, Sergey) 241n1

罗斯曼, 加布里埃尔 (Rossman, Gabriel) 104, 246n8

落马的富豪 (fall guys/people, HNWI as) 148–149, 154–164

M

马尔斯基, 爱德蒙·J. (Malesky, Edmund J.) 39

麦卡洛克, 内尔 (McCulloch, Neil) 39

麦克亚当斯, 道格 (McAdams, Doug) 28

“满意原则”策略 (“satisficing” strategy): 富豪的 (by HNWI) 149, 159; 隐身超级大富豪的 (by a stealthy UHNWI) 150–151

美国 (United States): 反贿赂法与疏通费 (anti-bribery laws vs. facilitation payments

in) 99; 监管离岸资本 (regulation of offshore capital) 34–35, 47–48; 美国的离岸司法管辖区 (offshore jurisdictions in) 213–214; 美国金融精英所面临的劣势 (disadvantages faced by American financial elites) 34–36, 47–48, 114, 157; 制裁缅甸 (Myanmar, sanctions against) 41; 中国和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 (China and, 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between) 36–37, 219

米尔斯, C. 赖特 (Mills, C. Wright) 9, 15–16, 21, 24, 79, 245nn6–7

米歇尔, 普拉斯 (Michél, Pras) 1

缅甸 (Myanmar [Burma]): 昂山素季, 选举 (Aung San Suu Kyi, election of) 18; 奥巴马针对缅甸的行动 (Obama's actions reaching out to) 37; 不熟悉缅甸的潜在投资者 (potential investors unfamiliar with) 160–161; 尝试成立合资企业 (joint venture in, attempt to set up) 161–163; 反腐败 (anti-corrupters in) 92–98; 军事政变 (military coup in) 38, 217–218; 缅甸的裙带资本主义 (crony capitalism in) 38, 40–41, 68–69, 92, 95; 缅甸的在岸投资环境 (the onshore context in) 40–41; 抢占先机 (front-running in) 127–128; 人们从缅甸迁出 (outmigration from) 220; 通过在岸会议向投资者推销 (selling to investors through onshore conferences) 66–69; 投资和民主 (investment in, democracy and) 38; 外国直接投资和人为的资本流动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rtificial flows of capital and) 42–46; 外国直接投资和新军事政权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he new military regime and) 218; 外国直接投资明显来源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pparent sources of) 42–44; 寻找交易的例子 (sourcing the deal in, example of) 74–77; 研究 (research in) 228–229; 制裁 (sanctions against) 41; 制度性空白 (institutional voids in) 54; 中国和缅甸 (China and) 218; 专业化 (professionalization in) 141; 资本限制 (capital restrictions in) 161; 作为常见做法的离岸外包 (off-shoring as common practice in) 159

缅甸社会主义之路 (“Burmese Way to Socialism”) 40

《缅甸自由与民主法案》(Burmese Freedom and Democracy Act [BFDA]) 41

民族志 (ethnography), 见 “方法论”

摩根大通私人客户 (Chase Private Client) 192

摩根大通银行 (JPMorgan Chase, JP) 16–17, 112, 155

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192

莫汉蒂, 钱德拉 (Mohanty, Chandra) 19

莫兹罗, 安杰洛 (Mozilo, Angelo) 212

墨菲, 亚历山德拉 (Murphy, Alexandra) 228

N

奈, 阮德 (Nhat, Nguyen Duc) 39

奈温 (Ne Win) 40, 244n39

内斯维索娃, 阿纳斯塔西娅 (Nesvetailova, Anastasia) 242n27

女权主义的认识论 / 方法论 (feminist epistemology/methodology) 227, 249n4

女性 (women): 对待女性的方式作为评

- 价一个人的标准 (treatment of as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people) 172, 174–175 ; 同性社会性联结中的性别劳动 (gendered labor in homoerotic bonding) 79–82 ; 投资女性拥有或经营的企业 (female-owned or -run businesses, investment in) 85–87 ; 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做研究的性别悖论 (research in a male-dominated world, the gendered paradox of) 224, 236–240
- P**
- 帕兰, 罗内 (Palan, Ronen) 8, 242n27
- 《潘多拉文件》(Pandora Papers) 212
- 皮克林, 菲尔德 (Pickering, Field) 218
- 平行经济 (parallel economy) 164–165
- 苹果公司 (Apple) 138–139
- 破坏 (Sabotage): 通过破坏策略创造市场 (making markets through) 10 ; 退出市场的不成功经历 (experiences of in unsuccessful exits) 187–188, 200–201, 203–205, 208
- 普京, 弗拉基米尔 (Putin, Vladimir) 1, 241n1
- 普拉卡什, 马杜·苏里 (Prakash, Madhu Suri) 19
- 普里茨克, 彭妮 (Pritzker, Penny) 213
- 普里茨克, J. B. (Pritzker, J. B.) 45
- 普通合伙人 (general partners [GPs]) 28, 62
- Q**
- 前沿市场和新兴市场 (frontier and emerging markets): 道德迷宫 (moral maze of) 170, 另见“证明正当”“道德困境”; 东南亚 (Southeast Asia), 见“缅甸”“东南亚”“越南”; 风险和投资策略 (risk and investment strategy in) 26–27 ; 快速增长率 (rapid growth rates in) 19 ; 退出 (exiting from), 见“退出 / 退出策略”; 政治精英和金融精英的密切联系 (close connection of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elites in) 35–36 ; 制度性空白 (institutional voids in) 54
- 抢占先机 (front-running) 77, 126–127, 191
- 区别于隐私的保密 (secrecy distinguished from privacy) 47
- 全国民主联盟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 18, 41, 95, 217
- 全球的概念 (global, conceptions of the) 216–217
- 全球金融 (global finance): 不受民族国家的束缚 (untethered from nation-states) 6–8 ; 东亚和东南亚的崛起 (rise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8–19 ; 理解障碍 (barriers to understanding) 6–10 ; 全球金融中合法和非法的市场网络 (web of licit and illicit markets in) 1–2 ; 另见“蜘蛛网资本主义”
- 全球民族志 (global ethnography) 10–18 ; 另见“方法论”
- 裙带资本主义 (crony capitalism): 多样的国家市场关系以及裙带资本主义 (heterogenous state-market relations and) 40 ; 过渡时期 (transitioning from) 95, 123 ; 在缅甸 (in Myanmar) 38, 40–41, 68–69, 218
- R**
- 阮图 (Nguyen, Tu) 39

瑞士 (Switzerland): 新加坡和开曼群岛的
银行办事处 (banking offices in Singapore
and the Cayman Islands) 35; 作为离岸金
融中心 (as an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
33-36

瑞士信贷银行 (Credit Suisse) 35

润滑打点者 (greasers) 91, 98-104

S

萨摩亚 (Samoa) 46, 158-159, 161-162

萨森, 萨斯基娅 (Sassen, Saskia) 7

塞舌尔 (Seychelles) 46

赛吉维克, 伊芙 (Sedgwick, Eve) 79,
245n7, 245n9

沙克森, 尼古拉斯 (Shaxson, Nicholas) 8,
24, 243n4, 245n55

舍曼, 蕾切尔 (Sherman, Rachel) 241n9

施瓦茨, 纳尔逊 (Schwartz, Nelson) 221

收受贿赂 (bribes and bribery) 90-91,
122-124: 避免“花钱玩灰色交易”
(avoiding “pay to play”) 82-87; 避免
纳税 (to avoid enforcement of taxation)
127-128, 130; 东亚/东南亚投资者
对贿赂司空见惯 (comfort of East/
Southeast Asian investors with) 40; 例
如 (examples of) 153-155; 模糊化实践
(blurring practices) 107; 润滑打点者支
付的疏通费 (facilitation payments made
by greasers) 91, 98-104; 收受贿赂的
合理性 (rationalization of) 114-115;
收受贿赂在越南的必要性 (necessity of
in Vietnam) 78-79, 173, 177-178; 受
贿者利用贪污手段谋取不义之财 (graft
engaged in by bribers) 91; 通过离岸金
融中心的代理人账户支付 (paid through

nominee accounts in OFCs) 36; 为了收
受贿赂专门建立的特殊目的公司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et up for the purpose
of) 159, 162; 掩盖策略 (obfuscation
strategies) 104; 掩盖策略: 经纪业务
费 (obfuscation strategies: brokerage)
112-120; 掩盖策略: 利益捆绑 (obfuscation
strategies: bundling) 107-112; 掩盖策略:
送礼 (obfuscation strategies: gift-giving)
104-107; 另见“腐败”

首次公开募股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
37, 113

疏通费 (facilitation payments) 91, 98-104
数据 (data); 见“方法论”

税收 (Taxation): 避税 (tax avoidance)
125; 避税: 避税的方法 (tax avoidance:
methods of) 136-142; 避税: 专业化 (tax
avoidanc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131-
136; 合规避税比逃税更麻烦 (compliance
as more cumbersome than evasion)
129-130; 离岸金融中心的功能 (functions
of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s [OFCs] and)
48-49; 全球精英的税务策略 (strategies
of global elites) 125-126, 145-147; 税
收确定性 (tax certainty) 125; 税收确
定性: 期望 (tax certainty: aspirations
to) 142-144; 税收确定性: 挑战 (tax
certainty: challenges to) 144-145; 逃税 (tax
evasion) 125-131; 逃税和避税之间的
区别 (evasion and avoidance, distinction
between) 131-133; 政府强制征税
(government coercion through) 196-97,
199-200

《私募备忘录》(Private Placement
Memorandum [PPM]) 26-27

斯蒂格利兹, 约瑟夫 (Stiglitz, Joseph) 221

斯莫尔, 马里奥·路易斯 (Small, Mario

Luis) 205–206, 209

送礼 (gift-giving) 104–107

随走的士公司 (Grab Taxi) 144–145, 147

T

特拉华州 (Delaware) 213–214

特朗普, 唐纳德 (Trump, Donald) 1, 37

特鲁多, 贾斯汀·皮埃尔 (Trudeau, Justin

Pierre) 37

特殊目的公司 [SPVs] (special purpose vehicles [SPVs]) 44, 46; 设立 (setting up) 156–160, 162; 设立离岸特殊目的公司作为文书专用公司 (as a paper company set up offshore) 4; 所有权结构中包括 (ownership structure including) 198; 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共担风险 (syndicating risk through) 138–139, 148; 投资者的优势 (advantages for investors of) 4, 50–52, 63; 往返交易 (round-tripping and) 136–139; 作为连接全球金融要素的黏合剂 (as the glue that connects the elements of global finance) 9

《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 152

通用授权书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33

同性社会性联结 (homoerotic bonding)

78–82, 173–175, 238

投资旅游 (investment tourism) 66: 会议

(conferences) 66–69; 精心策划的旅程

(highly curated tours) 69–73

投资者 / 投资 (investors/investment): 国

家官员和投资者互相推卸责任 (state

officials and, shifting of blame between)

164–167; 国家官员和投资者之间的共

生关系 (state officials and,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146; 基于对市场潜力和直觉的感受 (based on feeling of market potential and intuition) 71–73, 76–77; 驾驭官僚结构 (navigating bureaucratic structures) 101–104, 见“收受贿赂”“关系工作”; 区域性投资 [东亚和东南亚] (reg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08, 133–134; 日本和西方与东亚和东南亚的对比, 关于发展及投资阶段 (Japanese and Western vs.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phases of development and) 112–115; 试探性买家 (“tire-kickers”) 78; 特殊目的公司的吸引力 (special purpose vehicles, attractions of) 50–51, 63, 另见“特殊目的公司”; 投资者交易经纪流程 (deal-brokering process), 见“交易经纪流程”; 与政府官员和其他投资者的关系 (relations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other investors), 见“关系工作”

退出 / 退出策略 (exit/exit strategies): 典型投资期限为七年 (typical seven-year) 30, 92, 189; 东亚 / 东南亚的投资者 (of East/Southeast Asian investors) 112–113, 133; 经济饥荒, 两种退出经历之一 (famine from, two experiences of) 193–205; 来自海外投资 (from offshore investments) 50, 52; 前沿市场中的盛宴和饥荒 (feast and famine in frontier markets) 187–188, 210; 盛宴, 孤独 / 与经济盛宴相关的社交隔离 (feast from, loneliness/ social isolation associated with) 206–207; 盛宴, 两种退出经历之一 (feast from, two experiences of) 189–193; 盛

宴和饥荒, 社会—情感性体验 (feast and famine, socio-emotional experiences of) 205–206; 由于经济饥荒而退出, 依赖于社交网络人脉 (famine from, reliance on social networks during) 207–210; 在长期投资中避免腐败 (avoiding corruption with longer investment spans) 92; 专业化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135, 143–144; 作为最终退出策略的首次公开募股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 as the ultimate) 113

W

外国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测量存在缺陷, 投资资金流 / 投资网络 (flaws in the measurement of, investment flows/webs and) 42–44; 构成投资网络的人为资本流动 (artificial flows of capital constituting investment webs) 44–46; 胡志明市的竞赛赛道 (competing circuits in Ho Chi Minh City) 39; 另见“投资者 / 投资”

王爱华 (Ong, Aihwa) 19

往返交易的避税策略 (round-tripping, tax avoidance strategy of) 126, 136–139

威尔逊, 迈克尔 (Wilson, Michael) 122

微软公司 (Microsoft) 44

韦伯, 马克斯 (Weber, Max) 216

韦茨曼, 哈尔 (Weitzman, Hal) 213

委托代理问题和盗窃 (principal-agent problems, theft and) 120–122

文卡特斯, 素德 (Venkatesh, Sudhir) 227

沃特克, 杰夫 (Wodtke, Geoff) 236

吴觉温 (Kyaw Win, U) 93–94

吴努 (U Nu) 244n39

武, 约瑟夫 (Vu, Joseph) 142

武美美 (Vu, Mimi) 219

X

希利, 基兰 (Healy, Kieran) 171

夏基, 阿曼达 (Sharkey, Amanda) 236

“先占领, 再创收”的商业经营策略 (“spray and pay” business strategy) 202

香港 (Hong Kong): 设立特殊目的公司 (special purpose vehicles set up in) 46; 为特殊目的公司开设银行账户 (bank account for an SPV, setting up a) 162–163; 在香港运作的财富经理 (wealth manager working out of) 155–164; 作为离岸金融中心 (as an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 35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HSBC]) 34–35

协作 (Coordination): 成功退出的经验 (experiences of in successful exits) 187, 193; 通过协作来做市 (making markets through) 10

谢伊, 史蒂夫 (Shay, Steve) 247n12

新加坡 (Singapore): 瑞士的银行以及瑞士的银行与新加坡之间的关系 (banks in Switzerland and, relations between) 35; 设立特殊目的公司 (special purpose vehicles set up in) 46; 隐身的秘密蜘蛛在新加坡之外的运作 (stealth spider operating out of) 149–155; 作为离岸金融中心 (as an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 35

新兴市场 (emerging markets), 见“前沿市场和新兴市场”

“新钻十一国”集团国家 (“next eleven” [N-11] countries) 37

信任 (trust): 投入时间建立信任关系
(investing time to build relationships of)
135; 另见 “关系工作”

星巴克 (Starbucks) 139

性别悖论 (gendered paradox) 224,
236–240

Y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36

研究设计和研究过程 (research design and process), 见 “方法论”

扬, 阿尔 (Young, Al) 170

扬, 克里斯托巴尔 (Young, Cristobal) 8
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 [一马公司]
(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 [1MDB]
company) 1, 149–150, 160, 168, 212

银行和银行业 (banks and banking): “知悉您的顾客 / 客户” 法规 (“know your customer/ client” [KYC] regulations) 34;
薄弱的本地银行机构和离岸银行 (weak local banking institutions and offshore banking) 49–50; 为特殊目的公司设立账户 (setting up an account for an SPV) 162–163; 作为从属蜘蛛 (bankers as subordinate spiders) 31–32

隐私 (Privacy) 46–48

英属开曼群岛 (Cayman Islands) 35,
151–152, 156

英属维尔京群岛 (British Virgin Islands [BVI]) 156–157, 159–160, 191

影响力投资 (impact investing) 153

优越越南公司 (Uber Vietnam) 144–145,

147

有限合伙人 (limited partners [LPs]) 28

有限责任公司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 [LLC]) 33

有罪不罚 (impunity, operating with) 148–149, 167–168: 财富 (wealth and) 164;
超级大富豪 (by UHNWIs) 149–155;
富豪 (by HNWIs) 163–164; 平行经济中的土地掠夺 (land grabs in a parallel economy) 164–167

《欲望交易: 亚洲崛起、西方衰落、全球性产业中的资金暗流》[金伯莉·凯·黄]
(*Dealing in Desire: Asian Ascendancy, Western Decline, and the Hidden Currencies of Global Sex Work* [Hoang])
xiii, 3, 170, 224, 231–232

越南 (Vietnam): 从当地穷人手中夺取土地 (taking land from the local poor in) 165–167; 道德困境 (moral dilemmas in) 172–179; 对西方国家的重要性 (importance of for Western nations) 37;
对越南的研究 (research in) 229; 多样的国家—市场关系 (heterogenous state-market relations in) 40; 腐败和贿赂 (corruption and bribery in) 38, 108–112, 173, 177–178, 200; 胡志明市 (Ho Chi Minh City), 见 “胡志明市”; 经纪策略、中间人和贿赂 (brokerage strategies, fixers, and bribes in) 114–120; 经济增长率 (growth rate of) 37; 抢占先机 (front-running in) 127, 191; 随走的士 / 优越越南交易对税收执法的影响 (Grab Taxi/Uber Vietnam deal, tax enforcement implications of) 144–145; 通过精心策划的境内旅行向投资者推销 (selling to

investors through onshore highly curated trips) 69–73; 通过离岸路演向投资者推销 (selling to investors through offshore roadshows) 56–65; 退出投资导致的投资饥荒 (famine in exits from investments in) 194–205; 外国直接投资和人为的资本流动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rtificial flows of capital and) 42–46; 外国直接投资的明显来源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pparent sources of) 42–44; 移民别国 (outmigration from) 220; 用“越南的处事方式”做生意 (“Vietnamese way”, doing business the) 129, 177–178; 在岸投资市场环境 (the onshore context in) 38–40; 在市场上首次公开募股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s], market for) 37; 制度性空白 (institutional voids in) 54; 制造业和新冠疫情危机 (manufacturing in, the Covid-19 crisis and) 219; 专业化 (professionalization in) 131–133; 作为“新钻十一国”成员 (as “next eleven” country) 37

Z

在灰色地带游走 (playing in the gray): 超级大富豪和富豪在灰色地带中的相对位置 / 扮演的角色 (relative positions/roles of UHNWIs and HNWIs in) xiv, 29; 关于在灰色地带游走的道德考量 (moral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见“证明正当”“道德困境”; 连续 (continuum of) 91; 税收 (taxation and), 见“税收”; 希望最低程度进入灰色地带的投资者的替代策略 (alternative strategy for investors looking to minimize) 82–87; 学

术研究 (scholarly research and) 16–17; 拥有多数控制权的离岸 / 少数股权投资, 策略 (offshore/minority investment with majority control, strategy for) 63–64; 有罪不罚 / 免责 (with impunity), 见“有罪不罚”; 在灰色领域中赚的钱 (money captured by) 73; 掌握这种艺术 / 游戏 (mastering the art/game of) xiv; 蛛网的构建 (web construction and) 6
泽利泽, 微微安娜 (Zelizer, Viviana) 245n3
扎鲁姆, 凯特琳 (Zaloom, Caitlin) 226
占领华尔街 (Occupy Wall Street) 211–212
证明正当 (Justifications): 道德制度 (moral regimes of) 171, 186; 逃税的理由 (for tax evasion) 129; 以家庭为导向 (family-oriented) 170, 175–179; 用于支付回扣的特殊目的公司 (for SPV used to pay kickbacks) 162; 另见“道德困境”
《证券交易法》[1934年]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99
政府官员 (government officials): 不愿接受采访 (reluctance to be interviewed) 216; 低薪和腐败 (low salaries for, corruption and) 98, 131; 关系破裂 (breakdown in relations with) 195–201; 贿赂 (bribing), 见“收受贿赂”; 同性社会性联结 (homoerotic bonding with) 78–82; 在缅甸及其他地区的腐败 (corruption in Myanmar and) 93–95; 自由量裁权和税收 (discretion of, taxation and) 128–131
政治精英 (political elites): 将责任推卸给外国投资者 (shifting blame to foreign investors) 164–167; 金融精英 (financial elites and) 35–36; 投资者与政治精英的关系 (investor relations with), 见“关

- 系工作”；政治精英的孩子（children of）111；
-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经费（funding from）230；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机构审查委员会（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226–227, 232；通过与芝加哥大学的关联而获得的研究课题（access to research subjects through association with）231–232
- “知悉您的顾客 / 客户”法规（“know your customer/client” [KYC] regulations）34, 47–48
- 蜘蛛（spiders）：阿内蛛属社交蜘蛛（*Anelosimus eximius*）22, 193；从属型蜘蛛（subordinate），见“富豪 / 高净值人士”；秘密操作（stealth, operations by）149–155；群体中的（communal）22；印在一美元钞票上面（on the US one-dollar bill）22–23；主导型蜘蛛（dominant），见“超级大富豪 / 超高净值人士”
- 蜘蛛之间的关系 [超级大富豪与富豪]（spider relations [between UHNWIs and HNWIIs]）xiv, 5–6：复杂性（complexity of）28–29；富豪成了替罪羊，而超级大富豪则有罪不罚（HNWIs as the fall guy while UHNWIs operate with impunity）148–149, 154–164，另见“有罪不罚”；区分主导型蜘蛛和从属型蜘蛛（differentiating between dominant and subordinate spiders）11–12, 27–28, 167；退出经历（exit experiences and）188–189, 193；在灰色地带游走（playing in the gray and）122–124
- 治理模式（governance, modes of）39–40
- 中国（China）：美中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对抗（rivalry in Southeast Asia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36–37, 219；缅甸和中国（Myanmar and）218；作为金砖国家（as BRIC country）37
- 中间人（Fixers）：中介 / 贿赂（brokerage/bribery by）36, 112, 115–120, 195；作为从属型蜘蛛（as subordinate spiders）33
- 蛛网资本主义（spiderweb capitalism）5–6, 53；不受民族国家束缚（nation-states, untethered from）6–8；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of）24；关系联结（relational connections and）194，另见“关系工作”；贿赂和腐败（bribery and corruption）122–124，另见“收受贿赂”“腐败”；将在岸投资与离岸公司联系起来（connecting onshore investments to offshore vehicles）42–46，另见“外国直接投资”；交易经纪流程（deal-brokering process）88–89，另见“交易经纪流程”；解决蛛网资本主义问题所需要的新型社会契约（new social contract required for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221；猎物（the prey）220–221；税收（taxation and）145–146，另见“税收”；在灰色地带游走是关键（playing in the gray as key to）6，另见“在灰色地带游走”；最近的事件和蛛网资本主义的重新配置（reconfiguration of, recent events and）217–219
- 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避税（tax avoidance and）126, 131–135；外国和当地合作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tensions between foreign and local partners over）202–203；专业化的过程（process of，）10, 30, 93, 112；转让定价（transfer

- pricing and) 140–141
- 转让定价 (transfer pricing) 126 : 强制执行越南第 20 号法令 (enforcement of Decree 20 rules in Vietnam) 142–143 ; 作为一种避税策略 (as a tax avoidance strategy) 136, 139–142
- 资本 (capital): 通过离岸路演来筹集资金 (raising through offshore roadshows) 56–65 ; 通过境内投资者旅行来筹集资金 (raising through onshore investor trips) 66–73 ; 隐形 (stealth) 155 ; 真实的人和全球资本 (real people and global) 9 ; 资本的人为流动 (artificial flows of) 45
-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裙带 (crony), 见 “裙带资本主义” ; 同性社会性联结以及关系资本主义 (relational, homoerotic bonding and) 78–82 ; 蛛网 (spiderweb), 见 “蛛网资本主义”
- 资产保护信托 (asset protection trusts [ATPs]) 52
- 祖克曼, 加布里埃尔 (Zucman, Gabriel) 8, 146, 214–217
- 作为从属型蜘蛛的公司秘书 (company secretaries as subordinate spiders) 32
- 作为从属型蜘蛛的律师 (lawyers as subordinate spiders) 31
- 作为从属型蜘蛛的私人财富经理 (private wealth managers as subordinate spiders) 29–30

-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 德斯蒙德·图图 著
-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 纳尔逊·曼德拉 著
- 003 断臂上的花朵：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 奥比·萨克斯 著
-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
-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
-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 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
[爱尔兰] 康纳·奥克莱利 著
-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 奥兰多·费吉斯 著
-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 伊恩·布鲁玛 著
- 010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
- 011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
- 012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 伊恩·布鲁玛 著
-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 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 卡蒂·马顿 著
-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 奥兰多·费吉斯 著
-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
- 017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英] 劳伦斯·里斯 著
- 018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日] 小熊英二 著
- 019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

- 020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
[美] 尤金·罗根 著
- 021 国家构建：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
- 022 战争、枪炮与选票
[英] 保罗·科利尔 著
- 023 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美] 弗里茨·斯特恩 著
- 024 创造日本：1853—1964
[荷] 伊恩·布鲁玛 著
- 025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英] 奥兰多·费吉斯 著
- 026 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
[荷] 伊恩·布鲁玛 著
- 027 教宗与墨索里尼：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崛起秘史
[美] 大卫·I. 科泽 著
- 028 明治天皇：1852—1912
[美] 唐纳德·基恩 著
- 029 八月炮火
[美] 巴巴拉·W. 塔奇曼 著
- 030 资本之都：21 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英] 拉纳·达斯古普塔 著
- 031 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
[美] 伊娃·霍夫曼 著
- 032 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
[英] 奥兰多·费吉斯 著
- 033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乌拉圭]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著
- 034 不敢懈怠：曼德拉的总统岁月
[南非] 纳尔逊·曼德拉、曼迪拉·蓝加 著
- 035 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
[美] 巴巴拉·W. 塔奇曼 著
- 036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日] 鹤见俊辅 著
- 037 印尼 Etc.：众神遗落的珍珠
[英] 伊丽莎白·皮萨尼 著
- 038 第三帝国的到来
[英] 理查德·J. 埃文斯 著

- 039 当权的第三帝国
[英] 理查德·J. 埃文斯 著
- 040 战时的第三帝国
[英] 理查德·J. 埃文斯 著
- 041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
[德] 贝蒂娜·施汤内特 著
- 042 残酷剧场：艺术、电影与战争阴影
[荷] 伊恩·布鲁玛 著
- 043 资本主义的未来
[英] 保罗·科利尔 著
- 044 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
[墨] 恩里克·克劳泽 著
- 045 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全球秩序的重建
[英] 亚当·图兹 著
- 046 风雨横渡：英国、奴隶和美国革命
[英] 西蒙·沙玛 著
- 047 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
[英] 亚当·图兹 著
- 048 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
[美] 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 著
- 049 美国的反智传统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著
- 050 东京绮梦：日本最后的前卫年代
[荷] 伊恩·布鲁玛 著
- 051 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
- 052 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
[美] 桥本明子 著
- 053 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
[法] 让·哈茨菲尔德 著
- 054 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 20 世纪
[美] 康拉德·H. 雅劳施 著
- 055 刚果战争：失败的利维坦与被遗忘的非洲大战
[美] 贾森·斯特恩斯 著
- 056 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民族主义、世俗化与现代中东的困境
[美] 福阿德·阿贾米 著
- 057 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
[英] 保罗·科利尔 约翰·凯 著

- 058 最底层的十亿人：贫穷国家为何失败？
[英] 保罗·科利尔 著
- 059 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
[美] 马里乌斯·詹森 著
- 060 创造欧洲人：现代性的诞生与欧洲文化的形塑
[英] 奥兰多·费吉斯 著
- 061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 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
[法] 阿莱特·茹阿纳 著
- 062 无尽沧桑：一纸婚约与一个普通法国家族的浮沉，1700—1900
[英] 艾玛·罗斯柴尔德 著
- 063 何故为敌：1941 年一个巴尔干小镇的族群冲突、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
[美] 马克斯·伯格霍尔兹 著
- 064 狼性时代：第三帝国余波中的德国与德国人
[德] 哈拉尔德·耶纳 著
- 065 毁灭与重生：二战后欧洲文明的重建
[英] 保罗·贝茨 著
- 066 现代日本的缔造
[美] 马里乌斯·詹森 著
- 067 故国曾在：我的巴勒斯坦人生
[巴勒斯坦] 萨里·努赛贝 著
- 068 美国资本主义时代
[美] 乔纳森·利维 著
- 069 大清算：纳粹迫害的遗产与对正义的追寻
[英] 玛丽·弗尔布鲁克 著
- 070 1914 年一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迷惘一代”的诞生
[美] 罗伯特·沃尔 著
- 071 渗透边界的秘密贸易：东南亚边境地带的走私与国家，1865—1915
[美] 埃里克·塔利亚科佐 著
- 072 欧洲告急：丘吉尔、奥威尔与自由之战
[美] 托马斯·E. 里克斯 著
- 073 他们也是幸存者：纳粹大屠杀亲历儿童的人生与记忆
[加] 丽贝卡·克利福德 著
- 074 蛛网资本主义：全球精英如何从新兴市场攫取利益
[美] 金伯莉·凯·黄 著



理想国译丛

imaginist [MIRROR]

蛛网资本主义：

全球精英如何从新兴市场攫取利益

SPIDERWEB CAPITALISM:

HOW GLOBAL ELITES

EXPLOIT FRONTIER MARKETS

美国社会学学会全球和跨国研究领域最佳学术著作奖获奖作品

美国出版商协会专业与学术出版奖获奖作品

金伯莉·凯·黄进行了开创性的实地研究，揭示了前沿市场中的资本通过复杂的离岸子公司网络被输送和保护。这本书以清晰且引人入胜的方式总结了全球金融网络的运作方式，是了解 21 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必读之作。

——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副教授

在这部扣人心弦的著作中，金伯莉·凯·黄邀请我们进入全球高级金融世界。她用犀利的文笔揭露了超级大富豪可以自由编织的复杂交易网络，这些交易网络打破了限制世界其他地方的法律、道德、制度和主权的界线。这是一部关于当代资本形成的勇敢而有力的作品。

——李静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

这本书揭示了一种秘密且通常具有犯罪性质的运作机制如何帮助富人攫取和保护他们的钱财与声誉……在这项精彩的研究中，金伯莉·凯·黄展示了蛛网资本主义如何直接导致了不平等。这种资本主义是一场零和博弈，在其中，贩毒集团、有组织犯罪和超级大富豪难以区分……这是一本揭露真实犯罪活动的学术著作，可读性极强，读来令人十分愤慨。

——《柯克斯书评》

上架建议：社会学、国际关系、经济

ISBN 978-7-222-23168-9



9 787222 231689 >

定价：98.00 元

理
想
国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